中国学生运动史

ZHONGGUO XUESHENG YUNDONGSHI

翟作君 蒋志彦 著

学林出版社

中国学生运动史

翟作君　蒋志彦著

學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朱敏彦
封面设计：甘晓培

中国学生运动史　　翟作君　蒋志彦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扬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330,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16—085—X/K・3　　定价：18.00 元

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序

在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一支由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组成的革命队伍，每逢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都首先觉悟和行动起来，起到了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五四运动是这样，一二九运动是这样，五二〇运动也是这样。毛泽东高度赞扬说："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①

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过巨大贡献和起过重大作用的青年学生运动，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尤其是全面系统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很少，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多，好的著作更不多见，而青年学生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又很重要，亟需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运动的性质是什么？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对大学生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说："希望你们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当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② 在这里，恩格斯称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而他们与"体力劳动的工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兄弟”是属同一个队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是否称得上“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如果承认这个观点，那么中国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起，就是在同一队伍中并肩战斗的兄弟，他们之间仅仅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而不是其他。青年学生运动应该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又比如说，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 五四运动之初是一次伟大的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后来才转化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爱国反帝斗争。那么，怎样理解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呢？所以说，对青年学生运动的评价就直接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性质问题。再比如说，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对科学技术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现代化建设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制定知识分子政策至关重要。类似这样的问题，有些虽属于知识分子的内容，但与青年学生和学生运动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为青年学生毕竟是知识分子的后备军。

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应当重视对青年学生运动的科学研究，希望广大的教师、学者和专家们经过辛勤的劳动，在这方面创造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出版一批思想和内容好的著作，引导和教育现代社会主义青年学生，继承中国学生运动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但愿翟作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蒋志彦的专著《中国学生运动史》能在这方面产生启发、促进和引导的效果。是为序。

夏东元　贺世友

1993年11月26日

前　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巨卷，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起先锋和桥梁作用的是一代代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的几十年的革命活动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起着奔走呼号、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应当载入中国革命运动的史册。

《中国学生运动史》正是从微观的角度反映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个侧面，一部伟大的客观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正是千万个微观革命史汇合成的洪流。学生运动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紧密结合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在旧中国，当祖国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凌辱和侵犯时，当国内人民正当合理的要求受到当时政府的迫害和血腥镇压时，先进的青年学生总是首先掀起全国性的热血沸腾的革命运动。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桥梁作用。无论是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5 年的五卅运动，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抗议运动，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配合工人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运动，1935 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全国大中小城市包括偏僻的乡村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投身抗日武装和建设民主根据地的运动，抗战后方的救国宣传和支援前线运动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这些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国家独立、人民民主而进行的一次次的英勇斗争，其规模、声势和持久

性是全世界各国学生运动史上所罕见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学生运动史》就是以翔实的史料、鲜明的观点，记录了一次又一次的学生运动史实，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学生运动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奋起团结自救的爱国主义运动。

《中国学生运动史》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容"新"。近几年来，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各地区学生运动史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大量史料的挖掘、整理、公布，为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些研究禁区被打开，从而使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部著作对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作了反映，可使读者大体上了解这一领域中几年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内容"全"。著作既重点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生运动光辉业绩，又记述了五四运动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热血青年学生为了救国救民，在沉沉黑夜里寻求真理、追求光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历程；既反映了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内青年学生运动，又反映了海外华侨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重大贡献；既反映了根据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运动，又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斗争。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学生运动历史的全貌作了客观的反映和描绘。

三是内容"感人"。本书运用了翔实的史料，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讴歌了中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业绩，展现了他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不为酷刑所屈，不为利诱所动，立场坚定、机智果断、坚定不渝、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及许多可歌可泣、动人心弦的故事，因而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30年来，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回顾和总

结这些经验，将有助于当年参加或领导过学生运动的老同志重温历史、焕发青春，更能激励今天和明天的青年一代继承和发扬中国青年学生的光荣革命传统，也能为今天从事青年和学生工作的同志提供借鉴，在新的历史时期自觉地担负起振兴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使命。总之，有利于我们回顾过去，面向未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学生

一、新式学校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 …… (1)
1. 中国新式学校的产生和青年学生群的出现 …… (1)
2. 近代中国青年学生群的历史特点 …… (6)
二、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 …… (9)
1. 留日高潮和爱国团体的出现 …… (9)
2. 拒法、拒俄斗争和国内学潮 …… (12)
3. 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 (14)
三、十月革命和中国学生觉醒 …… (16)
1. 新文化运动对学生的影响 …… (16)
2. 走俄国人的路 …… (18)
3. 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和学生救国会的产生 …… (20)
4. 各种学生社团的出现 …… (23)

第二章　光辉的五四爱国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 …… (26)
1.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 (26)
2. 五四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 …… (28)
3. 北京学联的成立和被捕同学的获释 …… (32)
二、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涨 …… (34)

1. 蔡元培出走和挽蔡斗争胜利 …… (34)
2. 5月19日总罢课 …… (35)
3. 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 …… (37)
三、五四爱国运动的新阶段——六三运动 …… (40)
1. 6月3日北京大逮捕 …… (40)
2. 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 …… (41)
3. 拒签和约斗争的胜利 …… (43)
四、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 (44)
1. 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44)
2. 各地学生联合会的发展 …… (46)
五、五四运动的延续和意义 …… (49)
1. 对鲁案的声援和觉悟社的诞生 …… (49)
2.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 …… (51)
3. 对闽案的声援 …… (53)
4. 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 …… (54)

第三章　改造社会的探索

一、学生运动的挫折 …… (56)
1. 全国学联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 …… (56)
2. 第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59)
二、青年学生改造社会的探索 …… (60)
1. 改造社会的呼声 …… (60)
2. 研究新思潮 …… (62)
3.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 (67)
4. 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 (72)
5. 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 …… (77)
三、全国学生运动的消沉 …… (80)
1. 北京教潮和安徽学潮 …… (80)

2. 学运方针的争论和全国学联的分裂 …… (83)

第四章　学生运动的历史转折

一、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和驱彭挽蔡斗争 …… (87)
1. 资产阶级的学制改革运动 …… (87)
2. 封建文人和军阀政府的复古教育 …… (88)
3. 北京学生的驱彭挽蔡斗争 …… (89)
二、学生运动新方针的制定 …… (93)
1.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北京学潮的正确指导…… (93)
2. 第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96)
3. 第五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加入国民运动方针的确定 …… (99)
三、国民运动中的生力军 …… (103)
1. 反帝废约的先锋 …… (103)
2. 第六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105)
3. 国民会议运动的鼓动者 …… (109)
4. 非基督教运动的主力 …… (112)

第五章　五卅运动的先行军

一、反帝洪流的急先锋 …… (115)
1. 声援顾正红惨案 …… (115)
2. 血染南京路 …… (118)
3. 坚持十七项条件 …… (120)
二、全国学生的新动员 …… (124)
1. 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浪潮 …… (124)
2. 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125)
3. 各地学生会组织的空前发展 …… (128)
三、关税自主运动 …… (131)
1. 关税会议和北京学生的示威 …… (131)

2. 全国学联临时代表会议 …… (132)

第六章　三一八学生运动

一、反奉倒段斗争的展开 …… (135)
1. 反奉倒段运动中的学联会 …… (135)
2. 首都革命 …… (136)
二、三一八惨案 …… (139)
1. 大沽口事件 …… (139)
2. 天安门前的国民大会 …… (141)
3. 执政府门前的大屠杀 …… (144)
4. 北方革命的挫折 …… (145)
三、反对国家主义派 …… (147)
1. 国家主义派及其对学生的影响 …… (147)
2. 全国学生总会对国家主义派的批驳 …… (149)

第七章　大革命洪流中的搏击

一、统一学生运动，为北伐作准备 …… (152)
1. 反对"誓约书"的斗争 …… (152)
2. 巩固学生统一战线 …… (154)
3. 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156)
二、积极投入大革命洪流 …… (158)
1. 各地学生热烈支持北伐 …… (158)
2. 万县惨案和学生反英示威 …… (162)
3. 上海自治运动与学生总要求 …… (163)
4. 跟随工人阶级作战 …… (166)
三、国民党新军阀对学生的屠杀政策和分化策略 …… (168)
1. 新军阀对青年学生的镇压 …… (168)
2. 两种学生组织的对立 …… (170)

第八章　学生救亡运动的初步兴起

一、国民党"党化教育"下的中国学生 …… (173)
1.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 (173)
2. 济南惨案后的学生反日运动 …… (175)
3. 反对大学区制 …… (177)
4. 国民党改组派与第十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180)
二、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184)
1. 九一八事变和全国救亡运动的兴起 …… (184)
2. 波澜壮观的学生救亡运动 …… (186)
3. 党的学生工作路线的左倾错误 …… (190)
三、救亡运动新思潮的酝酿 …… (197)
1. 左翼文化运动对学生的影响 …… (197)
2. 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的涌现 …… (200)

第九章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一、华北事变和"八一宣言" …… (205)
1.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 (205)
2. "八一宣言"在学生中的传播 …… (207)
3. 从黄河水灾赈济会到北平学联 …… (210)
二、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 …… (212)
1.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 (212)
2. 一二一六的大示威 …… (216)
3. 全国学生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风暴 …… (220)
三、南下扩大宣传团和民先队的建立 …… (222)
1. 到农村去 …… (222)
2. 民先队的诞生 …… (225)
四、促成全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 …… (227)

1. 刘少奇到华北 …… (227)
2.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 (232)
3. 西安事变和学生运动 …… (235)

第十章　全国青年学生奋起抗日

一、抗日战争爆发，青年学生奔向抗日前线 …… (239)
1.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奋起抗日 …… (239)
2. 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投向抗日的行列 …… (241)
3. 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 (245)
二、抗日战争初期的上海学生救亡运动 …… (248)
1. 成立学生各种抗敌后援团体 …… (248)
2. 发动学生投入"节约救难"运动 …… (250)
3. 救亡协会在斗争中诞生 …… (252)
三、第十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254)
1. 党积极筹备全国学联代表大会 …… (254)
2. 国民党阴谋破产，全国学联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 (255)
3. 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 (259)
四、西北地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 (260)
五、中国学联与世界学联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264)
1. 武汉各界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 …… (265)
2. 世界学联代表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 …… (267)
3. 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 …… (268)
4. 中国学联代表出席世界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 (270)

第十一章　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斗争

一、"孤岛"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 (273)
1. 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 (273)

2. 积极活跃的上海联学生 …… (275)
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新方针，汪精卫公开投敌 …… (277)
1. 上海学生界开展护校斗争和反汪运动 …… (277)
2. 席卷全市的反汪运动 …… (278)
3. 打入汪伪组织开展合法斗争 …… (281)
三、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加紧迫害进步青年学生 …… (283)
1. 国民党疯狂捕杀抗日青年学生 …… (283)
2. 国统区学生工作方针的转变 …… (284)
3. 国统区学生掀起"倒孔"运动 …… (288)
四、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 …… (289)
1. 国统区学生开展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 …… (289)
2. 青年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 (293)

第十二章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

一、争取和平民主与反"甄审"斗争 …… (298)
1. 庆祝胜利，惩办汉奸 …… (298)
2. 反对"甄审"斗争 …… (300)
3. 上海学生"欢迎"马歇尔来华 …… (305)
二、反内战、争民主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 …… (311)
1. 昆明学生吹响了反内战的号角 …… (311)
2. 昆明一二一惨案 …… (316)
3. 昆明学生的反击 …… (318)
4. 全国各界对昆明一二一的声援 …… (323)
5. 殡葬烈士，胜利收兵 …… (325)

第十三章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

一、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 …… (329)
1. 北平爱国学生奋起抗暴 …… (330)

2. 国民党反动派露尽奴才相 …… (332)
3. 坚持“美军退出中国”的斗争 …… (333)
4. 反美怒火燃遍全中国 …… (335)
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 (339)
三、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 …… (344)
1. 最后的决定权属于人民 …… (344)
2. 赴南京和平请愿 …… (347)
3. 南京下关惨案 …… (348)
四、五二〇斗争 …… (350)
1. 五二〇惨案的发生 …… (350)
2. 全国各地声援五二〇斗争 …… (354)
五、六一大逮捕和六二斗争形式的改变 …… (358)
六、第十三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360)
1. 全国学联在沪秘密建立 …… (360)
2. 全国学联代表出席国际学联理事会 …… (362)

第十四章　开展“反迫害”与“反美扶日”的斗争

一、全国学生的反迫害斗争 …… (365)
1. 浙大于子三血案 …… (366)
2. “救饥救寒”运动 …… (368)
3. 抗议九龙暴行 …… (372)
4. 同济大学的一二九血案 …… (375)
5. 四月风暴 …… (381)
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 …… (383)
1. 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日本东山再起 …… (383)
2. 全国学生掀起反美扶日的熊熊烈火 …… (384)

第十五章　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

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 (389)
1. 七五血案 …… (389)
2. 八一九大逮捕，组织党员有秩序地疏散 …… (394)
二、将革命进行到底，迎接全国解放 …… (396)
1. 揭露敌人假和平的阴谋 …… (397)
2. 组织起来，迎接解放 …… (400)
三、全国学生大团结 …… (402)
1. 第十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 (402)
2. 全国学生运动的核心——青年团 …… (405)
3.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 (407)

后记 …… (411)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学生

一、新式学校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

1. 中国新式学校的产生和青年学生群的出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映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文化教育的新式学校也随之产生了。

清末封建教育制度是以学校和科举相辅而行。名义上也设有各级各类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和为八旗子弟所设的官学，地方有各级儒学——府学、州学、县学，各地还设有由国家设立的大小书院，为补书院之不足，国家有时在地方也设有小学、社学和义学。此外，还有各级各类私人设立的教育机构或"私馆"。但是，实际上，各级各类学校都不过是科举的附庸，有其名而无其实，支配全部教育的科举制度，已经腐化到了极点。清朝统治集团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积极提倡程朱理学，诱使知识分子专攻理学，使全部精力沉溺于"悟性"、"冥想"之中，以消灭反抗思想。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清朝统治者又积极倡导考据学，使一些学者，脱离现实斗争，沉湎于故纸堆中，无暇过问政治。

清朝末期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的要求，教育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非改革不可。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

想家，曾提出过一些改良教育、推行西学的主张，但是他们的计划都落空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在提倡“自强”、“求富”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口号下，要求办“洋务”，兴“西学”，于1862年由总理衙门奏请创办京师同文馆，这可算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家主办的新型的学校。接着李鸿章于1863年创立了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创立广州同文馆，以后张之洞于1893年创立了湖北自强学堂。这些新学校开始只重英语学习，后来逐渐加了一些俄、日、法、德等国语言，目的是为了培养外交活动中需要的翻译人员。后来同文馆还加设科学馆，学习科目逐渐包括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洋务派为了培养技术人员，在工厂里附设工业技术学校，如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上海机器学堂，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此外为培养电报技术人员，1879年成立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成立上海电报学堂。1892年湖北矿务局成立，附设矿业学堂，以培养矿冶工程人才。上述学校都属于工业专科性质，是中国近代工业技术学校的开端。

洋务派认为，要想“靖内患，御外侮，非讲求兵制不可”，于是，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学校。1880年建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1885年建立的天津武备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此后，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建南京水师学堂。1895年建南京陆师学堂。1893年建天津军医学堂。

上述各类新型学校的建立，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世纪7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到90年代得到了初步发展，代表资产阶级要求的维新运动，在各大城市发展起来，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

的“旧学”，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提倡西学入手。他们为了培养维新人才和传播维新思想，注意兴办学校，如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主办时务学堂，严复于1894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谭嗣同等于1897年创办浏阳算学馆，梁启超为了提倡女子教育，1898年在上海创办了务本女学和经正女学等。

“百日维新”期间，清帝连续发布了几十条除旧布新的诏令，其中关于教育的可归纳为两项：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首先将所属省、府、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郡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其次是废除八股，一律改试策论，宣布以后取士，以实学实政为主，不以楷法优劣为取舍标准。这些改革，由于受到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仅仅103天就失败了，全部新政都被推翻。但是，各地私立学校还是得到发展，尤其是私人设立学校得到鼓励，受其影响，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官僚买办也开始创办一些中国最早的新型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和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为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这两所学校是1900年以前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不但没有取消，而且大为革新，1916年变为北京大学。更值得庆幸的是1901—1902年中国官立大学有很大发展。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学奏设山西大学堂，将筹备中的中西大学堂并入，这是省立大学的起点。此外，还有陕西宏道大学堂、河南的河南大学堂、湖北的两湖大学堂、广东省大学堂、江苏省南菁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堂等。另外，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也有发展。据1909年统计，大学校总数123校，学生22262人；师范415所，学生共28572人。

创办新学校已经是不可抗拒的潮流。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通常称为“癸卯学制”规定学校为3段7级，长达29

年到30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5年，(7岁入学)高等小学4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年到4年，通儒院5年，共3级11年到12年。与上述直系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两等，修学年限共8年；实业教育除艺徒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外，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3等，修业年限合计15年。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学年限约5年。还有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设立的进士馆和为已仕的官员学习新知识设立的仕学馆，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这一学制的颁布对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的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是以此为依据。

"奏定学堂章程"还明确地确定新教育的宗旨是"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所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一宗旨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一种主要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兴办新学校的同时，科举制度也于1905年正式废除，自隋一朝行科举以来，至此完全停止，实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从此，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完全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清朝学部统计，1907年的学生数达1013571人，1908年达1284965人，1909年达1626720人[①]，其中高等学校人数达22262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57683人(1906年)，这样，全国青年学生就

①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学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统计图表》。

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以认为，中国的青年学生群已令人注目地在中国出现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他们把学校作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培养反清骨干的场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2年，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借南洋公学学潮，成立爱国学社。同年，蔡元培等人创办爱国女校；1905年，光复会成员徐锡麟、陶成章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1907年起，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主持校务。1912年1月，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提出对清末封建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并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规定了小学、中学的课程及教学计划。同时，蔡元培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他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

南京临时政府又对学制进行了改革，制定了一个新的学校系统，于1912年9月公布，称“壬子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儿童从6岁入学到24岁大学毕业，整个学程为17年或18年，分3段4级。第一，初等教育（分两级）：初等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3年。第二，中等教育：设中学校学习4年，毕业后可入大学，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第三，高等教育：设大学本科3或4年，预科3年；专门学校本科3年（医科4年），预科一年。此外下设蒙养院、上有大学院，不计年限。

这次学制改革同清末的《癸卯学制》相比有明显的反封建精神，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

经过初步改革，教育事业有了一定发展。据民国元年度（1912年8月至1913年7月）的统计：全国大专院校（公立、私立）115

所，其中大学 4 所，专科学校 111 所，大学生 481 人，专科学校学生 39633 人；中学（公立、私立）500 所，学生 59971 人；师范学校 253 所，学生 28605 人；职业学校 79 所，学生 14496 人；小学校（包括幼稚园）86318 所，学生 2793475 人。

袁世凯称帝，民国元年教育改革也被取消了，教育领域里出现了暂时的复辟倒退，但袁氏政权很快就垮台了。1916 年基本上恢复了民国元年制定的教育政策、法令和教育制度。

在新式学校产生和发展的同时，留学教育也发展起来，1872 年曾国藩、李鸿章上书清廷，派聪颖子弟去美国留学，他们计划自 1872—1875 年每年派 30 名幼童出国，4 年共 120 名，15 年后，逐年回国。1872 年容闳带领第一批留美学生 30 人赴美，至 1875 年共 4 批。我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是第一批留美学生。以后，李鸿章、张之洞等又派去英、法、德等国的留学生。义和团运动以后，除了清政府选派留学生去日本外，还有很多学生自费去日本留学，因此一时人数猛增，至 1906 年已达 12000 多人，为历史从未有过的极盛时期。

帝国主义为了传播宗教，进行文化侵略，鸦片战争之后，陆续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其中在全国有影响的教会大学有如上海的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等。至五四运动前夕，在华教会大学学生总数约 2000 人。

2. 近代中国青年学生群的历史特点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新式学校的开办，逐渐地形成了人数达几百万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部分，他们不同于旧式的士大夫，在中国社会内部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力量。

第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国青年学生群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逐渐由封建帝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一方面他

们目睹帝国主义的武力入侵，明火执仗的经济掠夺，清朝政府的腐败使他们感到中华民族的日益危亡，尤其他们有较多的世界知识，了解世界各国近几十年来的迅猛发展，相形之下，中国却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走向没落。这样他们对当时的民族危机就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逼人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光荣传统，不断地激励着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此，他们把挽救民族的危亡看成是责无旁贷的己任。因此，可以说，强烈的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学生最显著最本质的特点，这是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精神支柱。

李达同志回忆他自己 1905 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15 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①

第二，开始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当时，放在中国人面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在许多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看来，美国的独立和法国的革命仿佛是最出色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于是，法国、美国就代替戊戌变法时的俄国和日本，成为不少人心目中追求的最高榜样。许多人从西方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而这些也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使用过的主要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20 世纪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大量介绍的并不是 20 世纪那些最时髦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而是 18 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这看来是很奇特的现象，其实却又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些才是最适合他们

① 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 年第 13、14 期。

政治需要的东西。毛泽东曾经指出："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顶礼膜拜，有力地鼓舞并激励着他们中许多人奋不顾身地为实现这些新的理想而奋斗！

第三，许多人崇尚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华盛顿。不少留学生认为："祖国之前途，其安危悉系乎留学生，夫人而知之矣。是留学界者，对乎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是者。……留学界中人员全体国民之委托，为全体国民所属望，其言论行动影响于全体国民者甚大，又必人人具有完备之资格而以毅力雄心，勉图振奋，使彼政府视之，隐然一敌国在其境内，学成而后，尽出所能以过渡于全体国民，而共发达个人，国家，世界之三大主义，乃尽吾留学界之责任。"① 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成为推动他们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动力。

第四，多数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许多人的家庭正在破产没落，自己也遭受着失学失业和找不到出路的威胁。这些人大多有个人抱负。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抗的情绪。正是这样，他们中许多人在形势发展和革命宣传的推动下，逐渐觉醒起来，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中去。

第五，分布集中，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我国新型学校和学生大都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上海、北京、武汉、南京、广州等是学生最多的地方。他们来源很广泛，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下层，这样，他们一旦发动，不仅各城市一呼百应，而且牵动整个社会，往往引起农工商各阶层人士的响应，因此，学生运动往往成为革命的先锋和桥梁。

---

① 云窝：《教学通论》。《江苏》第4期，36—37页。

毛泽东曾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①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②

二、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

1. 留日高潮和爱国团体的出现

青年学生群这一新的社会力量，很迅速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其中尤其是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不仅激励国内学生不断地掀起学潮，而且直接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辛亥革命前虽然也向欧美派遣了少数留学生，但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1901 年留日学生仅 280 人，1905 年达 8000 人，③ 这些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比在国内所受到的政治迫害要少一些，而接受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也较多一些，所以，他们的救国的思想更为强烈。同时，他们的活动也直接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因此留学生运动就比国内的学生运动更早地活跃起来。

留学生运动开始以反帝爱国为中心内容，随着斗争的发展，反清的革命倾向越来越发展，是 1901 年至 1905 年期间一支活跃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64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559 页。
③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政治力量。

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是从组织爱国团体开始的。1900年，留日学生100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起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会章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该会成员也比较复杂，后来著名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等都是这个会的会员。之后，部分励志会会员主编《译书汇编》，这是留日学生倡办的第一种刊物，这个刊物专以翻译欧美与日本政法名著为宗旨，尤“以政治一门为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伯盖司的《政治学》、伯论知理的《政治学提纲》、有贺长雄的《近代政治史》和《近时外交史》等，都是他们翻译出版的。这些翻译作品向读者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鼓吹的新的观念，不仅在留日学生中，并且在国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01年，留日学生中政治上的分化逐步明朗了，革命派与保皇的分野也日益分明起来，清政府对留日学生以利禄引诱，章宗祥等渐与官场接近，而比较激进的学生中有些人同孙中山接近，励志会逐渐解体。1901年春广东独立协会出现，1902年春孙中山赞助中国青年会创立，这是留日学生中激进分子比较固定的聚集中心。1903年春浙江同乡会，江苏同乡会相继成立。1903年4月留日女学生也发起成立了共爱会。这些组织的出现，为留日学生中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02年暮春，章炳麟、秦力山等倡议于4月26日举行“支那亡国240周年纪念会”，由章炳麟起草《宣言书》，揭露清朝统治的罪恶，呼吁人们学习200多年以前的反清志士，起来向清朝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孙中山和其他一些革命者，支持这一爱国活动，孙中山不仅乐意充当大会“赞成人”，而且表示届时将亲自莅会。留学生报名参加者达数百人，“学界为之振动”。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在获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恐慌，急持《宣言

书》亲往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日本政府以纪念会“大伤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为理由，竟然公开出面禁阻留学生集会。

孙中山见赴会者被日警驱散，大会无法召开，便机警地在精养轩聚餐，以避日警耳目。当天下午，孙中山以主人身份，特邀大会发起人章炳麟、秦力山等到横滨永禾楼补行开会纪念式，到会者 60 余人。纪念会由孙中山主持，章炳麟宣读纪念辞，在极其庄重的气氛中结束。爱国志士坚持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1902 年 7 月，自费学生钮瑗等 9 人，准备进入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攻读。但是校方规定，学生如没有清国公使的保证，则不准入学，而清公使蔡钧以“防范革命排满”为辞，禁止各省私费学生入学。于是，留日学生就入东京使馆与公使蔡钧争闹，蔡反嗾使日本警吏将吴敬恒、孙道毅两人“以扰乱治安罪名”逐回国内。这件事在各省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公愤，8 月 12 日秦毓鎏等 10 人写了一封长信致送公使馆，指出蔡钧所为是“大负学生，大负国家也”。留学生一面联名通电清政府，强烈要求撤换蔡钧，以示惩戒；一面向日本当局要求退学，表示抗议，同时又致电上海中国教育会，请求国内声援。

中国教育会是“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是国内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爱国团体，由蔡元培为会长。为了支持留日学生的斗争，他们不仅开会声援，而且派出代表向日本政府交涉。在留日学生斗争的影响下，1902 年冬，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而且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学潮。

清政府为了平息这一事件，被迫承认“蔡钧不洽舆情，激成巨变”，应“严于惩处”，并急派专使大臣载振赴日本安抚学生，外务部还在东京增设留学生总监督一职，不再让蔡钧兼管留学生事务。9 名留学生于 1903 年 1 月获得保证正式进入成城学校。

随着留学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不断发展变化，到 1903 年上

半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和较有影响的“拒法”、“拒俄”两次爱国运动。

2. 拒法、拒俄斗争和国内学潮

1902年广西巡抚王之春为了镇压广西人民的反抗，求助于法帝国主义，请其出兵，允诺以全省铁路、矿山等权益为报。法国驻越提督立即命令屯踞凉山的侵略军，窜入广西境内，接着又派炮艇载运士兵，由内河驶往各要隘与清军联合围剿农民起义军。一时边防告警，舆论哗然。

当这一消息在日本披露以后，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1903年9月28日，留日学生会馆当即召开各省评议员会议，商讨对策。次日，全体留日学生在锦辉馆召开申讨大会，控诉王之春的卖国罪行，揭露法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大会强烈要求清政府撤除王之春的巡抚职务，并且废除他与法国侵略者私订的一切卖国信约。大会还向中国教育会发出电报，要求国内“协应”留学生的拒法斗争。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接获东京留日学生请求协应“拒法”的电报后，立即组织绅、商、学各界人士，召开拒法大会。次日，又通电全国罢市、罢工声援拒法惩王，杭州、广州等地学校也致电要求拒法和惩处王之春。清政府迫于人民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免去王之春的巡抚职务。

与拒法运动同时，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拒俄”运动接踵而起。

1900年沙俄出兵侵入东北，1903年4月，侵略东北的俄军不仅背信违约，拒不按期撤出，反而提出“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是：“一、东三省官制不得更改；二、营口以外不许开作市场；三、俄清两国之士外，无开掘东山省矿山权；四、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五、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六、设商务衙

门于奉天，派其国兵保护之；七、东三省练军归俄国将校训练；"① 这七项要求就是企图独吞东北，置东北于沙俄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沙俄驻日代理公使狂叫："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云云"。②

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抗。4 月 29 日，召开全体留学生大会，到会者 500 多人，整个会场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一致主张对俄开战，决议组织义勇队奔赴前线，到 30 日签名愿意入军队的有 130 多人。福建籍学生方声煊，年纪只 14 岁，于同乡会中要求签名，大家推说他年幼，留在后方，他哭着央求道："吾为国死，讵殇耶？"奋然提笔签名。5 月 2 日，留日学生再开大会，公议义勇队规则定名为学生军，有黄兴、陈天华、方声洞等 200 余人参加，天天练习体操，准备开赴疆场。

学生军成立后 4 天，清朝政府派驻日本的留学生总监督汪大燮责令停止活动。第 5 天，日本东京神田警察署又找学生代表谈话，勒令解散。清政府也密谕各省督抚：对于回国义勇队"不得妄为姑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留日学生的拒俄斗争迅速地发展到国内，4 月 27 日，在蔡元培等人发动下，上海各界同胞 1000 多人在张园召开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谴责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4 月 30 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士学馆"鸣钟上堂"，发起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5 月 13 日武昌各学堂停课、集会，上书湖广总督。5 月 17 日安徽学生，以后还有南昌、广州、福州、长沙、杭州、开封等地学生进行拒俄斗争，成为一次规模极大的学生运动。

拒俄运动表现了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和准备

---

①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 252 页。

② 《军国民教育会之言论》，《江苏》第 2 期。

为保卫祖国牺牲自己的可贵决心，但是在初期，他们对清朝政府仍抱着很大幻想，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担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身上，请他出来主战，并要求把学生军隶属于他的麾下，但是后来遭到镇压，拒俄流产之后，许多激进分子终于觉悟过来，丢弃了对清朝政府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黄兴、陈天华、秦毓鎏、叶澜、蔡锷等不顾清政府的高压政策，进一步建立了新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决心肩负革命反清和爱国拒俄的双重大任。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运动正式进入了反清革命的新阶段。

3. 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1905 年同盟会成立，革命思潮在留日中国学生中间迅速发展，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惊恐，要求日本加以压制和防止。1905 年 11 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之规程》(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根据这一规则日本政府可以“性行不良”而勒令留学生退学，特别是对自费学生尤严，而所谓“性行不良”可以任意解释，其实际目的是打击革命学生，破坏留学生的革命运动。

中国留学生对此群情激愤，12 月 3 日在留学生会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各校代表和会馆总干事一同前往公使馆，要求彻底取消此规则，12 月 4 日并前往公使馆请愿抗议清日勾结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罪行，实践女学校学生秋瑾，作为全体女子留日学生的代表，出席了(5 日)在富士见楼的聚会，发表了激烈的演说。12 月 6 日起各校留学生 8000 余人一律罢课。12 月 7 日，在京都的留日学生响应东京留日学生集体罢课的决议，前赴东京汇合，这样，反对“取缔规则”运动，终于发展成正式的全体留日学生运动。12 月 7 日，日本反动报刊诋毁留学生罢课行为是“放纵卑劣”，并妄言“其

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①] 著名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为抗议这“放纵卑劣”四字，12 月 8 日留下绝命书后在大森湾跳海自杀。他在绝命书上写道：“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②] 陈天华投海激励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此留日学生中以秋瑾、宋教仁等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全体退学，集体归国，而以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学。两派在东京中国留学生联合大会上争论激烈，多数留学生倾向于罢课回国。

12 月 14 日，归国先头部队出发，至月底，归国学生约 2000 余人。由于留日学生大举归国，盛极一时的弘文学院，不得不关闭几处分校。

在第一艘归国船开行后，反对归国派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组织“维持留学同志会”，破坏了罢课斗争和革命团结，于 1906 年 1 月 13 日起照常上课。

此次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显示了留日学生的革命战斗力量，打击了日本反动当局的气焰，赢得了日本社会舆论的同情。

孙中山在 1900 年以前，曾领导过多次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那时他所依靠的主要是中国南方各种会党的势力。1900 年底，他再次亡命日本以后，与留日学生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他依靠的主要力量。这是孙中山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发展，1905 年成立的同盟会，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1905 年至 1907 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其出身可考者有 379 人，其中学生 354 人，占 93%以上。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都是从

① 《朝日新闻》1905 年 12 月 7 日。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 395 页。

青年学生中成长起来的。

邹容1902年去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写了反清檄文《革命军》，1905年在上海出版，在国内外青年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共印20多种版本，印数达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陈天华1903年去日本留学，他于1904年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同盟会成立后，领导过多次武装起义，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干的革命活动家，如黄兴、宋教仁、陶成章、徐锡麟、吴玉章等，还有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他们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论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时指出："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①

三、十月革命和中国学生觉醒

1. 新文化运动对学生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学校有了更大的发展，学生队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就小学而言，至1916年学校数达120097座，学生达3843454人，而教职员有296319人；中学学校数350座，学生数60924人，大学在校学生数17241人。②

可以估计，这个数字到五四之前，还有一个相当的发展，当时中国学生面临的社会状况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二十一条"的签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②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30页。

袁世凯的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这一系列的政治旋涡冲击着中国知识分子，许多人感到彷徨苦闷，中国的出路何在？富于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更是痛心疾首，这种情况刺激了部分急进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从1915年起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9月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移到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家中。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时，刘半农也进入北大文科，钱玄同、沈尹默则在北大文科任教。胡适于1917年夏天由美国回国后，也被聘到北大来担任中国哲学史的课程。李大钊于1917年11月到北大，于次年1月任北大图书部主任。鲁迅当时（1920年前）虽然没有在北大任教，但由于他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又因为他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因此他和北大的一些教授们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并称为主要的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3个方面：第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第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第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开展文学革命。从这些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权平等自由说。在社会观上，主要的还是进化论。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思想革命。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尤其是对青年学生影响特别大，他们称《新青年》杂志是“青年界之明星”。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广大青年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追求真理、追求新知识的热潮，并且从他

们中间涌现出了大批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毛泽东在谈到这一段思想变化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①

另外在《新青年》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感觉到需要组织起来，于是从1917年开始至五四前，各地出现了不少社团，其中尤以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影响最大，这些社团的出现，实际上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2. 走俄国人的路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个消息虽然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就传到中国，并且受到了孙中山以及国内人民的欢迎，但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宣传十月革命则要到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一文。同年1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写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论文，才真正揭示了十月革命的本质和意义。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就是较急进的民主派，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在十月革命后，能够很快地理解它的本质及意义，那几篇文章，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内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而且文章也有些不够恰当之处，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在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他特别注意扩充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且他团聚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开展研究

① 《西行漫记》第125页。

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建立了一个学会的组织。高一涵回忆说："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斯，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①

从1918年至五四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日渐增多，除《新青年》外，又有《每周评论》，学生社团举办的一些刊物也开始宣传，如国民社办的《国民》，新潮社办的《新潮》等。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原著，翻译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此外，有些报刊还先后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的传记材料和其他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五四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只是初步传播，但是，它深深地吸引了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很多人热烈地追求和学习它，以期重新认识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1918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当时有很多青年学生，如周恩来、邓中夏等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写道："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

① 《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0页。

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1917 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涌现，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3. 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和学生救国会的产生

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决议出兵干涉。1918 年 3 月，日本政府以高度秘密方式向中国政府提议共同出兵西伯利亚。5 月 16 日，中日两国军事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之后，又签订了海军防敌协定等。这些协定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互相交换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③

日本签订这个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十月革命，另一方面是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了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日本利用这个协定，曾向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附近地区调来了 6 万军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513—151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470 页。
③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 228—229 页。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

这一协定首先遭到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对。4月间，中国留日学生获得了这一协定的秘密消息，就立即进行了集会和散发传单的活动。5月6日，即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前夕，各省各校留日学生的代表在东京神田的维新号饭店开会，这是一次借吃饭而开的秘密会议。出席的代表共46人，其中有3名是女子。会议进行之际，日军警官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刀闯入，不问情由，便拳打脚踢，殴击学生，并将全体代表逮捕至西神田警察署。后来虽然释放，但进一步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气愤，决定全体罢学归国。留日学生回国是分3起走的，一起至上海，一起至北京，另一起为直接回本省。至5月17日，"到上海者已有1400余人"，"学生归国进行之方针：在上海组织全国总机关，20日前尽离东京赴各省组织通讯机关，6月20日以前，成立各地方国民请愿会，通电告知上海全国总机关。召集全国国民大会，7月31日前一致到上海，8月1日在上海开。"[①] 这一计划虽没有完全实现，但由于留日学生的积极活动，取得了两个积极成果，第一，是5月下旬，北京学生为废除协定举行了请愿活动，留日学生李达回国后曾到北京和北大的学生代表进行联系，黄日葵回国后也到北大做旁听生，他们与北大的邓中夏等发生了联系，共同商讨行动计划。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报》上揭载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内容，次日，各报也纷纷转载。学生们看到后都愤怒异常。5月20日晚，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群众大会，北京其他各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发表了演说，要求废除卖国协定，北大学生代表也慷慨陈词，响应留日学生。当场有许多人痛哭流涕，全体学生表示要和留日学生一致行动，并定于次日去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前身）、高等工

① 《民国日报》，1918年5月17日。

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学生 2000 人，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当局宣布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情绪十分激昂。有一学生曾断右手中指血书："案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直系军阀的冯国璋，冯被迫接见了学生的代表，用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学生们受了骗，第二天就复课了。这次请愿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学生第一次政治请愿，从此开始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结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成果。

其第二个成果是通过这次运动，全国学生救国会组织起来了。学生们在这次请愿失败后感到有组织的必要，于是，以北京大学为主的部分学生组织了救国会。7 月，这个组织的代表许德珩、易克嶷两人南下联络，由天津转济南、武汉、九江、南京，最后到上海。"到上海后，上海的学生会在龙华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在上海停留二十多天，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组成了。"①

救国会简章规定："本会为大中华民国学生所组织"，"以养成爱国精神，协御外侮，不干涉内政为宗旨"，"本会有提倡国货之任务"。救国会总会暂设北京，各省城、上海、天津及外国重要都会设分会。救国会简章中有关组织一章规定设总务科、文事科等 7 个科，有正副会长，每校选举干事，每年 5 月 7 日开常会一次等。事实上这些组织没有正式建立起来，后来学生救国会的主要活动就由国民杂志社进行，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这个学生救国会实际上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前身。

全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是新文化运动以

①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

来文化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开始，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预演。

4. 各种学生社团的出现

五四时期是我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时期，其中青年学生的思想尤为活跃，他们寻找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借以冲破旧的传统思想，挽救危亡的中国。自1918年下半年开始，由思想文化向组织方面发展，因此，学生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团。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有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等等。

国民社于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起因于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国民》杂志。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先后参加国民社的成员有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段锡朋曾任过国民社的评议部部长。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当国民社成立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组织了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①。它仿效《新青年》主张“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新文化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新潮》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新潮社大多数社员虽然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很快就向右转了。

平民教育讲演团是1919年3月发起成立的，总务干事为廖书仓、邓康（即邓中夏）。讲演团的简章规定：“本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很多新潮社和国民社的成员都加入了该团。讲演团成立初期，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内容从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6页。

一般科学知识逐渐转向政治宣传，如“青岛问题”、“青岛交涉失败史”、“中国现在的形势怎么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等等。这些演讲有效地配合和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动。北京党组织最早的成员，如黄日葵、朱务善、张国焘等都是讲演团的活跃分子，因此讲演团后期成了北京党组织的有力助手。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成分复杂、分化最明显的一个社团。1918年6月30日，一个在北京新闻界活动的四川人王光祈联合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曾琦、陈淯、雷宝菁、张尚龄以及周无等，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合议筹建少年中国学会，并邀约李大钊“商榷一切”。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实学术，(三)发展社会事业，(四)转移末世风气”，[①] 这4条宗旨以第一条为核心，他们认为：“盖青年者，吾人所视为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也。”

1919年7月1日，开成立大会，当时会员共42人，先后参加该会的有100多人，由于李大钊的关系，北大社团中的许多骨干都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如黄日葵、邓康等，先后参加该会的还有张崧年、杨贤江、恽代英、张闻天、毛泽东、高尚德、刘云汉、刘仁静等人。这个学会在五四以前，主要是出版“会务报告”，没有多少实际活动，但它对五四运动，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以上所述，还都是在北京地区成立的著名社团，在不少省市也都有社团，其中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最为著名。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参加该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罗章龙、张昆弟、何叔衡、李维汉等。学会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1920年后，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员达70多人。学会成立以后，每隔一周或半月要开一次会，会议讨论学术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220页。

问题和思想问题。1918年6月，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发起了湖南青年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3月，毛泽东偕一批赴法青年离京赴上海，亲自到码头送走了第一批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回长沙后，号召新民学会成员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

除以上所举的著名社团之外，还有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团体。

各种学生社团的崛起，说明了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和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而且逐步向组织方面发展，这就为五四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章　光辉的五四爱国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

1.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9年1月，美、英、法、日、意等国为了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于巴黎召开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了代表团，以北京政府的外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代表南方军政府的王正廷名列第二，另外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等63人。

中国留欧学生对巴黎和会予以密切注意，派出代表要求中国的外交代表必须向和会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在此情势下，中国代表团最初向和会提出希望条件7条，随后又提出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等。

参加巴黎和会的有20多个国家，代表共计1000多人，但实际上是美、英、法在那里操纵会议，一切重大问题皆由这几国决定，其他国家只是在讨论到和其有关的问题时，才能列席。中国代表团的提案提交和会最高会议时，却遭到了拒绝，认为不在和会讨论之列。这样，唯一的希望就是山东问题能顺利解决。所谓山东问题，是指德国在山东省的势力范围问题。1897年，德国强占青岛和胶

州湾，整个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1914年8月23日对德宣战后，即派日军2万余人在龙口登陆，从9月26日起，日军深入山东内地，11月占领青岛，青岛德军向日军投降。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取代。

日本占青岛只是它独霸中国野心的一部分，1915年又强迫中国签订了"二十一条"，当时由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直接负责办理，因此，曹、陆两人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所痛恨的卖国贼。1917年初，日本又同英、法、俄、意4国达成了秘密谅解的协议，4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这个秘密协议成了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借口之一。1917年9月，因签订济顺、高徐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的合同，日本外务大臣后藤照会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以及在经营和管理胶济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章宗祥立即于同日复照，表示"欣然同意"。这"欣然同意"的换文，在巴黎和会上，就成了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又一借口，因此，章宗祥也就成为全国人民痛恨的又一卖国贼。

从1月27日到3月10日，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在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事先准备好的日本政府宣言书，声称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国人在山东的所有各种特权，应该无条件地让与日本。日本代表还发表了1917年初英、法、俄、意、日5国签订的秘密协议。中国代表多次申诉也无济于事。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前曾发表过14点声明，其中有一点说了要公道解决殖民地问题，国无大小，一律平等等漂亮言词，但当讨论中国问题时，英、法站在日本方面，美虽然通过中国代表团来抵制日本，而当日本以退出和会及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时，它便向日本让步了。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只不过是一句谎言。这样，中国外交

的失败已成定局。后来，美国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利、利益由和会暂收、或由五国共管，但都一再遭到日本拒绝。最后美国威尔逊表示无能为力，并质问中国何以于 1918 年“欣然同意”和日本订约。4 月 30 日，英、美、法、日 4 国会议议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的条款。

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各学校连续放假 3 天庆祝胜利，旌旗满街，灯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沉浸在“公理战胜”的梦幻中。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如晴空霹雳，梦幻消灭了，和会的条款成为中国人民的大辱，威尔逊不是“世界第一个大好人”而是“威大炮”。北京学生讥讽威尔逊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即 14 等于零。

对巴黎和会的幻想破灭了，中国人民唯有自己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了。

2. 五四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

5 月 1 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2 日北大学生许德珩从蔡元培那里首先得知，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以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 5 月 3 日晚 7 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 13 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推举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两人做记录，并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在大会上发言的学生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慎膺，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悲壮之气象。

大会在热烈的鼓掌声中，一致作出如下决定：(1)联合各界一

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4)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游行示威，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银元、钞票、铜子以及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纷纷捐掷到台上来，大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结束后，学生们并没有安睡，而是更加忙碌地分头进行游行的准备，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准备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准备大旗、小旗、标语等，有人把床单扯作旗帜用。

5月3日晚上，除北大学生在积极准备外，在北京高等师范匡互生发起的工学会也在秘密地活动着。因为他们当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一部分人提出"非参加暴动不可"。团体中有几个会员包括匡互生在内都曾对亲密的友人商托好后事，立好遗嘱，准备牺牲。

5月4日，为了让更多的学校知道以上计划，在北京大学学生的积极联络下，在5月4日上午10时，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了一个各校学生代表会，决议："(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①。会后，各代表都回校准备下午的游行去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的学生最早到天安门，接着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的学生。北大的学生到得最晚，因为北京政府知道学生要示威游行，教育部派了次长前去阻止，不

① 《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

准他们去参加游行，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和他们展开了辩论，最后突破阻拦，队伍才急速向天安门进发。北大是游行的领导，总指挥段锡朋、傅斯年都是北大新潮社的成员，因此，先到的学生都用鼓掌、摇旗来欢迎北大的学生。

学生们到天安门汇合之后，有一个暂短的集会，教育部的一位次长赶来讯问集会的用意，学生代表就将传单给他看，他看完传单，非常蛮横，企图阻止学生去使馆示威，但学生们高呼说："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按：5 月 4 日正好是星期日）这位次长毫无办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集会宣布开始，一名北大学生登上一张方桌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这一宣言是由许德珩起草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权霸道，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共同奋斗。北洋政府派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到场干涉，学生们无所畏惧。

集会结束后，队伍向使馆区进发，队伍的前面由两个学生举着两面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大国旗，接着后面是一副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边款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游行的学生手执各种旗帜，旗上写着："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签字巴黎和约"、"打倒卖国贼"等。他们还散发了很多传单，这些传单是由新潮社罗家伦起草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就是在这些传单里提出的，这一口号简明扼要地表明了五四运动的政治目标。学生们一面走，一面高呼各种口号。北京的市民们静静地站在街上，小心倾听学生们的呼喊，有的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游行的队伍到各国使馆区东交民巷西口，东交民巷的警察阻止学生通过，学生派出代表向各使馆递书，除了美国公使馆接受了学生们的"陈词"外，英、法使馆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学生代表

到日本使馆门前，日本卫兵阻止不许入内。3000余青年学生，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学生们深深感到，国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此时此景，怎能不使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义愤填膺、怒发冲冠呢？学生们决心改道向曹汝霖家走去，这时，“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已毫无效力了。”①

学生队伍向曹汝霖住宅进发，一路上散发许多传单，其中一张传单上写道：“民贼不容存，诛夷曹章陆”、“泣告我同胞，患莫留心腹”。学生们边行边宣传，爱国热情，溢于言表，沿途观众非常感动。下午4时许，学生游行队伍到达曹宅，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当学生们叩击大门时，周围警察即上前阻拦，学生们一面和警察理喻，对其宣传爱国思想，一面绕屋而行，寻找破门之路。有几个激烈的同学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这时，曹汝霖宅内的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所震骇，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

当学生们打进曹宅的时候，曹汝霖、章宗祥迅速躲避了起来。学生们遍寻曹汝霖不见，十分气愤，工学会的匡互生取出预先带好的火柴，决定放火“烧掉这个贼窝！”事为段锡朋所发觉，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匡互生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了一桶汽油，汽油泼在小火炉上，火就烧起来了。火起以后，愤怒的学生看到有两个穿西服的中年男子跑出，就去追赶，把这两人拖出来推倒在地，用手执的小

①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回忆录》上第307页。

旗杆对着当头乱打，打得一个人头破血流，另一个人则拼命保护他。不久，大队警察赶到，一齐舞起木棍和指挥刀来驱散群众，学生们恐怕打错了人、因而松了手，让他逃命。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正是卖国贼章宗祥，而拼命保护他的是一个日本人，大家懊悔不已，没有将他们打死。

曹宅起火后约半小时，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即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已经近 6 时了，学生大部已撤走，团体既散，军警乃敢逮捕学生中徒步散归者，当场被捕者 32 人，北大有许德珩等 20 人，高等师范 8 人，工业学校 2 人，中国大学 1 人，汇文大学 1 人。学生被捕后，押到警厅。

北京学生五四示威，说明中国青年学生的高度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

3. 北京学联的成立和被捕同学的获释

北京学生示威游行 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等爱国行动，使得反动派慌作一团。当晚国务院总理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对付学生的办法，企图将已经掀起的革命浪潮镇压下去。但是，学生方面因为有 32 人被捕，情绪更加激昂，也在当晚召开各校学生大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的学生，如何继续斗争。

北大的学生大会认为，要营救被捕同学，应该实行罢课，并进一步组织起来。于是，当晚北大学生干事会便成立了。有成百的学生纷纷参加干事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很多都是干事会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黄日葵等都参加文书股工作。这个干事会虽是临时性的机构，但它不仅成为北大学生的领导中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心。

5 月 5 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求援助。同日下午，各校的学生又

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大会，学生代表传达了上午会议的情况，并报告了挽救被捕同学的办法以及怎样坚持罢免曹、章、陆等卖国贼的要求及组织学界联合会的问题，并委托北大和北京高师负责起草学联组织大纲。第二天，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组织大纲规定："本会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

学联大会决议：对外力争山东青岛问题，以护国权；全国一致抵制日货；对内诛卖国贼曹、章、陆；并针对军阀势力压迫教育界一事，提出"打倒军阀派势力"的口号。

营救被捕学生一事，除学生方面积极努力外，各校校长也多表同情，蔡元培在北大学生大会上表示同情被捕学生，要负责营救。后来，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组织了校长团，以蔡元培为首，准备营救被捕同学，同时，商界和舆论界也表示同情学生，纷纷电请释放被捕学生，甚至连安福国会的议员，也有表示要弹劾政府的。当然这些人中，有的是真正同情学生，有的则是怕学生再闹大风潮，局面不可收拾。

军阀政府有一派人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各大学，更换各校长，甚至叫嚣："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但是，鉴于5月7日将临，担忧学生们再闹乱子，不堪设想，故在6日晚，警察总监向蔡元培等提出在实现两个条件下释放被捕学生，这两个条件是：(一)明日(7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国民外交协会原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二)各校在明日一律复课。蔡元培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学生们也在蔡元培的劝说下，于7日复课。

7日上午，各校遭逮捕学生被释放返校，当学生被释放时，人们奔走相告。《益世报》以汽车散发号外，不逾一小时，满城皆知。被捕学生返校后，各校全体排队欢迎，各校长以训辞慰勉。

被捕学生的获释是五四示威游行后学生斗争的又一个胜利，

和前不同的是，它是在北京学联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胜利，由此，北京的学生运动走上了有统一组织领导的新阶段。

二、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涨

1. 蔡元培出走和挽蔡斗争胜利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因此，蔡元培校长就成了反动派攻击的重要目标，甚至有焚烧北大、暗杀校长的恫吓言论。北京政府也内定要更换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于 8 日晚送上辞呈，9 日晨 5 时半秘密出京。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不仅震动了北京大学，而且震动了北京教育界。广大师生迅速掀起了挽留蔡元培的斗争。北大学生一面上书教育部并面见教育总长，要求明令挽留蔡元培并立即采取措施，一面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支援。北大的教职员会也作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5 月 11 日午后，北京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会议期间各校教职员一致签名要求挽蔡，13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为力争挽蔡，一致提出辞呈，北大学生有单独罢课之议。全国各地要求挽蔡的电报，也纷至沓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自今日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并严正表示“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

在广大师生的团结斗争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5 月 14 日晚，北京政府才不得不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下达了一个平淡敷衍的慰留蔡元培指令。

北京政府下了慰留蔡元培的指令，说明挽蔡斗争的初步胜利。挽留蔡元培，意义不在于蔡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要明辨是非，分清功罪，维护五四运动的正义性质，也就是说，正义是在学生和蔡

元培一边，有罪过的是北洋卖国政府。挽蔡斗争胜利后，五四爱国运动推向全国性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新阶段。

2. 5月19日总罢课

徐世昌在5月14日明令挽留蔡元培的同时，也下了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的指令，并连下两令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

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怒了学生。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次酝酿，在5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5月18日，北京学生召开郭钦光追悼会。郭钦光于1917年就学北大，平时不畏强暴，关心国家危亡，五四那天，因他患有肺病，同学们都劝他不要去参加示威游行，但他执意不肯。在游行中他亲眼看见反动政府逮捕镇压学生，"愤然大痛，呕血盈斗"，送到医院后，他忧国伤感，时常呕血不止，延至7天就赍志而殁了，年仅24岁。

郭钦光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追悼大会上悬挂着北京各界送来的3000余幅挽联，郭的遗像两旁，书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8个大字。到会的5000多人中，有很多妇女代表，大会在肃穆、沉痛的气氛中进行，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北大代表许德珩在演说时指出："今日追悼郭君，实无异追悼我们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业，全凭我们继行其志，做到他现在的地位，方肯罢休。"①

对郭钦光的追悼，事实上成了一次5月19日总罢课的动员誓师大会。

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实现了，参加此次罢课的计有北京2.5万多学生。学生们提出6项要求："(一)欧会不得签字；

① 《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56页。

(二)惩办国贼;(三)挽回蔡、傅,打消田长教育;(四)收回警备命令;(五)交涉留日学生被捕事;(六)维持南北和议。"①

罢课以后,学生们大规模地开展了爱国活动。首先是组织"十人团",开展演讲活动。除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外,高师、清华以及所有高等和中等学校,普遍建立起"十人团"组织,分段分组展开讲演活动。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庙会,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场所。他们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国民自决"、"国民快醒"等等。学生们的讲演促进了群众的觉悟,对爱国运动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虽然反动派一开始就干涉和阻挠学生们的讲演,但学生讲演团的规模和影响却越来越大。总罢课当天,分头讲演的学生有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21日,又猛增到1000多人,学生们的讲演,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开始限于城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郊区的农村、工厂以至于保定和京奉铁路的旅客列车上,都留下了北京讲演学生的足迹。

第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五四运动的锋芒,主要是指向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排斥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成了爱国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北京学联成立后,积极从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5月9日和13日,清华、北大的学生首先在校内焚毁日货。18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将自己手中的日货都送往先农坛,集中焚毁。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迅速影响了商界。5月20日,北京总商会召开全体大会,到50余行业,共同决议"一律停止贩运日货、违者从重议罚"。大会宣告成立国货维持会。商界的这次大会,迅速在社会中产生效果,各店一律停止贩销日货,日人所开店铺均无人问津,日货迅速跌价。

---

① 《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80页。

第三，发行日刊。为了扩大宣传，学生们在罢课后，拟出版《五七》、《五四》两种日刊。5 月 20 日，《五七》日刊出版了，发行之后，车夫工人皆争相传诵，甚至销罄之后，尚纷索不止，至 23 日，竟销去万份。日刊受到人民的欢迎，却为反动派所禁止。日刊一发行，京师警察厅就以“未曾立案”为借口，通令禁止发行，《五七》日刊诞生不到 3 天，就被北京政府查封停刊，编辑也被逮捕。

第四，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学生们在校内搭起帐篷，经常操练，学习枪法、战术，并聘有教官讲授军事学。军事训练的目的是“以备我国家不时之需”。

3. 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

从五四示威开始的北京学生运动，正在深入向前发展，而且它直接影响到全国，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出现了高潮。

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天津的学生立即响应。5 日，他们纷纷致电北大，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致电政府，反对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立即予以释放。6 日，7 日，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代表接连开会，并决定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以加强对爱国运动的领导。5 月 12 日，召开了郭钦光追悼大会，5 月 14 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被选为会长，南开学校的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致祥被选为副会长，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名义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表示天津学生誓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全体罢课，再申前请”。

最初的天津学联，只是男生的组织，女学生不包括在内，但是，五四运动唤醒了广大女学生，她们要求成立妇女爱国团体。5 月 25 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正式成立，会员 600 多人，大会选举刘清扬和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名为评议委员。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5 月 22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作出一律罢课的决议，从 5 月 23 日起，天津 15 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

学生开始罢课。他们在罢课期间，像北京学生一样，组织街头演讲、抵制日货活动。

继天津之后，5 月 8 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代表集会，决定：如被捕的北京学生不即释放，即一律罢课。5 月 9 日，44 所学校的代表 96 人又在复旦大学集会，决定：电告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力争中国主权，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5 月 12 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电告北京政府，限 3 天内答复学生要求，否则罢课。26 日，上海学生两万余人，齐集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宣誓典礼，誓言说："合全国人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

5 月 31 日，在上海学生联合会主持下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参加者 81 校 3 万余人，京、津学生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号召学界联合工商各界一致行动。会后，学生结队向上海县的商会、总商会、商业公团等处质问，要求他们表明态度，要求他们罢市，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山东人民因为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所以对这次运动的反映是最敏感，响应也是最积极的。早在 4 月初，山东人民就召开国民请愿大会，要求收回主权。北京五四运动爆发，5 月 5 日，济南各校学生纷纷组织学生团体，上街进行爱国宣传。不久，正式成立了全省学生联合会，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机关。5 月 23 日，济南中等以上学生一律罢课。罢课以后，学生们上街演讲，抵制日货，以济南为中心，全省各地学生也都普遍地行动起来。5 月 12 日，济宁学界联合会宣告成立，5 月 15 日，烟台学生罢课两天，17 日举行游行，要求力争青岛，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学生立即奋起救国。5 月 7 日，为纪念国耻，武汉各机关学校放假一日，当天在中华大学召开的学生大会上，广泛散发了由恽代英（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起草的传单，传单号召人们奋起救国"勿为亡国奴"。10 日，武汉 15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讨论和研究救国事宜。5 月 14 日，20 多

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集中在中华大学筹建武汉学生联合会，17 日正式成立，确定学联的宗旨是："热忱爱国，联合感情。"5 月 18 日，武汉学生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华大学、高等师范等 3000 余名大中学生汇集阅马场，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标语口号，学生一面游行，一面散发传单。5 月 26 日，武汉学联召开欢迎会，请北京代表在会上介绍五四运动的真相。这样，武汉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5 月 31 日下午，武汉学联决定，从 6 月 1 日起，武汉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声援和策应北京、上海的总罢课。

湖南学生得知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就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散发传单，向各界作口头宣传。不久，北京学生代表邓中夏等两人衔命来长沙，详细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殷切希望湖南学生举行罢课，声援北京学生。5 月 27 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 月 2 日学联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议全省从 6 月 3 日起一律罢课。毛泽东这时虽不是学联的正式成员，但学联的日常工作都是由他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主持的，所以毛泽东是湖南学联的实际指导者。

长沙学生罢课后，普遍建立了 10 人团、讲演会，广泛地开展讲演宣传活动。他们特别注重用戏剧进行爱国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学生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5 月 29 日，湖南各团体组织了国货维持会。

五四运动的浪潮，很快席卷了祖国南大门的广州，5 月 29 日，广州各校学生两三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

总之，自 5 月至 6 月初，全国有 22 个以上省份共 200 多个大小城市的学生举行罢课或者游行示威。一时间，全国几百万学生，从大学到中学甚至小学生，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奋不顾身，英勇斗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三、五四爱国运动的新阶段——六三运动

1. 6月3日北京大逮捕

6月3日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新阶段的界碑。在这之前为第一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在这之后，直至6月28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上海，而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这两大主力联合商界一致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后，北京政府接连下令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1日，发布了两道命令，公然为卖国贼辩解，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什么"纵火伤人"、"举动越轨"，要求立刻停止罢课，违者要"逮捕法办"。更有甚者，北京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竟奉命于6月2日逮捕了一批抵制日货、推销国货的学生。这样就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怒，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当天傍晚集会，决定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活动。倘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被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20余校各派学生数百名上街讲演，反动派非常惊慌，急忙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达178人，警察厅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大门前贴上"第一学生拘留所"。威武不屈的学生们，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6月4日按计划有更多的人上街讲演结果又被捕700多名。

反动派的大逮捕，没有使学生屈服。6月5日，有5000名学生上街演讲，学生们出去时，"各人背着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带

好了，预备去陪伴同学坐监。”① 学生分3队出发，声势浩大，他们不顾军警马队的冲击，雄赳赳地奔赴北河沿作为临时拘留所的北大法科，许多市民也自动地跟随，汇成了一股愤怒的人流。走到法科门前，愤怒的学生们要求军警拘捕，誓与前两天被捕同学一起坐牢，并肩战斗。昔日耀武扬威的军警，这时吓得面面相觑，连连向后退缩。

就在这时，在门前看守的军警突然撤走了，围困北大的军队拆掉帐篷后也匆匆离去。这是为何原因呢？原来北京政府已经接着上海“三罢”的消息，他们为了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避免出现更大的政治危机，只得“顿变方针，所拘学生尽行释放，驻扎学校军队，一律撤回。”②

2. 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

上海学生在悼念郭钦光大会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动员商界和工界的援助方面，从5月底开始至6月初，上海学生代表屡次要求商会宣布罢市，但都未能实现。

6月4日，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上海各界人士，使五四爱国运动顿时出现了新局面。上海学联当即通电全国，指出：“政府摧残士子，惨无人道，一至于此！”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援救”。当天，各校学生和救国10人团成员纷纷走上街头，报告北京爱国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吁请各界同胞急起援助。广大学生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分队向城内外并租界等处大小商号内，跪地泣求商界一律罢市。至夜11时，他们仍在大小东门、中华路一带讲演，对于反动军警的阻拦和镇压，他们也全都不顾，学生们挨家挨户动员商号于5日起一律罢市。

---

① 《军警压迫中的学生运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② 《新闻报》1919年6月7日。

5日清晨，南市城厢内外各大小商店，首先罢市停止营业，到午间，公共租界各马路的店铺十分之八九也停业罢市。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两大公司，曾一度营业，后见此情，亦随之闭门。其余各大小商铺，11时后尽行罢市，法、英租界及闸北各店铺也相继罢市休业。罢市的店铺门上悬挂着"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抵制日货"等旗帜。

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当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时，许多工人并没有经学生动员便自动罢工了。6月5日上午，日本在上海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五六千工人全体罢工。下午，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工人也随之罢工。同一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码头工人和沪宁、杭甬两条铁路部分工人也开始罢工。

和罢市、罢工的同时，各大中学校学生坚持罢课，而且全上海的高等小学以至国民小学也一律罢课。学生们纷纷出动，在街头上组织游行、演说和维持秩序。

这样，上海的"三罢"斗争实现了。上海"三罢"的当天，商、学、工、报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以利于在运动中统一行动。会议向全国发了通电，会议后各商号都贴出揭帖，上书："忍痛停业，冀救被捕学生，不除国贼，誓不开市。"

从6月6日起，工人罢工不断扩大。6日，华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等各处工人相继罢工，直至6月10日，罢工进入最高潮。这一天，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和全体海员工人全部罢工，使上海和外地的水陆交通完全断绝，罢工人数达五六万人。

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促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从6月3日开始，不到一星期，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运动遍及全国22省的150个城市。

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震撼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上海护军

使向北京政府发出“万急电”，6月7日和10日，天津总商会两次电北京政府告急，谓上海“三罢”：“影响所及，势必津埠市面不罢而自罢”，“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10万人，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尚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北京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于6月10日发布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免职令。

这一消息至12日为上海学联证实，上海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并组织游行，动员商界开市。至此，历时7天的“三罢”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3. 拒签和约斗争的胜利

“三罢”斗争的胜利，3个亲日的卖国贼被罢免了，但是山东问题还没有解决。6月28日，中国政府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一事还没有定论。于是，拒签和约的斗争成为运动的中心。站在这一斗争最前列的，自然是山东人民。18日，山东省议会、律师公会、报业公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商会等团体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代表到京向总统府、国务院请愿，但均未得满意之答复。6月27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也派出代表赴北京，与山东代表并肩战斗，同日，北京、山西代表也与山东代表一起要求见总统徐世昌，但徐拒不见，几百名代表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直到6月28日，徐世昌才被迫接见其中10名。陕西学生代表屈武“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以致头部受伤，当即送进医院，而徐世昌却趁机溜走了。

上海学界和商界于6月21日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并急电巴黎专使，警告他们：“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①

---

① 《新闻报》1919年6月25日。

旅居法国的华工和留学生也积极参加了拒签和约的斗争。28日(即和约签字之日),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专使的寓所,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留学生们还事先约定,每一个专使的命用3个人的命去偿他,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以致专使不敢出门参加列席会议。

当时拒签和约的运动极其广泛,不仅有城市工人、学生、店员、教师、商人,还有乡村里的农民,就连亲英美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等也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当时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先后接到拒签和约的电报共达7000份。

正是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军阀政府只得表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的又一个胜利,至此,五四运动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具体目标都部分地实现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遂告一段落。

四、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1. 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在运动过程中,各地都先后出现了学生自己的组织——学生联合会,这就为全国学生总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后,为了团结全国学生的力量,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等易服改装秘密出京串联,经天津,又与天津学生代表一起南下济南、武汉、九江、南京等地,最后到达上海。邓中夏也同时出发去湖南联络。6月2日,京、津、宁、沪及留日等学生代表在上海假南洋商业学校为招待所,召开筹备会,到会者计京4人,津2人,宁2人,沪6人,留日4人。会后拟就电稿,于当天发给各地学生联合会,请于两星期内各派代表赴沪筹议建立全国学生总会。

6月16日,在大东旅社召开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北京代表段锡朋、唐炳源、陆梅僧、许德

珩、杨钟健、陈宝锷、黄炳蔚、罗隆基、罗发组、黄日葵、张伯谦；南京代表曹公瑾、吴邦杰（辞职后由许哲递补）；天津代表张阳先、刘家麟、刘清扬；上海代表陈纶会、何葆仁、程学愉、何世桢；湖南代表柳敏、林祖烈；陕西代表屈武；安徽代表常万元；留日代表刘振群、凌炳、王之桢；杭州代表连瑞琦、黄维时；九江代表邓毅生；保定代表吴震寰；山东代表崔书馨、卓景泰；吉林代表奚仁华；河南代表李仁荣、李九朝；山西代表周敦信；江西代表张锦德；福建代表刘庆平、徐式庄；广东代表陈肇荣；等等，共21省区60多人。另有中外男女来宾黄任之等，总共200余人。午后3时开会，由段锡朋主席致开会辞，次黄任之及其他来宾演说，再次，许德珩演说，主论学生去虚荣心，保持坚韧心。最后摄影而散。

17日通过章程，18日选举，段锡朋为会长，何葆仁副会长，陈宝锷为评议长，干事长由会址所在地上海学联推选陈纶会担任，不久，陈辞职由上海狄侃接替。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正式诞生了。

新产生的第一届评议会，从7月12日开始审查和修改会章，7月29日通过会章。会章总纲确定："本会以联络感情，昌明学术，促进社会，辅卫国家为宗旨。"这一宗旨表现了学生们的爱国和进取精神。关于组织问题，章程规定"设评议执行二部"。评议部由各省区选派评议员1—3人组成，"每年暑假期内开常会一次"，遇特别事故"由理事长召集特别会"，"设正副评议长各一人"；其职权为"决议本会一切规章"、"制定各地学生联合会组织大纲"、"议决本会进行一切事宜"、"质问及弹劾"、"选举"。执行部"以理事长及干事组织之"，"任期一年"；职权"为本会对外代表"、"监督本部一切事宜"、"对于评议部负责"、"将评议部议决事项交干事实行"。这样的组织机构充分表现了民主主义的性质。

评议会在讨论会章同时，对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平民教育及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等案也进行了讨论。

鉴于五四运动的具体目标都已达到，时间又临近开学日期，7月23日，全国学联发表了终止罢课宣言。

8月5日，第一届评议会举行闭会式，会议柬请了沪上各团体来宾100多人，连学生代表共计200余人。会议在南洋商业学校举行。会议由陈宝锷议长主持，首先请孙中山作长篇讲演，他首先赞扬爱国学生运动，指出：从五四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撄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且久远。接着他又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弊病在不能统一，各界莫不皆然，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于不统一，故望学生能力图统一以促进人民之团结，知有国家而牺牲个人而云云。"① 接着由商工各界来宾分别演说。最后会议发表宣言。会毕设茶点招待并摄影留念。

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从6月16日开幕到8月5日正式结束，历时50多天。会议期间，出版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由许德珩任编委主任、黄日葵为编委。

大会结束以后不久，8月20日，第一届理事会就职，理事会由沪、京、津、宁、粤、鄂、留日学生各一人组成，由狄侃为理事长，会址设在上海。

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以后简称全国学联）的成立，不仅统一了全国的学生运动的步骤，加强了全国学生的团结，为五四爱国运动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它成为一面光辉的旗帜，激励着我国学生向着进步和革命的道路迈进。

2. 各地学生联合会的发展

随着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学生会的组织也不断地涌现，由校

① 《全国学生联合会之闭会式》，《申报》1919年8月6日。

而市而省组织成学生联合会。除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北京、天津、山东、武汉、上海、长沙等学生联合会外，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联合会从5月至7月陆续组织，成立了不下几十个。

5月5日，成都高等师范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经过几天酝酿，在各地学校学生爱国组织基础上，在成都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主要工作是宣传讲演、检查日货。6月3日以后，重庆成立了川东学生联合会。

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杭州，杭州第二师范学生立即响应，在施存统的带领下，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并劝告他们抵制日货。宁波的学生于19日各派代表在后乐园开会，组织成立宁波学生联合会。

五四示威后不久，山西省法政、工业、农林、商业等专门学校和第一师范、第一中学、阳兴中学等联合成立了山西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总会，学生联合总会会址在山西大学。另有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由贺昌、王振翼、张友渔等发起组织。北京学联为加强山西学运，派高君宇回晋指导。

1919年5月25日，南昌学生200余人，假沈公祠开成立大会，选举邵祖平为正干事长、卢任华为副干事长，成立了南昌学生联合会。

5月6日，安庆学生三四千人召开大会，支援北京学生，决议成立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筹备会，此后，芜湖学生会成立，5月15日，安徽学生团组成，5月25日，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议，成立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

陕西省西安学生在得知北京五四运动消息后，纷纷自动集会，要求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等以上学校开了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议游行。5月下旬，示威游行之后，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屈武被推选为会长，邹遵被选为评议长，后出版会刊。

南京学界自5月9日游行后即组织学界联合会，5月26日开紧急会议，决定与北京取一致行动，28日罢课，罢课后，该会议决6月2日赴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典礼，南京学联正式成立。

在苏州由东吴大学、萃英、桃坞、晏成、浸会、英华等各中学，联合第一师范、第二工业、第二农业、省立医学、福音医学、私立体操、第二中学，以及景海、大同、女子师范、英华女塾等各女校，组织苏州学生联合会。

无锡各校于1919年6月17日成立学生联合会，与会学校为第二师范、辅仁中学、代用女子中学、竞志女子师范、县立女子师范5校，选举陈寿金、吴广尧为正副会长。

1919年6月8日，云南学生爱国会成立，各校均设分会，宗旨是："养成爱国精神，协御外侮。"杨青田被选为会长。9月接全国学联通知一律称学生联合会，云南学生爱国会改称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

桂林学生在五四以后，由各校代表共同发起筹组桂林学生爱国会，后改名为桂林学生联合会。

广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前后组成4个学生联合会，一是广东省学生联合会，主张学成救国，不主张从事现实的斗争，另一个是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积极声援北京、天津、上海各地运动，会长为张启荣，副会长周其鉴，1920年冬，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改组为广东学生联合会和广州学生联合会。

另外，在河南成立了豫西学生联合会，时间大约在1919年7月。该会抵制日货活动甚为出色。

起初，各地的学生组织各自林立，全国学生总会成立后，大部参加全国学生总会，总会或派员指导或发函发电互通信息一致行动。当时学生总会下属60余分会，号称有50万会员受其领导。出现这样全国性的大联合，不仅是学生界的空前进步，而且也是全国

各界的榜样，有力促进了各界的联合。

五、五四运动的延续和意义

1. 对鲁案的声援和觉悟社的诞生

6月28日，巴黎和约的拒绝签字，表明五四运动已告一段落，但是，从8月初开始的山东惨案和11月的福建惨案，又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涨，这可以看成是五四运动的延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控制的地盘，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马良，都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济南市的《昌言报》是安福系的喉舌，五四运动期间，对学生运动大加攻击，骂学生是"狂热"，指责学生：应该注意学业，以期科学救国，不宜干涉外事，荒废业务，甚至主张军政当局对学潮应予武力镇压。对《昌言报》的行径，山东人民记恨在心头，决定相机予以惩罚。

7月21日，济南学、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救国大会，一位教师痛斥《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台下群众情绪激昂，愤怒的人群奔赴《昌言报》馆，将其主编、经理等六七人绑缚，背插亡命旗，上书"卖国贼"、"汉奸"字样，游街示众，最后，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不过，当日下午，审判厅即将他们取保释放了。

《昌言报》事件触怒了反动派，7月22日，山东督军张树元急电北京政府，请求颁布戒严令，对群众施行镇压。25日，北京政府无理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

8月3日，当山东学生请愿团向督军、省长请愿，要求解除戒严令时，马良率大队人马镇压，捕去学生16人，并当场杀害了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亭及两名回族爱国分子朱春祥和朱春涛。马良还得意洋洋地说："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

马良的滔天罪行，不仅激起山东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仇恨，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天津各界首先声援。周恩来在他主编的《天津学生会联合会报》上，署名"飞飞"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号召人们："推翻安福派"，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

8月23日，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在北京联合请愿，要求总统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结果瞿秋白、刘清扬等30名代表被逮捕，并进行非法审讯。周恩来沉着领导天津学联的干部，积极营救被捕代表，当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出关于京津请愿代表被捕的《号外》，全市沸腾，上千人要求赴京请愿。8月26日，北京、天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向总统府进发，至28日晚，不但未达目的，而且当夜幕降临时，丧心病狂的反动派，指挥军警，手持长枪、刺刀向代表们横扫乱打，许多代表被打伤，有的被捕，请愿指挥者之一马骏，也被逮捕。学生并没有被压服，8月30日仍然在北京街头发表演说和散布传单，为了推动请愿斗争的顺利发展，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亲自到了北京，动员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和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8月30日释放了全部被捕的代表。

在声援鲁案的斗争中，周恩来、郭隆真和被释放的代表们思索着和谈论着如何拯救祖国的问题，周恩来建议组织一个核心小组并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代表们的一致赞同，1919年9月16日，这个核心组织——觉悟社就在天津草厂庵学联会内诞生了，这个社男女社员各半，男社员有周恩来等10人，女社员有郭隆真、刘清扬、马骏等10人，他们或是学联会的正副会长，或是《会报》的主编，或是学运中的骨干，10个女社员，都是女界同志会的负责人和骨干，邓文淑（邓颖超）是年龄最小的社员，当时是学联的讲演部长。周恩来虽再三推让，但每次开会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推他当主席。在觉悟社成立大会上，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方案，其要点是：（一）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二）本"革

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三)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四)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丁、灌输世界新思想。觉悟社规定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替各人对外的姓名，抽签的方法是用50个号码，各人抽一个，再用这个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邓文淑抽的是一号，因此，她别名逸豪；周恩来抽的是五号，因此，他别名伍豪。9月21日，李大钊被邀请到觉悟社作学术讲演，后来钱玄同、刘半农等也到过天津来讲演，也到觉悟社来谈话。1920年1月《觉悟》第一期出版了，《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周恩来写的两篇纲领性的文字，《觉悟的宣言》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①

天津觉悟社的成立和它出版的《觉悟》，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2.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

人民群众从五四运动的实际斗争中感到有联合的必要，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全国各地的学生联合会以及全国学生总会首先出现，继此，各地的商界、教职员、女界等爱国团体陆续成立。联合已成为一种趋势。

1919年7月至8月初，毛泽东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02页。

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大联合。”①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认识到：“学联的组织，惟限于学生一部分，主张固为正当，力量终形薄弱，欲冀外交内政为有实力之匡救务必结合工商各界组成系统之团体。”② 因此要求各地学联推动该地各界联合会的建立。

1919年6月18日正式成立的天津各界联合会是全国成立最早的，它成立之后，不仅积极组织代表进京请愿，从事拒签和约运动，而且连续派出代表到各地联络，推动各地各界联合会的建立，如韩致祥（麟符）曾被派赴各地活动数月。9月，又派出刘清扬等3人到上海，和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起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强调建立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重要性。当时前来上海参加筹备工作的还有湖北代表施洋等人。

全国学联为了促进各界联合会的建立，它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一起，曾先后派许德珩、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武汉以及江西、湖南等地，依靠各地学联，促进那里的各界联合会建立。经过各地各界人士的努力，到11月中旬，石家庄、太原、汉口、南昌、九江、安庆、杭州、南京、镇江、开封、芜湖、上海、郑州等50多个各界联合会先后成立，这样，建立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基础已经具备。

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个省的各界联合会代表数十人。刘清扬主持大会，她在致辞中指出：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宗旨是：“（一）救国家于水火；（二）促国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③ 孙中山的代表黄大伟和章太炎也曾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说。大会一致通过由施洋起草的宣言。大会产生评议、执行二部，下设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14日—8月14日《湘江评论》。

② 《全国学生会开会纪事》，《时报》1919年8月16日。

③ 上海《时报》1919年11月11日。

六科，所有职员均由各地代表充任，施洋任评议部主任。

3. 对闽案的声援

日本侵占台湾后，就把侵略的触角伸向福建，在19世纪末，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身受日本侵略之害的福建人民，在五四运动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一再挑起事端，寻机报复。11月16日，日本人组织的所谓商品保护队持械寻衅，与福州学生发生冲突，枪伤学生1人，刀伤殴伤学生共5人。驻福州的日本领事馆，不仅不惩治凶手以谢罪，反以保护日侨为借口，电请日本政府于11月23日派来日舰嵯峨号，其海军并在福州登岸游行，进行讹诈。对此，福州学联通电全国，请求支援。

全国各界联合会于16日接到福建学联的急电，17日便连连急电各地团体、报馆，吁请一致声援。23日，又为闽案向各地发出通告，呼吁："速开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决不供给日本一切米粮煤铁及各种原料。"全国学联也于12月1日就闽案电告各地学联，要求每日多派学生游行演说，痛陈日人并吞中国之野心，唤起国人一致力抗，并促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

福州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北京学生们的极大愤慨。11月29日，北京学生约5000人齐集天安门，分为30队游行示威，印发100多种传单，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12月7日，学生们又联合北京爱国商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强硬抗议，要求撤换日本驻福州领事，要求日本惩凶、道歉，并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还决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卖日货，并由北京大学等20多个团体，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有计划地进行斗争。

天津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建学联的来电后，立刻

在11月3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12月20日，天津国民大会在南开操场举行，会后，当场焚烧了自五四半年来因违约而被没收的日货。焚烧日货后，开始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达数万人。

上海的声援活动也进行得热烈。11月23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上海各界大会，邀请福建代表报告"福州惨案"经过，最后大会提出更换驻闽日领事，由日本政府谢罪，慰恤死伤者、惩办犯罪日人，限日本军舰、军队离闽等8项要求。上海学联决定自12月3日起停课4日，全体出发演讲，散发传单，抵制日货。

声援闽案的活动，除上述北京、天津、上海外，济南、南京、长沙、杭州、开封、广州、南昌、武汉、长辛店、昆明等都有热烈的开展，声势十分浩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殿军一战，此后，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进入尾声。

4. 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界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还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①

五四运动开始于学生界，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因此，它尤其是我国学生运动历史上的丰碑。

五四运动大大激发了我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过去那种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09—700页。

问国事、闭门读书的陈旧陋习被一扫而空，从大学生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放下书本，走出课堂，上街游行示威，发表演讲，抵制日货，他们的决心和热情不仅表现于语言、文字，而且表现于热血和生命，运动发展得如此广泛，如此持久，在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上是未曾见过的。

五四运动开始了青年学生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学生，历来对于工农劳苦大众是轻视的，但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在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从六三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与商界、工界建立了联系，成功地实现了“三罢”斗争的胜利，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此后，也成为我国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正由于这一点，才使中国学生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并始终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汇合在一起。

五四运动是我国学生走向全国统一组织的起点。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学生组织上也得到了加强，学生会从一个学校的联合走向一市一省的联合，最后实现了全国学生的大联合，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不仅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指挥中心，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也建立过一时的权威。五四学生运动的这种善于联合，实行统一的特点，成为我国学生运动的又一优良传统。

第三章　改造社会的探索

一、学生运动的挫折

1. 全国学联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

1919年底发生的鲁案和闽案还没有结束，1920年1月开始在全国又发生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斗争。

1月6日，对德和约正式生效，日本政府借此向中国政府发出通牒：声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取缔排日运动，要求在1月中旬开始就胶州湾交还问题中日直接交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恃强欺人的野蛮行径。

一向媚日的段祺瑞政府，在接到日本通牒后，仓惶失措，既不敢拒绝通牒，又不敢公然接受，态度非常游移。日本政府借此宣布，延宕不答，即已默认。当时的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还公然对山东代表说："直接交涉，不见得不利。"可见，北京政府在实际上是趋向于直接交涉的。

全国人民之中，尤其是青年学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义愤填膺，对于北京政府之态度十分不满，一致要求拒绝日本通牒，以待国际联盟之公判。

1月15日，全国学联发出通告，要求北京政府拒绝日本通牒。否则五四以来，全国各界不惜为极大之牺牲，以从事于群众的运

动，“前功尽弃”。①

同日，全国学联致电英、法、美、意4国公使，希望他们转达本国政府，严持公论，戢遏强暴。

1月27日，天津学生约万人，聚集南开学校操场开会，会后游行。29日下午2点钟，各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并散发传单，要求省长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牒，拒绝直接交涉。讲演半小时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于兰渚、张若名、郭隆真4人求见省长，省长装病，将代表骗入兵棚处室等候。此时省署辕门外已经布满了卫队，将学生包围，接着数十名保安警察将4代表捕走，交由捕盗营看管。

天津学生代表被捕，激起了北京学生的义愤，1月30日，北大学生讨论声援天津被捕学生办法，发表《学生会万急通告》，通告大声疾呼：“我们抱牺牲主义的同学！我们讲互助同学！我们猛勇奋斗同学！”“请你们快来开大会，讨论个对付方法。”②

2月3日，北京42校游行声援天津被捕学生，并在前门一带举行大演讲，被扣留数十人，送往卫戍司令部。此后又有很多学生因上街演讲被军警殴打，受重伤者甚多。北京20几个团体原定于6日开国民大会，因政府压迫未能开成。

2月9日，上海各界联合会召集数千人大会，要求驳回日本通牒，废除中日间一切密约及恢复集会言论自由，会后游行至龙华使署附近。此外，还有河南、闽南等地学生联合会都在各地发动。一时间，全国学生又掀起了爱国学潮。

2月27日，经北京、天津、山东、湖南、南京和留日学生联合函请速开全国学联特别评议会，讨论挽救办法。3月27日，特别评议会在上海召开，3月31日评议部决定，电告北京政府从10日起限

① 《通告全国拒绝通牒》，《民国日报》1920年1月15日。

② 《五四运动档案资料》第526页。

期4天内驳回日本通牒，"如若再推诿延宕，学生誓以赤手空拳与公等周旋。"① 限期过去了，北京政府仍置之不理，于是，全国学联决定4月14日一致罢课。通电全国各地学联遵照执行。

当日下午2时，上海学联集会于公共体育场，到会52校共8000余人，全国学联代表及广西学联评议会，浙江学联评议会，河南学联评议会代表都到会发表演说。全国学联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推翻卖国政府，挽回国权，卖国政府一日不去，国权则迟迟无挽回之一日。"② 上海学生会副会长在演说中坚决表示，不推翻卖国政府死不干休，并三呼："中华民国万岁！"演说完毕，各校开始游行。接着，南京、杭州、芜湖、九江等地学生即刻响应。4月22日，上海召开国民大会，沪督卢永祥颁布戒严令，兵劫国民大会，学生受重伤者400余人，杭州等地学生也遭军警摧残。

北京政府在逮捕周恩来等天津学生代表后，把镇压学潮的注意力转到上海，他们尤其痛恨全国学联，千方百计要查禁取缔。3月20日密电江苏省长和淞沪护军使，攻击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实为捣乱之根据地"，要"从严查禁"。当时的学生联合会总会与全国各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同设于法租界，反动派又特派员勾结法领事，5月6日，法捕房查封了以上4组织。法国巡捕将会员驱出，所有该会文件、图书及门前所悬木牌一并搜去，并用木板将大门封钉，门前还派巡捕监视。在封闭了全国学生总会后，北京政府下令查封各地学生联合会。至此，全国的学潮大受挫折，5月14日，全国学联通知各地学联从5月17日起一律上课，并提出"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的口号。

全国学联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遭受挫折，原因是多方面

①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代电》，《五四运动档案资料》第547页。

② 《体育场学生大会记》，《民国日报》1920年4月15日。

的，首先是客观条件不具备，工商各界不支持，教育界还有一些校长持反对态度，其次是学生本身开始分化，一部分走向激进，而一部分认为学运影响学业，更有一部分认为学生不应涉及政治。

这次全国学联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虽然受挫，但它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仍然是一次英勇的斗争，北京政府不敢公然与日直接交涉，最后又不得不复电日本政府，表示不能接受通牒。1920年4月26日，北京政府给日本政府的复电中承认"且全国人民，对于本问题态度之激昂"，所以不能直接交涉。不仅如此，这一斗争还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1920年7月，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讨段，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利用全国人民自五四直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斗争以来的反段祺瑞政府的情绪，京汉线一战，打败皖系，从此被全国人民唾弃的安福俱乐部被解散，皖系内阁的阁员也均被免职。虽然直皖战争的这一结果，只是表现为英美侵略势力的得势和日本侵略势力的暂时失败，但其中人民的力量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这次斗争受挫后，全国学生运动出现低潮。但是，一部分先进分子却更热切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刊物，积极组织各种社团，探索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

2. 第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根据会章规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1920年七八月间举行，但因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受挫，各地学生联合会陆续遭查禁。在这种形势下，到暑假召集大会显然是困难的。3月份因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来沪参加评议会特别会的广西、甘肃、福建、南京、北京、天津、山东等学生联合会代表提议，趁这些地区的代表还在沪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全国学联决定5月17日召集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到会代表有留日代表李达、河南代表曹靖华、上海代表狄

佩等三四十人，于上海一品香召开。大会未能作任何决定，至23日，确定下届学联的地址仍然设上海，同时举定南京、北京、福建、浙江、江西和留日为下届理事会成员。原定于7月1日为新旧理事交替日期，但因多数理事未到，新理事会未能组成。10月，留日学生理事李达和福建理事等5人到任，确定李达为临时主席，职权与理事长同。至1921年1月，各地理事才陆续到齐，第二届理事会才最终组成。因为留日理事改为姚作宾，故由姚作宾为理事长。后来在实际上也未发挥什么作用，这表明学生运动正处低潮。

二、青年学生改造社会的探索

1. 改造社会的呼声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政治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因为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原来以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转为由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这两年，是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时期，在知识界出现的围绕着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讨论，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主要体现。学生界也同样发生了这种新旧交替的状况，而且可以说是表现尤为突出的一部分。

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挫败以后，中国学生要求改造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生看到中国的现实，仍然是军阀统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感到："四围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的，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

里似的，如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① 因此，他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

这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受到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流的冲击就更加迫切了。虽然当时很多学生对苏联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但是，从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和讲演中，已经得到很多新的启示。1920 年初，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后所发布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宣言，突破反动派的封锁，在中国报纸上全文发表，更激起了中国学生对十月革命的追求，同时也就更热心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另外，中国学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觉悟大大提高，一部分激进的学生，在五四运动高潮时就提出要从根本上推翻军阀政府的问题。1919 年 8 月 6 日，周恩来在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的《黑暗势力》（署名飞飞）一文中就提出：“推翻安福派，打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翻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② 恽代英在同年 7 月 1 日也为湖北学生界写下了《大家起来推翻安福系》的文字。③ 1920 年春，中国学生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时，曾提出推翻媚日军阀政府，实行民治主义，而且自己起来召集国民大会。学生的这种觉悟必然使改造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学生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可以从五四后学生社团和各种期刊的大量涌现这一事实充分表现出来。五四以前，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而五四后的第一年中，新出版刊物骤然增至 400 余种之多，其中学生办的期刊占相当的比例，比较有影响的就有近 40 种之多。

---

① 《曙光》第一卷第一号，1919 年 11 月 1 日。
②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 年 8 月 6 日。
③ 《恽代英日记》，1919 年 7 月 1 日。

各种学生社团大量的涌现，它们通常都是由一些志趣相投、关心社会改造、在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的青年学生组成，小的只有几人，大的数十人，个别的在百人以上，如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赵世炎组织的少年学会、浙江温州的永加新学会、江西南昌成立的鄱阳湖社（后更名为改造社）等等，估计约有三四百个，这些社团都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这类话，在不少刊物的发刊词中比比皆是。

当时的学生对于迎接新的思潮，怀着极大的热忱，对于改造中国社会，充满着信心。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湖南学联会刊《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① "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②这种以主人翁的姿态立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话，集中地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精神境界。有些学生创办社团，出版刊物时，还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朝气，充满着无所畏惧的精神。

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青年学生追求新思潮的热情也越高涨，五四高潮以后，政治斗争逐渐转向低潮，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群星灿烂、百家争鸣以探索改造社会的生动局面却出现了。

2. 研究新思潮

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是什么呢？孔孟的旧礼教当然已被唾弃，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

① 《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一号 1919 年 7 月 14 日。
② 《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1919 年 8 月 4 日。

击，在青年学生们的心目中动摇了，代之而起的是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追求。

先进的青年学生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认为：“对于我们现在中国争斗的救济，尤为剀切——要紧，我们应当欢天喜地争先恐后的欢迎，消除我们往日的三灾八难。”① 当时的一位青年在《群众运动的母——五四运动》一文中这样热情洋溢地写道：“五四以来，大西洋的新潮流，一天一天的由太平洋流到中国来，在东洋文化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什么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学说，都印入吾人的脑子里；吾人于此亦恍然大悟，晓得阶级制度，是不可存留的，资本观念，是不可持久的，将从前鄙陋的思想去了大半，这不是中国社会进化的一大好现象吗？”② 数以百计的学生刊物上，都可以找到这类热烈赞扬社会主义的话。一时，社会主义成了最时髦的东西，连盘据在闽南的军阀陈炯明所办的《闽星》，为了欺骗青年，也大量刊印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高唱社会主义调子。

然而，当时被人们认为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庞杂而繁多的，除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各种流派，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及其互助论（或互助主义，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主义以及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其他还有当时在国内衍生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

由于青年学生的出身、经历和思想状况不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的。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都还没有确定自己的

---

① 《随感录》，《星期日》第34号，1920年3月。

② 《杭州学生联合会报》第31期五四号增刊，1920年5月20日。

信仰，他们在讨论着，在比较和选择中。

邓颖超在回忆觉悟社的文章中说："这个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①

瞿秋白也曾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②

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盛行的同时，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原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等等，尤其是民主——德莫克拉西，仍然被青年学生所珍惜，而且往往把它和社会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描绘着新社会的蓝图，追求一个没有阶级的最善最美最新最合理的社会制度。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李大钊在5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和鉴别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之后，到1920年5月以前，李大钊还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侧重宣

---

① 《五四运动回忆》，《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52—353页。

②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

传唯物史观文章，一些青年学生“从他的文章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地离开了唯心论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①

这一段时间，《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等杂志都发表了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日渐扩大。1920 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同年出版的马、恩著作，还有《资本论自叙》（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半部分等，列宁的著作在 1920 年也开始流行了。在高等学校，马列主义上了讲台。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他们咒骂和查禁过激主义，资产阶级学者也开始阻止和反对。从 1919 年夏秋开始，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展开了 3 次论战：即与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以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伪社会主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 3 次论战中，留日学生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都写了不少文章，特别是李达在与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起了重大作用。他撰写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和 1920 年他又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和《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介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驳斥了张东荪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都直接对青年学生发生重要影响。

胡适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是很深的，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后，很快在社会上得到响应，7 月，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给北京会员的信中，便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主张，胡适请杜威来华讲学，原计划只几个月，由于受到了广泛欢迎，一再延长，竟住了两年又两个月。通过论战

① 曹靖华《回忆青年学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 109 页。

双方都阐明了各自的观点，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大多数学生的觉醒，是通过他们亲身的实践，即各地创办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才认识到改良主义的谬误，抛弃改良主义选择了革命道路，主张“根本解决”。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对青年学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1920年秋至1921年春，新民学会会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争论先发生在一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中。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明确主张采用“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①。以萧子升为代表的少数，虽然口头上也赞成社会主义，但“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和“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并公开申言：“不认俄式——马格斯式——革命为正当”② 双方争论不下，都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毛泽东复信坚决支持蔡和森，批评萧子升的主张。英国罗素在上海讲演，主张用教育方法，反对劳农专政，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进行讨论，认为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这些对于新民学会会员摆脱“温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坚持走十月革命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至1922年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这一论战在一些社团、学校以及国外留学生中，都有反映。例如，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讨论工学互助会章程的会议上，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都发言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引起了热烈的争论。1922年周恩来等办的《少年》月刊，同无政府主义办的《工余》杂志，也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展开了论战。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② 《肖旭东给毛泽东》1920年8月初，《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进化论”，在青年学生中仍有广泛的基础。

五四以后，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思潮，哺育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中间就包括一大批青年学生，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沈泽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周恩来、蔡和森、陈延年、赵世炎等也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3.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热烈追求，不仅表现于理论研究方面，而且勇于在实践上进行尝试。

1919 年底至 1921 年春，各地学生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就是这种尝试的标志。

1919 年 12 月 4 日，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建议在城市里成立工读互助团。最初王光祈设想在农村租个菜园，建筑十余间房子，十几个或几十个人在一起种菜、读书、翻译，还可以做游戏、阅报，这就是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蓝图。但是，这种设想遇到了两点麻烦：第一，土地不好解决；第二，学生大都不熟悉农村，于是就有城市工读互助团的提议。

王光祈的文章在报上登出后两三天，他便收到了数十位同志的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杭州的俞秀松、施存统特地跑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等人都表示支持，并一起作为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联名募捐。不到半月功夫，募捐逾额，召开了一次团员大会，工读互助团就首先在北京问世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 4 小时”；“工作所得归团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

给，唯书籍系归团体公有”等。①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以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组成的。该团共分4个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7号，共13人，按工作分为食堂、印刷（印信封、信纸）、英文专修（补习英文）、洗衣和电影5个局，开办费523元；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3校附近的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团员共11人，按工作分为平民消费公社（贩卖书报）、平民补习学校、小工艺、厨房和洗衣5个局，开办费约400元；第三组又名女子工读互助团，该组约有团员10余人，主要有织袜、缝纫、刺绣几类；第四组是后来增加的，主要是法文专修馆的一些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于是将国外工读变为国内工读，该组设在东城松公府夹道8号，原为10人，后有1人赴法，主要经营食品、杂货等。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刊物报道了它的活动，称赞工读互助团是极好的一桩事。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地方积极筹划，仿效实行：1919年12月，南京师范学校32个学生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次年1月，天津觉悟社成员谌志笃等发起工读印刷社；2月武汉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发起成立武昌工学互助团；北京中国大学教工发起组织中大工读互助团；同月2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筹备会，报告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进展情况，着重讨论了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和办法，并筹办在复旦、南洋等校附近建立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在广州女界发起组织粤女工学互助团；毛泽东提议办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他说，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②

随着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及其影响的扩大，1920年1月，

①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20年1月15日。

② 《毛泽东给周世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1920年3月14日。

王光祈写了《工读互助团》一文，对工读互助团性质、任务、前景以及在改造社会中的地位和特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强调，"工读互助团的理想，便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又说，"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哉！"①

王光祈的这一篇文章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影响最广泛的工读互助主义的代表作，王光祈显然也就成为这个主义的代表者了。

工读互助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学生由于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和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克鲁泡特金提倡的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对学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五四以后，一方面由于"劳工神圣"的呼声高涨，另一方面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出巨大威力，知识分子重视劳动，要求自己成为劳工，因此这个时期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也被当作社会主义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传，他们赞美这位把土地给农民。而自己过着三季工作、一季出版的勤劳寡欲生活的著名作家。有的学生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吗？……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抗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人？"② 有些知识分子看到自己的弱点，焦急地说："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

① 《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20年1月15日。

② 真：《教育的错误》，《平民教育》第九号，1919年12月6日。

五四运动前夕，1919 年 3 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对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加以介绍和鼓吹，周有意识地把新村主义与互助论、泛劳主义揉合在一起，把新村运动说成是："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①

在社会改造声浪高涨时，杜威和胡适竭力宣扬的实验主义也很容易被青年学生所接受，而且使得新村主义扩大影响。

就是这样，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由于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而融合在一起，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形成了工读互助主义。

工读互助主义是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地暴露了出来，第一组尤为突出，一是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很难维持下去，二是组内的思想分歧和感情不合，首先是辩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 5 人，讨论家庭问题，又有 1 人退团，之后，彼此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再加食堂发生经济危机，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大家都不愿去维持它，3 月 23 日开了一个会，从根本上推翻。第二、第三、四组中，第二组解散较早点，三、四组到 1920 年 10 月以前仍然存在。在这一段时间中，虽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如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等，此外还有些人，打着"新村"旗帜活动，但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解散毕竟是对工读互助团试验的严重挫伤。1920 年 6 月成立的旅沪湖南学生为主体的沪滨工读互助团，到 1921 年 2 月也无奈只得发表解散

①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9 年 3 月 15 日。

宣言——《呜呼工读互助团》，宣言说："北京工读互助团多半是受了经济的压迫，我们把这个团体设在经济中枢的上海，经济方面或较容易"，"哪里晓得在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总不能达到我们的生命力所须的要求"，"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① 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勉强实行起来，但一开始就走样了，不过是课余的时间贩卖面包、果品、书报罢了，使去考察的人大为扫兴。新村的试验更不景气，不仅没有出现过像各地筹建工读互助团时的热烈场面，就连一个新村试验场也未着手进行。

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一连串失败，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益的教训。施存统在 1920 年 4 月写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中，总结了两大教训。他指出："(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他说："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这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打翻，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② 这之后，他更坚信共产主义要根本改革社会的经济组织的科学观点。

从工读互助团失败以后，文化思想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而更加分化了，一大批先进青年学生，认识到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空想社会主义，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而坚定地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另外一些学生如余家菊、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国家主义派则走上反革命道路，工读互助主义的代表者王光祈则跑到德国，走上了音乐救国的道路，用西洋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礼乐去了。

---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 469 页。

② 《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七张，1920 年 5 月 1 日。

4. 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当国内青年学生中工读互助团纷纷涌现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出现了高潮。

还在辛亥革命前，留法的李石曾就和当时寄居法国的蔡元培等，在法国办了一个中文印刷所，还办了一个豆腐公司，工人都是从中国农村招去的。他们为这批华工办了华工学校，晚上上课，蔡元培等都在那里任教，使华工能够“兼工与学，以发达脑与手之本能。”随着华工增加，范围的扩大，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的发动下，于1915年6月创立了勤工俭学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这些勤工俭学学生实际上主要是以工兼学的工人，还不是兼工以济学的知识分子或学生。

1916年春间，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十几万华工，为了组织领导这些华工的教育和学生出国与谋工的便利，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和法国人士一起，组成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当会长，李石曾当书记，并在国内设总会于北京，设分会于广东、上海等地，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吸收贫苦有志的青年到法国留学。同时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进行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重办留法预备学校、法文专修班、法文夜班和兼习法文的孔德学校等等，以传以法语。预备学校分设北京、保定、长辛店等处，后来四川也开办起来。

留法勤工俭学开始并未被青年学生所重视，并且欧战正酣，谁肯去冒险呢？欧战结束，1918年夏天，全国许多省区掀起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浪潮，1919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400多人，而1920年猛增至1600人左右，其中以湖南、四川两省人数为多，各达300余人左右，许多知名人士都是这一时期去法的，例如蔡和森举家赴法（包括蔡畅、向警予和54岁的老母葛健豪）一时传为美谈，著名的教育家徐特立，时已43岁，仍到法国去

做工，更为人所崇敬。1920年底，周恩来出狱不久，也同觉悟社成员郭隆真、四川的傅钟等人一起赴法。

1600多人同时留学法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留学生大多去日本，留英、美、法的很少，五四爱国运动后，去英美的开始多了起来，如北京大学曾经接受资本家穆藕初10多万元的捐款，经过胡适的筹划，选派了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林、汪敬熙5个学生留美，被当时教育界讥为"五大臣出洋"，后来山东省的留英美学生选派了傅斯年、杨振声、何思源、徐彦之、赵太侔等人出国，人数都是寥寥无几的。

留法学生数字猛增，其原因有三：其一是经济原因，去法不必像去英美留学花那么多钱，一可俭学，二可勤工，贫困家庭的子女，可以不受限制。其二没有学历的限制，1600多留法学生中，自大学毕业生至高等小学毕业生均有，且有学校教职员、工人技师，"大学生仅有90人，中学生及各项甲种实业学校学生近千人，而高等小学学生不过30余人。"① 其三是由于十月革命爆发所形成的世界革命潮流及国内新思潮的影响。周恩来在《西欧通信》中写道："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② 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一文中关于他旅法的动机，曾这样写道："到了八年夏间，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我把这个主义思索了一遍，我相信工学生活是人的生活。我以为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是求学，是精神生活，是创造文化，为社会求进步，并且工学兼营，即理实并重，较在国内株守好得多了，又想中国人素来无往外营生的能力，我此次去以两手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这真是少年的伟力。能在海外独立，这也

① 周恩来：《旅欧通信》《续》。1921年12月24日《天津益世报》。
② 周恩来：《旅欧通信》。1921年5月10日《天津益世报》。

是一点光荣。”①

吴玉章在欢送勤工俭学学生出国的演说中，更是以考查和学习俄国革命，革新社会来要求学生的。他说：“此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社会革新之声，遍于全球，我们国人亦知顺此潮流，研究改革。”② 又说：“我们何以提倡留学法国？因为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由法国，……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往一考查。”③

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与国内工读互助团的学生就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要求改革社会。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工读互助团的成员是在自己独立经营的小社会中建设一个无剥削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乌托邦，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是深入到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且深入到最底层——工人阶级，这样就能更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在法国可以直接阅读到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就更迅速，更坚定。周恩来、蔡和森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在这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

由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到了法国以后只有一部分进厂做工，有半数找不到工作，也进不了学校，成为巴黎的漂泊者，本来华法教育会负责安排留学勤工俭学学生，但由于该会被李石曾、吴稚晖等把持，会中某些人贪污勤工俭学捐款，过阔绰奢侈的生活，国内寄去的捐款到不了学生手里。有些学生参加了

---

① 《时事新报》1921年10月31日。

② 《送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之演说》，《晨报》1919年4月10日。

③ 《吴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之演说》，《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月7日。

法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即污蔑勤工俭学学生“好坏不齐”，实行排挤和打击。1921年初法国经济困难，工厂息业停工不断发生，法国本国工人大量失业，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语言不尽通，技能大都缺乏，因此，工作机会更难寻觅，1600人中原来有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此时其中失掉工作的又有四分之一。

失学、失业威胁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在1921年2月28日发动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被迫宣布将国内汇来的一部分捐款分发给有困难的同学。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

6月初，北洋政府派出专使朱启钤到巴黎办理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借款一事，此次借款数额达3亿法郎，以出卖国家印花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担保条件，这是一笔肮脏交易。周恩来和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同志一起，联合巴黎各华侨团体，组成了一个拒款委员会，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300多人，以勤工俭学学生出席人数为最多，会议发表了《拒款宣言》，会后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又组织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华侨代表去见朱启钤，当面痛斥卖国借款的罪恶行为。此后，朱启钤的活动有所收敛，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

在拒款斗争后，法国政府加紧对勤工俭学学生迫害。9月里昂中法大学准备开学，而校长吴稚晖从国内带来100多名“新科贵人”，并通告谓：“里大”为培养教授之场所，入学者须有一定财力作保，有相当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这等于拒绝勤工俭学学生入学。

中法大学，是在拒款斗争前，由李石曾等人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与生活问题为名，募集经费筹办的，现在突然改为国内招生，拒绝勤工俭学学生，这不能不激起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义愤。周恩来、蔡和森等研究了斗争方案，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率领巴黎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前往里昂，先是说理，但校方坚持

不改。9月21日凌晨，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领导下，120多名代表冲进“里大”，占驻了一座楼房。

青年学生万没有想到，进驻“里大”的行动，正好上了陈箓的圈套。在这之前，学生代表向他表示，如果不解决勤工俭学学生入学问题，就要进驻“里大”。陈箓不仅没有反对，反而拍着胸脯担保，如果法国方面干预，他将负责去交涉，最后，他还慷慨地发给这批学生去里昂的路费。可是当学生一离开，他立即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说：“勤工俭学学生是‘极端分子’，要强占里大，请派军警弹压。”

学生代表进驻“里大”的第二天，里昂警察局派来了200名警察，包围了“里大”，首先检查姓名，骗走护照，随后便实行逮捕，全部押进了兵营。留在巴黎的周恩来、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同志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但终因中法两国当局，共同策划要把这批学生代表驱逐回国的方针已定，所以一切营救均皆无效。

1921年10月13日，拘押在法国兵营的12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除了有几名被保释，有几名被探视的代表机智带出外，其余104名包括蔡和森、陈毅等同志，全部转马赛上船遣返中国，于11月23日到达上海。

周恩来在《西欧通信》中写道：“他们是要生产而不能，求学而不得，终受被押解回国，……他们虽然自己承认一无所得，但是他们岂真一无所得，数万里的海程他们辛辛苦苦的来了，更悲悲惨惨的回去，劳动的真实的生活被他们尝着了，中法文化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识破了，社会现象的不平，东亚西欧如同一辙，也被他们发现了，纯洁的青年人格，更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了，这岂不是他们大有所得。”① 是的，他们是大有所得的，这些代表中的先进分子立即在国内投入了火热的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

留在法国的先进分子，也在1922年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① 周恩来：《旅欧通信》。《天津益世报》1921年12月18日。

党(旋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其主要领导人有周恩来、赵世炎等。它培育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郭隆真、谢唯进、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克明、刘鼎等同志。

5. 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

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探索、改造社会的重大进步。正是他们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新道路。

青年学生通过五四运动,特别是六三中国工人阶级表现了巨大的威力之后,"劳工神圣"的口号更被人们重视了,知识分子重视劳动,要求自己也成为劳工的呼声,愈来愈高。这就为他们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0 年 5 月,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青年学生与工界一起举行了较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上海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于 5 月 1 日,集合三四千工人,原定在公共体育场开会庆祝,但因军警禁止,不得不三易地点,最后在老靶子路的荒地上召开了庆祝大会。

北京的纪念活动主要是由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进行的。五一那天,北大召开了 500 多人的纪念会。会后,何孟雄等同志分乘两辆汽车,手执写有"劳工神圣"等旗帜四处游行,沿途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那一天,邓中夏还专程赶到长辛店,在 100 多工人举行的纪念会上讲了话。

广州活动由学生发起,在五一当天,召开了有学界和工界代表 1000 多人参加的纪念会。

这些活动,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

由于青年学生对劳工的重视,至 1920 年 8 月李大钊、周恩来

等发起由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和觉悟社参加的联合座谈会，就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到民间去：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①

1920 年下半年，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到民间去的热潮，其中尤以平民教育的发展为其主要途径。

平民教育是新文化的产物，还在五四运动前就办了不少的平民学校和平民教育事业。五四运动中，由于广大学生走出学校与工人相接触，与广大的民众接触，了解他们缺少文化，缺乏知识，因此感到平民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今欲根本救国，非促成社会上大多数人之觉悟，养成群众自动之能力不可，欲达此目的，必自推广平民教育始。”这样，学生中热心于平民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平民学校蓬勃而起，平民教育的发展推向高潮。

首先是各类平民学校的普遍开设。全国学联于 1919 年 10 月向各地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学校附设平民义务夜校，专收中年及少年贫困失学之店员及艺徒，授与修身国文（应用文）、算术（珠算）、簿记等科，教职由学生分任。”② 各地的学生联合会一般都设有教育科，专门负责平民教育。还在 1919 年 7 月 14 日，上海学联发表《义务教育团进行办法》，此后相继创办了 8 所义务学校，3 所为贫民子弟服务，两所为工人服务，两所为农民服务，一所为农民子弟服务。南洋公学学生侯绍裘等利用暑假创办了上海学联工界第一义务学校，吸收附近地区工人上学，学生共四五十人，设识字、国文、常识等课，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劳工神圣”。暑假结束后，因学校将房屋收回，致使义务学校停了一段时间，但他们千方百计想办法，终于借到距南洋公学校较远的虹桥路

① 《改造联合约章》，《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1920 年 11 月 25 日。

② 《实施平民教育主张》，《民国日报》1919 年 10 月 8 日。

清华国民学校的教室作为校舍，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侯绍裘及其同学都坚持摸黑步行几里路去上课。没有教材，他们自己编讲义。据1922年统计，南洋义务学校在校学生达113人。江苏第二师范学生会创办了龙门义务学校，全国学联曾将它的简章向各地介绍，在长沙、北京、天津、广州、南昌等地也都出现过平民义务学校。

其次是各种讲演团十分活跃。运动期间，各学校都普遍组织讲演团，手执小旗，选择人多的闹市，讲演爱国的道理，运动结束后，有些讲演团仍坚持活动，除讲爱国道理外，也进行科学文化的教育。1920年3月以后，"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在邓中夏的带领下，到长辛店的工厂，向工人讲演，到农村向农民讲演。

再次是各地通俗读物大量出版，如1920年8月创刊的上海《劳动界》、10月创刊的广州《劳动者》和11月创刊的北京《劳动音》等周刊，都是向工农进行通俗宣传的刊物，是平民教育的一种形式。

平民教育在开始时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起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3部分人的统一战线，五四以后，这个统一战线逐渐分化。以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晏阳初为首，于1920年由法国归来，也标榜平民教育，并于1923年6月，联合朱其慧和留美归来的陶行知等，接受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他们在全国20个省区的范围内，打着"平民主义"旗号，办起"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还编了一套《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学校课本，以教育改造社会，提倡教育救国。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将平民教育与宣传马列主义相结合，把平民学校变为教育工人阶级和一般群众的阵地，特别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们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从1920年底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

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这个学校当然是我们在此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① 1921年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纱厂集中的小沙渡，也办起了“上海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1921年12月，党为培养妇女干部和教育青年，创办了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教员有陈独秀、高语罕、邵子力、陈望道、沈泽民、张秋人等，学生约有30人，其中有钱希均、王一知、丁玲等。

三、全国学生运动的消沉

1. 北京教潮和安徽学潮

全国的学生运动，自1920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受挫后，已经平息无声了，1921年6月发生的北京教潮和安徽学潮，在平静的水面上掀起了一阵微波。

五四运动之后，军阀政府对学生深恶痛绝，对于教育竭力摧残。军阀连年混战，军队不断扩充，大部财政收入拨作军费，而对教育经费则千方百计克扣，甚至移作他用，以致使很多国立学校平时经费不着，教职员的薪金也发不出，于是，就出现了1921年春夏的北京教潮和安徽的学潮。

早在1919年12月，因为学校的经费有名无实，学校实在无法维持，北京小学以上各学校全体罢课，请政府筹集教育基金，在基金未筹足以前，指拨确实款项，以充教育经费。1920年1月，政府答应要筹备教育基金，并且由财政部筹措在京各校经费，但过了不到两个月，仍旧又欠发各校的经费，而且愈欠愈多，竟使各校实在没法自存。后经多次交涉，自11月起，各校经费都按月照发。不料才发了两个月，不但积欠的不按期分还，就是本月的经费，亦渐渐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1页。

拖延，至此，北京大学、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等校长及教职员商议，于3月14日一致罢教。接着法政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女子高等师范等8校的教职员都实行了罢教。

北京教职员的斗争得到了学生的同情和支持。6月3日，北京教职员及学生，去国务院请愿，被卫兵用枪柄刺刀乱击，重伤数十人，造成惨案。北京教潮由此扩大。至12日，北京公私立学校决议罢课，各校在东城燕京大学开会，北京已陷于无教育状态。被监视于首善医院的马叙伦，绝食一昼夜以抗议北京政府对教育之摧残。

六三惨案发生以后，全国学生对北京教职员和学生的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6月4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发表通电，指出："今日而欲根本解决教育问题，惟有号召国人与北庭奋斗，斩木揭竿，卒覆秦室"①。6月7日，山西太原中等以上学校，罢课支持北京教职员和学生的斗争。6月13日，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教职员开联合会议，北京学生代表谢绍敏、高尚德介绍北京学潮的经过，会议通电政府："恢复受伤教职员自由，并速筹教育基金，妥定办法，以维国本，否则我民将以停止纳税为最后对待方法。"② 此后，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教职员和学生也都表示对北京教潮的支持。

这一斗争，持续到7月13日，经过调停人多次活动，北京政府不得不表示："为六三不幸派员向教育界慰问"、"受伤医药费由教育部支给"、"八校临时费，由教育部依八年度预算拨给"。这样，北京教潮才逐渐平息。

当北京教潮发展到高潮时，安徽学生的六二运动也爆发了。这一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安徽学生为了改善安徽教育，要求增加教育经费。

五四以后，安徽的学校无论是官办的高级学校也好，优级师范

---

① 《北京摧残学界之呼援》，《民国日报》1921年6月15日。

② 《上海教职员热烈运动》，《民国日报》1921年6月14日。

学校也好，普通中小学校也好，都像被狂风吹打的落叶一样，有的遭到无理的停办，有的在经费上不止一次被压缩。当时的私立学校，更是时时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加上当时仅存的学校，大部分又是那些不学无术与奔竞夤缘的议员们担任校长，他们这些人，整天忙着趋炎附势，使得安徽教育完全处于破产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安徽学生提出："改善安徽教育，增加教育经费。"但省财政厅和省议会多方阻碍，不同意增加经费，校长从中疏通无效，学生请愿也无着落。

正在这时，安徽督军倪嗣冲在蚌埠建立的生祠，定于6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马联甲、倪道烺及多数议员相约在6月2日晚间由安庆同船到蚌埠参加典礼，省议会副议长赵继椿及议员刘顾等，设宴欢送他们。安庆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认为议员们走了之后，讨论教育经费问题的会议，必将遥遥无期，通过预算案的困难，必然就更大了。经过了商讨之后，立即由学生会及教员联合会一面推定代表赶到议会挽留议员，请他们讨论了安徽教育预算后再去蚌埠，一面又通知各校学生紧急集合，结队到江岸把轮船码头把守起来，以免这些家伙散席动身。

当学生代表11人于6月2日下午6时到省议会要求见议长、挽留议员讨论教育经费时，警卫们不问青红皂白，端起长枪，上了刺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代表，后来大批学生们赶到支援也遭到无情毒打。当场受伤有数十人，其中一师的姜方琦受伤最重，军警7次用刺刀戳过他的胸膛，经抢救无效，于7月1日逝世。学生代表戴之秀后脑被击，昏迷很久才苏醒过来。一中学生代表周肇基被军警抓去，幽禁在省议会，遭多次毒打，一年以后不治身死，周爱人悲愤填膺，以身殉死，合葬一起。

6月3日，省教育会、学校联合会、学生总会3单位共同通电全国，诉以公理，并决定省内各学校一律罢课，并到各校门前悬挂白布大标语，上面写着："议员军阀，残杀学生，全体罢课，誓与偕

亡。”

罢课后，经过多次谈判。6月22日，省长基本上接受了学生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抚恤死难者家属、撤换不称职校长等条件。7月，学潮逐渐平息。

安徽学生的斗争不仅对安徽教育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它与北京的教潮相呼应，影响很大。不少省市的教职员和学生在此推动下积极开展为挽救教育危机的斗争。但是，这一时期的斗争不仅限于经济性质，而且都是局部和地方性的，各地的教职员和学生对于这些斗争曾表示支持和同情，但也都限于电报声援或者是少数学生代表请愿，没有能动员广大学生群众参加。全国学生运动的消沉局面未能打破，学生政治热情的冷落状态也未能改观。

2. 学运方针的争论和全国学联的分裂

按照会章规定，1921年8月10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召集第三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安徽、江西、广东、贵州、福建、山东、江苏等各地代表31人。

会议重要议题之一是关于太平洋会议提案。这一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赃，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决定于1921年11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美国还正式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抱有幻想，希望美国在这次会议上能主持公道，解决山东问题，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广东、南京等省市发起了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或研究会，北京发起了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学生界对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选及各种提案都十分关切。为此，这次学生代表大会组织了专门研究提案的外交委员会，拟定了“对于太平洋会议我国应提出之问题案”。外交委员会提出的提案经理事会讨论作了修改，提交评议会复议，提案分：“（甲）特别提案：（一）废除1915

年日本强迫我国承认之二十一条件及换文。(二)无条件收回青岛及欧战发生前德国在山东享有之一切权利。(三)取消欧战发生后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私订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契约。(四)要求各国承认韩国为完全独立国。(乙)希望条件:(一)各国不得互相承认或议定妨碍中国主权之条约(如英日续盟之类);(二)各国应以平等精神改良对中国及华侨不平等之待遇(本此原则如领事裁判权及邮政权、关税自由权,对华侨一切不平等待遇之条例在收回或取消之列)"①。这一提案为评议会顺利通过。

8月26日,评论会讨论"否认北庭(即北京政府)及准备否认北庭后之方法案"。在北京教潮和安徽学潮期间,因北京政府残杀学生,镇压请愿,全国学生总会为此发出通电"否认北庭政府资格",电文指出:"徐靳媚日成性……外挟日本之厚援,内假张曹王之虚声,特施高压手段以箝制国人之口,……吾人以非法政府待之。"② (注:徐即徐世昌,当时任总统;靳即靳云鹏,当时任内阁总理;曹即曹锟,张即张作霖,王即王占元。)安徽学生对总会的通电十分赞同。评议会开会的第一天,安徽代表呈请愿书,要求否认北庭政府资格,这样,否认北庭案成为大会重大议题之一。

大会讨论此案时,北京代表唐世芳、林宝慈、蒋志澄等竭力反对,但为大多数评议员通过。27日,唐作为评议长提出复议,结果多数代表仍然通过原案。此后,北京代表发表宣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平素主张,在于力争外交,促进教育,以谋社会之改革,故关于涉及政治臭味各问题,曾一再声明,我辈在学生时代,为外交教育奔走呼号,荒废学业,已属国家之不幸,若更涉政治,益形纷扰,良以政治问题,以党派分歧,是非丹素,易致迷悟,不如暂置勿问。超然于政治范围之外之为愈也。"因此,"为尊重北京学生历来主张

① 《学生会对太平洋会提案之修正案》,《民国日报》1921年9月2日。

② 《否认北庭政府资格》,《民国日报》1921年6月9日。

计，不敢赞同。”① 并声明退出会议。

北京代表的行为，违犯了学联会章程。因此，评议会于 9 月 1 日开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弹劾唐世芳、蒋志澄两评议员和林宝慈理事。

在这场争论中，杭州、南京代表保持中立，山西代表因赴会前，山西学联未讨论此案，为慎重起见，也未表赞同。

关于否认北庭案的争论实质是学运方针的争论。评议会进行之第六天，在一次学联欢宴会上，北京代表唐世芳演说，他认为：“今后学生之行动，宜向根本方面着手，即注意能实行的事，不必徒托空言”。② 什么是“根本方面”呢？林宝慈接着就说：“北京学生认为救国须从教育入手，不必干涉政治。”南京代表也主张要注重教育。安徽代表立即表示：“若不从政治方面改革，教育也难普及，即如六二、六三两案至今尚未解决，足见北京政府无维持教育之诚意。诸位既提倡教育，应对于教育想一根本办法，不受不良政治之传染。”留日学生代表，学联总会理事长喻育之积极支持安徽代表之观点，他说：“五四学生运动，为反对山东问题，今山东直接交涉，将成为事实，我辈学生不干涉政治则五四之举，殊为多事。”③

这次争论还涉及对南北政府的态度问题。虽然在否认北庭案中未提承认南方政府之事，但广东代表明确表示：“承认南政府为正式政府，确为广东学生联合会夙昔之所主张，于此事自然枉端赞同。”④ 而北京代表则认为：承认南方政府，“当召集全国国民大会，以实力解决之，决非学生一纸空文所能济事。”⑤大多数代表认为北京代表袒护北庭，事实上，“北庭卖国，证据昭然，南政府绝无此种行动。”

---

①⑤ 《京学生会代表之宣言》，《申报》1921 年 8 月 28 日。

②③ 《学生会欢宴评议员记》，《国民日报》1921 年 8 月 17 日。

④ 《粤学生代表之澄谬》，《民国日报》1921 年 8 月 3 日。

这场争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学生在改造社会问题上主张的不同。北京代表显然是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而福建代表则表示“吾人既不赞同无政府主义或过激主义”①，主张在南北政府中择其善者从之。另一部分学生代表则认为：“人生之要即自由，国家之存在自治，今北政府日事卖买，将吾人之自由自治，剥削殆尽，长此不已，后患无穷。”②这些都表明青年学生在思想上的分化。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北京代表公然退出会议，致使大会组织上发生分裂。此后，大会虽然还继续进行，而且最后决定，除上海例出一理事外，广东、四川、安徽、南京、福建、留日等学联各派一理事，组成第三届理事会。会址仍设上海。但是，因为北京学联历来在总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大会实际上陷于分裂。第三届理事会原定 9 月 20 日接替第二届理事会工作，结果届时只到了上海和安徽两理事，后来也一直未组成。此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几乎销声匿迹了。

①② 《学生会欢宴评议员记》，《国民日报》1921 年 8 月 17 日。

第四章　学生运动的历史转折

一、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和驱彭挽蔡斗争

1. 资产阶级的学制改革运动

1920 年直奉联合打败皖系，1922 年 4 月底 5 月初，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张作霖被迫退回关外，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

直系军阀是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在“五四”时曾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过安福系控制的亲日卖国政府，随后一举推翻了安福系政权，这时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因此，颇得一般舆论的好评，一时被誉为“爱国军人”。

懦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政治上的改良，组织所谓“好人政府”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状况，尤其想通过教育的改革，从封建军阀手里取得教育独占权，发展教育和科学，培养人的美好品德，以此为救国的主要途径。于是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发起下，开始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于 1915 年 5 月，是由江苏教育会代表黄炎培、浙江教育会代表经亨颐等人发起的，后来福建也参加。1921 年 10 月，该会在广州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心讨论“学制系统案”，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学制改革成为这次教育改革的中心。1922 年 9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学制会议，蔡元培被

推为学制会议主席，会议讨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新学制，经略加修改，于11月命令公布。新学制提出下列7项教育标准：(1)适应社会之进化；(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改变了1912年的学制，规定：小学六年，中学分为初级三年、高级三年共六年，大学四至六年。师范专业及各类专门学校的学制也有变化。这一学制改革基本上是模仿美国的"六三三制"，从那时起直到全国解放后，都是采用这一学制。

学制改革以后，接着就进行课程改革。1922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开始草拟中小学课程。1923年该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并开始新编教科书，中学采用学分制，教育内容注意适应现代化的潮流。

这一学制改革受美国杜威等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给美国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开了一个方便之门。美国教会学校在这一期间有很大发展，1920年教会学生约24万人，而据1924年的统计，教会学校学生数达56万人。此外还有大批的留美学生，据统计1920年到1925年有89.4%的留学生是留美的。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后来就发生了波澜壮阔的非基督教运动。

蔡元培极力倡导的"教育独立论"是学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他企图让教育事业既能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又能超然于各派教会之外，而有经济独立，从而取得办学的独立，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虽然只是一种幻想，但这种理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是有广泛影响的。1919年到1923年间，"教育独立论"曾在当时的一些报刊上加以热烈的鼓吹，不少学生主张力学救国，不干预政治，这是五四以来学生运动沉寂一时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封建文人和军阀政府的复古教育

资产阶级的学制改革是借1922年王宠惠组阁的所谓"好人政

府”期间进行的。因吴佩孚与曹锟存在矛盾、曾表示支持好人内阁。但是，这个好人内阁寿命不过两个月就垮台了，新内阁上台马上就对学制改革进行反攻，复古教育猖獗起来。

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军阀吴佩孚公然说：“你们办学校，应当教忠教孝，怎么说适应现代化潮流？中国的教育与外国的教育，原来不同。外国的教育就是声光化电；中国的教育就是礼义廉耻。高等师范理化都不应当要。不读经书，学这些事情，有什么用？不过在乡间去变把戏，或者制些药品害人罢了。……回去把你们学校的功课表改了它，不改我是不给钱的，我将来回武昌到你们学校参观的时候，还要你们的学生背《四书》给我听呢。不能背的学生是要开除的。……女子学校不应当要，男人读书，做事情，女子读书有什么用呢？”①

当时充当吴佩孚爪牙的阎锡山在山西，就在自省堂（即洗心社）常常用旧学说（孔佛）批评新学说。他的左右各机关各学校的教职员，从而知之。张作霖的爪牙张宗昌在山东各校添设讲经，以挡新文化之狂澜。

一些封建文人，则要“通国写经”，在孔庙“崇祀孟母”，甚至女教员、女学生的剪发自由也受剥夺。

在复古教育的猖獗中，他们首先牢牢控制教育的领导权，各地都派一些政客、议员执掌学校，这些人不学无术，竭力摧残教育，1922 年底彭允彝任教育总长就是一例。1923 年初，北京爆发的驱彭挽蔡学潮，即渊源于此。

3. 北京学生的驱彭挽蔡斗争

1922 年 11 月，黎元洪为了争取湖南的支持，以便拉拢西南，加强自己的地位，任命由湖南军阀赵恒惕保荐的无耻政客彭允彝

① 《军阀重轭下的湖北教育》，《上海民国报》副刊《觉悟》1923 年 4 月 17 日。

为教育总长。

彭允彝，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曾任众议员、参议员。彭在湖南谋官未得，希望黎元洪替他在内阁中谋得一席，为此，曾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一起，诬陷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贪污受贿。总统黎元洪不经阁员副署，破坏司法独立，直接将罗逮捕入狱，形成了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开始还指责黎元洪捕罗违法，但当曹锟通电攻击罗文干"丧权误国"时，他即转向，表示"拥护总统，服众仲帅(即曹锟)，这样致使王宠惠内阁倒台，由汪大燮代理总理，彭窃取教育总长一职。1923 年 1 月，张绍曾组阁，彭仍任原职。

北大学生在上总统呈文时指出："彭允彝乃一鄙卑政客，早已见恶于国人，他既无教育知识，又缺办学经验，当此教育革新之期，岂能胜此重任。综其到任以来……，假整顿学风之名，摧残教育，乘各校出缺之机，位置私人……，为其个人营私固位，迎承军阀及一部分议员意旨，越位违法，公然提出干涉司法，蹂躏人权，人格扫地。"①

此后北京国立 8 校广大师生开始了驱彭运动。驱彭运动的掀起，使反动派大为恼怒和不安。1923 年 1 月，大总统黎元洪悍然下令"严行整顿学风"，污蔑学生的正当要求是"学风颓坏，聚众要挟，逾越范围"。教育部也下令禁止学生来部请愿，妄图压制师生的正义斗争。

彭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也非常气愤，蔡和罗文干曾一道出过国，他对罗的为人比较了解，相信他不会有贪污受贿之事，而且从后来报上公布的材料，也足以说明罗是无罪的。他深恶吴景濂、张伯烈和彭允彝等人，为了倒阁，竟以如此卑污的手段陷人于罪。蔡元培不屑与这样一个人格卑污的政客为伍，乃于 1 月 17 日愤然辞

① 《晨报》1923 年 1 月 20 日。

职。在辞呈中他痛切地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①

1月19日，蔡元培宣布"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随即离开北京。蔡的辞职是用不合作的办法或称为不合作主义，以打倒黑暗政治，他不明白，这种主张是消极的，但在当时，他那愤时忧世、嫉恶如仇的精神，"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受到了人们的钦佩和称赞。他辞职后，在北大及北京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又掀起了大规模的挽蔡运动。驱彭、挽蔡这两件事起因于一，就自然形成为驱彭挽蔡运动。

1月18日，北京大学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由黄日葵任主席。他报告蔡校长辞职经过后，与会者相继发言，当即决定5件事：(一)驱逐彭允彝；(二)拥护司法独立；(三)挽留蔡校长；(四)警告国会；(五)联络全国学校及各团体。关于驱彭提出：1.先请政府明令罢免；2.警告国会勿投同意票；3.迅速联合国立8校采取一致行动；4.宣布彭氏罪状；5.至不得已时则采取直接行动。关于挽蔡决定：1.派代表挽留；2.请总统退还辞呈。会议决定组织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推定杨廉、黄日葵、张维舟、何孟雄等负责进行。当天，北大评议会与8校教职联席会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维持学校与挽留蔡校长事宜。

1月19日，军阀控制的众议院投阁员同意票，若通过彭的同意案，彭则可以正式就职。于是北大学生代表黄日葵等4人赴公府向黎元洪请愿，要求罢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黎元洪因彭允彝是他推举的阁员，有意包庇，借口总统不能干涉内阁，不予接受。当日

① 《晨报》1923年1月18日。

下午，为众议员投阁员同意票的时间，北大、法专、医专、工专等校学生约千余人赴象坊桥众议院请愿，要求勿投彭允彝的同意票。队伍前面举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警告国会”4个大字，大学生每人手执“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拥护司法独立”等小旗。队伍到达众议院门口时，吴景濂指使警察百余人，用刀、枪、皮鞭和棍棒向学生袭击，当场受伤者200余人，重伤50余人，北大学生代表黄日葵等八人身受重伤。学生队伍被驱散后，众议院多数议员投了彭允彝的同意票。

20日晚8时，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琉璃厂高师开联席会议，与会者约30人，公推朱务善为主席，首先讨论组织北京学生联合会问题，结果一致主张火速组织成立，并决定采用委员制。为联合全国教育界一致行动，决定暂派两人出京，一由京汉路南下，一由津浦路南下，将众议院门前流血惨剧诉诸国人。当天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开紧急会议，会后发表宣言，表示反对彭允彝，并挽留蔡校长。

24日，参议院投阁员同意票。各校学生根据23日学生联合会之决议，于下午1时齐集天安门，赴参议院请愿。其时，北大、高师、法专、女高师、医专、工专、美术、华大、平大、四中、豫章商业等42校约5000余人，高举“请勿投彭允彝同意票”等旗，2时至参议院，派出代表朱务善等24人，见参议院临时主席，一番寒暄之后，让代表们在接待室坐候，5000学生鹤立寒风之中。约在5时许参议院投票揭晓，彭竟获通过，学生代表出院向大众起告，学生闻言，愤激不可言状，5时20分各队整队回校，讨论以后办法。

北京学潮爆发后，连日来天津、杭州、上海、太原等处都有来电。上海全国学生总会、环球中国学生会声明愿尽力援助到底。至2月初，南京、开封、武汉、江西等地学生会也纷纷表示支持，南下的北京学联代表在各地都受到了欢迎。至5月份，学潮向建立和发展组织方面转化，于是便有了第五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召开。

二、学生运动新方针的制定

1.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北京学潮的正确指导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北京学潮爆发时，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在李大钊领导下，按照党的二大路线，对学潮进行了正确的指导。

这首先表现在努力提高师生的政治水平，把斗争引向根本推翻军阀统治的高度上来。

当北京学生在1月19日和1月24日两次请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机关刊物《向导》，引导学生把斗争锋芒指向整个军阀政府。《向导》载文指出：现在北大学生既要挽蔡驱彭，谋求学之安全，非联络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不可。要使全体学生一致行动，"不可专以挽蔡驱彭为目的"，如果"打倒军阀官僚，建立真正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是没有人不赞成的。"① 在北大出版发行的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指出：在反动统治下，即使驱逐一个彭允彝也还有许多彭允彝，或比彭允彝更蛮横的人将支配他们，蔡元培可挽于今日，而难保于明天，去一人留一人，于改造社会，"澄清政治"是毫无意义的，真要改造社会，真要安宁求学，首先要同心协力，推翻现有统治阶级的势力。1月31日邓中夏在《北大学生新闻》上发表《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指出：这次运动的目标，不要特别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别注意"驱彭"，因为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只要反动的政治势力，即军阀政治的根本被推翻，这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在党的正确引导下，广大学生逐渐把这次学潮的目标，转向维

① 《向导》第17期。

护人权，澄清政治，推翻军阀统治。当时有些学生写出了“打倒军阀政治，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标语。《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载文指出：“在国内我们要团结一切被压迫人民在一条阵线，以之为打倒军阀的武器；对国外我们要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苏俄，团结在一条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①

蔡元培辞职的基本出发点是“不合作主义”，然而驱彭挽蔡斗争远远超出了这一点，两年前，北京学生会的代表还竭力主张，学生不干预政治，教育救国是根本，现在他们已把这种主张抛弃了。这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斗争，经过两次请愿失败而体验到的，另一方面是学生们看到了二七大罢工工人惨遭残害，这两件事，大大惊醒了广大学生，决心“与万恶的军阀国会决一死战”。

其次是组织上积极参与领导，并注重恢复和发展学生会。

这次学潮起源于北大，北大的党员大都积极参与领导。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临时委员会，处理挽留蔡校长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李大钊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曾在会议上多次发言，指出这次斗争中“大学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据不可”。对挽蔡问题“应当注重全社会”，要“大活动”，以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反对军阀政府。

当时北大学生中的一些党团员，如黄日葵、朱务善、夏曦等都站在斗争的第一线，而且成为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骨干。

为了学潮有一个指挥中心，学潮爆发的第二天就迅速组织北大学生干事会，设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宣传、纠察等股，由黄日葵、张维舟、何孟雄等负责。北京第一次请愿遭受镇压，又迅速建立北京学生联合会，由朱务善负责。之后各校相继建立学生会，这样，五四以来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学生会重又复活起来了，使得北京学

① 《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第8期。

潮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发表宣言、组织演讲团、维护请愿队伍的秩序，一切都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

2月中旬，因为放寒假，学生回家，运动一时平静下去，但是，组织活动并未停止，尤其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先后派员分赴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南昌、杭州、苏州等地串连，朱务善、缪伯英经武汉到长沙，李骏则去九江，黄日葵经南京到上海后又去杭州，屠安先到南京后又去苏州，他们宣传北京学潮的情况，帮助各地组织学生会共同奋斗，起了积极作用。当时上海学生会也已涣散，由于北京代表的努力，也重建起来。于是，3月份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恢复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这就为以后的学生运动作好了组织准备。

再次，引导学生和二七大罢工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北京学潮高涨时期也正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高涨时期，党注意将两者结合，特别是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支援工人斗争上。2月6日，当郑州工人开会受阻的消息传到北大后，北大学生发出通电，表示："望诸君为自由奋斗到底，敝校敢敬谨以从"。二七惨案发生，北京学联发出宣言，指出："众议院门口打杀学生的是中国万恶军阀收买的国会，郑州以强力禁止工人开会的是中国万恶军阀指挥的军警。我们学生工人一样的平民，一样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同受如此惨酷之摧残与压迫，我们学生不但对工人表示无限同情，尽充分的援助，而且必定要手挽手一致团结起来，争夺我们共同需要的民权，推倒我们共同的痛恶的强敌"。①

2月9日，北京各校全体学生，根据北京学生联合会之决议，分两处召集开会，会上有工人及被害家属报告军警包围郑州长辛店工会及工人毙命之惨状，会议决定向政府提出要求条件："（一）请政府明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之自由；（二）撤退长辛店军队；

① 《民国日报》1923年2月8日。

(三)释放工会被捕职员;(四)抚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属;(五)惩办郑州长辛店肇事之军警及罢免路局当事者;(六)改良工人之待遇。"[①] 会后分两路约1000人举行游行,人手一白旗,上书"援助工人"、"打倒军阀"、"还我自由"等字样,沿路散发传单二十余种。游行队伍到总统府新华门前示威,高呼"劳工万岁"。

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采取严厉的手段实行镇压,军警、侦探在各校门前往来巡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暂取冷静态度,以待时机。

虽然二七大罢工和北京学潮都被镇压了,但随着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以国民运动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迅速地高涨起来了。学生在这一运动中仍然是先锋和桥梁。

2. 第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北京学潮席卷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来表示援助,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南下代表到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南昌、南京、上海等地串连,发起重组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一事,进行顺利。2月2日,由湖南学联提出:"重组全国学生总会,以解决北京学潮,并确定学生对于现在政治与教育之方针。"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北京学生联合会等赞成。10日前后,北京学联代表、北京大学学生会代表由津浦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抵沪,武汉、天津、济南、南京学生联合会也已选派代表赴沪。3月中旬各地代表陆续到沪,先到的代表进行了提案的充分准备,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提案分3段:"(一)原则;(二)提案;(三)方法。此次运动原则(甲)独立教育;(乙)澄清政治;(丙)拥护人权;(丁)力争外交"。"关于(甲)案之提案,有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经费独立、驱彭三端。关于(乙)项,有裁兵废督、否认国会等端。关于(丙)项,有司法独立、力争言论及结会结社自由、取消

① 《昨日工人与学生游行示威》,《晨报》1923年2月10日。

治安警察法、援助工人等端。关于力争外交，有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讨论金佛郎问题，研究蒙藏问题等端”。关于方法，强调“组织强固永久之全国学生总会及各地学生会”，“促全国各地开国民大会”①等。武汉代表提出学生总会对于政治的态度建议案和京汉工潮之提案，还有的代表提出裁兵运动案，组织强固永久之学生会案等等。

3月15日，假大东旅社正式大会，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北京代表李骏、李国暄、周传儒、屠安，北大代表王汝典、黄日葵、杨钟键，上海代表汝保彝、朱景春、刘稻心，武汉代表刘曼、黄志鹗，湖北代表刘愚真、何恐、张绍康，山东代表王季高，江苏代表葛铭勋，安徽代表许炳松，河北代表范鸿劼，广西代表杨立惠，南京代表杨嘉猷，留日代表郝兆先等共20余人，另外柬请了上海各团体及新闻界与会，共计80余人。大会主席上海学联代表汝保彝致词，他强调“此次会议，同人等将于政治改革上稍下功夫”。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到会演说，学生代表纷纷发言，一致认为：“此后学生将从事政治运动，而政治运动之目的，则在实现真正民治主义”。

23日通过《全国学生总会对于现时政治态度建议案》、《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学生界与其他民众关系案》、《对京汉工潮之提案》。24日又通过《组织强固之学生会案》，最后发表了《全国学生总会宣言》和通电。

26日，北京政府照会法领事馆，封闭了学生总会，致使很多提案未能充分讨论。27日，临时理事会正式成立，由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广西、山东、福建7地各派一理事组成。理事会成员是：北京李骏、上海汝保彝、湖南龚际飞、湖北何恐、福建黄东鹗（后因擅用会章被撤职，由王永劲代理）、山东缺席、广西杨文炤，由杨文炤为理事长。

---

① 《全国学生大会消息》，《民国日报》1923年3月8日。

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功绩是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的新方针。在《全国学生总会对于现时政治态度建议案》中明确宣布："要集中我们的势力，于一个显明的正确的目标之下，为统一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活动"，"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设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为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为被压迫的民众利益而奋斗"。① 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议案中指出：对外"我们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和平'、'人类解放'应该联合一切被压迫的各民族各阶级，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对内"我们要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下，结合联合战线来打倒曹、吴及其他军阀"。②

这次大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新方针是一大进步。五四运动时，学生的注意力在"力争外交"，这当然是反帝性质的，但当时所反对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对美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抱有幻想。"内惩国贼"的口号是为"力争外交"服务的，因此当外交问题缓和以后，学生的阵线很快就分化了，其中一部分学生主张教育救国，不干预政治，一部分学生不问政治，埋头读书，因此学生运动沉寂了二三年。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初期的党团员中多数是学生出身，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80%多是学生，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成为新的学生运动的骨干，由于北京学潮把他们推到了第一线，一开始就表现出领导作用，这是五四运动时所不能达到的。这是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新方针提出的重要保证。

这次大会的酝酿和召开时期正值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时期，这显然对学生是一极大鼓舞，同时由于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镇压，使广大学生更加看清了军阀的反动本质，这时提出

① 《全国学生应拥护全国学生总会》，《学生杂志》1922年第十期。

② 《全国学生大会特刊》第五期。

打倒军阀的口号自然会被广大学生接受的，这是新方针提出的客观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虽然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还未正式建立，但是因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党和团在全力领导工人运动同时，开始注意学生运动，并不断地加以指导。2月26日，全国学联开会前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此次全国学生联合集会希望》一文，文章向全国学生提出："现在我们唯一的责任是向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攻击"，"全国学生联合会要结合在打倒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的目标下面"，并且号召学生"要为劳苦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要与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密切地结合在一条战线上而努力"，要求学生"抛弃一切和平的改良观念"。[①] 由此可以说，这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新方针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结果，这表明学生运动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因此，这次大会是学生运动走向新高潮的起点。

3. 第五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加入国民运动方针的确定

第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制定的学生运动新方针，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打破了五四以来的沉寂，很快出现了一个爱国运动的新高涨。这一新高涨的起点，是从1923年3月底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开始的。旅顺、大连是沙俄1898年从中国强占去的租地，1904年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占领，按原定租借期为25年，1923年3月26日期满，中国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外务省和驻京日使，接洽收回。但日本政府却以"二十一条"有关条款为借口，拒绝归还中国，于是北京、上海、长沙、天津、南京、武汉、广州、

① 《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1923年2月27日。

济南、西安、杭州直至留日学生多次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

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的斗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长沙、武汉等地的学生会，活动尤其积极，他们组织学生检查日货，劝阻人们乘坐日轮，迫使日轮停班。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怀恨在心，从5月中旬开始，不断挑衅。5月18日，停泊在湘潭的日轮水手追殴学生，警察上前排解，也将警察加以殴打。5月23日，沙市学生登日轮大元丸，检查日货，被日兵舰开枪射击。6月1日，日清公司的武陵丸由汉口驶长沙，抵岸后，学生上船检查，驻在长沙小西门外之日军舰伏见号，开枪射击，当时中国学生死3人、伤数10人，制造了长沙六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湖南学联召集50余校的代表会议，由夏曦任主席，会后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限期解除日本水兵武装、惩办凶手等等，并决定举行罢市、罢课。武汉学联也派代表支持，全国学联也发出了鼓励电文。

正当全国学生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时，北京发生政变，直系军阀赶走了黎元洪，曹锟开始收买国会议员准备进行贿选，以登总统宝座。北京学联因为反对北京政府而被查封。

在内乱外患的严重刺激之下，全国学生联合会于6月9日决定在广州召集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3日向各地学生会发出通电，指出：“内而本国军阀官僚之横暴，外而国际资本主义之侵略，朋比为奸，有加无已”，“吾侪青年学生，痛感切肤，宁忍坐视？用是本会第四届评论会决议努力澄清政治也，惟是言之非艰，行之实难，打倒军阀与国际资本主义。图澄清政治之惟一门径，而方法手段如何，不可不再加讨论，以便由评议员提交大会，共策进行”。①

8月初，各地代表先后抵粤，孙中山派代表陈树人、林森、徐清

① 《学生总会召集评议会》，《民国日报》1923年6月13日。

和及国民党粤支部均先后设筵欢迎，尤其是廖仲凯和广东总工会以茶话会形式欢迎各地代表更为热烈。

8月16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借广东省教育会场正式开幕，出席代表有：韩觉民、梁松荣（北京），王基永、龚际飞、范体仁（湖南），潭鹿鸣、李汉潘（湘南），张国苌（常德），蕲经伟（留日），许鸿、瞿本固、邓鹤鸣（武汉），江伟潘（陕西），陈书农、林柏生、崔世（广州），赵鹤琴（山西），李觉士（宜昌），唐道海（芜湖），柯柏伦、翁兴毓、夏禹畴（福建）等。会议于17日首先通过《为对于长沙六一案应取之态度案》，此案要求"由日政府撤惩日本驻湘领事及伏见舰长"、"日政府用书面向中国全体人民道歉"、"对于死者，日政府应各赔偿身体费10万元"，并"请广州政府依法向日严重交涉，并惩办媚外辱国之赵恒惕"等。① 18日会议发表《敦请孙中山先生重组政府之宣言》。22日通过《为本会会后运动之目标和进行的计划案》，《为对于外交问题提案》等。26日全体代表及理事往黄花冈祭先驱。27日又通过《为请孙中山组织政府行使总统职权的决议案》，《为本会对时局应持之态度的议决案》等30多项提案。28日评议会选举下届理事，29日闭幕。

这次会议，明确规定学生要加入民主革命赞助三民主义。在大会通过的《为本会今后运动之目标和进行的计划案》中明确指出："过去的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没有运动的目标，今后，我们要全体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上，赞助三民主义，与主张三民主义者携手合作，使三民主义早日成功，以达到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目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议案还规定："各地学生联合会开全体大会，详细述明总会之决议案及三民主义真相，使学生皆得充分了解，以共同从事于运动"。②

---

① 《全国学生总会开会记》，《民国日报》1923年8月28日。

② 《学生联合会之议决案》，《民国日报》1923年8月30日。

由于大会确立三民主义为运动目标，所以对孙中山及广东政府以热烈的支持。大会通过的《为请孙中山组织政府行使总统职权的议决案》中指出："我们环顾国中，肯为人民而牺牲，有主义有建国能力而百折不回的，只有孙先生，我们知道由五千年专制方面夺回我们共有的主权，我们要请先生做我们的领袖组织政府"。① 并为此发表宣言宣布："一致否认北京之非法摄政院及非法国会"，追溯辛亥革命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历史，表示学生要"敦促中山先生早日复职，执行大总统职权"。②

大会谴责直系军阀祸国殃民，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大会通过的《为本会对时局应持之态度的议决案》中指出："本会主张召集全国商会、学生会、工会、农会、教育会以及其他组织团体，择适当地点举行国民会议解决时局"。③

从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学生运动已经完成了重要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明显地表现以下两点：第一，从一般学潮转为有目的有主义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从此以后学生运动改变了以前那种受到某种刺激而发，一阵风过后而止的忽高忽低的状况，成为统一的国民运动当中的一部分，标志着中国学生运动走上了国民运动的新阶段。第二，五四时期，学生鄙视政党，以不介入政治为清高，但是从此以后，学生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不仅宣布与国民党合作而且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学生运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历史表明，只有党的正确领导，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反之，学生运动也是一事无成的。

---

① 《学生会之重要决议案》，《民国日报》1923年9月5日。
② 《全国学生会宣言全文》，《民国日报》1923年9月27日。
③ 《学生会之重要决议案》，《民国日报》1923年9月6日。

三、国民运动中的生力军

1. 反帝废约的先锋

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即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标志着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从此，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1924 年 5 月 31 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正式签订，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苏联政府多次宣言表示要废除帝俄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了具体实施这一点，并正式建立中苏邦交，1924 年初，苏联政府开始和北京政府谈判。谈判开始不久，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使团就对北京政府实行恐吓，声言“如中国先承认苏俄政府，即绝交”，而且借中东路问题破坏谈判，这样北京政府在谈判中态度反复无常，致使中苏协定不能顺利签定。

帝国主义对中苏谈判的破坏，以及北京政府的态度，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24 年 3 月 21 日，北京教育会等 9 团体发布了抗议宣言，宣言指出：“外力干涉，于是乃造成今日中苏交涉间严重情形了”，“今日之事，最后唯一希望，在于国民之努力，吾人特请我全国同胞，各地团体，速起运动用其势力以（一）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外交之压迫；（二）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①

反抗最激烈并对北京政府威胁最大的是北京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说：“内听一二不肖政客之指使，外受法美各国之播点，致失外交独立之精神，并以贻误国是，此敝会深为中国外交前途忧，更为先生惜也，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②

---

①② 《晨报》1924 年 3 月 22 日。

3月28日，北大、师大等40余校学生代表开紧急会议，“议决于29日下午2时，全体学生游行示威，并赴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请愿承认苏俄”。① 这一计划，虽然由于反动政府军警的阻挠，未能全部实现，但给予北京政府的震动是巨大的。

5月31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签订，协定规定：“凡沙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立的一切有损害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一概无效”、“苏联政府放弃前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之一切租界地”、“苏联政府放弃庚子赔款”、“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等。

这一协定不但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

7月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余团体，联合组成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他们提出了大同盟的4项任务，其中首项任务就是“扑灭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

7月16日，北京学生发起筹备中华学生废约同盟会，筹备会通告指出：“各帝国主义列强，乘此时机，协而谋我，以致辱国害民之事屡屡发生，惟其所以敢于猖狂之由来，无非各帝国主义列强，假惜日迫我签订之种种不平等条约为藉口，此种不平等条约，苟再不设法废除，恐我神圣华胄，将步安南缅甸之后。”② 在这同时，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及天津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起来组织反帝同盟，展开废约运动。

9月3日至9日，由反帝大同盟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第一天在北京街上贴有各种标语，上书“撤废辛丑和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各国完全经济绝交”等，并派出多

① 《游行大会卒被禁止》，《晨报》1924年3月30日。
② 《北京学生废约同盟》，《民国日报》1924年7月17日。

人在热闹街市散发“警告国民”及“打倒帝国主义”种种传单，还准备在北大三院开市民大会。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30余个团体召开代表会议，发表通电。除北京以外，各地都开展了九七国耻纪念活动，9月8日，全国学生总会与废约运动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上海发起九七纪念会，到会500余人，施存统等在大会上发表讲演。同日，杭州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也召集九七国耻纪念大会，俞秀松等参加，并有提议。武汉也举行九七纪念会，各校到者极多，还在会场散发“九七”告国民书。湖南的国耻纪念活动更是活跃，5日开讲演会，到者万余人，6日结队讲演，全城数十队，群情沸腾，7日原拟举行游行示威，并罢工、罢课、罢市一日，因赵恒惕派军警制止，未举行游行。

总之，从1924年春开始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爱国运动，学生是这一运动的先锋。

2. 第六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第五次大会后，反帝运动有了新的高潮，而且国民会议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也有所发展，为了进一步明确学生在运动中的任务，同时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1924年5月28日，全国学联发出通知：“按照本会章程第十条，召集第六届代表大会，定阳历八月一日在沪开会”，“望促所派代表于7月25日以前来沪”。①

8月4日，第六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假徐家汇复旦大学中学部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张宙、王备、周远文(北京)，徐国卿、胡蕴玉、余泽鸿、兰梦良、张霁帆(四川)，张信之(保定)，李逸、谢义辛、璜田(天津)，郭寿华、朱节山、郭协恭(广州)，李巍、黄绍榜、季超荃(广西)，李亚农、肖述凡、王基永(湖南)，吕香岩、李士青(山东)，陈承荫、刘一清、端木恺(上海)，楼蜀峙、汪自省(杭州)，

① 《学生总会大会通知》，《民国日报》1924年5月28日。

费清朴、饶漱石(九江),吴文钦、孙经文(宁波),钱挹青(南通),高岳生、彭振纲(南京),沈尚平、叶景芬、邓淑豪、田筠、汪守愚(武汉),纪廷梓、弓志儒(山西),杨景修、程镇西(南昌),另外还有周连明、刘刀心、张亿之、吴中哲、许鸿、胡寄窗、谢曦等,共18省区50多人。开幕式预邀报界及吴稚晖、于佑任、施存统、邵力子等演说,还放了孙中山先生演说留声机片。最后由我党上海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学生方面的负责人恽代英演说,他指出:"卖国之徒无国蔑有,惟在各国国民监督极严,遂使野心者欲卖不得,故学生会救国事业,应注意于培植大势力,足以监督一切,使任何人不得任意作祸国殃民之举动,同时须使人人知国内军阀之猖獗,原因由于外间强力之侵入,合众力以抗外侮,外侮息则内乱自平,然此二作尤非具革命精神不可。"①

大会从8月5日开始审查和讨论各种提案,由于第5次大会以后,各地学生会逐渐恢复,各地代表带来的提案极多,如湖南、广东都各有六七件,总计有几十件,可见当时学生运动的活跃。8月18日会议闭幕。

这次大会主要讨论了3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大会确定了今后一年中的主要任务是:收回关税权、司法权、教育权3种运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我们为了帮助本国产业的发展,以打倒列强的经济侵略,我们不能承认由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等以武力勒迫所规定的关税条约。""我们为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与法权的尊严,不能容许有外国的司法权力,存在于我们的国土中间"。"为根本的遏制外人文化侵略的野心","我们应当收回教育权的运动"。为了收回这3种权利,大会号召:"一切受他们鱼肉蹂躏的国民,以国民一致的结合,打倒此等反动的政局,以建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革命政府","我们必须联合世界的革命势力","我们

① 《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开幕纪》,《民国日报》1924年8月5日。

必须跟从着国民革命的先锋军队为我们的民族的独立而战争。"①

为了进行有效的反帝斗争，大会决定与各地各团体联络，发起组织上海废约运动大同盟与上海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8月11日，由全国学联发起，上海10多个团体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筹备会在上海大学办公。8月14日，全国学联也与市民对外协会、工团联合会等团体一起成立了上海废约运动大同盟，全国学生总会派一代表参加该同盟执行委员会工作。

大会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学生自身利益方面，大会提出了反对反动的复古教育。复古教育是封建知识分子勾结军阀官僚进行的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反动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这个最腐朽的武器，反对五四以来的新的文化教育。大会尖锐揭露"专制君主的愚民政策"，"转移全国学生的精神，使我们消耗时力于已失时效的典籍当中，他们重新鼓励我们去作那种矫揉造作、'言之无物'的文字，去追求那种'安分守己'、'以顺为正'的修养，亦有一般长辈先生，有意的或无意的帮着他们提倡那种'闭户读书，不问世事'的风气"，"所以我们不能不反对那些沿袭科举精神的国文会考，不能不反对一切愚蠢而自以为是的教育负责人所加于我们非理的行为。"在反对复古教育的同时，提出了反对学校教员的专制，为此大会向全国学生提出了一个庄严的口号："我们不能做奴隶式的学生"。②

大会的第三个内容是关于学生会组织问题。大会指出要"刷新我们各地的，乃至各校的学生会"，首先应该明确学生运动的方针乃是"引导国民注意政治，培养学生自身的反抗精神"。同时检查过去的学生会"根基亦还未巩固，内容也还未坚实"，"亦便不能做成一个有力的社会运动的组织"。为了今后运动的需要，大会认为要

---

①②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8月31日。

注意以下3点：第一，“要使各校的学生会成为与全校学生密切相关的团体”，“无论是体育会，无论是音乐会，无论是各种演说、辩论、读书、研究会，学生会必须要自己办起来”。第二，“要干预一切与全校学生最有关系的事情，一切校舍的整洁，馆事的料理，学课的改良，校务会议的参与，学生会必须尽力引为自身的责任，以在这日常事务的中间，领导全校的同学，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第三，“学生会必须担任去引导全校学生做各种社会活动”，“我们应当办理平民教育，组织讲演队。”①

大会关于学生会组织的规定正确地总结了历届学生会工作的成功经验，是学生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

会议期间，正值广州沙面罢工发生，学生代表旋议援助沙面罢工事件，通电全国，并通过了《提倡平民教育案办法》，要求各地学生会“联络各团体妥筹经费，设法举办”，“听取教材必须切近实际生活之需要，对于政治常识尤宜时常灌输。”为此大会要求“各地学生会应设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②

最后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1924年冬，全国学联执行委员会主任为中共党员李硕勋，副主任为梅龚彬，秘书刘刀心，组织刘一清，宣传陈企荫，其他工作人员有秦坤华、黄超裳、沈尚平、田映冰、张碧英等10余人。

这次大会不仅坚定了学生运动的政治方向，即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而且正确规定了学生政治斗争的具体目标；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学生运动必须与谋学生自身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组织上也明确了加强巩固学生会自身的办法和措施。这些都表明学生运动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正确轨道。它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当时正在全国掀起的反帝废约运动，而

① 《学生总会六届代表会议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8月31日。
② 《学生总会之代表会议》，《民国日报》1924年8月11日。

且为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涨发挥了积极作用。

3. 国民会议运动的鼓动者

1924年全国各地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促使军阀内部发生重大的分化。10月23日，冯玉祥占领北京各要地，囚禁了曹锟，改组内阁，曹吴的统治就此迅速瓦解。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表示倾向革命，称自己的部队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立即北上，共商时局。

早在1923年6月，在曹锟驱逐黎元洪事件时，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此次北京政变后，虽然不能奢望实现国民会议与组织国民党左派临时政府，但它可以给民众以政治活动的机会。因此，中国共产党建议孙中山北上，同时必须面向全国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造成全国的舆论及民众的后援，庶几进可制胜军阀，退可扩大宣传。"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孙中山于11月4日决定离粤北上，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言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议；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②

孙中山为实现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对全国青年学生寄于特别的希望，他不仅明确规定各省学生联合会应派代表参加预备会议，而且希望学生要努力促成国民会议。

---

① 《向导》第九十一期757页。
② 《北上宣言》孙中山。

11 月 23 日，孙中山取道日本，应留日中国学生会欢迎讲演，希望学生联合会要促成“国民会议”。

全国学联对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极表赞同，11 月 26 日全国学联发出宣言，明确表示：“我们对于孙中山先生召集职业团体代表的预备会议和国民会议的主张无限赞成与钦佩，我们认为必须这样才能表现真正的民意，才能真正解决政局的纠纷”，“誓当努力拥护，并且助他奋斗，以期望实现他的主张。”① 12 月 14 日，全国学联又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学生联合会举行代表会议，切实整顿各校之学生会，并研究筹备如何促成国民会议。上海大学于 1924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 时，召开教职员及学生全体会议，“通过赞成中山先生之意见，并发表宣言号召国人一致拥护，以促成国民会议并解决中国问题。”② 各地学生会纷纷表示热烈赞同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

为了促使国民会议的召开，各地陆续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南京、广州、徐州、北京、天津、济南、保定、青岛和安徽、湖南、湖北、浙江等省市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学生团体是积极的参加者和鼓动者，有些省市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就是在学生的领导组织下建立的，如南京学生联合会于 12 月中旬开始就分头邀集各界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主要成员都是学生，其中如黄日葵、朱务善、李国暄、杨善南等都被推为干事。上海学生联合会对于国民会议运动持冷漠态度，结果南洋、上大等 7 校联名提议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大会进行改选，新的上海学联积极参加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露天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指派宣传员，还特地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所要的国民会议是什么》，成为促成会中最活跃的力量，后来上海国

① 《学生总会赞成国民会议之宣言》，《民国日报》1924 年 12 月 1 日。
② 《上海大学主张国民会议宣言》，《民国日报》1924 年 12 月 3 日。

民会议促成会发起组织全国促成会，派出4名代表去北京筹办，其中上海学联代表就有刘一清、刘清扬两人。

在国民会议运动高潮之际，段祺瑞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决定召集善后会议，参加这一会议的主要是各省的军阀头目及所谓“有特望学术经验者”，如王士珍、胡适之流，还有社会党的政客江亢虎等，而没有一个人民团体参加。段祺瑞企图由这个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的条例，然后用这一块国民会议的招牌，选举他为正式总统。可见善后会议是反动性质的会议。

孙中山主张先召开由各人民团体的预备会议，为国民会议作准备，而段则开善后会议，因此，究竟是预备会议还是善后会议，这将决定着将来召开的国民会议的性质。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都反对善后会议。12月29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孙中山，表示：“先生对时局宣言，本会深表同情，幸乞贯彻初衷，坚持到底，反对善后会议，本会誓为后盾”。广州学生为反对善后会议曾举行一万人的游行示威。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开幕。为了反对这个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也于3月1日在北京开幕，到会代表200余人，包括工农、教职员、学生、新闻记者、律师、民族资本家等等。大会否认了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所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的条例，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的重要工具。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共开了一个多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都加以讨论，虽然它的议案不能为反动政府所采纳，但它起了巨大的宣传和组织广大群众的作用。

学生是国民会议运动的鼓动者和积极参加者，而国民会议运动又推动了各地学生组织的恢复和建立，尤其是学生的政治热情大大提高了，这就为五卅运动中学生运动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4. 非基督教运动的主力

在反帝废约和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中，中国学生以反对基督教和反对帝国主义对教会学校的控制为中心的活动也在高涨起来。

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传教和开设教会学校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20年代初，基督教（包括新旧教）在中国的信徒总数达200多万。1924年教会学校的学生数达56万人。上海的教会学校尤多，这些教会学校要学生读《圣经》做祷告，进行奴化教育，有些神父、传教士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学生，限制学生自由，不允许学生参加任何爱国运动，因此学生反对基督教的斗争时有发生。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于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为了反对这一次会议，上海各校学生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反对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以欺骗一般平民。

4月4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的当天，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又发表《非基督教宣言》。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召开了反宗教大会。

全国各地教育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发出通电、通函，积极响应上海、北京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国内革命运动走向高潮。8月，重建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学生方面的张秋人、高尔柏被推为5人委员会委员。年底，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开展，非基督教同盟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向各处联络发起组织支部，至12月，已有杭州、温州、宁波、苏州和河南、安徽、湖南、山东、广东等十几个支部。为了进行广泛的宣传，上海学联的刊物《上海学生》专门为反对基督教运动出专刊。各地的非基督教同盟也广泛地进行宣传，组织讲演、游行和散发传单，掀起了新高潮。

12月25日，圣诞节期间，教会学校都要举行活动，上海学联

抓住这一机会，决定从22日起举行反基督教运动周。25日下午2时，非基督教同盟假徐家汇复旦中学召开反对基督教大会，到会有300余人。在广州，反基督教活动，得到了革命政府的支持，12月25日，广州非基督教同盟邀请廖仲恺等人讲演，29日，又请周恩来讲演，题目是《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他的演讲"辞表俱佳，听众非常踊跃"。非基督教运动波及全国，青年学生们举行通俗讲演，散发传单，连西北的延安这样一些边远城市也受到这一浪潮的冲击。

革命运动的高涨不仅调动了一般青年学生，而且也激发了教会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是教会学校当局对此百般限制，于是由一般反基督教运动发展成为收回教育权的运动。第6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我们应当为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外人自从藉传教的名义，享取了在中国办理教育的权力，他们更假此以行其文化的侵略"，"他们的学校，不遵定章，不受中国政府或社会的干涉，所以亦便不许他们的学生注意国事"，"甚至于有'既入教会读书，应当继绝国家关系'的谬论"，"我们要根本使教育与宗教脱离关系，要禁止外人或其走狗在学校以内有传教或干涉学生热心国事的任何行为。"①

五卅运动以后，收回教育权的活动更猛烈。有些学生为此退出教会学校，如广州的圣三一中学，由于学生退校，学校被迫停办；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生反对美国校长干涉学生的爱国运动，全体退学，在各界支持下，新办了光华大学；有些学生破坏教会学校的招考，使多数学校招生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教会学校换上了中国籍人士当校长，向中国政府立了案，同时把宗教课和宗教活动改变得比过去灵活了一些，教育体制也作了一些调整，这说明了学生反对基督教运动的重要作用。

---

① 《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8月30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学生反对基督教运动的后期，立足于“科学”和“反帝”两点，并不一般地反对教会学校，更不反对教会学校的学生。对此，上海学联曾提出“欢迎教会学生加入革命阵线”的口号，这样，就把学生反基督教运动纳入了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之中。

第五章　五卅运动的先行军

一、反帝洪流的急先锋

1. 声援顾正红惨案

随着全国反帝斗争和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涨，1925 年初，上海滩涌现出 3 股反帝潮流，这就是反对租界的越界筑路、“四提案”和以纱厂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

“越界筑路”是殖民主义者扩充租界范围使用的一种手段，即先在界外，廉价收买一些土地，强行取得筑路权，然后就修筑了一条马路，把一大片土地圈在里面，再修一些道路互相贯通，并派巡捕巡逻。久而久之，这一大片土地就纳入了租界范围。1925 年 2 月工部局即在北新泾、徐家汇、虹桥等地强占民田，拆除民房，强行竖桩插标，铺设管道，昼夜施工筑路，仅在沪西开辟之新马路即达 10 余条。这就引起了沪西及全上海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四提案”，是 1925 年 4 月公共租界纳税西人常年大会例会上由工部局提出的：(一)增加码头捐案；(二)印刷附律案；(三)交易所注册案；(四)改善雇佣童工案。这些提案通过的话，不仅加重了对工商业者和市民的经济压迫，而且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言论出版和交往自由，使交易所注册权完全置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所以上海人民把工部局的“四提案”比作是四支“毒矢利箭”。

在第一股和第二股潮流中，最活跃的阶层，就是上海的青年学

生，特别是上海大学是革命青年学生的据点。他们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不仅是学联的领导者，而且深入工人运动，办工人补习学校，成为点燃工人运动熊熊烈火的先锋队。

5月15日，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川村开枪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16日，内外棉纱厂8000多工人因顾正红惨案而愤起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

惨案一爆发，上海学生积极声援，上海学联参加了工、学界等35个团体组织的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17日，上海学联召开执委会，会议由张永和主持，文治大学代表报告枪杀顾正红、打伤工人的情况，决议参加后援会和发起募捐等。会后上海学联动员了上海大学、文治、复旦、交通、持志、法政等14所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约30个小队，从5月18日开始，每天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东新桥、大世界、静安寺、北站、十六铺码头等闹市区，向行人宣传、募捐，以支持罢工工人。21日，文治大学学生为救济工人举行募捐，被租界捕房逮捕两人。

24日，内外棉纱厂工会在潭子湾广场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会，上海大学4名学生在赴追悼大会途中，又被租界当局逮捕。

25日和26日，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召开会议，决议继续援助日商纱厂工人案，继续进行募捐，同时援助文治、上大两校被捕同学，决定通知各校组织讲演队，发表宣言，扩大向外宣传。

27日，上海学联再次召集会议，讨论抵制工部局将于6月2日开会通过"四提案"的问题，恽代英在会上发言，要求与会者把斗争矛头紧紧指向帝国主义。同日，大夏大学、南洋大学等60余团体的800余人，召开上海各团体援救被捕学生联合会，决议出版特刊、组织讲演队、联合反对越界筑路、反对印刷附律等，各团体共同进行。并通过该会章程，选举15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总理一切事宜。这样，上海人民的3股反帝潮流已在逐步地汇合起来。

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

议的主题是关于学生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会议决定通过青年学生这一先行军宣传揭露帝国主义越界筑路、"四提案"等等的侵略行为，以此把上海的3股反帝潮流融合成反帝的革命洪流。上街讲演、示威定于30日下午，29日，学联和许多学校都日夜准备30日的示威和讲演。学联对贯彻党的决定作了具体的安排：(一)组织不怕牺牲的讲演队向租界出发讲演；(二)联合各团体一致行动；(三)规定讲演队伍5至7人为一组。南洋大学、复旦中学、同文书院担任一、二、三、四、五马路一带；南方大学担任杨树浦一带；同济、中国公学、商大、复旦、暨南担任北火车站一带；上大、大夏、东华、同德、文治担任静安寺路爱文弋路一带。会上充分预料到在租界演说，巡捕一定要出来干涉、拘捕，所以又组织先锋队、后备队两种，并各设队长一人任指挥。若先锋队被捕，后备队便继续上来，务使讲演队员从5个增加到10个，从10个增加到20个，使巡捕捕不胜捕，从而引起市民注意。讲演队的总指挥部设在望志路永吉里34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由恽代英、侯绍裘负责指挥，高尔柏则坐镇在环龙路上海执行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有30个学生用自行车担任交通。这些计划制定之后，又拟定演说大纲，通告各校团体。其内容大体有：(一)说明日厂主对工人的强暴及工人反抗的意义；(二)说明中国纱厂因受日本的压迫而倒闭；(三)说明此次学生援助工人的意义；(四)说明最近列强压迫中国的事实；(五)以援助工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释放被捕学生等为口号。

晚上，上海学联又召集各校代表大会，彻夜研究动员工、学、市民参加演讲示威的各项具体问题。确定了标语口号，起草宣言、通电。规定游行路线，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决定秘密口令"下雨"、"吃饭"两种。最后决定总发动时间为5月30日下午2时。

上海学联200多人通宵忙碌。各个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的积极分子，面对帝国主义的欺凌，民族的苦难，他们无

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决心作好一切准备，迎接伟大的反帝风暴的来临！

2. 血染南京路

讲演示威，原定于30日下午分头出发，可是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胸中的反帝怒火，30日早上，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就已出发，上午9时左右，他们陆续到达公共租界。

上海大学组织的13个决死队的队长于29日晚上召开会议，对30日的演讲示威再次进行研究，并作了充分准备。30日早上，13个决死队浩浩荡荡，直奔公共租界中区一带，讲演示威。决死队员有180多人，临时又加入了很多演讲员和跟随的群众。

当学生进入租界之后，三五成群，各有柱旗一面，上书"学生演讲队"字样，散发《学生被捕》、《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讲演日商纱厂罢工、顾正红被枪杀以及学生因声援顾正红惨案而被捕的情形。

同济大学学生组织得十分严密，分4个中队16个小队分别进入租界，到达南京路预先约定的演讲区。

负责指挥的党组织获知有些学校提前进入租界讲演，一面令南洋、上大等校下午继续讲演，一面令其他各校提前出发。

时方正午，英老闸捕房开始以"扰乱治安"为名，拘捕演讲学生，先后被捕的有10余名。演讲学生被捕后，大家都拥向捕房，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援助罢工工人"等口号，声若洪钟，响彻市井。英捕房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午时以后，讲演的学生愈聚愈多，仅在北火车站附近就集结学生2000人以上，准备联合到租界游行。这一天主要讲演示威的地段是在英租界大马路(即现南京路)，下午1时以后，在南京路讲演示威的学生、工人的反帝情绪逐步高涨，听者动容，几至泣下，学生们手执白色的三角旗，用红字或黑字写着各种示威口号，如"反对增加码头捐"、"取消治外法权"、"反对越界筑路"、"反对印刷附律"、"援助被捕学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

约”等。其中有一份传单是《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宣言说：“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然而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吞声忍气地蜷伏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比十几国的奴隶还不如。”“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大马路讲演，唤醒全埠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① 当时南京路上每隔一二十家商店就有一组学生在演讲，各处都围了许多听众，红头阿三（印捕），到处驱散听众，但赶不胜赶。

随着群众反帝呼声高涨，帝国主义者开始大规模逮捕学生，2时许，先后被捕者达100余人，被关在老闸捕房看守所铁栅内。

演讲指挥部为了援救被捕学生，这时正通过传讯员联系，把分散在各点上的演讲队员向老闸捕房集结，包围老闸捕房，迫使它立即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下午3时，老闸捕房门前已经群众云集，水泄不通。捕头爱活生突然下令：“准备瞄准！开枪！”英人枭威尔首先向人众射击，紧接着英、印捕一起开枪，发射了40多颗子弹，当时开枪的巡捕离群众只不过一丈远，因此有的一粒子弹击中两人，顿时南京路上血流遍地，当场殉难的有13位烈士。上大学生何秉彝是第4决死队队长，虽中弹身倒，仍然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见同队陈宝聪受伤，急忙向前用手巾为他包扎。这时英捕立即上前对准尹的胸部开枪，尹当场牺牲。另有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被捕者50余人，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陈独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5、686页。

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市、罢工、罢课，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3. 坚持十七项条件

在上海要实现“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商界还没有发动起来，然而5月30日，帝国主义不仅杀害了学生和工人，而且也杀害了商人。因学生这一阶层大多是中小商人子弟，何况学生的讲演和斗争口号也是符合商人利益的，因此在30日当天晚上，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非常愤激，有决议主张实行停业以待解决。山东路、河南路、爱多亚路、五马路、四马路等各商联会，纷函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从速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救济办法。广大中小商人都在等待总商会的决定。

31日午后，学生、工人继续在南京路讲演，劝导商人罢市，印捕拿起警棍驱散群众，帝国主义者调来救火车，用高压水龙头向密集的群众猛射，这天又有40多人被捕，11名学生被殴伤。3时左右，脚踏车队传令要求“包围总商会”，由于学生工人都涌向北河南路727号上海总商会会址，致使礼堂、甬道、院落一片人海，约有数千人之多。学生们说：“今天不通过罢市，谁都别想出去！”上海学联代表登台演说，并在台上叩头恳求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总商会终于被迫同意罢市，众人拍手欢迎。数千人一致鼓掌，表示满意而去，时已夜10时许。总商会连夜发布罢市命令，决定6月1日起实现罢市。

6月1日，公共租界的大小公司、小商店一律停止营业，店门上贴有“惨案同胞，休业志哀”、“宁为救国鬼，毋为亡国奴”等等招贴和标语。2日，罢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各马路、各商店，乃至交易所、银行、钱庄、机关、转运、保险、粮食、杂粮、糖业、肉食、渔业、菜场、煤炭等各行各业都投入罢市行列，其声势之大是从来未有的。

武装西捕强迫开市，拍桌谩骂也无济于事。

上海学联决定中等以上各学校全体罢课。上海大学通电说："本校亦于6月1日起罢课，誓达惩凶、雪耻之目的，还望全国各界一致响应。"① 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一向脱离革命斗争，自五卅惨案发生后，该校学生不顾美国校长的刁难和反对，也愤然投入反帝斗争。校方竟悍然宣布提前放假，勒令学生出校自找住处，学生召开会议，全体退校，后来一部分人到新建光华大学就读，这一正义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上海其他教会学校师生。

开始，学生们主要是上街讲演，动员罢市。6月5日以后，为避免屠杀、逮捕，改变方针，主要从事于国内外之宣传活动，派代表分赴内地宣传，通电世界各国，揭露五卅惨案之真相，请各弱小民族予以援助，同时积极开展募捐和抵制英货、日货活动。学生联合会多次发表宣言，反对一切苟安妥协态度，他们要求："(甲)关于全部者：(一)撤销临时裁判权；(二)收回海关；(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乙)关于局部者有二：(一)先决条件：(1)撤兵，(2)解严，(3)释放被捕学生工人，(4)启封锁闭各校；(二)要求条件：(1)惩凶，(2)撤销工部局总办鲁和，(3)收回会审公廨，(4)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及交易所领照案，(5)永远撤退驻沪海陆军。"② 这些要求充分反映了学生的民族自觉性。

6月2日，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等团体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当日由全国学联代表林钧在商界联席会议上作报告，并经会议表决通过。4日下午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布成立。它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帝国主义提出17项交涉条件，其中"宣布取消戒严令"、"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等4项为先决条件。"惩凶"、"赔偿"、"道歉"、"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

① 《民国日报》1925年6月3日。

② 秋人：《五卅惨案中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第364页。

领照案"、"收回会审公廨"、"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为正式条件，这17项指出了五卅反帝运动的统一的斗争目标，团结了各界的反帝力量，给上海和全国人民以莫大鼓舞。

正当上海三罢斗争日益高涨，全国各地反帝怒火炽烈燃烧之际，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回到上海，开始与帝国主义妥协。总商会不仅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而且竭力缩小运动范围，少提一些交涉条件，还成立五卅委员会与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11日下午，他们提出13条交涉条件，将17项中"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条件都删去，另外对于"优待工人"一项，删去"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罢工，开除工人"等重要内容，这显然是抹杀工人阶级的要求。

因此，这个13条，一方面是借人民群众三罢斗争的声势，乘机向帝国主义讨回一些权利，另一方面又以损害广大人民利益，特别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为交换条件，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让步。

总工会和上海学联、全国学联坚决反对13条。16日，联合会讨论发宣言反对总商会条件案。学生代表说："十三条'强奸大多数市民之公意'、'欺凌全体市民'。"21日，上海学联发表宣言，指斥总商会"包办交涉"、"卖国罔民"、"我们誓死不承认总商会的条件"，呼吁各界"一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种种工具"、"坚决坚持到底，继续罢工罢课反抗。"① 为了实现17项要求，上海学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动员群众对英日采取经济绝交。学联设经济绝交部，每日派出调查仇货者达几百人，严行调查，遇有销售仇货者，即将货物扣留拍卖，以作维持罢工救济费，为了查封江面，各调

① 《上海学生联合会反对上海总商会宣言》，《血潮月刊》1925年6月21日，第十八期。

查员乘小轮，逡巡江面，忘寝废食，深夜不归，虽遭警察恐吓，也不畏强暴，仍然进行。第二是宣传，一方面组织学生在本市讲演，散布传单，张贴标语。据估计上海学联所印标语、传单有五六万至十余万之多。五卅案爆发时，租界各大报都不许登载惨案的真实情况，上海学联迅速编印了《血潮日刊》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发表上海学联的主张。另一方面，积极向外省宣传，唤起各地同情与援助，6月6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派遣代表赴各地，复旦中学、东吴、亚东为沪宁线；法政、南洋为闽广线；中法、上大附中等为沪杭甬线；神州、南方、圣约翰为京汉线；上大、南洋中学等为长江线；同济等为西北线。通过这些宣传员的派出，与各地学生会联系，宣传五卅惨案的真实情形，全国各地的学生很快地发动起来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都发生了罢工、罢市、罢课。第三是积极募捐以救济罢工工人，学生们自己自动捐献，同时在市内搞义演筹款，全国学联还派代表去东南亚动员爱国华侨捐款，学联代表刘一声于9月5日抵泗水，先后募捐7次，得荷币40万元，于10月才回国。

由于总商会的妥协，由于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也由于反动派的联合镇压，7月以后，五卅运动逐渐进入了收缩阶段。7月23日，奉系军阀封闭了上海学联、全国学联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8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工人学生士兵书》，号召工人要有组织的复工。20日，全国学联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学生秋季后停止罢课。24日，上海学联通告指出，为巩固学生运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号召学生入学上课。

五卅运动首先由工人阶级发难，得力于青年学生的鼓动，才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高潮。就上海而言几乎没有一个学校不组织学生会、不参加上海学联，他们的成员由20多校增至98校，学生们在运动中也得到了锻炼，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过去教会学校从来脱离革命，而这次大多数教会学校的学生也走上街头。

瞿秋白曾说过："中国的学生运动向来总是革命潮流里的鲜花"①，而五卅运动中，这朵鲜花开放得尤其绚丽多姿，光采夺目。

二、全国学生的新动员

1. 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浪潮

五卅惨案的当晚，全国学联就发出电报，请求各地援助，并发表宣言说："不平等条约、租界、领事裁判权，外国工厂、纳税西人会与工部局，所给予我们的这样惨痛的结果，我们还能让不平等条约存在一天么？""现在我们应当与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为我们全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要求惩凶、赔偿，迅速解决工潮，取消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禁止外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取消纳税西人会与工部局，组织华人市议会管理市政"。他们通告各地学生联合会要组织罢课、捐款，并号召市民作各种形式的运动，为沪案后援。

北京学生联合会于6月1日晚召集紧急会议，决议各校自2日起，一致罢课，出外演讲募捐，为上海后援，并决议条件七项。3日举行示威游行，有30000余学生参加，队伍进入东交民巷东口，外兵紧闭铁门，不许入内，学生们就在门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10日举行全城大募捐，由各校学生分段担任，每10人一组，结果极佳。下午参加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虽然当天大雨沛然而下，但学生们兴奋不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并按预定路线游行至外交部，继至执政府。

武汉学生联合会自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后，即召集紧急会议，一致决议罢课、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口号。3日各校整队到公共体育场集会，40余校2万余人，大会议决沪案要求条件有：收回上

① 《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运动》，《向导》第144期。

海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外人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死伤费；撤换英日领事；取消外国在华工厂等。会后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情绪激昂，观者人山人海，莫不感动泪下。9日上午，学生联合会与其他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并大游行，约有45000多人。湖北督军萧耀南逼各校校长，提前放假，并密令通缉学生80余人，学生会职员被秘密逮捕者不下10余人。

天津学生会也异常活跃，5日一致罢课。广东学生也举行大示威，济南学生急欲恢复学生联合会，6月5日宣告成立，后即宣告罢课，8日游行示威、外出讲演宣传等。此外，长沙、九江、杭州、成都、旅顺、大连、汕头等地学生都举行了罢课和游行。陕西、山西、沈阳、吉林、哈尔滨、江西、安徽、广西、云南、香港等地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海外的留学生也积极响应，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人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帝示威。《赤光》第33期发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特刊》，支援国内斗争。6月21日，200多名学生和华工到中国公使馆示威，冲击使馆，迫使公使陈箓接受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和撤退在华法军等项要求。在德国，中共旅欧总支部用“中国留德学生会”的名义，致函柏林各大报，说明五卅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还举行集会和募捐支持国内反帝斗争。

一时，从国内到国外，掀起了援助沪案的新的学生浪潮。

2. 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为进一步巩固学生会组织，研究如何配合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全国学联于6月26日，在上海召开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恽代英担任大会党团书记，任弼时也亲自参加了大会的指导工作。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全国30多个地区的学联代表60余人：郑州刘国章；河南周群贤、尚芳；武昌胡彦彬、高标；汉阳胡云翼；汉口林尤

勇、吴绍镒；北京李启耕、杨善南、叶桐；芜湖周范文、陈原道；鄱阳李照钢；乐平杨清琅；南昌桂家鸿；余干徐甫；杭州杨瑞祥、张崇文；天津史汉清；寿县薛卓汉；安徽张鹏超、郭士杰；浙江张新锦；宁波韩光汉、来元义；福建陈空谷、方尔灏；蚌埠吴熙绩；扬州吴士伟、田仲刚；南京姚尔觉、任露清；山西潘泽清、万宗章；青岛彭明精、孙桂亭；上海高尔柏、蔡鸿干、张永和；江西吉州甘青山；四川彭县杨达；甘肃杨海清、吴鸿来；奉天粟丰；苏州沈炳魁、陈觉民；四川李顾埙、欧阳本义；皖北刘稻新；湖南杨遣漠、张晓柳；贵州谢岐、王漱芳；云南徐景濂、沈体要；保定冀明定；松江奚汉屏；镇江张仁昌、卢兆祺等。①

大会开幕式上，首先由大会主席杨善南讲话，他指出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口号已显笼统，应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内军阀”为口号。随后恽代英在会上作了《五卅后政治形势》报告，他说：“五卅惨案，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和革命学生，唤起了他们向帝国主义斗争。这个运动不仅在全国掀起了革命浪潮，而且对世界革命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他号召青年学生一定要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英勇坚持斗争。同时他向大会提出了两大议案，一是在学校里建立学生军；一是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援助工农，向工农学习。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章程》，这是五四以来对学联章程的第一次修改。是六七年来学生运动经验的总结。新《章程》突出了革命精神，明确提出了以“团结学生，联络民众，本互助的真缔，革命的精神，谋学生本身及全体民众的利益为宗旨”；新章程更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改评议部为全国代表大会，执行部为执行委员会，由 9 人组成，其中 5 人为常委。

---

①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二）第 210—212 页。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言》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决议案(附学生军组织问题议决案)》、《改进学生本身利益问题议决案》、《学生组织问题议决案》、《援助工人农民运动议决案》等8个议决案。大会还发了《致广州革命政府电》、《致全国各界电》等10个电文。这些议决案和电文充分表现了学生运动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推进为"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运动以及全国的反帝浪潮,使全国青年学生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祸乱的根源,中国军阀政治和战祸内乱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学生群众因为其家庭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剥削而破产,不能继续求学,不能谋得职业,不能结婚,因此,读书不问政治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有依赖民众自己的力量以革命的手段,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与帝国主义作战,为此大会拟定:每年5月30日至6月5日为纪念周;以五九、九七两纪念日,作大规模的反帝宣传;学校课程中应加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不平等条约之研究,各地学生利用各种机会作演讲及出版物的种种宣传;各地学生应设法组织大规模的统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应提倡学生军为武装人民的准备。

第二,从单纯的政治运动,进而为社会服务及保障学生自身利益运动。在《改进学生本身利益问题议决案》中指出:官厅教职员不能为学生谋利益,因此学生会应注意指导各校学生组织以自负改进学校的责任。学生会应参与校务,实行自治。学校的财政、课程的改良、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全校体育卫生设施、校规的确定,都应该有学生会的参与。

第三,从单独的学生运动,进而为宣传民众及参加农工市民等社会活动。大会通过的《援助工人农民运动议决案》是开学生会议案的创举,经过斗争的实践,广大学生认识到:学生们没有经济上的地位,其力量仅限于宣传,至于实际行动,必要靠全国最大多数

的工农群众。而且工农在中国社会居于最受压迫的地位，其所受之苦痛极大，而其革命之要求亦最烈。故学生运动要与工农联合，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组织，如此才能使中国民族解放成功。援助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及工农群众的教育与宣传，再帮助他们组织团体，尤其要在他们发生重要事件时给予精神的与物质的援助，为此各校学生会要设立工农部。

第四，从松懈的组织到紧密的团结。自从国民会议运动开展以来，各地学生会陆续成立，但与全国学生总会的关系异常松懈，上下没有集权的合法组织，不能指导所属各联合会及学生会工作，故而这次大会在《学生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规定："为求全国学生运动集中统一而有力量，本会认为本会全国的组织应厉行民主集中的原则，各下级学生联合会及学生会应服从上级机关之指导，执行其通知和命令，且每月应将其经过情形报告于上级机关，各上级机关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多派考查员或报告者到各所属联合会或学生会考查其工作成绩，指导发展方针。"① 而且还规定了划一的组织系统。这一决议案是统一全国学生运动的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至7月6日结束。全体会议共开了18次，最后选举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安徽、奉天等9个地区的代表为本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次大会所体现的学生运动的新进步，全面继承并大大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尤其是这次大会更自觉地提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生运动史上有重要意义。这次大会不仅大大鼓舞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使五卅运动坚持深入发展，而且为动员学生参加北伐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3. 各地学生会组织的空前发展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二)第176页。

五卅运动把全国学生卷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涛中，各地学生会组织也在运动中蓬勃建立和发展起来，全国学生总会为促进各地学生组织发展起见，派出大批的特派员分赴京、津、豫、陕、湘、皖、闽、粤等地常驻，负责指挥该地学生运动。这就大大帮助了各地学生会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和在组织上的日臻巩固与加强。

陕西省学生为了集中全省学生的力量，确定全省学生运动的大计，深感有统一全省学生组织的必要。即于1925年7月7日正式召集全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陕北、三原、赤水等地共12学联会代表30余人，选举了陕西省学联执行委员会。

河南省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于8月1日举行，到会代表99人，大会选举了省学联执行委员会9人，以5人担任省学联执行委员常委，并派特派员分驻各地。直至1926年1月吴佩孚大举攻豫，影响学联工作，各地学联瓦解甚多后，仅存安阳、临颍、杞县等10多处。

山西原有全省学联组织，五卅运动爆发，要求组织发展，于1925年9月3日召集第二届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加入省学联的有太原、大同、平阳、河东、汾阳、长治等地学联所分辖之50余学校学生会，群众总数约在20000人左右。

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闭幕后，武汉学生联合会即分化为武昌、汉口、汉阳3学联，另组省联代表筹备处，筹备成立省学联。至12月湖北学潮普遍爆发，吴佩孚加紧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学生领袖被捕入狱者3人，密令通缉者40人，但是湖北学生不因此屈服气馁，他们在黑暗恐怖之中召开了第一届全省学生代表大会，由9个学联30余代表参加，选举了省学联执行委员会，还指派各县特派员10余人，于寒假期中分赴各县督促组织或整顿学生联合会，以至省学联所统率的学联有武昌、汉口、汉阳、宜昌、襄樊、枣阳、荆门、安陆、黄海、黄冈、沙市、天门、新堤、汉川等20余处。

湖南学生的战斗经验和组织能力是全国学生运动中不可多得

的。五卅运动以后，湖南学运更为积极，湖南学生更趋革命化。1925年12月28日至1926年1月2日，湖南省学联召集了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共到47县之学联代表29人（有数县学联委派一代表列席者），省学联所统辖之各县学联有长沙、常德、衡阳、湘潭、岳阳、平江、宝庆、益阳、零陵、沅江、浏阳、醴陵、桃源、沅陵、保靖、永顺、资兴、郴县、华容、南县、宁湘、武冈等50余处，其群众总数约在20万以上。

四川学联在五卅运动后有惊人之发展，第一次四川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于1926年3月在成都举行。加入全省学联的有川东、川北、川南等地区学联及顺庆、绥定、高县等60余县之学联，而且在各大运动中，县学联都能服从省学联之指挥而从事工作。

江西学联自南昌学联于1925年因查日英货而遭军阀封闭后，不能公开活动，但在重压之下，反促成江西学生之觉悟。1926年5月中旬召开省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南昌、九江、吉安、抚州、饶州、鄱阳、永丰、乐年、余干等10余学联均有代表列席。省学联会后，派30人分赴各地，发展各县学联之组织，如贵溪、清江、吉水、安福、万安、泰兴、都昌、泰和、高安、永新、德安等20余县都有特派员之工作。

广东学联在五卅运动之后，与香港学生联合会于1926年4月15日在广州召开全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到会50余学联之代表120人。广西学联所率有梧州、桂林、容县、怀集等10余处学生联合会。浙江、福建、安徽及云南各省学生组织都有发展。

综计已有组织之全省学生联合会共计16省，加入此16省学联之各城市、各县学联为数在320个以上。无省组织而各城市已有学生联合会之组织为直隶、山东、江苏3省，现共有学联约20左右，尚无学生联合会之省份吉林、黑龙江、新疆3省。边远的察哈尔、绥远、热河等省也已有学生会组织，但政治作用不显著。据估计，当时全国学生总会领导之下的学生总数约达800万左右。

由此可见，五卅运动中，学生组织如此广泛，如此迅速地发展是空前的，甚至连五四时期也不能及的。这对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关税自主运动

1. 关税会议和北京学生的示威

五卅运动以来，全国的反帝浪潮汹涌澎湃，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改变策略，利用关税会议的名义来欺骗中国人民。

1921 年 12 月，华盛顿会议议决，鉴于中国财政紊乱，厘金为各省军阀截留，因此协议以裁厘加税补救。按不平等条约，各国协定的税则，名为值百抽五，实际不及百分之三，此次除切实值百抽五外，如中国能裁去厘金，即实行 1902 年中英条约规定之值百抽一二点五。原约闭会后三月，各国均派代表来华开会，讨论加税方法，但是一拖三四年之久而不实行。

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的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于是就想拿些小惠来博中国人的好感，希图缓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激情。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马慕瑞来华就提出了召开关税会议的倡议。段祺瑞政府正式发出请柬，关税会议定于 1925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召开。

这次关税会议，并非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而是顺着中国军阀意旨讨论裁厘和关税二五增率问题。因此其结果一方面只能是加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增加二五附捐，其中除抵押外债外，其余部分被中国政府和军阀囊括了去，用以制造枪炮、购买军火，以作争夺地盘屠杀人民之用。这只能是加强和巩固军阀的势力，这样的关税会议当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北京学生站在反对关税会议的最前列，当时北京学生组织分

裂为两派，一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派为沪案后援会，但是两派在反对关税会议上是一致的。10 月 25 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动所属学校游行示威。26 日关税会议开幕之日，后援会所属学校召集市民大会，虽然当天警察密布于各校校门，阻止学生出校，但各校学生均用武力冲出，队伍经过西长安街单牌楼时为军警所阻，激起公愤，群众用乱石击退警察，至天安门开会。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派所属学校的学生也全体出动。之后在全国学生总会代表的调解下，北京学生两派合并为北京学生总会，在反对关税会议和反奉倒段的运动中成为北京学生的中枢。

11 月以后，北京学生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逐渐与教育界、商界及工人相结合，动员的群众更广泛，规模也空前扩大了。

11 月 22 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等 30 个团体发起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虽然军警将各校大门严密封锁，阻止学生集会游行，但学生们冲破了封锁，北城各校集结于北大第三院，至 12 时已集合 5000 余人，南城各校集结于师大，有群众 8000 人，集合后分头向天安门进发。下午 2 时，2 万余人集合天安门前开会，主席由吴稚晖、陈启修等 9 人组成，大会通过决议，提出："绝对无条件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对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会议"，"绝对尊重人民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会后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对欺骗的关税自主通过"，"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政府剥夺民众自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当天在与军警的冲突中，北大教授马叙伦、于树德、林玉堂等 60 人受伤。

北京学生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运动至 11 月底"首都革命"之后，与反奉倒段运动融合为一。

2. 全国学联临时代表会议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召开的关税会议，动员全国学

生参加关税自主运动，全国学联于1925年11月3日在北京召集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上海的郭伯和、葛建时，湖南的赵绪一、田波扬，安徽的杨善南，天津的史汉清、谢曦，北京的张绍琦、李人祝以及河南、山西、武汉、济南、陕西、保定、江西、广东、四川、南京等地代表28人。另外有北京学生、教育界、工商界以及政府方面的代表5000余人参加会议开幕式，是日风沙飘扬，但作为会场的国民大学的大操场内却是"灯火辉煌、五彩相映良一盛会"。大会首先讨论关税自主问题，此后又讨论了关于时局、学生自由、反对沪案重查等问题，至11月15日闭幕，前后共开了10几天。会议通过了《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关税自主决议案》、《对抗时局议案》、《拥护广州民国政府决议案》、《反对沪案重查决议案》、《学生自由运动决议案》、《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告国民军书》等10个文件和通电。

大会指出："关税会议如果成功，结果是张、段发洋财而全国民众永受协定关税的桎梏。"因此，我们要"反对分赃式的关税会议，要求力争关税自主"。

大会通过的《关税自主决议案》提出了对于关税会议的正确主张。首先认为："(甲)关税会议只能讨论一个问题——无条件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① 甲项问题若无肯定的解决，则不得讨论任何加税率，更税则，裁厘金种种问题，若甲项问题得肯定解决，则中国当提出下列关于废除旧约缔结新约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加征值百抽五十以上的入口奢侈税"等等；第二步"在一年以内制定国税定则，与通商各国分别缔结新商约"；第三步"在二年以内，中国对于新商约尚未成立之国家，由中国适用国定的最高税率。"②

决议还号召同学："一方面公布和宣传我们的主张，一方面还

① 《关税自主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二)第430页。
② 《关税自主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二)第431页。

要根据我们的见地和主张，努力攻击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官僚机关新闻，关于关税会议一切煽惑的言论，并指责一般舆论界视线不清，议论不彻底的错误。"①

全国学生临时代表大会闭幕后，特组织——关税自主运动委员会。由上海的代表郭伯和、南京代表希苑俨、湖南代表田波杨、北京代表李人祝、天津代表史汉清5人组成。在北京的师范大学设办公地点。②

临时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反奉战争，提出这次战争是一派帝国主义扶植一派军阀的祸国殃民的战争，但我们可以组成反奉联合战线，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大力发展民众势力，直到取得民众的权力，建立人民的政府。因此，大会号召全国民众和全国学生要积极参加反奉战争，一定要使这次战争成为真正的扑灭反革命势力的战争。

临时代表大会关于关税自主决议得到了全国学生的一致响应，一时，上海、广州、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均有示威游行，11月底，北京学生如上所述因反对关税会议，爆发了"首都革命"。

关税自主运动是五卅运动的延续，并且与反奉战争相结合，又形成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北方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新高涨。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关税会议也无结果而散。

---

① 《关税自主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二)第431页。

② 《学总关委会职员选定》，《晨报》1925年11月17日。

第六章　三一八学生运动

一、反奉倒段斗争的展开

1. 反奉倒段运动中的学联会

1924 年 10 月北京政变后，北京的执政者名义上是段祺瑞，但这时的皖系的实力已经瓦解，因此北方反动势力的首脑实际上已是张作霖。段祺瑞政府只能在奉系的卵翼下来维持反动的政局。

奉系入关以后，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派军队沿津浦线南下，一直伸展到上海。奉系的南下，引起了 1925 年 10 月的浙、奉之战，孙传芳自称 5 省联军，反攻奉系。10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反奉战争宣言。宣言指出："反奉战争已经开始了！……从表面上看来，此次战争自然是军阀之间的循环报复战争"，但是"反奉运动是全国民众的，直系不过是导火线，江浙开战，尤其是导火线之导火线"，"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参加战争。""肃清奉系军阀的势力，确定革命的民主政府之局面。"① 此后，在全国开始了反奉倒段运动。

10 月 26 日，学生总会发表时局宣言，赞成反奉，指出："我们主张并赞助反奉战争，而且认为是目前切要的工作。但是我们赞助

① 《对反奉战争宣言》，《三一八运动资料》第 3—4 页。

反奉战争，乃是为我们人民本身利益而赞助，并不是为某一派军阀的利益（尤其是不为曹吴的利益）而赞助的。我们在目前反奉战争蔓延全国的状况中，应指出我们国家利益的具体要求，我们应该很明显地提出下列要求，全国国民都应为实现这种要求而努力：第一，要求建筑在民众利益上的统一的委员制的中央政府；第二，要求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第三，要求启封全国各地爱国团体；第四，反对以任何政治势力干涉学生之爱国运动。"①

全国学生总会的宣言得到了全国学生的拥护。11 月 12 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宣言，指出奉系军阀不独不扶植中国民众运动，反而不遗余力摧残蹂躏。因此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奉系卖国军阀"，"组织统一的国民政府"。② 各地学生积极地宣传反奉倒段，揭露奉系的罪恶，到 11 月底以北京学生为主的"首都革命"，使全国的反奉倒段运动达到了高潮。直至 12 月，各地学生反奉倒段的斗争还不断发生。12 月 6 日上海学联与上海工人临时代表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等团体，在青云路大操场召集市民反段大会，到会群众有 2 万余人。大会提出，各界团结一致打倒段政府！组织人民政府！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到会群众遭到数百军警的镇压，受伤数人，但群情激昂，冲破军警截阻，举行了游行示威。

长沙学生于 12 月 7 日举行了示威游行，把反奉倒段和"打倒吴佩孚"结合起来。南京和武汉等地学生也都举行了反奉倒段的示威游行。

2. 首都革命

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潮的影响下，11 月 23 日奉军将领郭松龄

① 《学生总会发表时局宣言》，《民国日报》1925 年 10 月 26 日。

② 《学生联合会时局宣言》，《民国日报》1925 年 11 月 13 日。

秘密和国民军取得联系，在滦州倒戈，郭军的进攻直指关外，随即攻到距离沈阳60里巨流河附近。张作霖已经十分危急，眼看奉系大势已去，此时国民军一、二军也会师马厂。北京内阁开始瓦解，奉系阁员已经望风而逃，其他阁员也于11月25日全体总辞职相率出京，北京遂陷于无政府状态中，原来的关税会议也无形闭幕。

中共北方区委根据这种形势，决定将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发展成为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真正国民政府的首都革命，连日来召集北京学生总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团体秘密会议，决定28日下午1时开国民大会。28日上午11时，各校墙壁贴出布告，谓："政局突变，现政府根本动摇，北京已属吾侪民众(学生工人兵士)，吾侪应乘此机会，为大规模之民众运动，即日下午1时齐集神武门(南城各校集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迫段祺瑞辞职，拿办朱深、章士钊、姚震、李思浩等祸首，望诸同学严守秘密，服从指挥，届时踊跃参加"。同时还发布传单，其中有"民众武装起来团结暴动首都革命"等语。

下午2时，各校学生教职员以及市民、工人等约数万人，集合于神武门，推朱家骅为总指挥兼主席，又推共产党员刘清杨、于树德以及杨理恒、朱我农、韦青云等为副指挥，民众整队排列，由北大学生军维持秩序，又组织北京学生军敢死队、交通队、救护队以及工人保卫团。敢死队队员手持尖头木棍，主席台有总司令大旗一面，另用丈长红布上书："国民军同胞啊，你们要起来与民众一致奋斗，为国努力，组织国民政府，打倒卖国贼。"①

2时15分，主席宣布开会，指出："今日开会，其目的在打倒段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接着发出赴执政府，请段祺瑞下野。队伍以"首都革命"的大旗为前导，群众手持木棍、长板等种种为武器，游行时京畿警卫司令部派出手枪大刀队两连维持，当队伍到铁

① 《北京市民迫段氏下野》，《申报》1925年12月5日。

狮子胡同执政府前时，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派国民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门致中带一营士兵阻止队伍入内，后来队伍见段不在执政府即高呼口号。3时左右大队至吉兆胡同段宅，队伍要进去，兵弁阻止，后电鹿钟麟也不允，敢死队大呼"冲锋"，但铁栅栏已紧闭了仍未进得，段的卫队全副武装，戒备极严，国民军劝群众不要冲入，群众高呼"请段祺瑞下野"、"请段祺瑞缴出印信来"、"迫段祺瑞签字即日离京"等口号。群众停立门前直至5时，游行队伍指挥北大教授陈翰笙电鹿钟麟磋商办法，鹿乘汽车至吉兆胡同，群众当即开大会，决议"(一)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二)组织国民委员会的政府，执行政权；国民委员会之责任：(甲)对外极力谋国际平等地位，(乙)对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及言论集会之自由，(丙)召集真正代表国民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正式政府。"① 决议交鹿，并决定29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再开国民大会，由鹿出席答复。至是，队伍才退出吉兆胡同。

群众退出吉兆胡同后，就转向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及有关人员李思浩、蒋百昭、曾毓隽、梁鸿志以及警察总监朱深、姚震等住宅，寻找卖国祸首，学生们见他们早已逃之夭夭，气愤之下捣毁器具，并纵火焚烧以示惩罚。29日10时各团体在北大三院开预备会议，讨论国民大会一事，提出8项议案："(一)将卖国贼财产充公，交鹿钟麟保管，用途后议；(二)推主席(即朱)谒鹿，告以今日在天安门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请鹿出席；(三)打倒北京晨报馆；(四)在前门闹市立一招揭书明取消关税会议，宣布自主；(五)倒段，通缉卖国贼，由国民裁判；(六)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七)责成国民军表示服从国民大会之决议案；(八)查办金佛郎案。"②

① 《申报》1925年12月5日。
② 《申报》1925年12月8日。

下午2时约5万人齐集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主席朱家骅报告说昨日之运动，即我等革命运动，今日之国民大会，是国民共同讨论解决我国之一切问题。报告毕通过上午预备会议提出的8项议案。陈启修、马寅初、顾孟余、蒋希曾、王汝勤以及总工会代表、京汉铁路代表相继发表讲演。马寅初讲演时指出："昨日驱段运动，尚未成功，务希大家始终贯彻初衷，继续驱段，不让段氏多住一日北京。"① 会后群众游行，有一部分人到晨报馆，将该报馆举火焚毁大半。

首都革命是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共同组织和发动的，它是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尝试，虽然也曾得到上海、长沙、汉口等地学生和市民的支持，但当时处于军阀割据之下，未形成统一的革命高潮，尤其是未能争取到驻北京的国民军与民众运动相结合，未能及时解除段祺瑞卫队旅武装和解散执政府，相反国民军当时的态度实际上是保护了段祺瑞政府，因此群众在两次示威之后，并未达到驱逐段祺瑞的目的。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派兵进攻敦松龄部，巨流河一战郭大败。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被杀，形势对国民军不利。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辞职，后去苏联及赴德游历。段祺瑞政府得到奉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又重新加强起来。3月，段祺瑞任命贾德耀为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

二、三一八惨案

1. 大沽口事件

1926年3月初，奉系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领军舰5艘、商轮8艘，运送张宗昌部下的陆战队，企图在大沽口登陆，和榆关张学良军、马厂李景林军配合，进攻国民军。3月7日，奉军在北圹登

① 《北京之国民大会》，《民国日报》1925年12月8日。

陆，与国民军发生激战，结果被国民军击败，于10日晨退至直隶湾。经过这场战斗，国民军更加紧防守港口，并布水雷以封锁圹港，外国船只只准白天驶行。

国民军的这一措施，外国使团竟无理抗议。说什么"查《辛丑条约》最终议定书，京津交通不能阻断，天津30里内不得有军事行动，并不得为军事设备。今竟如此，实属蔑视条约，应请中国政府立饬该地军事当局，即日撤退军备，恢复平时状态"。[①] 此后，国民军遂向他们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外轮需有引水船，由引水船吹哨为号，可免炮击；第二，外轮需悬本国国旗；第三，入口外轮之华人，需由国民军检查。这些条件原为国民军防止奉舰和奉军人员而提出的，对外轮来说丝毫也没有损伤。但是帝国主义并不甘心遵守，他们对第三条提出了异议。国民军为了避免和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对第三条做了让步，并于12日开放大沽口。但是要求外国使团必须履行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外轮不得再为敌军运兵运械；第二，外轮入口不得使敌舰尾随混入。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支持奉系军阀，无视国民军的条件，蓄意制造事端。12日下午3时，两艘日舰驶入大沽口，并有奉舰数艘尾随。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现这一情况后，即以旗语制止。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而日舰却对国民军报以实弹射击，结果国民军炮台受损失，守军人员死伤10余人，此时国民军才不得不予以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此后，国民军向日使提出抗议，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反向中国提出抗议。3月16日，美、日、法、英、意、荷、西、比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八国通牒》，通牒限期中国在44小时内即3月16日下午4时至3月18日正午止："(甲)由大沽砂洲至天津之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乙)应除却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碍物；(丙)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且须保证将来不再

① 《英使麻克类为大沽口事件提出节略》，《顺天时报》1926年3月11日。

发生任何妨碍行为；(丁)一切兵船须停泊于大沽砂洲之外，且须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戊)除海关官员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舶之一切检查。"如在限期内"不得满足的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① 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20余艘也云集大沽口，对中国人民进行军事恫吓。

这一通牒是新的八国联军的侵略行径，顿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从工人到市民，从各团体到国民军，以及国民党人士，而其中学生尤为激烈。还在14日，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为大沽口案发表致全国同胞电中指出："帝国主义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横行妄为，肆无忌惮，每当我国内乱之际，辄借口保护侨商，派遣军舰，驻泊各埠口岸，以为扶植卖国军阀延长内乱之武装保障……乃当此奉系军阀阴谋之表现，……本会痛帝国主义之横行，爰本匹夫有责之大义，作誓死救亡之呼号，……翘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具与汝偕亡之决心，作大规模之反日运动，国家前途，庶其有多。"② 同时致电外交部："恳即据理力争，并设法制止，以遏乱源，而维国权。"③

北京学生总会积极联络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民治主义同志会等180余团体筹备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

2. 天安门前的国民大会

《八国通牒》发出的当天，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立即召集各校负责人、学联负责人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在翠花胡同8号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共青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刘伯庄主持，李大钊作政治报告。参加会议的还有赵世炎、陈乔年、陈毅、萧

① 《八国通牒》，《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第27—28页。

②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大沽案致全国同胞电》，《工人之路》第267期，1926年3月22日。

③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致外交部电》，《民国日报》1926年3月15日。

三、陈为人、邓鹤皋(即邓洁)、彭桂生等同志。会议讨论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办法,决议于18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满以前,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督促段祺瑞执政府严重驳复八国无理通牒。17日下午,北京学生总会、北大、中俄大、师大、女师大、郁大、中法大、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等200余团体的400余代表在北大第三院再一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五事"(一)即日严重驳复通牒,(二)不许日舰携带奉舰入口,(三)驱逐八公使出京,(四)请国民军改变非战目的。即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五)定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并推定主席团由林森、于右任、学总会代表、总工会代表、总商会代表组织之。口号决定如下:(一)驳回列强无理通牒。(二)废除《辛丑条约》。(三)驱逐外国兵舰出境。(四)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各国公使出境。(五)反对日舰携带奉兵入境。(六)巩固大沽口的国防。(七)打倒勾结张吴的英日帝国主义。(八)国民军应该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九)全国民众立时起来抵抗第二次八国联军。"①

会后分为甲乙两组,甲组由共产党员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去外交部请愿,抵部要求见总长或其他负责人,结果无一人出见。乙组约七八十人,由共产党员陈毅率领去执政府,抵门口即被卫队拦阻,经婉转说明才允许三代表入内,不料三代表入内不及几分钟,卫队即驱代表退出,代表论理,卫兵军官即喝打,代表只得退出,而卫队尾追用枪柄刺刀乱打乱刺,代表中受重伤者六人,轻者数十,四川外交代表团杨伯伦受伤最重。

甲组代表在外交部得知执政府前流血事件,不肯出部门,直至午夜代表相率至贾府,与贾德耀(国务院总理)而谈,说明民众为外交后盾之来意并提出条件要求惩办刺伤请愿代表卫队,并派代表向民众道歉,贾允即时撤换卫队易国民军,派代表至国民大会道

① 《北京惨案真相》,《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45期第150页。

歉。代表离贾府时已 18 日晨 5 时。

18 日上午 10 时，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在天安门举行，到会者有北京学生总会、女师大、师大、燕大、北大、清华、总工会、中俄大等 200 余团体 3 万余人。徐谦主席与顾孟余在会上演说毕，师大代表报告 17 日在执政府请愿情形，并高悬请愿受伤代表杨伯伦的血衣，留日归国学生代表赵晋声泪俱下，向大会宣读杨伯伦《致大会群众书》，书上写道："我为革命而死，死亦无憾，望大家继续努力。"当报告杨伯伦恐有生命危险时，台下立即怒吼起来，高呼"坚持到底"、"誓死不屈"。会议通过了《天安门国民大会议决案》，议决案第一条即"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此外议决案还决定"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八国公使出境"、"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会议还通过了《驳复列强通牒致八国公使函》，在函文中严正指出："贵公使团根据《辛丑条约》之权利，提出最后通牒，真是无理取闹！我们最后向你们提出抗议"，"《辛丑条约》，在我们中国人民认定是清帝国时代的条约，在民国以来，是绝对否认为有效的"，你们的抗议"证明你们就是帮助张作霖，延长我国的内乱，侵犯我国的主权！如果你们不能立时撤退各国战舰与最后通牒，则请各国下旗归国，立即出境，否则我们当努力驱逐！"①

天安门前的国民大会至 12 时结束。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各帝国主义公使见我国舆论激昂，也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之无理要求，因此，这次大会对粉碎帝国主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侵略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①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第 39 页。

3. 执政府门前的大屠杀

天安门前的国民大会结束后，群众开始游行，去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前请愿，每4人一排，队伍长数里，各人手执小旗一面，旗上书各种标语，一路上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等等，并唱《国民革命歌》。游行队伍原定由国民党左派徐谦任总指挥，徐因病未去，这时，陈毅当机立断推举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共青团北方区委都参加了国民大会和游行，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在北方区委会议一结束，立即赶来游行。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陈为人以及共青团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全国学生总会北方特派员杨善南等跑前跑后负责联络。队伍将抵国务院时，即有交通队报告谓卫兵并未撤换，但是群众以为，上午国民大会时，代理警卫司令李鸣钟因17日执政府前流血来函向群众道歉，而且还有贾德耀派潘某为代表向群众道歉，并谓"诸君今日赴执政府，当可招待"等语，因此决不至有任何意外发生，大队鱼贯入院。院内四周全是卫队排列，刺刀上枪，群众并不畏惧，他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要求面见贾德耀，但院内空无一人，此时总指挥发令整队赴吉兆胡同段祺瑞私第，话音未落，响起枪声，群众向东辕门、西辕门逃去，但铁门小，退却极慢，卫兵手持铁棒大刀，见学生就砍、就打，遭枪杀者有40多人，伤者百余人，执政府门前血溅满街，陈尸遍地。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北大、清华、师大、女师大、工大、中法大、燕大、中大、平大、交大、艺专、清明中学、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团等10多所学校都有死难者。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担任着指挥，卫队的枪弹从她右肋射入，斜穿心肺。同学杨德群前来扶她，她说："你们快走，不要管我。"这时，杀人成性的军警枪杀了杨德群，并冲上去挥刀向刘和珍的头部、胸部乱砍，残忍地杀害了她。鲁迅赞扬她为"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北大学生共青团员张仲

超，三一八以前，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广东军事学校学习，但他毅然参加了三一八游行请愿，不幸被反动派杀害，共青团中央送给张仲超的挽联上写道“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踏着血迹前进不愧勇敢少年先锋团”。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陈乔年胸口被刺刀戳伤，赵世炎被警察扎了一刀，青年团北方区委书记萧三在退却时跌倒擦破了手，他们始终和群众在一起，指挥与掩护群众撤退。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等5人，谓“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并诬蔑学生“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这显然是为执政府开脱罪职。鲁迅在杂文中猛烈抨击刽子手的阴谋，他指出：“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事实证明，段祺瑞政府的大屠杀不仅是蓄谋已久的，而且采取了诱杀手段，原来上午派出代表到国民大会向群众道歉并欺骗说卫队已撤退代以国民军，就是下午大屠杀的诱杀信号，此手段真是卑鄙已极。

4. 北方革命的挫折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北京学生总会向全国学生总会并转各团体各报馆发出急电：“望全国同胞，亟起声讨”！全国学生总会接电后即于19日电慰北京学生：“希坚持奋斗，总会已分电全国同学，即起倒段反日，取消不平等条约。”并电广州、天津及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速起援助，积极作废除《辛丑条约》反段并反对日本反动军阀之运动”，致函上海学联：“上海地处南北要冲，学生行动，辄足以为全国所矜式，至盼鼓五州首难之余余勇，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苦战，至所企盼。”①

① 《全国学生总会致各处电文二则》，《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第133页。

19日，北京学生总会通告各校罢课，组织讲演队，唤醒民众，并组织伤亡善后委员会，讨伐杀人凶手，举行追悼会悼念被难者，派代表赴各地联络。

20日，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指出："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全国的民众！我们能不为这些死者复仇么？我们能不讨伐这个杀人的卖国凶犯么？""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①

上海学生从24日起罢课4天，27日召集上海各界3万余人举行北京殉难烈士追悼会，会后游行。南京、湖北、安庆、山西、浙江金华、广州、张家口、长沙等地学生纷纷声援北京，甚至纽约城千余学生，也举行大会一致声援京案，并向美国政府抗议，反对施用武力政策。因此一时间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段浪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4月初，奉军和直鲁联军向北京总攻击。在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下，鹿钟麟于4月10日以警卫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宣布段祺瑞罪状，派军队包围段政府，改编府卫队，段等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北京学生总会召集各校各团体在师大开联席会议，一致主张对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等及卫队官兵，按律惩办。并向公使团提出抗议，从速引渡段祺瑞等，但不过几天，鹿钟麟国民军退出北京。4月22日奉军张学良等入京，并擅委重要官吏，此后，奉军对北京民众运动大肆镇压，以宣传赤化为罪名，搜查各学校，而且封了京报馆，杀害了进步社长邵飘萍。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军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和支持民众运动，给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良好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利用了这个良机，不仅发展了组织，而且出现了北方的革命高潮，从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关税会议、

① 《向导周报》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

首都革命直至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之后，不仅民众运动遭到镇压，国民军也处于危险境地，至此北方革命走向低潮。

三一八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粉碎了帝国主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的无理要求，同时这一运动也严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三一八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共同组织和发动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爱国运动，它虽然没有造成五卅运动那样浩大的声势，但是它有力地支持了广州国民党政府，并且直接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三一八运动中，学生们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谱写了学生运动史上又一光辉的篇章。

三、反对国家主义派

1. 国家主义派及其对学生的影响

随着民众运动的发展，一小撮服务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家主义派分子的活动也猖獗起来。

国家主义派是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为首的极端反动的政治派别，他们标榜的所谓国家主义的理论，并无什么新奇之处。这种理论最初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流行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年代，它抹煞阶级本质，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欺骗人民服从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对内用"国家至上"的口号取消阶级斗争，欺骗劳动人民服从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对外宣传"民族优越论"，唆使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之间的对立，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叫嚣侵略战争。

中国的国家主义派用这一反动理论，宣扬什么"全民政治"，来反对阶级斗争，他们唱出两个动听的口号"外抗强权"、"内除国

贼”，初听起来似乎继承了五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但实质相反，他们所谓的“外抗强权”即反对苏联，他们并不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人。曾琦曾在《醒狮》第二期上说：“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决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他们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为帝国主义辩护，声称中国并无帝国主义资本的侵略，而百般仇视苏联，诬蔑苏联“侵略”、“干涉”等等。他们所谓“内除国贼”，即反对共产党之谓，他们咬牙切齿地说：“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他们恭维吴佩孚为爱国军人，说：“反赤的军队是爱国的军队”。国家主义派是以反共为职志的。

国家主义派的理论是极为贫乏的，但他们的反共反苏活动曾猖獗一时，而且尤其是对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23 年 12 月间，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他们建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曾琦说：“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得俄之援助，大肆活动于国内外，而国民党孙中山又有联俄容共之主义，予深知大乱将作，国命或为之斩，因决急另组新革命党”。① 1924 年周恩来等人回国内，曾琦、李璜等也“跟踪追击”至国内。10 月，《醒狮》周报出版，并成为青年党的喉舌。因此，人们又称青年党为醒狮派。1925 年 10 月公开建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先入团，经过一段训练再秘密吸收到青年党。从 1924 年至 1925 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建立了 30 多个国家主义团体，在留日学生和留美学生中也有一些组织。1925 年 12 月，成立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以及北京、南京、武汉 3 个分会。

---

①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 76—77 页。

由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致使有些地区的学生联合会发生分裂，如1925年关税会议前的北京学生就分为两派，四川学生联合会和广东学生联合会也曾分裂为两派，这对学生运动是极为不利的。

五卅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高潮，而学生运动成为其先锋，国家主义派不仅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且诬蔑这些运动是"赤化"、是"过激"、是为"共产党操纵"，与帝国主义、军阀同出一辙。

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荒谬地声称"鼓吹赤化促起列强一致结合压迫中国的共产党徒"应对此次惨案负责，攻击运动的领导人"北大少数贩卖共产之教授""以人命为儿戏罪无可逭"①。此后他们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在全国学生总会，在《醒狮》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企图破坏全国的学生运动。

国家主义派的出现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是相联系的，是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化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在反对国民党老右派和戴季陶主义新右派的同时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也加以驳斥，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至1926年底他们越来越孤立，北伐军出师后，许多国家主义团体纷纷瓦解，还有一些人也纷纷写文章宣称他们"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过来"，看清了国家主义派不是爱国而是卖国。这样国家主义派的影响缩小了，青年党基本上土崩瓦解了，而其骨干分子却公开投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怀抱。

2. 全国学生总会对国家主义派的批驳

国家主义派在反共反苏活动中，将全国学生总会作为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特别在三一八惨案之后，《醒狮》周报第77、78两

① 《上海商报》1926年8月25日。

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提出“肃清赤化学生运动”的口号，还告诫全国教职员“要积极指导学生改组共产党把持的各校学生会及学生总会”，这实际上就是要各校中一部分反动教职员解散学生会，摧残学生自由，其中尤以广东学联代表余衍恒、上海学联代表葛建时以及四川代表等签署的《共产党把持下之全国学生总会》一文措词荒谬、用心险恶，更能迷惑群众。

为了彻底批驳国家主义派对学生运动以及学生总会的攻击，硕勋、唐鉴等在《上海学生》上发表了《我们的回答》、《醒狮报破坏全国学生运动之谬论》等文章。全国学生总会也于4月18日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致醒狮记者》。在这些文章和公开信中，首先驳斥了国家主义派所谓“赤化”和“共产”之谬论，他们指出：查“‘共产’、‘赤化’早为帝国主义、军阀、洋奴、绅士陷害爱国人士之利器。”“本会领导全国学生为国民革命之先锋，与帝国主义与军阀肉搏，遭其深恶绝痛，自在意料之中”，“贵报提倡国家主义自称爱国”，反进而诬蔑全国所产生之本会，胆敢为军阀与帝国主义张目，欲以‘赤化’、‘共产’诬陷本会及全国各校学生会”，“其破坏全国学生运动，用心诚可谓奸险卑鄙极点。”其次批驳了“为共产党把持”之诬陷，他们指出：“本会职员为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为各省各地学联所产生，一切选举均系公开合法执行，若本会为‘共产党所把持’，事之荒谬离奇，孰有过于此者？贵报之无脑筋、无常识、甘为军阀鹰犬，厚诬全国学生，有如此者！”国家主义派说：“因为学生总会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共产党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便是把持的证据。文章指出：“请问有什么理由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是不对，若是既无理由反对，只因共产党有如此主张，而学生总会便不应该主张，为什么共产党人都吃饭，而《醒狮》周报的先生们却不去吃屎呢？总之，学生总会之主张，是根据中国现在各方面的情形、学生本身的地位与其实际要求确定的，凡是什么主张只问对与不对，不问是某党或某某人所提

出。"国家主义派说:你们的全国代表会议(指1925年11月3日至11月15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会议)为纪念苏俄革命,休会一天,便是共产党把持之证据。文章驳斥道,总会第7届代表大会之反帝国主义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我们要联合一切被帝国主义压迫而有反对帝国主义觉悟的外国人共同作战","苏俄反对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立在被压迫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场合上面,对于已经取得胜利的苏俄革命纪念日表示庆祝,一则是友谊的,另一面是借此策励我国民众,效法苏俄人民之奋斗早日达到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之目的","这能说是献媚苏俄?更能以此指为共产党把持全国学生总会的证据?"在驳斥国家主义派的诬陷后,文章还指出:"本会为一代表全国学生利益,纯粹无党无派之机关,一切言论行动均以全国学生利益、国民幸福为前题,本会历届职员容有政见信仰之不同,——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员、爱国主义者,亦有无党派之青年。本会兼容并包,专视其行动能否代表学生利益,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以为断,决无歧视之心"。

国家主义派对学生总会的攻击,其实质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分裂学生组织,以达到破坏学生运动的统一战线。这和当时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是一脉相承的。全国学生总会在彻底批驳国家主义谬论的同时,努力教育与争取一部分受国家主义派欺骗的青年学生,这就更加巩固与发展了学生运动的统一战线,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致使学生运动成了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持者。

第七章　大革命洪流中的搏击

一、统一学生运动，为北伐作准备

1. 反对“誓约书”的斗争

三一八北京惨案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学联决定全市学生罢课4天以声援，商科大学学生会根据上海学联的决定，自24日起罢课，29日罢课结束。该校教授忽告罢教，逼令学生另填志愿书，志愿书内容是不许学生在未得学校许可以前停课或全体请假，不许学生会自由开会，不许学生会请校外名人演说。

3月30日，同济大学校长阮尚介也在校内贴出布告，将五四以来的历次爱国运动污蔑为“收效其微，殊属得不偿失”，指责五卅运动是学生“一时激于义愤”，造成“重大损失，至今尚有余痛”，学生罢课声援三一八“为校章所不许，又与重视学业之旨，大相违背”，于是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于一周内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否则“即令退学”。“誓约书”的内容是什么呢？现将全文录下：“学生某某，今愿宣誓，遵守同济大学宣布下列之规约：(一)非得学校之命令公布不得停课或全体请假；(二)学生大会须于三日前呈请校长许可，且不许用学生会名义邀请校外之人演讲。决不违背，若有不遵，愿受退学处分。此誓。某某具”。①

---

① 《申报》1926年3月21日。

要求学生签具“誓约书”是反动教育当局和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压迫学生运动，破坏学生团结的反动措施。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反动的教育当局视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如仇敌，共同联合起来对付学生运动。1926 年 3 月 18 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宴请淞沪警察厅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江苏省教育会要人和一些大学校长，以“将来英国庚子赔款退还时，他们有优先权”为诱饵，要他们“合力预防”学潮，于是有反动的校长们想出了“誓约书”这一招，以报效帝国主义和军阀。

但是，事不如愿，签“誓约书”一事受到了学生的抵制。4 月 1 日，上海学联为此事发表宣言，指出：“逼迫同学在无理之悔过书上签字”是“反动教育家之侮辱学生人格，摧残爱国运动”。“本会为全国学生人格计，为全国学生自由计，领率上海 4 万学生誓为商大同学之后盾。”① 同济大学在校长布告贴出的当晚就有 380 名学生（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 85%）签名反对“誓约书”，至 4 月 5 日中午，填“誓约书”期限已到，但没有一个学生服从阮尚介的命令，正午 12 时，吴淞警察局巡官带领巡警 20 名，会同驻炮台湾陆军第三营营长率领的士兵 30 多名，荷枪实弹，开进学校，禁止学生出门。军阀孙传芳明令，对学生就应“勿稍纵任”，江苏省教育会也决定对学生“勿稍迁就”。而国家主义派的一些教授则通电说什么“学生被赤党利用”。

阮尚介在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态度十分强硬，19 日，20 日，眼看强迫学生填写“誓约书”已不可能，于是决定开除学生会骨干 20 余人，强迫他们马上离校。

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为了支持同济学生的斗争，派代表去同济慰问，同时去江苏教育会质问，上海的很多大学，如南洋、东南、商科等学生会也向同济学生会表示慰问，并对阮尚介提出抗议。

---

① 《五卅后之上海学生》，《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二）第 525 页。

26日晚，阮勾结淞沪警察厅，扬言要逮捕被开除的学生。于是他们在同学们的掩护下离校。在这些学生离校的第二天即4月27日，有140余人签名离校以支持被开除学生的斗争。同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得到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电，即复电赞扬同济学生的斗争，并欢迎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去广州转学或工作，广东大学还直接拍电报给同济学生会，表示"极为赞佩，如去广州，可开特别班，并给予特殊照顾"。同济被迫离校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第一批20多同学于5月上旬到达广州，詹大悲、邓颖超代表国民党中央欢迎他们，第二批30余人于5月18日离沪，其余南下学生于6月中旬全部到达广州，先后进入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以及黄埔军校，有的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或军队政治部工作。

同济大学的进步学生离校后，阮尚介于4月28日在《申报》登出《开课通告》，此后一部分分散在外的学生回校上课，学生会被迫解散，左派力量大大削弱。这说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教育当局，压迫学生运动、分裂学生团结的一时得逞。但是时隔一年，北伐军推进上海之际，学生会又恢复起来，阮尚介乖乖发还学生写的"誓约书"，3月底，阮尚介在《申报》发表启事中不得不承认："去年强迫学生签押誓约书，施用武装军警封锁学校，措施诚属失当"。不久，阮即被学生会赶下台了。

2. 巩固学生统一战线

在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教育当局压迫学生运动、分裂学生团结的同时，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以"赤化"、"过激"等谣言恐吓青年学生，制造学生组织的分裂，一时曾发生相当效率。五卅以后，在北京则有民治主义同志会、孙文主义学会与国家主义派勾结，运动少数学校，脱离北京学联与北京各界雪耻会，以"反共产"、"单独对英"等口号来分裂北京民众。在广州的士的派（士的为英文音译，即棍棒之意）、四川的诚学会（国家主义派和研究系联合以把

持四川教育的团体)都不约而同地以"反共产"的招牌,脱离当地的学生联合会,另行组织。在上海,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攻击上海学联是共产党的御用机关,诬蔑经济不公开、行政不民主,并勾结学阀组织各大学同志会,以图另组学联,分裂上海的学生运动。

针对学生运动分裂的状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采取积极的策略:即在右派势力小的或者简直没有的地方,加紧巩固学生的下层组织和反对右派思想的斗争和宣传;在右派势力已经形成一种力量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东,就一面加紧思想上的斗争,同时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去争取他们的群众。1926年4月2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告全国同学书,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以至于反动的教育家都正在馨香默祷乘机窃发,以促成学生势力的分裂,尤其是上海一部分不肖教职员更乘着反动势力重来的时候,强迫我们同学填'立誓悔过'、'不再爱国'的降表,全国同学们,在这种黑暗恐怖的时候,因我们个人主张信仰之不同而影响学联会之统一与集中,其结果任何派别都不能得着胜利,而胜利是帝国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啊"。为此全国学联提出"统一学生运动"的总口号,要求全国同学在"'反抗外国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军阀压迫以争得民权'这两点是应该一致努力的,一切主义的不同、思想的冲突都应该是超越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工作以外的同学间个人的纠纷,我们决不能因一类个人的纠纷而影响整个学联会对外奋斗之进行。"①

本着"统一学生运动"的精神,学生总会派代表去北京进行调解,结果北京学联会与沪案后援会两派合组成北京学生总会。但是后来右派领袖仍然退出。在上海,右派所组织的各大学同志会本身包括教员与学生,因师生间地位不同,所以组织也不巩固,对此,上海学联容纳一部分右派加入,担任不甚重要的工作,便仍然保持上

① 《学联会注意学生统一运动》,《民国日报》1926年4月2日。

海学联形式的统一。惟有广东的学联，以新学生社为核心的左派组织脱离学生群众，右派学生组织的士的派力量强大，所以学联机关始终被他们占领。

3. 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由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出师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1926 年 5 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首先进入湖南，并且初战告捷，我们党除了努力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来热烈支持北伐战争之外，也十分重视发动革命的学生运动作为北伐的后盾之一。

三一八之后奉军占领北京，大肆镇压学生运动，革命学生遭逮捕，学生组织遭摧残，只能转入秘密状态。南方学生运动虽处在高涨之中，但也不断受到军阀的镇压，而且还有反动学阀、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等进行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形下，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明确新形势下的任务，制定新的策略，是推动学生运动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北伐战争新形势的需要。鉴于此，全国学生总会在共产党员李硕勋的主持下，决定于 7 月中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召开。7 月初，李硕勋、刘昌群、唐鉴三人就赴粤主持大会的筹备工作，7 月 23 日在广州国立广东大学正式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北京的邓文辉、蒲振声、傅正，上海的张超、夏清祺、黄信道，广东的郑国材、潘考鉴、龚希直，湖南的唐鉴、彭芷绚、李孝忠，四川的郑鼎勋、刘尊一、宋玉门，福建的林隶夫、吴诲若、罗扬才，浙江的汪孝铭、童沂志、苏中常，江西的曾迎祥，邹努、张如龙，香港的莫伦白，广西的陈镜明、曾祖汉、陈楚延，天津的何雪，湖北的张婺、李伯勋、兰芝溥，山东的徐宝琦、张洛书、张实之，安徽的王培吾、姜敬兴、张鹏超，江苏的费青，热河的王星华，甘肃的胡廷珍、骆力学，山西的薛映雏、李时蒙、

彭兆泰，河南的刘英、蒋舜华、马景山，陕西的庞诚齐、赵宗润，云南的毕昌杰、饶维昌、向镇清等，共有21个地区的学联代表56名。

这次大会是在中共粤区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曾作为来宾参加了大会，上海代表张超为大会执行主席。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在学生组织、宣传及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通过了《总结一年来会务总报告决议案》、《统一学生运动决议案》、《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拥护民众利益决议案》等10个决议案，大会还发布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言》，最后大会选举了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总务部常务委员林隶夫、组织部常务委员张超、宣传部常务委员郑鼎勋、工农商部常务委员刘英、编辑部常务委员唐鉴。7月31日，大会结束。

大会认为："国民政府之出师北伐，在中国国民运动中具有至伟大之意义！""革命的中国学生以至于一般民众对于国民政府之北伐都应立于积极赞助参加之地位而不能稍存消极希望的心理，甚至于坐待革命义师之到来。在北伐之前进期间，我们决不应专恃革命将士在前线上之军事奋斗而不努力于广大的民众之宣传与组织。号召广大的民众起来一致参加北伐，同时从多方面去促成军阀的崩溃，是中国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之一个重要的任务。"① 基于以上认识，决议案要求各地学联"作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北伐之工作。"

大会对于统一学生运动给予特别的重视，提出"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的口号。大会号召全体学生不管在主义和信仰上各有不同，应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以争求民族的独立及民权的伸张"、"反对不良教职员以争取学生切身的利益"这两点上一致努力，"学生联合会应该容纳各党派的学生统一组织之下而进行

① 《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

其共同需要的一切工作”。为了统一学生运动之实施，要求各地学联在工作中注意：制定当地学生对各方面态度之共同的纲领；反对不经合法手段组织第二学联；发生纠纷时得由上级学联派员调解，不可互相争持等等。

大会还明确提出学生利益与民众利益之关系，强调“谋民众利益，就是救国的精义，离开了民众就不得谓救国”。把拥护民众利益视为学生的天职，过去促成国民会议、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拥护民众利益的工作，而反对米谷涨价、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滥发纸币、反对摧残新闻记者等等也都是拥护民众利益，同学都应该做，大会号召学生“深入民间去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渐渐集中民众的势力”，中国农民占 80%，受痛苦亦最深，“所以我们全国学生尤其要到农民中间去”。

大会的这些决议案不仅是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正确总结，而且是北伐战争的动员令，给全国青年学生指明在北伐中的任务和策略方针，因此这次大会为北伐战争中的学生运动的新高潮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积极投入大革命洪流

1. 各地学生热烈支持北伐

1926 年 7 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武力推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对学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们热烈支持北伐，视参加北伐军为荣耀。南方各省以及北方有些省份的青年学生，踊跃投考黄埔军校，仅据浙江一省的记录，从第一期至第四期就有 419 人，而广东、湖南则更多。北伐过程中，各地仍有青年学生陆续加入北伐军，成为北伐军中战斗力极强的一部分。

他们除了直接参加北伐军之外，在北伐军所到之处，纷纷组织

慰劳队、救护队，参加各种战勤服务。1927 年，北伐军进攻河南时，运回武汉的伤员有 5000 多人，湖北团省委组织青年学生和部分劳动童子团担负护理工作，他们吃苦耐劳，细心为伤员洗伤口、换药等，受到北伐军士兵的热烈欢迎。上海、武汉等地的学生还为北伐军募捐，从经济上接济北伐军。

宣传北伐是各地学联和学生们最热心的事，他们大量地印发传单，上街演讲。长沙学生为了宣传北伐，决定半日留校读书，半日为北伐军宣传。在北伐军未到之处因为宣传被军阀逮捕杀害，但学生们毫不畏惧，当北伐军包围武昌时，一师学生陈定一深入反动军队中向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宣传，以策应北伐军，他还经常代表学联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讲，喉咙嘶哑也不停息，后来为国家主义派告密而被杀害。上海学生为宣传北伐，组织几百个宣传队，虽然一批又一批地遭到逮捕也不停止。尤其是江西九江和南昌的青年学生，为宣传北伐被屠杀的有上千人。1926 年 9 月 15 日，北伐军程潜所部一个团逼近南昌旧城内，守敌十分空虚，青年学生通宵达旦赶制标语，贴满全城以为北伐军内应，后来军阀邓如琢反扑，南昌失守，邓布告“凡人民之曾欢迎帮助南军者杀”，据警察署统计被屠杀者不下 2000 人，以学生为多。军阀孙传芳曾对人述及：“当余在决川舰时，九江的学生，以小艇开至舰旁，高喊口号，向船上人员演讲，被余悉数枪毙，不料第二批又来，又将彼等枪毙，第三批、第四批学生陆续而来，亦皆枪毙，乃又有第五批学生前来，余党结以枪毙对之，亦无用处，乃改变对付方法”。面对学生的英勇牺牲精神，他惊叹道：“彼等如此勇敢，不知何故”。

全国学生对北伐的支持，从当时各报所载军阀对学生的镇压可见一斑。

9 月 18 日

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执法处，于 18 日晚在二马路斩决青年两人，并未宣布罪状。……有谓系学生宣传赤化者，一广东人，一湖南

人，姓名未详(《时报》)。

9月18日夜间，忽有军警多名捕去国民党学生谢光培及高某、吴某等3人，又当场将吴某击毙。翌日又从西关育德中学捕去教员学生彭桂秋等两人及教员两人。……又将育德学生丁春元城内公馆搜查，将丁之父拘去。其他如第六中学、第二师范、志存中学皆被军警指名索人(《民国日报》保定通信)。

9月23日

学生会(指福州学联)理事翁良毓、闽光新报记者廖又铭，及其他两名，均于梗(23)日枪毙。前任财政厅长萧奇斌私邸发现炸弹，对于被拘禁之学生，益从严取缔(《时报》)。

9月28日

邓军夺回南昌，即将为党军内应之学生枪毙(《民国日报》)。

10月1日

本日下午卫戍司令部(指北京)侦缉队，派队四出，赴各书铺搜查，有"俄""社会"字样者，均被抄去。对于小学校亦搜捕，被拘捕学生男女达80余人(《民国日报》)。

10月3日

南京当局拘捕学生王建三等10余名，闻系与党人有关云(《时事新报》)。

杭州学生因讲演，万县惨案被拘6人(《申报》)。

北大附近30余学生被捕(《时报》)。

上海各团体代表10余人为万案在总会开万案后援会，被上海警察厅逮捕，总会职员张超、郑鼎勋、林隶夫、陈冰亦与焉。

10月5日

苏军攻入南昌，对于欢迎民军之群众，异常仇视，尤以学生为甚。两三日间，遭其杀戮者，盈2000人，腥臭扑鼻，不可响迩(《民国日报》)。

宁垣近日学生为军警捕去甚多(《时报》)。

宁垣私立光夏中学教员学生被捕者十余人，学校被封(《时报》)。

福州昨有学生陈某被捕，传系杨光学校退学者(《申报》)。

10月7日

南京警察厅对于出入男女青年学生严加搜查，捕去徐某3人。……某大学学生数人(《申报》)。

10月12日

北京学生被捕20余人，系属北大、法大、中大等校。(《申报》)

福州当局，对于防范党人，益为严密。……对于青年学生，侦骑四出，日夜搜捕。前学生会理事林鼎亚已被捕获。昨今两日，更有学生苏昭苞、高芹等，均在南台福星街就捕(《申报》)。

10月3日

邓如琢再入南昌时，因迁怒于学生，将留居南昌之学生概处死刑。心远中学……200余人完全被邓氏在学校操场内杀死。又同学是光华学校学生，亦同时在校内被邓氏枪毙100余人(《民国日报》)。

10月17日

顷有杨光中学学生被捕20余人。

上海东亚体校学生2人被捕。

上海南洋学生林廷书被捕。

11月10日

上海学生散发传单被捕者20余人。

11月11日

上海学生散发传单被拘捕15人。

11月12日

上海学生被拘捕20余名。

11月13日

上海学生续有被捕。

这些报道虽然没有一一查证，但也可说明当时学生支持北伐之热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震憾着中国大地，激励着千百万人的革命热情，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多年来，为之奋斗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目标实现有望了，逮捕屠杀都吓不倒、扑不灭学生们奔腾的革命热情，学生运动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原动力之一。

2. 万县惨案和学生反英示威

北伐战争的迅速推进，孙吴军阀的崩溃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于革命势力首先向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推进，首先打倒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所以英帝国主义也就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9月5日，英帝国主义在万县对中国人民实行了空前的大屠杀，是北伐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英国商轮依恃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内河航行权横行川江，自6月以来不断肇事，不仅撞沉民船，而且还故意撞沉一度曾主张北伐的杨森川军官兵的船只。7月8日撞沉划子一只，淹死川军官兵23人和乘客数人，8月2日又先后两次撞沉木船数只，淹死川军官兵数十人。1926年8月29日，英轮万流号又在四川云阳江面横行，故意撞沉中国木船3只，溺死乘客64人，其中四川杨森部下的解饷兵员58人，损失饷银8.5万元。这是"英人弁视公法，侵辱国体，3月来迭演惨溺同胞案"。万流轮到万县后，杨森派官兵赴该轮查讯事件经过，又遭到停泊在万县的英舰柯克捷夫号水兵的袭击，川军重伤两人，其他官兵被缴械。同时，英舰还以巨炮对准万县民房，进行威胁。杨森便将英轮扣留以便交涉，而英帝国主义竟以此为借口，于9月5日派遣"装甲嘉乐船，载英兵数百名"，用机关枪猛烈向守护万流轮的中国士兵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同时，由渝调万县的英舰威警号与柯克捷夫号复用大炮轰击县城两岸陈家坝、

南津街及省长公署等地，焚毁民房商店1000家，死伤人民数以千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英帝国主义调遣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9艘来华，大肆宣传和策动列强联合武装干涉中国革命。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英怒潮，重庆、上海、汉口、北京等地的各界人民纷纷集会抗议，学生是这次反英示威的先锋。9月13日重庆市民5万人举行水陆示威，参加学校有22所之多。处在孙传芳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学生在惨案发生后，积极联络各团体，举行反英示威。9月30日，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建议于10月5日至12日为反英运动周，一致提出反对英国炮舰政策。10月5日举行大规模之示威运动，表示国内民气之激昂，以促交涉之进展。10月3日学生总会和上海学联代表与上海10余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讨论至5日起实行罢课演讲事宜，被警厅逮捕，由于代表被捕，大规模的示威大会未能开成，但是援助万县案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上海各团体在学生会和学联会的努力下，组织了上海各团体万县惨案后援会，宣告从10月5日起举行万县惨案追悼周，决定一周中努力宣传。10月17日，各界万县惨案后援会在闸北方家木桥五卅烈士公墓基址举行了追悼大会。

湖南人民声援万县惨案的声势特别浩大，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总工会、总商会、省农民协会等230余团体，于9月25日举行七八万人的大会，由李亚农为大会主席，提出与英经济绝交公约，致英领事通牒。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万县惨案的交涉虽没有取得成功，但由万县惨案引起的反英示威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是1927年1至2月间，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的重要准备。

3. 上海自治运动与学生总要求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在南昌、九江消灭了孙传芳主力，孙传芳的地盘江苏、浙江及安徽难以保存。孙于 10 月底北上天津与奉军相勾结，拟请直鲁军南下，占江苏、安徽继续维持其军阀统治。

为了动摇孙传芳的统治势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开展了苏皖浙 3 省自治运动。10 月底成立了苏皖浙自治运动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同时上海自治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上海市的自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直接领导与组织的。上海学生是自治运动的鼓吹者，全国学总、上海学联是最初发起自治运动的群众团体。

11 月 8 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时局宣言，主张实现和平、撤退上海的各国驻兵、上海市民自治、组织上海市民自治政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保障民众集会结社出版的完全自由。当天，上海学联即组织 1000 余学生，分为 250 个讲演队，上街宣传，散发传单，孙传芳派兵逮捕了 80 余人，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10 日，上海学联等团体组织了 750 个讲演队，上街宣传，要求上海立即实行自治，坚决反对直鲁军南下。

11 月 23 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宣言，提出“划上海为特别市”，号召上海和江浙人民、学生一致奋起，为民众自治而奋斗。

张宗昌的鲁军南下进占南京的消息，推动了上海的自治运动走向高潮。11 月 29 日上海工商学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开市民大会，反对奉军南下，到会团体计 400 余个约 5 万人。会场上群众高呼“反对直鲁军南下”、“打倒摧残学生的张宗昌”、“人民武装自卫”、“实行组织上海市民政府”，并且还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革命歌，大会推学生会代表冷隽为主席，3 省联合会代表蔡元培、褚辅成，总工会代表杨贤江，国民党部代表杨杏佛等都发表了演说，一致决议：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市政府。11 月 30 日，全国学生总会向各马路联合会、总工会、闸北商会等团体提出恢复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经过协商，于 12 月 3 日各团体代表 20 余人集议恢复上海

工商学联合会事宜，全国学生总会代表为主席，讨论议决：名称改为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以实现上海自治为宗旨。12月6日正式成立。市民公会的建立，使上海自治运动有了一个领导中心，上海区委为了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决定在市民公会里组织党团，派林钧为党团书记。全国学总会和上海学联会的党员唐鉴、陈廷勋、林隶夫、刘荣简、谢祥生、左汉忠等同志均组入党团，总的策略是组织市政府，如组织市政府不能实现，也要使它成为上海的最高团体。

在上海自治运动中，为充分反映学生的意见，上海学联从11月底就起草上海学生总要求，12月3日正式发表。这一总要求共28条，其中包括政治方面的，如："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学生有参加爱国运动之自由"，"学校当局不得干涉学生自治"。也有是关系学生自身利益方面的，如："学校开除学生，须正式宣布理由"，"学生不满意之教员，学校须调换或阻止该教员对于该学科之授课"，"学生所缴图书费，须全数购置图书"，"男女求学机会均等"，"学生伙食由学生自办，不能自办者，学校须将其所缴纳之伙食费全数包付伙食，不得从中取利"，"学校须聘请良好的校医住校，并减低其医药费"，"购置或增加运动与娱乐器具"等等。总要求还规定"教会学校当局不得强迫学生读经或做祷告"。上海学生总要求是五四以来学生利益的总体现，它对于上海学生参加自治运动起了动员作用。

上海市民公会为了进一步动员民众参加自治运动，准备在12月初再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市民大会，但由于上海防守司令的阻挠，不得不改为团体代表会议。这次团体代表会议决议由上海市民公会筹备组织上海特别市市政府。

12月下旬，孙传芳首先镇压了浙江的自治运动，接着直鲁军接防上海，对革命群众施行了野蛮镇压，上海自治运动被迫停止。

上海的自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自治运动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首先是发展了民众力量，打击了孙传芳，使他威信扫地，过去他提出的“保境安民”口号再没有人相信了。其次是自治运动中市民公会的成立，提高了学生会、总工会等团体的社会地位，为第二次武装起义作了准备。

4. 跟随工人阶级作战

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全国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夺取了上海，创造了世界工人阶级武装暴动的又一光辉范例。上海的学生，跟随工人阶级作战，为武装夺取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讨论暴动动员及行动大纲。其中要求“学生会应特别号召群众”。

万县惨案时，上海学生举行反英斗争受到军阀的严厉镇压，学联会被查封，不少学生被逮捕，因此，当时积极响应上海区委号召的只有几个革命力量较强的学生会。10 月 20 日以上海大学学生为主上街散发《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鼓动群众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组织上海市民政府。23 日当第一次武装起义爆发时，又有大夏大学学生熊天荆、罗玉君、周竺、夏咏裳、熊彩云、乐志平、乐志纯等组成 5 个宣传组，出动宣传，东亚体专和南洋医大部分学生也上街宣传，有不少人被逮捕。

第一次起义虽失败了，但孙传芳的主力在南昌九江被北伐军歼灭，所以上海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而低落，其中学生比之前一个月发动得更广泛了，特别是上海自治运动中，上海学生是最活跃的力量。

为准备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成立了学生委员会，由郭子民、刘振铎、余泽鸿、陈昌德、刘尊一、刘荣简、王心远、杨振铎、黄承镜、蒋寿田等同志组成，余泽鸿为主任。学生们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挠，纷纷上街宣传，散发传单。大夏

大学学生陈骏、陈亮在曹家渡宣传时，被孙传芳派驻上海的防守司令李宝章的大刀队抓住，他们奋力抵抗，挥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被砍掉右手，他们以左臂高呼，又被砍去左手，鲜血直流，但还是高呼口号，残酷的敌人割掉他们的舌头，随后砍下头颅悬挂在电线杆上，真是惨不忍睹。其他各大学因上街宣传，不断遭到逮捕，其中有案可查者 10 多人。

学生们不仅做宣传工作，而且还直接参加了战斗，文治大学学生为起义工人准备好土制炸弹，即在香烟罐头里面装满炸药、石头和玻璃碎片。提篮桥部分工人就是用大刀和这种土制炸弹围攻警察局的。上海大学等部分学生与工人纠察队一起攻打警察署，缴获了 8 枝长枪。

1927 年 3 月，北伐军东路军已到达上海附近的龙华镇，上海人民革命情绪特别高涨，中共上海区委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3 月 21 日晨发出了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令。上海学生响应号召，有 60 余所大学、中学罢课，很多大学组织讲演队，鼓动起义。

在这次起义中，直接参加战斗的学生比上次更多更广泛。上海大学学生郭伯和率领闸北基干纠察队在铁路两侧埋伏，袭击敌人军车。上海大学的很多学生与工人纠察队一起拆毁天通庵附近的铁轨，造成敌人的军列在此出轨倾倒。在战斗最激烈的闸北区，由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学生组织了 3 个纠察队，单是上海大学就有 100 多人，他们作战很勇敢。在火车站作战的学生，在前线牺牲了四五人。在起义中，他们不仅是战斗员，而且有很多学生会的骨干成为各地区工人纠察队的指挥员。上大的郭伯和参加指挥闸北起义，何洛在虹口指挥战斗，大夏大学熊天荆，交通大学周至初、李硕勋，复旦大学冷雋、孙连，暨南大学傅文彬、罗潜渊、黄承镜等都参加了起义的指挥。

学生跟随工人阶级一起作战，为夺取上海作出了贡献，因此在

3月22日起义胜利后召开的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林钧被推为3人主席成员之一。工商学各界代表选举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19人，其中学生代表有林钧和何洛两人。

三、国民党新军阀对学生的屠杀政策和分化策略

1. 新军阀对青年学生的镇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上海学生与工人阶级一起奋力战斗、流血牺牲从鲁军手中夺下上海，3月23日下午，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5万人的市民大会，拥护市政府成立，欢迎北伐军莅沪，但是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命令市临时政府暂缓办公，并积极布置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借口"工人内讧"，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发还枪械，学生也决定大罢课，声援工人。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在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惨遭新军阀的屠杀，当场死百余人，伤无数，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就在全市开始反革命的清党活动。

蒋介石发动的清党活动，一开始就把肃清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员作为重要内容之一。4月15日解散上海学生联合会，逮捕职员，此后派兵至各校逮捕革命的学生领袖，公开发布通缉令，逮捕全国学总会和上海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党员林钧、刘荣简等人。反动派特别仇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认为："上大是赤色的大本营"，所以蒋介石特别指令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陈群进行"查办"。5月3日，国民党白崇禧部队进驻江湾上海大学新址，武力查封了上海大学，搜查校部办公室、庶务科，并到学生宿舍以借查危险品为名，将学生的衣物、钟表、热水瓶、书籍等抢劫一空。后来上大被改为国立劳动大学。此次搜查，虽大部分同学离校逃避，但被捕杀者也有若干人。

蒋介石在发动清党活动的同时，又搜罗右派学生组织御用的

学生会，以配合他的清党。4月19日，蒋介石的东路军政治部发布命令，成立上海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并令上海的学生运动必须归它“指导”。指导委员会指派国民党市党部青年部派出代表到各校强迫改组学生会，并通令逮捕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领袖，“一经举发”“一律戮杀无赦”。一部分右派学生甘心投靠国民党新军阀，于4月20日在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召开改组会议，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通过宣言“拥护上海特别市党部及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议决发表宣言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声称：“本会向为少数跨党分子所把持，以致一切会务倒行逆施，早为各校所不满，现值清党运动高涨之时，本会应乘此肃清一切反动分子。”① 此后，法政、复旦、南洋、持志、震旦、光华、南洋医专等大部分大学都改组了各校的学生会，这些学生会为右派把持，积极配合国民党的清党活动，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惨遭逮捕与屠杀，我党领导的上海学联转入秘密状态。

上海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三天，广州的国民党也叛变了革命，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4月18日，反动派出动大批军队包围黄埔军校，逮捕军校中2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当夜分别在虎门炮台和鱼珠炮台秘密杀害，正在病中的萧楚女和中共广东区委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也被反动派从医院中捕去，4月23日被投入珠江杀害。

学生运动著名领袖、全国学联第八届执行委员唐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将全国学生总会移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叛变，他仍坚持斗争，后担任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国民党曾以高官厚禄、美女相诱，但他大义凛然怒斥道：“你们是军阀走狗，我肯来做军阀走狗的走狗么？”一批国民党官僚政客请他吃酒，要他供出个别同志的地址，他

① 《上海学联改组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4月21日。

把酒桌一推说："我就是我，我就是唐鉴，你们要枪毙快点枪毙，不要絮絮叨叨的多话！"后来他受过各种酷刑，但仍未供出党的机密，坚贞不屈。一天法官向他宣判死刑，问他有何遗言，他泰然自若地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妻子李绥弦也是学生领袖，是第9届全国学联常委、农工商部负责人，也被捕关在女囚牢。临刑前，李绥弦痛泣不止，他却笑着与妻道别，叫她勿哭，并取出了事先写好的"继续奋斗"4字赠送于她，沿路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青年团万岁！"情景悲壮，观者皆为泪下。

在南方革命学生遭到残酷屠杀的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于4月6日公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6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与北大学生范鸿劼、张挹兰、杨景山、邓文辉、李昆等20人被绞杀。

全国的学生运动从此处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下。

2. 两种学生组织的对立

自五卅运动起，在革命运动的高涨的同时，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分裂学生运动的趋势也随着发生，一部分右派学生一方面以反帝反军阀为旗帜，一方面又以反"赤化"反"共产"为口号，组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联合会相对抗的学生团体，不过当时军阀未除，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因此还有一致可言，而且由于党争取统一学生运动的正确策略，有些城市虽然发生两种组织的对立，但大部分经过调解而统一，特别是全国学生总会并没有发生分裂。大革命一失败，右派学生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公开改组全国学生总会，于是两种对立的学生组织就出现了。

4月15日上海学联被解散，不得不转入地下。国民党御用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于4月20日成立，5月份即提出要改组全国学生总会。这样，我党领导的全国学生总会不得不由沪迁至武汉，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地派遣代表前往武汉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海的国民党御用学联就联络东南各地学联成立改组筹备处，他们的这一活动，得到南京国民党青年部的赏识，决定将筹备处迁南京。6月28日上海、南京、江苏、甘肃等10余处学联在南京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全国学总改组筹备处，也决定7月15日左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两个代表大会，产生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国学生总会。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限制工农运动，发布反动训令，举行反共会议，准备公开叛变。形势对革命非常不利。就在此时，全国学生总会在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下，经过紧张的筹备，排除了国民党右派的干扰，于7月15日在武汉的湖北省党部礼堂召开了第九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四川、江西、河南、安徽、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奉天、吉林、贵州、云南、香港、哈尔滨等地学联会代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留学日本和新加坡的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代表共计51人，另有特别代表3人。湖北代表包泽英、湖南代表简傅良、北京代表段纯、上海代表刘荣简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总主席为刘荣简，在会上他首先报告开会宗旨，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反动势力重重包围和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下举行的，这次大会的要求与任务是："拥护革命的国民政府；拥护国民政府消灭蒋介石、张作霖；反对帝国主义；检阅过去的工作；坚固本身组织，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郭沫若出席大会，并作了演说。他强调："现在时局已到了一个很严重很困难时期"，"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联合向革命势力的壁垒进攻"，"同时国内一切反动势力，亦联合起来向革命的壁垒进攻，使革命势力，在四面楚歌之中，此刻我们应当团结我们的力量，打出一条生路来。"①

经过几天的讨论，大会一致通过《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关于会务

① 《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会开幕志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6日。

工作报告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改进学生本身利益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农村工作问题决议案》、《为东南伪学生联合会事告全国同学书》以及两则通电。

7月21日，大会选举了第九届全国学生总会执行委员会。7月24日，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上海刘荣简、北京段纯、广东潘行之、湖北包泽英、江西邹努为正式常务委员，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代表为候补常务委员。常委分工为：上海刘荣简分管总务部、湖北包泽英分管组织部、湖南李绶弦分管工农商部、江西邹努分管宣传部、福建林隶夫为秘书长。

8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反共活动加剧，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改组各种群众团体，全国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均被通缉，于是全国学联被迫停止活动。

由我党领导的第九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结束后不几日，南京国民党御用的学生总会代表大会也于8月1日在南京金陵大学举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胡汉民、吴稚晖，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叶楚伧，蒋介石代表陶树模等都到会发表训词，大会还通过了学生会章程，选举了15人为执行委员。

这一学生总会虽然也以反帝反军阀为旗号，但公开采取拥蒋反共立场，同时也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宁汉合流后，表示拥护蒋汪合作，但反共立场始终未变。因此，它完全是南京国民党的御用学生总会。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各种政治派别的斗争错综复杂，学生也不可避免地被卷进这些政治旋涡。如果说五四运动后，学生主要是在新的思想斗争中发生分化而重新组合的话，那么现在出现的将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发生新的分化而重新组合，因此这是学生运动的新的转变时期。

第八章　学生救亡运动的初步兴起

一、国民党"党化教育"下的中国学生

1.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把教育当作治国的重要工具，竭力推行"党化教育"。

所谓"党化教育"是把教育纳入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当时的江浙两省积极抢先，浙江省政府还公布了所拟订的"党化教育大纲"，其大纲要求以国民党训练党员之法训练学生，使学生以国民党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接受国民党的指挥而指挥民众，反对共产党及共产党的主张，要求以国民党的纪律为学校纪律，用管党的办法来管教育，例如：在国民党的组织中，只有党的自由，没有党员的自由，在学校中亦应只有学校的自由，没有学生的自由；要求保存中国固有的"好道德"，建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道德"；要求以三民主义之中心思想确定学生的人生观等等。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国民党一夺取政权就立即采取措施来控制教育，所以"党化教育"就是要使学校教育国民党化。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受到了革命人士的抨击，而且国民党内部解释也不一致，怕为"异党"利用。1928 年 5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废止"党化教育"代以"三民主义教育"的议案。"三民主义教育"就是各级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

和各种教学科目，一切教育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它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实质与“党化教育”是一样的。

在“党化教育”方针之下，国民党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借“清党”之名，剥夺教师和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通信、行动等一切自由，开除进步学生，屠杀革命分子。四川当局为镇压共产党，1930年11月成都学生被明令枪决或遭杀害者，达300余人，当时报刊揭露：“军警机关之杀人，既不搜索证据，亦未宣布罪名，凭一连排长之喜怒，即演流血之惨剧。”①

国民党还担心开除、屠杀仍不足以遏止革命思想之传播，为了隔离革命者与群众的联系，往往以“防共”为名，停办或查封学校，解散全体师生。湖南省、江西省1927年下半年明令停办全省中等学校，云南省1928年上半年停办中等以上学校，上海先后查封了上海大学、大陆大学、华南大学、建华中学等，在南京查封了晓庄师范等。国民党限制学生运动，1928年就提出《学生参加群众运动的标准》，1930年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规定学生团体“以在学校以内组织为限”、“以不侵犯学校行政为限”。12月6日，国民党教育部发布《整顿学风令》，“宣布一切罢课、集会皆为非法”。随后蒋介石又亲自签署《告诫全国学生书》，宣称：“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②

为了严格地管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还建立了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学校中的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或公民教员可以随时干涉学生的思想行为，以体罚、记过、开除作为压制的手段。

由于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学校中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学生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对我党领导学生运动是极为不利的，

---

① 《教育界消息》，《教育杂志》第22卷12号。

② 《教育杂志》第23卷第1号175—176页。

但是由于这些措施严重地侵犯了学生本身的权益，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激，因此，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仍然不断爆发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政策，以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2. 济南惨案后的学生反日运动

1928年4月，蒋、冯、阎、桂4派为了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获得妥协。5月1日，北伐部队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向刚进入济南的北伐部队挑衅，肆意屠杀中国军民，甚至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将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捆绑毒打。蔡提出抗议，被日军割去耳鼻；蔡大义凛然，继续怒斥日军暴行，日军又将其舌头、眼睛挖去。蔡公时等17人全部被日军残杀，其状惨不忍睹。7时，日军还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北伐部队有关军事长官。8日，日军炮击济南城，炮火延烧千余家。11日济南为日军侵占。据事后调查，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严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日军任意残杀中国军民的暴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各地学生站在这一怒潮的最前列。

5月5日，南京各团体为日兵惨杀我国军民事件在金陵大学礼堂开会，决议成立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电全国反对日本暴行，学生总会通电全国各学校，一律罢课3日，以资宣传。并组织救国学生军，同时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6日武汉各界组织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电唁蔡公时等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军民，要求国民党严重交涉，与日经济绝交。一时，浙江、徐州、厦门、广州等地的学生都开始反日运动，停课宣传，追悼死难者以及募捐慰劳活动，其中上海的学生界最为活跃。5月6日，济南惨案消息传到上海，各大学学生会纷纷发动学生游行或讲演，上海市学联会召集代表大

会，讨论对付办法，决定7日起一致停课，7、8、9三日全体上街讲演以宣传群众。市学联将各大学分为7个演讲区，各区设演讲地点，并组织好纠察队，同时发起成立反日运动委员会。9日上午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学生反日运动大会，到会学校400余所，学生约10.3万人。大会通过提案："(一)电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二)通电全国对日经济绝交；(三)电请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四)通电全国学生武装起来。"① 在大会之后，全市学生又继续停课宣传。

四一二政变之后成立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原是国民党的御用工具，然而，当济南惨案发生，全市学生的反日情绪高涨时，也不得不出面领导这次反日斗争，他们一方面不得不迎合学生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一方面却又"严防共产党煽动内乱"，因此他们所提出的口号主要是"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誓为国民政府外交后盾"、"打倒勾结外援背叛祖国的北方军阀"等等，这些完全可以为国民党所接受。

但是群众却不会为这些所束缚，随着反日运动的发展，群众中提出了要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对日宣战"等口号都超越国民党的许可。10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委员于佑任、蔡元培等召集南京各团体代表，宣示对日方针指出：主张暂为容忍，先行肃清国内军阀，北伐完成之后，再行一致办理外交，要求学生"力持镇静"。至于要"恢复民众运动"是万万不可的，因为民众运动会给共产党以捣乱与煽动之机。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学生总会发出训令"当此时局严重，不得令学生继续罢课、结队游行及检查商货等"。全国学生总会也即电令各地学联"自文到之日，罢课结队游行检查日货等举动迅即停止"②。为了遏止上海的学生反日运动，派何应钦、叶楚伧两人来沪"指导一切"。11日，南京卫戍部队发出禁

① 《市学联昨开全沪学生反日大会》，1928年5月9日《申报》。

② 《学生总会通令停止罢课游行》，《申报》19285月12日。

令，要“安内先于攘外”、“友邦领事及侨民生命财产仍须加以保护”、“群众游行及不正当之检查仇货等事……自应一律暂停”。[①]一道道禁令下来，学生反日运动至5月中旬就消沉下去了。

在这一学生反日运动中，我党力量因为刚受到严重摧残，没有能起领导作用，但是散布在各校的党员仍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作用。如南京中央大学的党支部10位党员，在支部书记齐国庆同志的带领下，发动群众召开反日大会，齐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还与金大、安徽公学、五州公学、东方、钟英等中学共七八百人举行请愿游行活动，当队伍到国民党政府门前时，共产党员窦止敬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正因为他们站在群众斗争的前列，为国民党所注意，不久就被捕了，齐国庆同志被杀害，窦止敬同志因为身分未暴露，监禁16个月后刑满释放。

1929年3月28日，由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签订的关于解决济南惨案的议定书中，将日本侵略者掠地杀人的罪责一笔勾销，而强调对“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进行“实地调查”，这充分表现了国民党屈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学生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不少地方出现了反日会和反帝大同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同盟青年部，在各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3. 反对大学区制

在济南惨案学潮结束不久，北京学生反对大学区制的学潮又爆发了。

1928年5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规定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一大学区设大学一所，每所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每个大学区设秘书处辅助校

① 《首都卫戍部取缔民众运动》，《申报》1928年5月12日。

长办理行政事务，设评议会为立法机关，设研究院为研究专门学术之最高机关，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及扩充教育处分掌教育事宜。高等教育处下设文、教、法、商、理、工、农、医等学院。这种大学区制是蔡元培仿照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提出推行的，他以为实行大学区制后，教育行政与学术打成一片，教育可以学术化，行政可以独立，事权可以统一。但在江、浙两省实行一年后，遭到强烈反对。

国民党进入北京以后，国民党政客李石曾企图扼杀北京大学的民主传统，7 月 19 日，国民党政府决议将北平国立各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以李石曾为校长，这一消息传出，遭到北京各校的一致反对，特别是北京大学师生为保存北大民主和科学的传统，宣称誓死反对李石曾接管，反对更改校名。李鉴于北方形势不妙，建议改为北平大学，同时成立北平大学区。8 月 16 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开会讨论设立北平大学分区案，蔡元培任主席。他鉴于江、浙地区试行的结果，问题甚多，而北平大学区的设立又与他原来主张实行大学区制的思想相背离，因此表示反对，与李石曾的意见发生正面冲突，但由于李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又曾为蒋介石反共清党出过大力，得到蒋介石的支持，结果通过了李所提出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设立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规定，以北平政治分会所辖的区域（包括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和河北、热河两省）为北平大学区，设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大学本部之组织为文、理、法、工、医、农、艺术、师范等学院，文理两预科及俄文专修馆，将北京大学一院（文科）与保定河北大学文科合并，称为北平大学文学院，二院（理科）称为理学院；三院（法科）与北京法政大学、保定河北大学法科、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合并，称为法学院。任命李石曾为北平大学校长。

由于蒋介石袒李抑蔡，8 月 17 日蔡呈文辞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长、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10 月被批

准。11 月 20 日李石曾北上就任，当他到北平时，北平各院校反对大学区组织的风潮已风起云涌。其中以北京大学学生最激烈。

北大师生组织了恢复北大委员会，多次阻止了国民党政府派员接收学校的企图，反对大学区制，要求恢复原有校名和组织，11 月初发表宣言表示："现我校同学，皆义愤填膺，准备为拥护北京大学作一切之牺牲，绝对否认北平大学关于北京大学之一切命令，倘有人不顾一切，悍然前来，则枝节横生，负责有人。"学生中还先后建立了"复校团"、"救校敢死队"、"武力护校团"等护校组织。11 月 15 日，全体学生大会决议成立学生会，21 日学生会正式成立后，因多次派代表交涉学校经费都无结果，遂决定 29 日集合游行示威。这一天，北大学生 500 余人手执"打倒北平大学"、"北大独立"等旗帜，来到怀仁堂西门的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要求负责人出见，遭到拒绝后，群情激愤，捣毁了办事处，砸碎了"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个牌子。随后学生队伍又到李石曾等人的住宅示威。

国民党北平地方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公然要以武力挟迫北大师生就范，"饬令迅速查拿北京大学学生暴动为首之人"，并下令限期以武力接管北大。在此之际，他们还指使少数学生，秘密组织上课促进团，反对复校委员会，张贴"铲除暴徒"等反动标语，妄图破坏护校斗争。12 月 2 日清晨，李石曾派军警数百人保护接收人员乘汽车往北大接管，这时正在睡梦中的学生被惊醒后，即按原定的鸣钟打铃为号，分区抵抗，军警和接收人员都被赶出校外，学生群立门前高呼口号，对陆续派来的军警发表演说，劝他们不要为李石曾之流的无政府主义党徒学阀卖命。双方相持数小时，军警不得不悻悻离去。国民党武力接收的阴谋破产了。

武力接收失败后，李当即以下列 4 项通告北大学生：

"(一)本大学奉国府令组织，如违抗即反国民党；(二)保存北京大学旧名，有封建腐化之嫌；(三)护校重在精神，不在一字名称；

(四)接收后立即开课,学生以前轨外运动概不追问。"① 同日,北平政治分会市府将北大学潮为首者速拿法办。南京教育部进行政治威胁,要北大学生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但北大师生仍然坚持复校斗争,派出代表南下交涉。经蔡元培调停,1929 年初,南京教育部不得不表示让步,名称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在反对大学区制的斗争中,北京师大学生也是一支生力军。按《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规定,原北京师大改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原女师大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校,专收女生。1928 年师大经费紧缺,依靠抵押校产拖欠借债度日,学生向大学区当局请愿要求学校独立,增加经费,恢复公费(高师改为大学后,学生除不交学费外,其他改为自费),但毫无结果。1929 年 2 月 2 日全体同学赴北海团城,向大学委员会请愿,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代主席张继和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多方刁难,学生激怒之下,冲入院内。张、李被迫答应拨给临时经费与公费,但事后竟不算数。2 月 19 日,开全校大会,群情激昂,会后去北平大学办公处请愿,请愿学生与守门的军警发生冲突,学生 13 人被打伤,大学委员会和大学办公处的木牌被砸碎,学生 5 人被捕。20 日师大全体学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

鉴于反对大学区斗争的激烈,1929 年 6 月 17 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议决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8 月,恢复北京大学原名,蔡元培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师大改为北平师大也完全独立。至 9 月,大学区制全部结束,先后试行两年的大学区制,至此完全取消。

4. 国民党改组派与第十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① 《新闻报》1928 年 12 月 2 日。

国民党自“清党”以后，地主、资产阶级政客和党棍打着国民党旗号结党营私，造成国民党派系丛生，小组织林立。1928年夏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就是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国民党改组派自称“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确定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帝是它的“坚强纲领”。但实际上，改组派的领导核心是国民党官僚政客汪精卫、陈公博一伙，在叛变革命以后，在与蒋介石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失利，于是抓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的巨大影响，倡导重新改组国民党，要求掌握国民党中央权力。国民党改组派的基层组织是以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其中有不少学生群众。在大革命时期，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但表现动摇和软弱，在大革命高潮中，他们害怕工农革命胜利，怕共产党、怕流血牺牲，有的脱离革命，有的消极观望。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不满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又没有勇气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处于愤激和徘徊、彷徨、苦闷之中。1928年春，陈公博、顾孟余到上海，以法租界为据点办起《革命评论》和《前进》两杂志，发表一系列的反对独裁、鼓吹改组国民党的文章，他们欢欣鼓舞，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派组织。陈、顾等为了国民党改组派作组织准备，在上海创办了大陆大学。

改组派以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汪派委员组成全国临时领导机构，总部设在上海，各省设支部。他们利用国民党原有各省市的地方组织发展势力。很快在南京、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等省成立了国民党改组派支部，海外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及香港都设有支部，仅南京支部所属就近70个小组，人数最多时达500人。全国成员最盛时达万人以上。

1928年6月，南京政府北伐讨奉胜利后，暂时联合的蒋、桂、阎、冯4系的矛盾又尖锐起来。蒋介石企图削夺各派地盘和兵权，

以独揽中央大权，冯、桂、阎对蒋皆不满。国民党改组派等也在为争夺国民党中央大权而四下活动，利用青年学生的反蒋情绪，作为竞争的重要工具，是其活动的一部分。

1928年春，南京国民党多次强调停止民众运动。5月济南惨案发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同时就提出恢复民众运动，广大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政府压制学生反日运动和与日外交交涉中的妥协态度不满，当时的上海市学联就公开与南京的全国学生总会取对立态度。7月，上海学联提出召开第十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全国学总会。其理由有二：一是九届大会所选职员均已任满，按总会章程每年召集代表大会；二是党国潜伏之危机日深，应即召集大会共策进行方针。南京的全国学总会发出通告，攻击上海学联"为少数人操纵"、"毁灭学生组织破坏学生运动"。于是上海学联驳斥总会通告，指责学总会职员王开基等在济南惨案之后"压迫学生运动"、"经济不公开"、"已经脱离学籍"，是一些腐化投机分子。因此决定自动召集全国学生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得到江苏、浙江、湖南、济南、河南、广东等10余处学联的支持，在上海开了几次筹备会议。

对此，国民党政府显然是不支持的。8月初由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出宣言，提议取消青年运动，理由是"全国已在青白旗下，应使学生安心读书"。上海学联一面反对蔡元培取消青年运动的提议，一面积极筹备十大。经过几次筹备会议，于9月2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正式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上海、北平、山西、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河北、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20余人。3日上午讨论各地议案。这些议案集中反映了国民党改组派的要求，如《敦请汪精卫先生回国，主持党国大计案》、《呈请中央严禁无政府党、西山会议派、共产党、第三党、国家主义暗中活动煽惑青年案》。不仅如此，国民党改组派利用这次大会攻击蒋介石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大会闭会宣言中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妥协，是违背总理

遗教的，是革命政府“莫大耻辱”，是“显然欺骗民众的外交”，在内政方面“军阀之势力犹潜，土豪劣绅之横行，贪官污吏之肆虐，封建思想之延……足以证明革命之危机。”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民众运动政策进行激烈的抨击，说：“停止民众运动”、“取消青年运动”等等是“反革命的主张”，是反动势力对“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袭击。

当然这次大会的议案中，也有些是反映了青年学生爱国的民主的要求。如《关于民众运动及反对取消青年运动案》、《呈请中央保障革命民众的宣言、出版完全自由案》、《呈请中央自动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请政府从速解决济南案》、《通告全国同学永远不买日货》等等。

这次大会于9月4日结束，选举了执行委员会11人，监察委员3人，会址仍设在南京。这个学生总会也是脱离学生群众的，实际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1929年3月决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月上旬，全国学生总会已经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好代表。准备在10月中旬开会。

还在是年8月，中共中央通告就估计到：“在这次大会中，国民党改组派一定有不少的活动。因为他们向来要依靠学生群众为其主要的力量，他们一定要与南京派国民党争取这一大会的领导权，以求便利于他们将来的发展。……在目前蒋介石拼命打击改组派的时候，他们也许有比较剧烈的斗争。”根据这种估计，通告指出：“无论学生群众接受国民党任何一派的影响，实际都可以减弱学生群众革命的倾向，使他们又徘徊迷惑于反动的或改良主义的旗帜之下。所以我们的党必须设法加入这一次大会，打破敌人的企图，并且号召全国学生群众以行动反抗黑暗专制政治。这样我们党的影响才能扩大到群众中去，才能扫除敌人的反宣传，更促进广大学生群众走入革命的路上来。”为了加入这次大会，要动员学生反对国民党指派代表，力争民主选举，党员要努力在无党群众中活动，

提出自己的纲领，以争得当选代表，“决不应放弃选举的竞争”。①

党中央通告的估计是正确的，策略也是对头的，它改变了两年来对学生运动的消极态度。

由于国民党南京派与改组派的激烈斗争，尽管有些地区的学联代表已准备启程赴南京开会，但是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于10月14日勒令停止。于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基本上是一年一次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就此中断。

二、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 九一八事变和全国救亡运动的兴起

1929年秋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后，其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化。日本政府为了转嫁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困境，又加速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东北军奉命：“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②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0余万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大片土地迅即沦陷。日军于19日晨占沈阳，同日又占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20座城市，掠地千里。一周时间内，

① 《中共中央通告》第43号1929年8月6日，《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第6集103页。

② 《九一八事变真相》，《革命文献》第34辑第879页、882页。

辽、吉两省基本丢失，至1932年2月，东三省全部沦陷。日军在攻占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大片国土的沦丧，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全国性的抗日高潮蓬勃兴起。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召开了抗日救国大会，1931年9月23日，南京工、农、商、学、妇女等各界各团体10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反日救国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26日上海各界民众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强烈要求对日宣战，武装群众和惩办失职、失地官吏，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28日，北平各界召开了有250多个团体约20多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抗日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在上海，9月24日首先有3.5万名码头工人爆发了反日大罢工，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迫使满载煤炭、器材、货物的大批日本船只只得停靠码头，上海23家日本纺纱厂工人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酝酿同盟罢工，日本商号的店员和私人雇佣的佣工都陆续离去，此外各大城市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也都掀起了抗日浪潮。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工义勇队、邮工宣传队进行抗日活动。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由浦口北上，沿途宣讲日军侵华暴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10月2日，广州工人群众因进行反日宣传和警察冲突，将一部分警察包围，夺取了他们枪械。在此期间，香港的中国工人也不断地举行抗日示威，并和阻止示威的英国巡警发生数次的斗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的爱国活动。

在日本侵华的威胁下，在全国抗日救国高潮的激励下，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深明民族大义，提出各项抗日主张。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9月23日，为日军侵占东北，要

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潮中，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更是波澜壮观。

2. 波澜壮观的学生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学生们虽然非常震惊，但是，对于事件的真相还来不及弄清楚，更不知道是蒋介石下的绝对不抵抗命令，大多数学生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是罪魁祸首，因此，要求国民政府罢免张学良和其他不抵抗的军官，明令出兵抵抗。在这种状况之下，学生救亡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向国民政府请愿。9 月 20 日，南京各大中小学 2 万余学生首先向国府请愿。9 月 25 日以后，各地学生络绎不绝地涌入南京，到 9 月底，仅上海一地到南京的学生就有 3000 多人。他们向国民党政府先后多次请愿，都无结果，9 月 28 日，京沪 2000 余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不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他们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王于纷乱中从窗口跳下，躲进了医院。以上是第一次请愿浪潮。

平息了一个多月，从 11 月中旬开始，又出现了第二次请愿浪潮。

11 月 9 日清晨，驻天津的日本领事向中国驻军提出抗议，谓日军一排长被中国兵打死，限令中国军队迅速撤离日租界 300 米之外，否则采取严厉手段。虽然中国军队按日方限令撤退，但 6 时半，日军还是用炮向市区轰击，午后又炮击，中国居民死伤 200 余人。在日本唆使下，10 日深夜 11 时至 11 日凌晨 5 时，天津便衣队由日租界冲出，发动武装暴乱，与警察发生激战，同时，日军开炮并有铁甲车相助便衣队，天明后，暴徒全部退入日租界。由于连续发生暴乱事件，天津、北平宣布戒严。

天津暴乱事件激起了平津学生的愤怒，他们决定罢课，上街进行反日宣传，并派300余代表南下晋京请愿。国民党教育部曾发布命令禁止学生晋京请愿，但禁令不仅没有阻止平津学生请愿代表团南下，而且，它一下就引发了全国学生的反日怒潮。上海、无锡、苏州、镇江等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至11月底，汇集南京的外地请愿学生达2万人。在第一次请愿时，学生们曾被国民党的"力争外交"、"镇静从事"，等待"国联公判"等言词所欺骗，但是事实上，国民党的外交是依赖国联，虽然在这期间，国联曾作出过两次制止日本的决议，但都被日本拒绝，最后，由英法美操纵的国联完全袒护日本侵略，企图将日本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只说是要派调查团来东北调查。这样，学生们对国联的幻想也破灭了，由此认识到只有自己起来，督促政府迅速出兵收复失地。因此，督促政府出兵就成为这次请愿活动的中心。

面对请愿学生，蒋介石只能用一些谎言搪塞，一时说："三年之内就要收复失地，如果三年后失地不复，当杀我以谢天下"；一时又说他自己就是岳飞，岳飞要北上抗日，只因为后方不"统一"，还不能北上抗日。到11月19日，蒋介石为了抵制粤派汪精卫要他下野的要求，他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忽然诡称："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于是，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趁机发起"送蒋介石北上"的运动，各地学生又闻风兴起，陆续赴赴南京。11月26日，上海学生会同南京学生结队到国民政府前，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国民政府对马路架起一座大钟，日夜不停地敲打，表示警钟长鸣，"不答应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政府"。这天又逢大雨，天气骤寒，学生在凄风苦雨中鹄立一天一夜，冻倒多人，但学生的情绪高昂而不散。27日下午一时，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他看到群情愤激，众怒难犯，无奈中说："我……我三天以后，宣布出兵抗日"。学生们要他签字时，他借口"回去写"而乘机逃脱。不多时，由张治中拿着蒋介石写的"手谕"出来了，"手谕"上尽说些"本主席效忠党国，早具决心，

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望诸生转告各同学，安心求学，拥护政府，各尽天职”[①] 之类的空话。

蒋介石的欺骗是不能持久的，3 天，10 天过去了，国民党政府仍然没有下令出兵抗日，广大青年学生不再认为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守土长官的错误，他们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是不会抗日的，对已经丢掉的东北三省是不想收复了，于是，学生们感到要抗日救亡必须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抗日与反蒋两者不可分离。这样，学生运动由合法的请愿活动走向更高的示威斗争。

11 月下旬，日军占领黑龙江省后，开始向辽西锦州地区进攻。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担忧日本的行动会危害它们的利益，因此，由美国出面，积极策动在锦州建立“中立区”。11 月 25 日，国民党政府令其驻国联代表提出把锦州划为“中立区”，并由英美法等国派军队驻扎的建议。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愤怒指责锦州“中立区”的提议。

12 月初，北大 230 余人组成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决定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公开示威，提出“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利益”、“反对划分国际共管的中立区”、“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视北大示威团如大敌，派出大批军警包围示威团，逮捕 200 人，囚禁于孝陵卫；学生绝食，军警用绳子捆绑学生，强迫押送回北京。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闻讯，立即召开援助北大示威团的全体大会，并迅速组成中大示威团，出动街头，表示抗议，南京各中等学校也参加了这一行动。示威团的 3000 多学生突破警戒线，英勇地冲开了卫戍司令部的两层铁门，直入司令部院内向反动当局提出质问，一直坚持到深夜才归。

北京大学示威团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上海、杭州、徐州、济南、

① 《申报》1931 年 11 月 28 日。

广州等地学生陆续赶赴南京，声援北大被捕学生，而且都把请愿的旗帜一律改为示威的旗帜，酝酿着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上海市1.5万名学生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营救被捕同学，于12月7日举行总示威。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代表大会开会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警察局公然指使特务闯入会场捣乱，将从南京来的北大和中大学生代表绑走。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数万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并在市府门前坚持了一夜。学生们向市长张群提出："不许压迫抗日运动，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凶手及主谋"。第二天上午，终于迫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释放了学生代表，并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10日，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由学生推选了审判长、推事、书记官，由各校学生义勇军自任法警，公审凶手。人民法庭又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警察局长陈希曾，并加以通缉。陈、陶在群众威力面前吓得全家逃匿。11日，市长张群被迫引咎辞职。

在全国学生爱国运动高涨的同时，汪精卫、胡汉民等反蒋各派也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电促蒋介石下野。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迫于大势，决定批准蒋介石辞职。蒋介石下野后，由汪精卫主政。16日，各地赴南京学生示威团电汪精卫，质问新国府当局能否与日宣战？能否收回失地？能否退出国联？能否惩办张学良？若不能，抗日民众将与对待原执政者同等对待之。

12月17日，全国各学校联合大示威发动，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赴南京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共3万多人，组成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高举着示威团的大旗，大家高呼口号："立即出兵抗日"、"收复东三省失地"、"反对不抵抗主义"、"反对卖国的外交政策"、"反对压迫爱国运动"。队伍经中山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奔向国民党政府门前。市民们也从家里涌向街头，年轻的纷纷加入队伍，与学生们挽着臂膀，并肩前进。队伍走过中央日报馆，因为《中央日报》几天来污蔑南京示威同学为"暴徒"，且天

天宣扬不抵抗主义，所以愤怒的群众一下子就冲进去，编辑们已经躲藏起来，学生们就将编辑部和排字房捣了个稀烂。这时，国民党政府派来了大批军警，在珍珠桥附近向徒手的学生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军警们端着刺刀向同学们刺来，高举着示威团旗帜的同学，第一个被刺伤，接着好多学生倒在血泊里，十几分钟，有30多个学生被刺死，受重伤者100多人，死难者尸体有的被扔到河里，抗日青年学生的热血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

国民党虽然严密封锁了珍珠桥惨案的消息，但是仍然未能阻止这项消息的传布。各地教员、学生、市民在获得这一消息后，都为死难者集会追悼。

珍珠桥惨案的第二天，即12月18日，山西太原国民党省党部也命令军警开枪射击学生和工人，造成惨案。太原市各学校即于19日起罢课。12月24日，上海学生、工人、市民抬着死难者的棺木举行了10万人的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由九一八事变而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造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危机，形势对革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被王明路线统治着，采取了"左"倾政策，使革命的有利形势很快就丧失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也被国民党镇压了。此后，"爱国有罪"、"莫谈国事"的沉闷空气笼罩全国。

3. 党的学生工作路线的左倾错误

从1929年国民党禁止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起，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已不存在，各校的学生会及济南惨案之后各地成立的各种反日会的领导权并不在我们党的手里，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从组织上讲并不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但是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在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的南下示威团是抗日救亡高潮中的一支主力军，这个示威团，冲破北大旧学生会以及由学生会组织的抗日会的限制和破坏，以党团员为骨干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决定南下示威，成立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示威团分文书、交际、宣传、纠察、总务5个股，印发《告民众书》，南下示威宣言就是由文书股的千家驹起草，他当时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读书的共产党员陈沂同志担任示威团的纠察队长。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为核心的北京学生南下示威运动，一开始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各左翼文化团体广大盟员的积极参加下进行的，刘德成是中共北平市委直接出面领导的负责人，具体执行领导的是王荫槐，从日本回来的大林和陈沂、薛迅（平大艺术学院团支部、左联支部）也参加了领导。

中央大学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重要阵地，因为在这期间它接待着各地来的学生请愿团和示威团，同时以该校为核心，组织南京的及全国赴南京学生一次又一次开展斗争，中央大学的地下支部在这中间曾起了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共产党员汪楚宝，在9月下旬的请愿中，冲进外交部，摘下了外交部的牌子，摔在地下将其踩断。经过多次请愿无效至10月下旬，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看出国民党是不会抗日的，也不会收复东三省失地了，而且由此对御用的学生会、反日会也很不满，于是成立了各校的抗日救国会，以后又成立了首都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些抗日救国会中，虽然国民党御用的学生会头头占多数，但地下党的学生党员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已经渗入这些组织，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杨晋豪、王枫、狄幽青（即获超白）等同学都参加了中大的抗日救国会，成为骨干力量，王枫、胡济邦提出了入党请求，后来党组织在示威途中讨论通过了常伦同学的入党要求，王枫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与汪楚宝等都被选入南京市学生抗日救国会，汪楚宝被推为主席。上海交大的地下党员许邦和、乔魁贤等在运动中都起

了骨干作用。

12月17日联合大示威，当队伍到中央日报社门前时，交大学生共产党员许邦和、张云源等首先愤怒地捣毁了报馆挂的牌匾，随后200余学生冲进报馆大门，中央大学的王枫也冲在前面，后来军警开始屠杀，她躲进了一个小商店，逃至成贤街恰遇她哥哥王昆仑的小汽车，才得以脱身。

虽然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但就整个路线来说，因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得当时的学生工作路线也同样存在着左倾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否认民族矛盾的上升，反对"一致对外"的口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并在平津暴乱，已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已经是国内政治的主题。党、团应该积极地领导全国高涨的学生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争取政治民主。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却仍坚持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路线，认为现在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因此，要求"尽量开展和利用学生的争斗，与红军的英勇行动呼应和配合，将毫无疑义的促进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①

由于对形势和任务的错误认识，所以当时团中央所发的通告说："一致对外"是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蒋派、新月派等等进行的武断宣传，它"阻碍学生群众的左倾过程，而缓和学生群众的革命情绪，藉以挽救其垂死的命运。"还说："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有意无意之中，将校内的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要求的斗争都取消了，并无加紧学校的斗争"。②

应当指出：当时所谓"一致对外"，主要是指国民党宁粤两派停

① 博古：《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18页。

② 《关于目前学生运动的形势与团的任务》团中央通告1931年12月1日。

止内战，和平统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还没有人敢直接提出停止国共两党的内战。但是，“一致对外”的口号反映了客观形势的要求，同时也是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相对立，因此，这一口号为广大学生所赞同，我们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的反革命性质，以争取广大群众，将“一致对外”的口号引导到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战争的道路上去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1932 年 5 月，废止内战大同盟的成立，要求废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一历史史实就足以证明这一可能性。可惜，当时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的不是我们党，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由此可见，“一致对外”的口号，不但不会阻碍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下，唯有这个口号才能巩固和发展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要求学生采取“直接的斗争方式”，反对合法斗争。

12 月 1 日，当第二次请愿浪潮过去后，团中央发出第 7 号通告，通告认为：前一段学生运动“并未脱离合法的狭隘思想的影响，不能采取直接的斗争方式来求得反帝运动力量和学生运动的自由的胜利，而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愿方式及其他的合法运动，在这样的范围之内，是得不到真实的革命学生运动的展开和巩固的”。①

这种看法，是轻视合法的请愿斗争，而这在当时是完全脱离群众的。大革命失败至九一八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的严格控制，学生革命情绪低落，而且在运动的前期，学生中大多数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因此只有合法的请愿斗争才能为广大学生群众所接受，党和团要在运动中争取群众，必须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参加请愿斗争，同时逐步地打破学生对国民党的幻想。事实上，学生经过多次请愿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539 页。

无效，才明白国民党的基本政策是不抵抗主义，国民党政府是卖国的政府，所以在12月以后，便由合法斗争发展为示威运动，而且是北平、上海、济南、江苏等几万人的总示威。

当时左倾机会主义所说的"直接的斗争方式"是指什么呢？这就是他们所喜好的总示威、暴动，冲击国民党党部、国民政府，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

12月9日，上海学生出于义愤围困国民党市政府，10日组织民众法庭。15日，博古在《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一文中赞扬说："它是政权的最初萌芽，这个特殊的政权，不依靠法律产生的，直接依据于群众的拥护和力量之上的民众代表的组织，它压迫着反革命的统治机关执行自己命令，撤销警察局长，释放被捕领袖，通缉党部委员"。① 有的同志也赞扬说："这一民众法庭，在它存在的十八小时中，简直发生了临时政权之作用。"②

据此，他们认为学生运动面临着一个"转变"，即"是在从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转变到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上去；是在从和平请愿等方式转变到直接地坚决地向反动统治堡垒作总的进攻上去。"③ "团的任务在这里就应该加紧对于苏维埃政权之宣传与进行实际工作。我们必须反对在现在有许多学校中不敢提出这个'政权'问题来的右倾观点。"④12月21日，珍珠桥惨案后，学生运动已经低落。可是团中央通告直截了当地提出要"领导他们(贫苦学生群众)一直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⑤ 要建立政权，就要武装力量，武装力量从哪里来呢？"将义勇军变成半武装的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15页。
② 石帆：《此次学生围困市政府行动之意义》。《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08页。
③ 博古：《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14页。
④ 阿丙：《在转变途中之中国学生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12页。
⑤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42页。

贫苦学生的组织。”

以上种种，都是极左的错误估计。学生示威、冲击国民党政府机关、组织民众法庭，显然是请愿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学生所痛恨的仅仅是那些压迫学生救亡运动的个别人，个别事件。上海学生一方面组织民众法庭公审凶犯，通缉警察局长等，但另一方面又挽留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要他收回辞呈，而且在民众法庭的组成上，虽然有地下党员和左派学生参加，但也有国民党派的学生参加，因此它并不是什么“特殊形式的政权”。至于要引导学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主观臆想，而且学生的大多数是不可能接受的。学生义勇军虽然在各校普遍组织起来了，但并不是武装的半武装的组织，义勇军的训练完全在国民党指派的军事教官掌握之中，而且学生参加义勇军是作政府抗日的后盾，想通过学生义勇军去推翻国民党政权完全是一种奢望。

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方式”既然不能被大部分学生群众接受，最后便只能是少数人的盲动。这样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导致严重的失败。

第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错误。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兴起，各校开始成立抗日救国会，北平、天津、太原、南昌、南京还出现了全市性的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学生则有上海大学生和中学生两个抗日救国联合会。11月初，由天津、河南、北平、山东、江苏、南京、上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市学生会代表6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此外，各地各校还陆续组织了学生义勇军。

这些学生组织是公开的合法的，当然就免不了有国民党各派势力介入其中，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学生组织的崛起本身已经冲破了国民党颁布的学生自治会组织法规的限制，不仅超越学校界线，而且跨越省市界线而形成全国性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都是爱国的，9月下旬和11月中下旬两次请愿浪潮的主要组织者是它们担

当的。正因如此，所以它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在许多公开的学生会中，大都是国民党各派的御用组织，不能成为革命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而且全是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蒋派、新月派等等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认为南京成立的全国学联"不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全国学联，而是压迫学生运动的走狗机关"。①

由此，他们认为，必须"努力地发展、改组和推翻现在各地被国民党走狗及买办阶级把持的各界抗日救国会，而以工人、学生、农民、士兵的反日救国会的代表会议代之。"② 在学校中，就要进而团结其他左倾、中立的分子在我们影响之下进行各学校的改组运动，将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的领导分子打下去，以我们的同志和同情者代替之，实现在组织上来巩固我们政治上的胜利和坚固的组织领导。"③ 这完全是一套关门主义的策略。

当时，他们提出了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在学生运动中的具体执行便是只团结贫苦学生，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提出学生运动的重点应放在中小学生中。团中央第十号通告就这样说："团的任务，是领导贫苦的学生群众起来斗争，在他们之中宣传苏维埃，指出只有苏维埃是贫苦学生的唯一出路，团在学生中的工作，尤应转变到中小学校中去。"④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反对一切合法组织，坚持秘密的小团体主义，因此，在持续数月的学生运动中，没有能够很好地团结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走出狭隘的小圈子，更没有能将运动初期出现的分散的学生组织建立坚实的统一基础。这正是这次学生运动很快夭

---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十)第104页。

② 博古：《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

③ 《我们准备彻底地努力完成这个"转变"》，《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21页。

④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九)第642页。

折的组织原因。

此外，左倾机会主义还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武装保卫苏联等等脱离学生群众的错误口号。

在分析党对学生工作路线左倾错误的同时，我们必须肯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九一八事变后，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团中央也发表《为满洲事件告全国青年书》，号召青年工人、学生、农民、士兵、店员以"罢工、罢课、罢操、罢市，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这些号召对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三、救亡运动新思潮的酝酿

1. 左翼文化运动对学生的影响

国民党为了维护其买办豪绅阶级的利益，巩固法西斯独裁政权，对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文化艺术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妄图以此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行"新生活运动"，宣扬封建主义的"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文学方面，竭力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攻击主张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文学。他们所采取的是强制手段和恐怖政策，查禁进步书刊是其惯用手段。1934年2月，仅上海一地，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的理论著作和文艺书籍共有140种，想以此来钳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更进一步则是逮捕、监禁和屠杀革命文化工作者。很多优秀文化工作者被逮捕、暗杀，鲁迅、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被迫害和恐吓，特务横行，冤狱遍于国中。在学校则强制推行"新生活"运动，加强军事训练和童子军训练，提倡尊孔读经。从1934年开始，要求学校普遍举行纪念孔丘的活动，曾国藩的

家书也被选为中学教材，以此来禁锢青年学生的思想。总之，“凡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所提倡的理论、方法，设立的机关，领导的各项运动，均应铲除。”①

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里，英勇地领导左翼文化战士开展革命文化运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文化“围剿”斗争。

1929年秋，党中央宣传部为了加强对白区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潘汉年任文委书记。“文委”成立后不久，在党的领导下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与此同时，其他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其中有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世界语联盟等。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些文化团体，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文总”共拥有数千盟员，鲁迅是旗手，形成了一支文化新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

左翼文化工作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创办许多进步刊物，积极传播革命思想。1929年前后，他们翻译和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40种。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译著，共150多种。电影方面实际上控制编导的领导权，音乐方面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等形成了救亡歌咏运动。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表现为一败涂地，而左翼革命文化却

① 《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国闻周报》第五五期，1928年2月5日。

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救亡运动的高潮虽然很快被国民党镇压下去了，但是学生们胸中的火焰仍在燃烧着，于是，他们暂时离开政治斗争而从事文化活动，细心进行理论的探讨。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学生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以及中国农村性质问题的讨论，像磁铁般吸引着青年学生，左翼社会科学家写的《中国经济性质》（潘东周）、《中国土地问题》（吴黎平）、《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中国的商业资本》（向省吾）、《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王学文）、《中国劳动问题》（李一氓）等文章是学生们热心钻研的读物。一时间，社会科学书籍成了热门，而出售社会科学书籍的老板也大发其财。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杂志不能出，左翼文化工作者主要通过几个学校，如大夏大学、法学院的校刊和研究会来组织出版。

学校是主要的宣传阵地，在党的领导下，“左联”办过泉漳中学，被查封后，“社联”和“左联”合办了华南大学，由潘梓年主持，后来又办了浦江中学以及文艺暑期补习班等各种补习班。华南大学查封后，一部分同学转入中华艺大，那里也都是“左联”的人去上课。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多数是进步青年、党团员，所以一般时间都很短，有的只有 50 天左右，但是它是有力的宣传阵地。

左翼文化工作者为广大学生所欢迎，不少大学经常请他们去讲课、讲演，如群治大学请国民党人士上课，听众寥寥，有时甚至一堂课才两三个人，有时一个也没有。“左联”和“社联”的人去上课就不同了，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当时的中华艺大、上海艺大、法政学院、中国公学、法学院等校都经常请左翼文化工作者去上课。大夏大学请鲁迅演讲，不仅大夏的学生，有的别校的学生也赶去听讲。

左翼文化工作者也以学校为演出的重要阵地。如“剧联”领导的大道剧社就经常和各大学的学生剧社联合演出，有一次，苏州东

吴大学学生会请他们去演戏，整个礼堂挤得水泄不通。

田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去大道剧社商谈排演抗日救亡的戏，随后他就写剧本，边写边印边排，从20日到24日剧本写好，戏也排好。当晚就在真如的暨南大学与暨大剧社联合公演，获得了全校学生的欢迎和好评，这就是第一个救亡戏剧《乱钟》的诞生。

左翼剧社基本上掌握了电影剧本的编导权，抗日救亡的电影风行全国，其中一些救亡歌曲，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不仅在广大学生中流行，而且由他们很快影响到工人、店员以及一般市民群众。

总之，左翼文化运动，不仅是青年学生吸收新思想的源泉，而且在它的影响下，培养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学生，成为领导学生救亡运动新高潮的领袖，成为党和青年团的重要骨干。

2. 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的涌现

1931年以后，各地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的出现，是学生运动的一个新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救亡运动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镇压了，但是接着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1933年初长城内外一大片国土的沦陷，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普遍地活跃起来了，全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再次被激发，不过这次并没有像九一八以后那样搞请愿示威，而是转向实际的行动。例如上海十九路军起来英勇保卫上海时，学生也加入了战斗，这里不仅是上海的学生，而且有远道而来的外地学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冯庸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战壕中与士兵并肩作战，组织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1933年初，日寇进攻长城各口，平津的学生不但慰劳伤兵，而且跑到前线将大刀赠给抗日的二十九军士兵，南方的学生也在后方进行募捐慰劳。即使是这样的行动，国民党也恐惧，蒋介石发

布“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禁令，在各学校，用“读书救国”的口号压制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些进步学生已经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要寻求救亡的道路，这是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涌现的客观环境。

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学校的党组织虽然遭到破坏，但是，不少党团员仍然坚持革命斗争，他们像火种，在学校里点燃着爱国学生的胸中烈火，这些党团员往往成为各种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的发起者和核心。

左翼文化工作者所掀起的革命文化运动，吸引了广大爱国进步青年，而且很多“左联”、“社联”的小组，开始就是以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的形式出现的。因此随着革命文化运动的深入，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的活动也自然地活跃起来。

在北京，北大有曙光读书会，北师大有今日读书会，中国大学有绿洲社等等。而且北京“左联”的支部分散于北大、清华、燕京、香山慈幼院、平大艺术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及其附中、宏达学院，28 中等地，一个支部一般三五人，燕京大学人最多有 10 人。有的读书会专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如 1930 年北平大学法学院三院学生于伶是共产党员，苏州暴动失败逃到北京，考入法学院，加入了李三楼、张鱼、赵翅生等组织的读书会，专门从当时的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的三两家小书店买《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禁书，偷偷地阅读，热烈地讨论。之后这个读书会的不少成员参加了北平“左联”。1932 年“剧联”北平分盟成立，于伶同志又任执行委员、研究部长。

中国大学的绿洲社则是文艺团体。1933 年暑假，王西彦考入中国大学。当时一些不见容于各国立大学的进步教师，如经济系的李达和陈豹隐、政治系的黄松令和刘侃文、历史系的吕振羽、国学系的曹靖华都在中国大学任教。学生方面空气也很活跃，不久王西

彦就和鲁方明、夏英喆等人发起组织绿洲社。名义上是国学系学生为主的文艺团体，但也有别系甚至外校的同学参加，吴泽和王大彤后来也相继加入。绿洲社经常举行座谈会，有时是讨论文艺问题，有时是敦请校内外的进步学者讲解政治形势，内容包括“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组织实际上是“左联”主持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绿洲社用文艺茶会的名义，团结起一大批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在救亡运动大开展后，文艺茶会就改组成北平文艺青年抗日救亡协会，广泛联系各大学的文艺青年。协会的党员领导人是谷牧和谷锋。

在天津，以法商学院中的党员郝金贵、朱光等为核心，以左倾学生为主体，建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经常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4 年南开中学则有李文达、高云屏、张炳元、梅洛、梁易云、白文治等组织了一个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出版不定期的《野烟》(共出 4 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揭露黑暗、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诗歌、散文、小说。这个社是一个自发的进步文艺团体，没有哪一个人与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但到一二九时期，南开中学重建党组织时，野烟社社员高云屏、张炳元、白文治都首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外，1932 年初秋，张香山就读于中日中学，学校的物理教师艾大炎(兼任天津《大公报》编辑)要他参加读书会，在这个读书会里有南开学生王士钟、王士钧两兄弟，还有《大公报》编辑曹世瑛等一共不超过 10 人。这就是天津左翼作家联盟。

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党的组织虽遭到严重破坏，但是还留下不少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团员。1933 年末，中央大学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翟毅和汪灼华，在南京中学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吸收南中的进步同学参加(还有两位国民党中央军校外语班的同志，一位陆军测量学校的陈文治同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参加读书会的进步同学，还从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中认识了十月

革命后的苏联，从地下党员口头介绍中了解到党的历史和苏区的斗争。到1934年6月，南京中学秘密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当时地下党市委的共青团书记顾清侣，发展了周克、王家珍和李庚3位同学同时入团。8月南京地下党被破坏，他们的组织关系中断了，读书会的活动也停止。不久，李庚等又重建一个以团员为主的小读书会，接着又发展了另一个读书会，许立群（杨成栋）、吕有佩（吕希贤）、叶向云（叶甲忻）、郑代巩等十几位同学都是后一个读书会的成员。两个读书会的成员，都展开活动，吸收进步同学，在学校组织公开社团，争夺班会、级会，并且同校外联系，组织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世界语学会，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学生和职业青年知识分子。1934年秋，李庚进入中央大学念书，与来自各地的受过党的影响或和党有过接触的同学，于1935年上半年组织了读书会。后奕斋（后文翰）、季钟朴、薛保鼎、孙远仁、蓝毓钟、夏林（林家旅）、张刚（张植华）、张式愚、冯秀藻等都是最早的成员。接着，又陆续发起成立了中大学生中日问题研究会和新文学社、二五剧社等文艺团体。其中以中日问题研究会最为活跃，会员多，经常举办中日和战问题的公开讨论，是当时中大最引人注意最大的社团。中大读书会的一部分同志，很快和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的进步活动分子组织的南京读书会发生联系，并同他们一起在1935年秋成立了文化界座谈会。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季洪、狄秋白、陈洪进、汪德彰、薛宁人、千家驹、后奕斋、李庚、薛保鼎、夏林都先后参加。这是一个把老一辈同志和学生积极分子联系起来，并包括文化、妇女、学生、职员各界的人在内的组织，是由老一辈同志原来组织的南京读书会扩大而来的。这个团体实际是1936年成立的南京各界救国会的前身。

在武汉，武大和女师都有读书小组，武大的陈宽、吴月缸、刘佛年、杨光穆、黄美健都是读书小组成员。他们读的是《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禁书，故谓他们是“闭门读禁书”。女师以王日曦为首的

读书会成员，有一批曾遭国民党逮捕。

1932年初，在广州以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女子师范、仲凯农工学校、执信女子学校等学校为基地，以一批留日归国学生和从上海南下的学生为骨干，组成了文化运动总同盟（简称“文总”）在“文总”之下有“左联”、“社联”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中山大学于1932年成立了演抗日戏剧的抗日剧社。何干之是留日学生，他与留日同学有很多来往，因此“文总”和抗日剧社首先在留日回来的同学中活动。1934年陈济棠等勾结蒋介石，疯狂镇压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广州的群众社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无法再开展活动，何干之离开广州到上海，后来又到延安。

左翼文化工作者活动的中心，上海学生与各地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直接参加“左联”、“社联”、“剧联”等各团体，以及直接参加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如武自会等。很多大学都有“左联”、“社联”的支部，如复旦、大夏等。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学生社团和学生读书会不免也受其影响，发生过一些盲目的飞行集会等过左的行动。但是，一方面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的签订，民族危亡日益加深，一方面是因为1933年1月，山海关失守之际，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广大学生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因此各学生社团和读书会的主题是抗日救亡。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活动在广大的学生中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虽然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加紧镇压，但是抗日救亡的思潮不仅扑不灭，而且迅速地蔓延着，1935年底华北危机出现，很快就形成了熊熊烈火，这就导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第九章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一、华北事变和“八一宣言”

1.“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3年1月，日寇占领山海关之后又发动对长城各口的进攻，5月卖国的《塘沽协定》的签订，将华北各省门户洞开，并且在事实上已置于日本的武装监视之下了。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议长酒井等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的被暗杀，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开入关内。日本重要将领也在天津集会，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结果，国民党政府又一次屈服了，6月初，何应钦开始与日方进行秘密会商。7月6日致函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正式承认了日本的要求，其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非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这就是卖国的《何梅协定》。

5月30日，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6月5

日，被当地驻军扣留，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即令释放。但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借此向中国提出种种要胁，并立即调动军队驻屯察哈尔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6月27日国民党代表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这一协定的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系的中国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可以自由往来无阻；取消察哈尔境内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得日本在实际上控制了冀察两省，但日本并未满足，至10月，华北形势更加危险。

10月22日，日本挟持着一部分汉奸地主武装和驻扎冀东香河、昌平、武清、三河等县一批流氓无赖，向香河县城进袭，23日占领县城，组织县政临时维持会，宣称"自治"。此后日本宣传，华北有强大的自治潮流。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抢先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冀东20余县的大片国土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治。11月26日国民党为了向日本表示退让，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派宋哲元为主任。但侵略者的贪心毫无止境，日本又进一步策动冀察政权特殊化。11月底，国内外谣言纷传，或谓冀察两省即将"独立"，或谓华北5省（冀、鲁、晋、察、绥）亦将继冀东而"自治"，国亡无日的危机，沉重地压在华北及全国人民的心上。到12月7日，消息证实了国民党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遴选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本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人为委员，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此时，华北危急已达到极点。

华北危急，古都北平也危城欲倒，城门洞口，大街小巷，都布满了日军岗哨。在光天化日之下，日军竟在东安市场鸣枪抢劫。日本浪人随意绑架女学生，拖到中山公园进行百般污辱后，用手帕塞口，缚住手脚，丢到假山后边的池塘里。日军常在郊区夜以继日地

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农田农舍多被焚毁，居民不断遭到伤亡。北京前门车站，熙熙攘攘，国民党的军政显要携带金银细软和眷属争相南下。故宫的古物，继续南迁。各大学当局纷纷准备迁校，清华大学要迁长沙，东北大学要迁太原，教育界正准备上"最后的一课"。人心惶惶，谣诼纷纭：早上听说下午日军要占北平城，下午又传说晚上来。真是风声鹤唳，人们不知何时大难临头。

北平城内外的大中学生，目睹险象环生的华北局势，忧心如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2. "八一宣言"在学生中的传播

华北危急，国家危急，民族危急，爱国的青年学生忧心似焚，胸中燃烧着熊熊的抗日烈火。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屈膝退让，一再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发布公开声明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反日团体的《邦交敦睦会》，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学生们处于悲愤和屈辱，不安和苦闷的沉闷空气之中，国家的前途何在？学生的前途何在？在教室、宿舍，时而激昂高亢地歌唱，时而沉痛地低吟着流行的救亡歌曲——《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什么是救亡的道路？学生们怎样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怎样冲破沉闷的空气，把覆盖着的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引燃？进步的学生们思考着，寻找着。

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在1933年秋至1935年夏，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后来他专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论坛报》的

自由投稿记者。他同情中国革命，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因此当他离开燕京大学后，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仍常去拜访他，同他谈论中国时局，其中如燕京大学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等人都是斯诺家里的常客。红军北上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也是从他那里听到的，从此，在学生中传播着，成为抗日救亡的鼓舞力量。他们还通过斯诺，请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去上海，转交一封致宋庆龄的信，信中陈述了他们的爱国激情和对时局的苦闷，并请教孙夫人怎么办。10 几天后，王汝梅、陈翰伯从斯诺手中得到了孙夫人亲笔签名的回信，信中赞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斥责了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指出了处在北国国防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这就是孙夫人对学生们的殷切期望。

按什么路线去行动呢？这时学生们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 7 次代表大会，鉴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对世界和平构成的严重威胁，大会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国内发生了反对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救亡高潮，在吴玉章等参与下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后来送交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经共产国际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注明日期为 1935 年 8 月 1 日，故又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① 尤其重要的是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

① “八一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 28 页。

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① 宣言还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八一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它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八一宣言”标志着党从左倾的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恢复通讯联系，“八一宣言”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传到国内，一条渠道是张浩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的委托，向党中央传达和报告共产国际七大的新战略及中共代表团“八一宣言”的内容。张浩跋涉蒙古戈壁，到达瓦窑堡，11 月 21 日先见到张闻天、邓发和李维汉，之后又见到毛泽东、周恩来，这就为党的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策略奠定了基础。另一条渠道是，1935 年 10 月 1 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版第 10 期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报《共产国际通讯》上，均先后刊登了“八一宣言”。北京学生得到“八一宣言”是从这一渠道。当时一个法国人在北京饭店楼上办法文图书馆，一些进步学生到那里去发现了“八一宣言”，真是如获至宝。很快就在学生中秘密地传阅着，地下党的组织也秘密地展开了活动。在清华大学的布告栏上，半夜里公开贴出了“八一宣言”，燕京、北师大、清华等校的教授家里以及学生宿舍的门缝里和洗脸盆里，都有印好的“八一宣言”。北大一时没有收到，陆平就抄好一份贴在东斋的告示牌上。学生们争相传阅，细细地议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能顺应中国青年和中国

① “八一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 28 页。

人民迸发出来的势不可挡的抗日救亡的怒潮，一呼百应，风起云涌。当时的党团员并不多，但是，党的政治影响因为“八一宣言”的宣传，迅速地扩大了，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地向前发展。

3. 从黄河水灾赈济会到北平学联

北京的党组织在1934年曾遭到严重破坏，过去曾在学生中活跃一时的“左联”、“社联”和一些学生社团也遭摧残，大部分都停止了活动。但是保存下来的地下党员并没有完全停止革命活动，他们分散隐蔽在党的一些外围组织中坚持斗争，同群众保持着联系。1935年初，北平的地下党员与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同志前来北平，指定共青团北平市委暂时代替市委工作。不久，组成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成员有王学明、彭涛、冷楚等同志。当时，全北平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有10多人，加上共青团员也不过20余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党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是很困难的，河北省委的意见，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

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田庐被淹，农民流离失所。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皆是。灾民饥贫交困，急需救济，但是，国民党政府视若无睹，这就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义愤。北平临委抓住这一时机，正式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向北平市社会局备了案，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对外公开活动，由彭涛具体领导。

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将20多个曾被敌人搞垮了组织的学校，又逐步地重新集中起来。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大中学校也都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学生们公开在大街小巷开展救济灾民募捐活

动。临委的彭涛、清华大学的牛荫冠、师范大学的杜润生、东北大学的王振乾和杨旭、汇文中学的邓力群等同志携带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党通过救灾活动，团结了群众，为进一步领导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10月，赈灾活动结束，彭涛、姚克广（姚依林）同志希望把黄河水灾赈济会转为北平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抗日救国会。首先是于11月1日，发动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北平汇文中学、私立北平贝满女子中学、私立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私立天津汇文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该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岐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从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宣言吁请国民党政府以"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①] 这一宣言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该校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起草的。宣言曾寄交平津各报馆，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敢发表它。因为它表达了学生的抗日爱国愿望，所以还是广泛地为学生们所流传着。

这之后，华北汉奸的"自治"活动猖獗。11月11日，天津的日本报纸发表了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的消息。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抢先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此时，党决定由党团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11月28日，在中国大学召开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北平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长是清

① 《一二九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页。

华大学的姚克广，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股长王其梅。学联党的领导人是彭涛同志。

北平学联的成立，为党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党就是通过北平学联领导和发动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二、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

1.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北平学联成立之际，华北形势已非常严重，北平临委分析形势，认为必须有所行动。12 月 3 日，北平学联在市立女一中召开秘密会议，统一思想，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12 月 6 日，北大、清华、北师大、东北大学等 15 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北平各校通电》，请求政府："(一)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二)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三)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四)请政府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①

这时有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准备于 12 月 9 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消息震惊了每一个爱国者，眼看华北各省又将继东三省之后沦入日寇之手了，华北将亡，国家将亡，我们决不能坐视。北平临委毅然决定于 12 月 9 日发动学生请愿，请愿不成，即转为示威，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8 日，学生联合会将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路线和组织工作作了部署。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已经酝酿成熟了。

12 月 9 日，古城北平正是严冬季节，千里冰封，寒风凛冽，但是学生们怀着满腔的热血，按预定计划行动起来了。

---

① 《一二九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46、148 页。

北平反动当局已得到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他们加岗设哨，严加戒备，尤其是派了军警包围了学校，但学生们有的越墙而出，有的巧妙地避开军警，有的冲破军警的包围，走上街头，向预定目标新华门汇集。学生队伍分城内和城外两部分。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东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宋黎任该校请愿队伍的总指挥。清晨，东北大学校园内早已沸腾了，同学们不顾军警的包围和学校当局的阻挠，在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宋黎向同学们作简短的动员。这些失掉了家乡、远离亲人、饱尝亡国奴之苦的东北学生，再也不能坐视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被日寇侵吞了，他们斗志昂扬、视死如归般冲出了校门。他们一路上迎接北平大学法学院、东北中山中学等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向新华门进发。北师大、中国大学、女一中以及镜湖中学学生也先后汇集到新华门，2000 学生在这里高举起大旗，挥舞着的标语，在寒风中飘荡。他们唱着救亡歌曲，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内战，一致抗日！"

当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冲破了国民党"爱国有罪"禁锢的沉闷空气、满腔悲愤地第一次喊出这些抗日爱国的口号时，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悲壮激昂的口号，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抗日意志是不可摧的，党的"八一宣言"已经深入了人心。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大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在里面的居仁堂办公，爱国学生要求何应钦出来接见，但遭到拒绝，何早已躲到小汤山去了。学生们临时选出代表 12 人，前往居仁堂请愿，并拟定了 6 项要求，向群众宣读后一致通过，这 6 项是：(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的组织；(二)反对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经过；(三)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释放被捕学生。到了中午，学生越集越多，情绪愈来愈激昂。这时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才派参谋长侯成出来和学生见面。

城外燕京、清华等校，以清华带头。国民党警察当局在得知清华、燕京的学生要请愿之后，便扣住了校车，但是，这并没有难倒热血青年，他们决定迎着寒风徒步10几里直奔西直门。清华大学的队伍由黄诚、吴承明等同志带领，沿着平绥路前进，燕京大学由陈翰伯、朱启平等同志带领，从田间小道绕行。这两支队伍甩开了沿途阻拦的军警，在西直门前汇合了。但是当局下令将西直门关闭，并派警车去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等处戒备，将城门关闭。西直门前的学生代表与军警交涉数次都无结果，千百个爱国学生愤激了，他们含着热泪呼喊着"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

清华、燕京被阻于城外的消息，很快传到新华门前，新华门的学生们高呼口号："开放西直门！""释放被捕同学！"但侯成却推诿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而加以拒绝。

原计划是推举燕京大学代表出面交涉，因燕京受阻西直门外，中国大学董毓华就挺身而出与侯成交涉，侯要求学生们"谅解政府困难"，"好好读书救国"，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可以代为转达等等。学生们对此当然不能满意，董毓华、宋黎与其他学校代表商量，研究对策，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为了集结队伍、壮大声势、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指挥部决定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转道沙滩，然后到天安门集合。示威总指挥由东北大学担任，当宋黎招呼整顿好队伍，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时，群众一致高呼："现在我们要示威，我们要表示中国人民和华北人民的真实心意！"

示威队伍4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旗帜标语迎风招展，口号声此起彼落，沿路两侧群众不断鼓掌喝采，抢阅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有的跟随学生高呼："捉拿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弘达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女二中、志诚中学、威城中学、艺文

中学、河北高中、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等校同学加入游行行列。

当大队呼着口号经过辅仁大学时，刘达等同志踊跃地加入了示威队伍，课堂上的神甫正在向学生讲神学，学生们丢开了《圣经》，也纷纷参加到队伍中来。示威队伍来到了北京大学门外，示威大队的宣传员跑进红楼高喊："北大，起来！""北大，恢复五四精神！"红楼外的群众游行队伍齐相呼应："欢迎北大同学参加！""发扬五四精神！"此时，北大学生立即敲钟来召唤大家，顷刻间，黄敬、刘导生、唐守愚、宋劭文、张震寰等同志与许多学生迅速地冲出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集合在红楼前，一时没有校旗，刘居英跑到东斋拿出吴承明的两条床单，撕开写上"北平大学"，结在竹杆上，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示威行列。

队伍到了王府井南口，国民党当局以为示威队伍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开来了救火车。军警们手持大刀、木棍、水龙，虎视眈眈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学生领队与军警交涉，警察署长握着手枪，恶狠狠地说："不许通过，宋司令下了命令，谁敢往前冲就开枪！"但是学生们并没有被他吓住，一边喊"冲呀，冲呀"，一边往前冲，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向着学生喷射过来，冰冷的水柱像一把把尖刀似地扎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指挥部的学生和纠察队站在最前面，将寒冷、饥饿、疼痛置之度外，仍然向前冲。这时，军警又挥着皮鞭、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学生们蜂拥上去，用力与军警拼战，抢过水龙头反击军警，一场搏斗，约 20 多分钟，游行队伍终于被打散了，当场受伤 30 多名，为了保存力量，宋黎振臂高呼："队伍到北大三院去集合！"留下少数人作抢救工作。队伍撤到北大三院，宋黎慷慨激昂地说："汉奸亲日派的大刀、皮鞭、水龙头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回去组织全市学生罢课。"大家一致通过"从 10 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以后各校学生分别回到自己的学校。

在城内学生与军警奋战的同时，城外学生除清华、燕京外，北平大学农学院、成达中学、明德学校的游行队伍也被关在门外，1000多人高呼口号，向军警宣传抗日，力图进城。从黎明到中午11时多，学生们没有吃饭，伫立在寒风中，饥寒交迫。燕京大学教师雷洁琼赶回学校，与美籍教师一起送来一车馒头，分给同学。饭后，派一部分学生奔向西便门、阜成门，但是都紧闭着，时近傍晚，各校队伍，在寒风中悲壮地高呼口号，愤然返校。同学们纷纷表示："下一次我们要举行示威！"

12月9日这一天，斯诺夫妇自始至终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事前燕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将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通知了他们。斯诺夫妇同扛大旗的学生在一起，走在队伍的前头，学生与军警搏斗时，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为了救护受伤学生，她的衣服也被水龙喷湿。当晚，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条长长的电讯，称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在北平的外国记者中，只有斯诺最迅速地发了这条独家新闻。

一二九的斗争，仅仅是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一步酝酿着一场更大、更英勇的斗争。

2. 一二一六的大示威

经过一二九整整一天的英勇斗争，各校热气腾腾的抗日救国新局面出现了。10日，各校都按照学联的决定，实行了全市总罢课。北平学联发布了《宣传大纲》，强调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正确方针。指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我们的目标，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的方针。然而这种重大的任务，绝非学生群众所能单独胜任的。所以为了我们伟大的前途，我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

争。”①

学生们首先在学校恢复被摧残破坏的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组织。10日北大学生救国会成立，选举了朱穆之、陈忠经等同志为负责人；东北大学成立了学生救亡委员会。救亡组织成为各校救亡活动的中心。在救亡组织领导下，各校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着自我教育。清华大学抗日救国会负责人黄敬，邀请北大著名爱国教授许德珩去清华讲演，在讲坛上，许德珩追述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精神，当他沉痛而激愤地说道：“我是江西人，但是现在我的家乡，中国人还在那里打中国人。”时，台下极少数右派学生，用鸡蛋和碎煤块打他，他鄙视这种无耻行径。北大学生驳斥了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一文中的谬论。

几天时间，学生们办墙报、出特刊、演讲宣传、问题辩论，思想觉悟的提高是平时几年功夫所难达到的，广大学生要求“再来一次”的呼声极为高涨。

12月14日，北平报载国民党决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于是，党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发动大示威，引导学生运动走向新高潮。

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示威指挥部，对示威游行作了严密的部署。

清华、燕京吸取了上次被阻在城外的教训，分别在前一天组织了先遣队进城，城内各校共组成3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各校学生队伍有的冲破军警的封锁和水龙、大刀队的阻击，有的巧妙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至天桥集中。清华、燕京等校的城外大队，在西直门受阻，转阜成门又奔西便门，仍遭阻拦，2000多学

① 《一二九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页。

生怒不可遏，决心用血肉之躯，冲开铁门，在“一二三、一二三”的喊声中，大家手挽着手撞击铁门，前面累了，后面换上去，渐渐地铁门被撞开了，同学们冲进西便门向天桥进发。上午11时左右，四面八方的示威队伍，一路又一路地会师天桥。天桥是北京劳动人民聚集的地方，北平学联确定在这里集中，就是为了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时天桥周围的工人、农民、市民、小商贩、东北流亡同胞也都参加到斗争中来了。人越聚越多，广场上约有2万市民和1万学生。人人精神饱满，情绪激昂，广场上旗帜翻腾，标语成林，传单遍地飞。

东北大学宋黎是游行示威总指挥之一，他和其他同学支撑着站在破电车上的黄敬，由黄敬领着广场上的群众高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爱国自由”等口号。接着大会当场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一致要求：(一)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二)组织民众，工农兵学商共同抗日；(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四)反对华北自治，到外交大楼及市政府质问地方当局何以卖国？

市民大会结束后，立即由学生和市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长达两里的游行队伍，开始示威游行。

示威队伍共分两列，每列以4人为一排，手挽着手，并肩前进。清华大学为前导，高举“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一切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和标语，两旁各校纠察队及自行车交通队随行。沿途又有许多市民陆续加入队伍。市民知道学生们从上午到下午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纷纷送来开水、面食，许多贫苦的市民热情地将自己糊口的窝窝头也送给了学生。

当示威游行队伍到达珠市口时，城外大队的学生也赶到了，双方会师，声势倍增。队伍行进至正阳门时，守城军警连鸣数枪，阻拦进城，指挥部当即以退为进，将队伍带至前门西车广场。纠察队用

自行车搭成主席台，再次召开市民大会，会后，继续举行游行示威，原规定路线是：沿前门大街进前门，经天安门、东长安街转东单到外交部街，然后由北城转到西城解散。但是反动当局关闭了前门，经多次谈判，允许分3批通过。指挥部警觉到这是个“各个击破”的阴谋，因此决定分3队进城，一队从正阳，由黄敬同志率领，二队绕道宣武门入城，三队留守原地。第一、二队在宣武门会合后再回师迎接第三队。第一队从正阳门入城后，在绒线胡同西口被保安队拦住去路，为避免流血，同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同学们滴水未沾地苦战了一整天，也应该从事休整。因此指挥部决定整队往北，分头回校。但当队伍转弯北进时，反动军警的大刀队向学生冲了过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重大伤亡，指挥部又决定化整为零，很快地退却。

留在西车站广场的第三队，在军警的阻止下，未能进入正阳门，在城外绕了一圈之后，与第二队在宣武门外会师，他们根据冲垮西便门的经验，数度冲击宣武门，未获成功。这时，有学生发现城门的瓮城门底下有一条缝隙，决心从这爬进去，清华大学陆璀女同学，勇敢地将身子平贴着地面爬了进去，迅速跳起，把一根铁门栓抽下，又用手去拧动扣住门环的铁丝，向城外高呼：“冲呀，冲进来呀！”但她还没有来得及将城门打开，就被军警抓住了。在广大学生的再三斗争下，军警才不得不把她放还，并答应开城门，让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返校。

当清华、燕京等校离开宣武门以后，夜幕降临，路灯突然熄灭，反动派在城外开始对示威游行队伍进行血腥镇压：大刀、皮鞭、刺刀一齐向学生扑来，爱国学生一边抗击，一边将队伍分散到两旁的胡同，北平晨报报馆，打开大门，让一些学生进去躲避。一二一六的整天斗争中，全市学生被捕共有20多人，而受伤者将近400人。

一二一六的全市爱国学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的卖国活动，他们不得不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3. 全国学生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风暴

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犹如阵阵惊雷，震惊祖国大地，唤醒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在短短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风暴。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第二天传到天津，点燃了天津爱国学生早就憋着的抗日救亡的怒火。南开大学等校立即宣布罢课，表示声援。12 月 18 日，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两支队伍游行示威，学生们冲破军警和特务的阻拦，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对内团结，对外抗战”等口号。下午一时，示威队伍在南开中学运动场集合，举行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天津学生抗日救国会，决定 19 日全市总罢课。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学生也遏止不住胸中的怒火，立即酝酿罢课声援和示威游行。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将学生的爱国运动和上海各界人民、著名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结合在一起。12 月 12 日，上海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马相伯等 283 人，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发表《救国运动》宣言，赞扬华北青年的爱国运动。14 日，各大学学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19 日复旦大学首先发难，并联合持志学院、同德学院和上海法学院的学生，在闸北一带举行示威游行。当天晚上，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交通大学、两江女子师范、麦伦中学、正风中学、爱国女中等校也参加了游行示威。12 月 23 日，复旦大学近 1000 名学生，举起赴京请愿讨逆团的旗帜，向上海北站进发，24 日清晨，又有大夏、同济、暨南等大学以及建国、武陵、光夏、新亚等中学学生 3000 多人到车站慰问学生，司机热情地握住学生的手说：“就是枪毙我，我也要帮助你们把车开到南京。”26 日，车到了无锡被国民党宪兵拦住去路，并用武力劫持火车转向上海方向行驶，当车突然停下时，1000 多学生下车，在无锡大街上举行游行示威。27 日无锡 3000 多学生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工人也

支持学生的斗争。为了进一步聚积力量，巩固成果，爱国学生决定不去南京请愿，大家冒着寒风细雨，在宪兵的"保护"下，乘着铁篷车，回到了上海。

在这期间，北平学联派燕京大学的陈伯翰、清华大学的韦毓梅、陈元等3人，于17日到上海。经过邹韬奋、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胡子婴等著名爱国人士的介绍联系，和上海爱国学生一起共同商量上海开展救亡运动的部署。12月24日，党又领导和组织了各大中学校学生和部分工人、店员、妇女，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27日下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了会员大会，到会300多人，通过了大会章程，选出了马相伯、沈钧儒等35人为执行委员，发表了第二次宣言——《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宣言指出："在当前严重的危机下，全国大众已经超过了忍耐的限度，目下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的高潮，明显的是全国大众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这一爱国运动正在开展中，钢铁般的民族阵线将由全国大众自动建立起来，形成不可侮的巨力。"①

北京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南京学生，也燃起了抗日的怒火。12月12日，南京各中等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响应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18日在中央大学的操场，汇集了女子法政讲习所、南京女一中、京华中学等校学生5000余人。游行队伍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教育部进发，遭到军警阻拦。19日，南京学生2万多人举行第二次爱国示威游行。通过斗争，党员和积极分子被选进了学生自治会，排除了自治会中的CC分子。如中央大学原学生自治会被CC分子刘某把持，中大读书会的同志利用学生对刘某的不满，将他赶下台，选举共产党员后奕斋担任主席。南京中学读书会的同志，也选举郑代巩为学生会主席，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北平学联派清华

① 《一二九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6页。

大学刘毓珩、燕京大学朱南华到南京，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介绍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得到了南京爱国学生的热情支持。

武汉三镇的爱国学生在17日组成救国联合会。20日在武昌举行示威集会。23日，又在汉口召开万人的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媚外政策。

河南开封的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在23、24两日连续举行了万人以上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前往省政府请愿，由于当局无意答复学生要求而激怒了学生，队伍到火车站要求去南京请愿，在火车站卧轨斗争坚持了4昼夜，29日，南京派去"中央大员"，表示将学生要求条件负责带回南京，学生们才撤回学校。断绝4天的陇海路交通才得以恢复。

除上述各地外，一二九运动之后，杭州、广州、西安、济南、青岛、南宁、长沙、安庆、厦门、梧州、南昌、成都、桂林、太原、扬州、徐州、保定、苏州、张家口、宁波、南通、重庆、芜湖、江宁、应城、焦作、信阳、宜昌、常州、香港先后都举行了请愿和示威游行，而且在海外，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一二九运动由北京而全国，原来覆盖着的救亡怒火，一经点燃，就成了势不可挡的燎原烈火。抗日救亡的新风暴席卷祖国大地，它是全民抗战的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三、南下扩大宣传团和民先队的建立

1. 到农村去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斗争已经从请愿发展到了示威，如若再向高一级发展，就必须是转向武装斗争，当时也确有少数人主张去袭击派出所，夺取枪支，武装自己，但是这是当时条件所不允许的，另外，南京当局下令解散北平学联，收买一部分右翼分子，组织"南下聆训团"，到南京去接受蒋介石的"面谕"。

这样，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运动向何处去？下一步怎么办？

12月下旬的一天，北平学联党组织核心成员开会讨论。参加会议的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孙敬文等同志。会议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还决定留预备队留守北平，巩固原有阵地，并派代表赴津、沪、汉各地活动，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

两天后的夜晚，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大会。清华、燕京、东北、北京、中国、师范等大学及女一中、汇文、镜湖等中学代表80多人，讨论今后行动计划。北大代表刘江陵发表演说，他从五四运动的传统——民主和科学，讲到九一八以来日寇侵略的痛史，历数国民党蒋介石只打内战不抗日的罪行，呼吁全国学生与广大民众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原来多数赞成去南京"聆训"，讲演后，多数赞成南下宣传，重新表决时，学联党团的决定被顺利通过了。

1936年1月，北平学联和天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总指挥是中国大学的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宋黎、北师大的江明，宣传团的党团书记是彭涛。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分4个团，一、二团是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大学、镜湖中学等校学生。第一团指挥是北京大学的韩天石，第二团指挥是江明。第三团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校学生，指挥是燕京大学的黄华和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第四团由天津各大中学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计500人左右。

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的行动计划是沿平汉路南下，先到固南会合，然后分头至保定集中。1月初，正是北方最冷的天气，但是学生们情绪极高，迎着寒风，忍受饿冻，避开军警的阻拦，"急行军"前

进，脚磨破了，双腿肿了，也没有人退缩。

在农村，他们走进阴暗冰冷的小土房调查访问，亲眼看见农民吃稀薄的糠菜粥，一家5口人只有一床破棉被，大冷天小女孩只围一块单布片，怀孕8个月的妇女还得拖着百十来斤的石碾在劳动。这些悲惨的情景以及农民的血泪控诉，深深地震动着学生们的心，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大家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充分发动广大农民，才能取得抗日斗争的彻底胜利。

开始由于学生们不熟悉农民，向农民宣讲抗日的道理，脱离农民实际，宣传队遇到了困难。后来当他们深入农村之后，讲演结合农民的实际，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而且他们用救亡歌曲、街头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抗日的道理，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农民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有的老大娘激动地走上台高喊：“大家齐心打日本，不要当亡国奴”，有的农民则询问：“洋人能占北平吗？”、“老蒋为什么不抗日？”

1月18日前后，南下宣传团的4路大军兴冲冲地在固安城会师，但该县城的伪县长却把城门关闭了，还派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如临大敌。县城进不去，学生就在城外召开群众大会，并演出了话剧《打回老家去》。城内的居民和学生为了援助宣传团，开展了募捐活动，把钱、粮、棉被等用绳子传送过城墙，给学生们以极大的鼓舞。

在固安召开了全体宣传团员大会，会上总结了工作并讨论了“当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策略问题，经过讨论，大家明白了应该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另外宣传团又组织大家讨论“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生们通过学习和讨论，初步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些什么人，不应该包括些什么人以及怎样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等问题，这样，大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变得成熟一些了。

在固安住了4天，除了总结工作外，还整顿了组织，重新划分了各团的行动路线，决定各团在保定会合。一、二团排除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阻挠，粉碎了武装便衣的包围，并且争取了三十二军一个团的支持，于1月21日到达了保定。三团于1月13日到达高碑店时被便衣警察武力解散，此后便返回北平。1月底，一、二团也回到北平，至此，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基本结束了。

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后，全国各地学生都先后发动了深入农村的扩大宣传活动。上海各大中学学生90余人组成扩大宣传团于1月20日出发，到村落、街头、茶馆进行宣传，散发图画宣传品，演爱国戏，唱救亡歌，效果很好，他们到达苏州后，才被反动军警和宪兵强迫送回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各大中学学生在2月初也有大规模的深入农村的扩大宣传活动。

知识青年深入农村扩大宣传，与工农相结合，是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不仅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而且，学生们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由民族觉悟转变到阶级觉悟，在党的领导下，决心为完成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献身。不少同学就由此成长为先进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华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

2. 民先队的诞生

1月30日，第三团在高碑店遭到便衣警察的武力解散时，宣传团员们为了保持这个战斗的集体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坚决要求全团一起返回北平，在小店里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热烈地讨论了“抗日救亡工作是不是就此结束”的问题。为了不让门外的警察偷听，大家都用英语发言，与会者无不慷慨激昂，共同的结论是：抗日救亡工作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抗日团体，向日寇、汉奸卖国贼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三团负责人蒋南翔

等同志在会上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的建议，立刻得到全团一致的热烈拥护。

第一团和第二团在保定会合后，冲破省政府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开展宣传活动，大家也认识到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把运动坚持下去。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党组织通过进步学生提出了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议，也立即获得了全体学生的热烈支持和拥护。

还在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此，中央决定："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的共产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在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建立不仅包括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应该彻底改变在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

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二、三团在北平汇合后，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与黄敬、姚依林等在骑河楼清华同志会举行会议，认为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共青团圈子太狭小，外表又太红，工作方式太秘密，已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为此商量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后来在一次南下同学的会议上，北师大的曹国智同志提出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家认为这个名字最好。1936年2月1日在北师大文学院召集各校代表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代表们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并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简称民先队)正式成立。当时正式队员有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

大会通过的《工作纲要》中指出,每个队员对救亡工作的基本认识是: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并研讨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并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斗争纲领》的重点是:(一)动员全国武装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三)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四)铲除汉奸卖国贼;(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产业充作抗日军费;(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七)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共谋解放。大会通过的《规约》中规定:服从队员公意;服从各级队部的一切指示、决议,并严格执行;忠实于组织,不作破坏或诽谤组织的任何言论与行为;对上级的意见或批判须依组织系统提出;队员如违反《规约》时各级队部得斟酌情形,予以批评或警告,遇必要时总队部应撤销其队籍;按期交纳队费。

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的青年组织。它既以先进青年为核心又团结广大的爱国青年群众,而且它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因此它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成为华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由民先队训练出来的许多平津学生,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促成全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

1. 刘少奇到华北

学生运动的猛烈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他们一方面拼凑平津保学联与北平学联对抗,派遣伪代表去南京"聆训",以此分裂

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于2月间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解散救亡团体和限制救亡言论。接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先后宣布军事戒严，南京国民党行政院于2月29日密电天津、北平两市长，下令取缔平、津两地学联，并开始在各校实行大逮捕。为了保存实力，隐蔽精干，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学联和学生救国会干部或者转移他地，或者隐蔽在一些进步教授家中，同时组织纠察队、情报队，开展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学生们的英勇斗争，冲破了一个月来的白色恐怖，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3月9日，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郭清由于受到严刑拷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而惨死狱中，这一消息，引起了北平学生的义愤，要求学联采取行动。北平学联决定3月31日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会，会后抬棺游行，控诉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要求爱国自由。由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参加追悼会的只有1300多人，大部是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国民党反动派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报告后，派出了大批军警和特务打手，重重包围了北大三院，并打散了游行队伍，还逮捕了54人。

在白色恐怖之下，组织一次英勇的反击是非常必要的。只是在策略上有些过急，而且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群众，因此使学生运动遭到了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民先队的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力量受到了打击，许多爱国学生被投入监狱和被学校开除，还有不少学生受了伤，一部分中间学生产生了害怕情绪，一部分积极分子、民先队员也动摇彷徨起来。一些反动政客和资产阶级右翼教授也乘机散布"读书救国"等花言巧语，诱使学生离开革命的道路。

如何巩固一二九以来的成果？如何引导运动进一步发展下去？这是亟需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

正在这时候，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指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

刘少奇到天津以后，为了执行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这一方针得到了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林枫、徐冰以及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华等同志的坚决支持。

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奇用KV署名于4月10日在北方局的党内秘密刊物《火线》上发表了著名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之后又以仲篪、陶尚行、莫文华等笔名在《火线》以及《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所谓具体领导》、《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上、中、下篇)、《怎样做群众工作》、《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论左派》等文章，这些文章阐述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提出了要善于把一般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要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领导艺术和新策略，揭露和批判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根据刘少奇指示的原则精神，北平党组织首先对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加强了形势教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教育。其中，特别是提出了要开展各项活动，要交朋友、团结群众、共同救亡。

5月17日，民先队在北师大召集了一次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联合战线"的口号，转变了民先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逐步克服了急躁、骄傲自满、与群众联系不够等缺点，开始转变为革命的、民主的、踏实苦干的作风。

为了团结广大学生参加救亡运动，党通过各校校刊和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辩论会，在广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读书与救国"的大辩论，明确了要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好好学好功课，而且要求党团员和民先队员要通过学习上的模范行动去影

响团结大家。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同志提出了做好学生的口号。同时各学校还组织了各种学术性的社团，举办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的学术活动。如北平各大学学生组织的北平求知学会，会员达千人，设20多个分会，举办新哲学讲座，出版《求知月刊》；北师大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自己动手做防毒面具，研究国防化学。

为了团结教育群众，抗日救亡的文艺活动也活跃起来，歌咏活动普及各大中学校，《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广为传播，而且学生们还巧妙地把《国际歌》、《马赛曲》、《保卫马德里》等外国革命歌曲，搬上舞台。歌咏团、剧团纷纷成立，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以及东北大学爱国学生自编自演的话剧《流亡曲》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之一。

在这时期，各校学生自治会和学生救国会还注意了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如清华大学学生会派杨学诚等同志办了一个清寒食堂，这样吃饭花钱少，吃得好，受到大家普遍的赞扬。其他学校也办了类似性质的食堂，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学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建立了友谊，促进了团结。

1936年夏天，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5月6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二十九军退至河北南部，日军进驻平津，彻底消灭抗日运动等。紧接着，日寇将其华北驻兵由8000人骤增至2万人，进占北宁铁路沿线，并公然将平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华北即将完全沦为第二满洲国了。

在日寇的加紧进攻之下，宋哲元在华北和平津的地盘越来越缩小，因此与日寇的矛盾也加剧了，南京国民党蒋介石对宋哲元，则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方面要控制宋哲元，并想伺机消灭他，所以派特务监视防范他投靠日本，一方面又利用宋哲元手下6万多军队和平津地盘，向日本讨价还价，因此，宋哲元和蒋介石也有

矛盾。在此种情形下，宋的基本对策是：日紧靠蒋，蒋紧靠日，日蒋均紧就靠学生，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特别是由于华北和平津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抗日风暴一再掀起，二十九军的下层军官和士兵的抗日爱国情绪日趋高涨，因此，宋哲元改变了对学生一贯镇压的态度，而表现出某些摇摆。

这时，刘少奇在天津，他指示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发动平津学生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同时，改“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5 月 28 日，天津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示威，学生们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抗日大旗，走上了街头，后来一部分教职员，成批的工人，甚至连一些盲人也参加了，队伍迅速集合到 1 万人，这次游行示威运动是成功的。

6 月 13 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第 4 次大示威，民先队员采用了灵活迂回前进的“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七聚七散，使军警无法阻拦，学生们不仅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而且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口号。这些口号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此后，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官兵就逐步转到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天津、北平两次大示威迅速影响全国。5 月底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在全国学联的领导和发动下，上海学联也宣布罢课，南京学联也组织了 3000 人的示威运动，包围日本领事馆，武汉学联于 6 月 10 日发动反对内战、要求保卫华北的运动，各校纷纷举行群众大会，温州学联发动了罢课，而广西、广东两省同学更表现了雄伟的群众力量。

除各地的青年学生外，各阶层人士、市民也纷纷起来响应，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掀起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高潮。

2.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随着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涨，各地的学生救国会陆续成立。继北平学联之后，1935 年 12 月 28 日，天津市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当时参与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有南开大学的程人士、王绶昌、李涛、沙兆豫，北洋工学院的徐瑞恩、孙景芳、刘讷，法商学院的庄金林、阮务德、刘立栻、傅朋竹、王民生、郝金贵等，此外还有一些中学的学生骨干。

北平学联和天津学联在一二九运动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久，就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

1936 年 1 月，上海市大专院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学联第一次会议在税专召开，与会者有复旦、大同、暨南、同济、美专、中法工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代表，推税专代表当主席。

1935 年 12 月 17 日，武汉中等以上学院学生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参加的有 53 校，推举许升为主席。

1935 年底，开封学生在罢课游行的斗争中，由河南大学领头，主持邀约开封女师等 30 余所学校成立了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

西南地方势力主张抗日，因此，广西学生的救亡运动有比较有利的条件，成立了全国唯一的省学联。

南京当时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压迫之下，未能组织起市学联，但救亡运动中的进步同学李庚、后奕斋、祁式潜等都参加了全国学联的会议。

总之，各地各城市学联的成立，为成立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当时全国学生的救亡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也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以便交流情报，统一行动。

1935 年底，由平津学生发起，派代表分 4 路赴各地进行联络，“北平的学联代表负责平沪、平汉两路，凡沿路各城市，如济南、青岛、徐州、蚌埠、南京、上海、杭州、温州及保定、太原、石家庄、郑州、开封、汉口、武昌、汉阳、应城等城市，均归北平派人联络；天津的学

联代表负责平绥、北宁两路，凡沿路城市如宣化、张家口、绥远、唐山，以及东北均归天津派人联络。自12月26日起至1936年3月18日止，经过3个月的筹备，上述各地已有2/3的城市答应参加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①，如清华学生孙兰（原名韦毓梅）到上海，清华学生刘毓行（即陈其五）和燕京学生朱南华到武汉。此后，北平学联派出刘江凌（当时化名江陵）和董毓华（化名大李）来上海筹备全国学联，上海学联代表彭瑞复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参加筹备工作的共计七八人。

1936年3月28日，在无锡鼋头渚，选择了游客较少的清静角落的一块草地上开了两天会议，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日期等事宜，随后发出通告，宣布筹备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提议在1936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全国学联筹备的过程中，北平学联又派黄敬、陆璀等来上海，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由于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密探十分注意学生运动，因此要选择安全的会场非常困难。当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吴耀宗和协会学生总干事刘良模，衷心拥护我党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学生救亡运动极表支持，因此就决定借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为会场。

1936年5月29日，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在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来自广州、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温州、徐州、武汉、杭州、厦门、香港、巢县、宜兴、苏州、无锡及广西等地学联代表28人聚集一堂，召开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

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通过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纲领》和《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章》，

①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经过及现状》1936年《学生呼声》。

会议还通过了“1. 派员赴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帮助建立组织；2. 加入世界学联；3. 规定5月29日为全国学生节；4. 发下列宣言：对国民大会表态度，召开全国各实力派组织抗日联合军队--致对外，告日本民众书，给东北同学快邮代电”等4项重要提案。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广西、广州、厦门、杭州、温州、青岛、济南等11个地区的代表为执行委员，选举了北平地区代表刘江凌为学联主席（后为刘道生接任，再后为段君毅），陆璀为宣传部长，唐守愚为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全国学联党组工作，董毓华为组织部长。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庄严宣布：“从今天起，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将勇敢地领导着全国学生走向民族解放的征途”，为此，它号召“一切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全国各地的学生，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组织起来！我们要不分地位、不分党派、不分性别地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紧紧地团结！组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总动员对日作战！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反对奴化教育！肃清一切汉奸卖国贼！否认一切卖国条约及协定，否认一切傀儡政权！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和民众，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①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纲领》提出了：“政府应当和人民合作，实现人民的共同要求，立即对日正式宣战，武力收复失地；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枪口一致对外；铲除汉奸，罢免及严惩卖国悦敌官吏及摧残爱国运动的地方当局；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② 等12项政治主张。

---

① 《救亡情报》1936年6月7日。

② 《学生呼声》1936年。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表明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而且它结束了1929年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各地学生组织分散的状况，再一次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学生组织，这不仅对于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有重大作用，而且当时作为唯一的全国性救亡组织，对各界的全国性组织的迅速建立也有促进作用，此后，相继成立了工人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全国学联的黄敬、刘江凌、陆璀、董毓华、段君毅、唐守愚等都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和成立大会。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继承了五四以来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又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因此解放后，将这次成立大会列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3. 西安事变和学生运动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使全国学生摆脱零星分散的状态，走向全国的统一，这是学生运动的一个活动中心。另外，全国很多城市发展和建立了民先队组织，民先队又成为学联的核心，团结着广大同学，直接推动着全国学生的救亡运动。

1936年8月间，平津民先队各级干部实行了民主选举，李昌同志被选为总队长，总队部成员有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孙传文（即孙陶林）、顾德欢等同志。不久，北平市委派黄敬同志领导民先队总部工作，还派了杨维、李明等同志到民先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天津民先队由李哲人和张晓同志负责。10月4日，北平民先队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经充分讨论，参加会议的125位民先队干部一致认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以最大的努力，促成联合战线的广泛开展和深入。"会议规定了当前的工作是：（一）促成各学校的学生会，以奠定学联的群众基础，在执

行此项决议时，必须正确地运用联合战线，争取师生合作；(二)加紧促成联合战线的成立，运用新的方式组织群众，扶助及推动文化界、妇女界的救亡友军；(三)积极参加社会的各种团体，扩大工作的领域，以作为联合战线广泛开展的基础；(四)支持学联准备群众行动以答复敌人的进攻。①

此后，平津民先队员通过平时的通信和个别的联系，特别是暑假返回故里，在家乡活动，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发展和建立了民先队组织。据1936年10月间的统计，共有31个城市有民先队员，计有北平、天津、西安、济南、唐山、长辛店、开封、束鹿、康庄、烟台，武昌、汉口、苏州、南京、成都、洛阳、保定、青岛、广州、徐州、上海、太原、宣化、杭州、贵阳、南昌、长沙等，以及国外的巴黎、里昂和东京。北平民先队总队部还派黄超显(黄秋耘)同志去香港开展工作。他经广州地下党负责人章汉夫同志介绍，与香港抗日救国会负责人连贯同志见面，建立了联系，并在香港发展了民先队员，其中多数为华侨中学生。

民先队最初在北平成立时，不到300人，后来全国各地发展迅速，很快超过3000人之多，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民先队员已经发展到2万人。

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全国学联以及民先队领导的学生救亡运动与全国各界救亡运动汇合一起，形成了全国性的各阶层人民的救亡运动的高潮。

从8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发表宣言，呼吁援绥抗日，在全国掀起了援绥运动。在南京救国会的推动下，在冯玉祥的大力支持下，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11月，当地爱国驻军傅作义将军所部奋

① 《我们的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队，1937年3月编印第23、28页。

起抗战，一举击溃日本侵略者和蒙奸德王的伪蒙军，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消息传到北平、天津和全国各地，立即在全国出现了援绥运动的新热潮，各界爱国志士仁人、学者名流，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赶赴百灵庙。北师大组织慰问团，清华大学组成赴绥前线服务团，带去的慰问品从棉背心到医药用品等差不多装了半个车厢，各地的慰劳品不断地送往前线，堆积如山。但是，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绥远驻军威胁利诱，对日妥协，使得局部抗战告终，另一方面镇压人民的救亡运动，于 11 月 22 日深夜将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 7 人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震惊全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把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摧残救国运动的法西斯暴行也非常不满。12 月初，张学良只身前往洛阳会见正在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央求他释放救国会的负责人，蒋介石拒不采纳。张学良质问蒋介石：“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则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①

11 月下旬，全国救国联合会执委、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张语到西安，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12 月 9 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学生们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张副司令出兵援绥抗日”、“阻止爱国运动的人就是汉奸”、“欢迎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迎着寒风由西安向临潼进发，行至 10 多里，到了十里街亭的时候，张学良赶到，站在土崖上向同学们发表

①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 年 12 月 16 日《西安事变资料选》。

讲话："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要求，我是完全接受的，或者还能做你们的一个请愿代表，我即刻将你们的意思传达到临潼的蒋委员长，至少我比你们有效力，你们如若不信，……等着，三五日内便有事实的表现答复你们，我是绝对不会欺骗诸位的，……天黑了，你们如信服我张学良的话，那么就请你们回去吧！"学生们高呼："拥护抗日的张副司令！"夜来了，学生们高唱着歌，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而后才回到了西安。

之后，张学良向蒋介石说明一二九西安学生请愿，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并用抗日的事实来答复。但蒋介石却说："对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由此，张学良、杨虎城感到，用口头和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的。于是，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谏，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拘捕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等 10 余人，并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 月 25 日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是全国人民救亡运动的伟大胜利和新发展。

西安事变之后，党进一步领导全国学联和民先队，进行多方面的群众工作，准备迎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十章　全国青年学生奋起抗日

一、抗日战争爆发，青年学生奔向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附近芦沟桥进行挑衅性的军事行动，借口一个日本浪人失踪，无理要求进宛平城（旧县城，1952年并入北京市，属丰台区）搜查。遭到拒绝后，日军竟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中国驻军奋起反击。8月13日，日军又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从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芦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党要求立即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武装保卫全中国，给进攻的日本侵略军以坚决的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团结抗日，救亡图存，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1.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奋起抗日

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是剑拔弩张，华北战云密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以武力侵略平津、华北。平津、华北处

在十分危急之中。7月8日党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就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党要求立即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在困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为挽救祖国的危亡，郑重宣言：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力求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中共中央将这份《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然而，国民党却拖延了下来。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一场极端野蛮的战争，烧杀、奸淫、抢掠、破坏，无所不为。日寇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各阶层的人们都卷入了反日浪潮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形成。迫于形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翌日，蒋介石又发表了谈话。蒋介石的谈话中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纲领，也没有公开承认国民党过去10年中对招致严重民族危机所应负的责任，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提到了团结救国的必要。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的又一次合作。这样，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正式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在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号召全国青年学生立即奋起联合抗日。就在我党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的同时，党直接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表了致全国青年的通电和给全体青救会员的紧急通告，号召"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华青年男女，不分政治、信仰、职业、宗教的区别，应该实现抗日青年救国大联合，在一致抵抗到底，誓死不让日寇侵占中国一寸土地坚决保卫平津、华北的口号下，准备立即驶赴抗日

前线”，又提出“组织学生的军事训练，动员千百万青年到抗日部队中去……”

7月底，平津沦陷后，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在保定接见民先队总部负责人时指出：“民先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学会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开展各项抗日活动。”8月初，周恩来、贺龙途经太原时也向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指出：日寇是拿杀人武器的凶恶敌人，我们革命青年也只有拿起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道路。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都给青年学生指出了抗日斗争的方向。

1937年8月25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也指出：“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以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号召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华北人民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战争，为保卫华北和祖国而斗争。

在党的“团结、抗战”的号召下，华北和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学生纷纷脱下学生装，拿起武器走上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走向农村与敌后，与抗日武装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事业中，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 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投向抗日的行列

在芦沟桥的抗日炮声中，北平的爱国青年首先行动了。7月11日，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组成了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开展了广泛的抗战活动，组织了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宣传队、战地团等。平津沦陷后，大批

青年学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为建立敌后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如北平沦陷后，学生们三五成群，冒着危险，跑出城外，拣起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下的枪支，同没有撤退的国民党爱国士兵、青年工人、郊区农民组成了平西游击队，党的北方局和北平市委也不断派员加强这支游击队，由于学生参加的很多，群众称他们是学生军。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地壮大，于1937年11月改编为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五支队。第五支队经常活跃在香山、万寿山、门头沟一带，不断给日寇以痛击，后来，日寇甚至都不敢在清华大学驻兵。游击队还在各村镇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断壮大队伍，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形成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北平、天津、保定的一批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杨秀峰的带领下，建立了抗日游击队，艰苦地转战在太行山上，以后又与一二九师骑兵团的一部分队伍汇合，为抗击日寇奋勇作战。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黄敬，带领了一批学生来到晋东北和冀中，参加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鄂中抗日根据地也是由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学生会领导人杨学诚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带领了一批学生来到鄂中农村，从8条破枪开始，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山西，薄一波为推动阎锡山守土抗战，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以平、津、晋学生为骨干，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在山东，中共胶东地委集合了林一山、孙传文等部分平津南下学生和济南青年学生组成了一支山东纵队，活跃在泰山一带，后与八路军的东进部队汇合，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济南，荣高棠、杨易辰、陈荒煤和张瑞芳等，组织了平、津学生流动剧团，演出了许多生动活泼的救亡戏剧，影响很大。在这同时，来到山西太原的民先队骨干宋尔纯（宋应）、饶斌、康世恩等也踊跃参加了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在广东，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深入农村与农民结

合，创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开辟了东江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底，在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上海、南京也于11、12月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12月从南京仓皇迁都武汉。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重要人物、在野的各界党派领袖、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先后从南京、上海等地集中到了武汉。平、津、沪及日本归国青年学生，由东北背乡离井的各种救亡团体，也纷纷集中到了武汉。可是，当时武汉的形势也并不乐观，士兵在前方打仗，后方抗战气氛阴郁。因此，从各沦陷区来武汉的青年学生感到抗战前途渺茫，青年学生在徘徊、惆怅，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战、为救亡都各自寻找出路，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前方，有的继续徘徊。

党为了将广大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应武汉大学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向师生们作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的讲演。他指出："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因为"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周恩来提到的这首歌曲，正是反映了东北流亡同学的真情、实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无不为之感动。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悲壮哀痛的歌曲，唤起了青年学生的悲愤的激情，也使他们懂得，每一个青年学生不仅要在救亡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周恩来又说，“任重道远”这4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他还指出，当前的形势不能与过去五四和五卅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现在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外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今天，中国青年的任务是：“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随时到直接杀敌的战场上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知识，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我们得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至少也得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活动不易。第三，到乡村中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城乡……有作为的青年们因此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我们还可以进行许多人民自卫的工作……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

不能让华东、华南像东北四省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我们要艰苦地在那残暴的统治之下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我们的救国组织发展起来……准备迎接我们正规军的反攻。”周恩来最后说：“中国青年运动有着最光荣的传统。今天，我们青年面对着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远大的。”他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周恩来的讲演不仅对国民党统治区及沦陷区的广大青年、学生指明了努力方向，而且对当时武汉地区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在武汉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青年学生们不愿做亡国奴，踊跃参加各项抗日活动。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所在的上海演剧二队来到武汉后，在黄民伟、徐培豪、汪云、曾昭正等人组织的武汉业务歌咏团的基础上，举办了各种具有抗日救亡特色的音乐知识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歌咏骨干，从而吸引了广大学生和各界爱国青年。在他们的指导下，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动组织起星海、怒涛、群声、群蜂、三八等 20 多个歌咏队。他们走上街道，深入工厂，指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用歌声表达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一大批热血青年正是在歌声中走上了抗日的战场。1938 年 2 月，临汾失守，民先队总部也由临汾转经西安撤到武汉。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由于民先队的干部、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蒋南翔、宋一平、李昌、杨学诚、黄华、于光远等都在武汉地区从事青年工作，武汉地区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

3. 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这块革命圣地，成了革命青年向往之处。广大青年学生（包括华侨学生）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寻求革命真理、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愿望，先后从全国

各地，从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从敌后根据地，从海外，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层层封锁与障碍，长途跋涉，历尽艰难困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战爆发的最初几年，平、津、沪等沦陷区就先后有四五万学生青年奔向延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仅1938年一年就向陕北输送了一万余名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到了延安就分别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女子大学和中央青委主办的安吴青训班等革命院校学习，结业以后又分赴各地参加抗日工作，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各条战线上的重要力量。

广大青年学生一投身到革命的摇篮——延安，就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教诲。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延安的青年学生说："一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二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① "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② 因此，毛泽东号召延安的青年学生们要"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③ 同时强调"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④

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后，就收到了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赠送的3件宝：镢头、枪和笔。他勉励青年学生们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建设边区；拿起枪来打击敌人，学会武装斗争，保卫好边区；拿起笔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文化知识，武装

---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2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5—56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9页。

自己的头脑。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后，参观了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住的窑洞以及朱德同志种的菜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使学生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党中央为了培养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所需要的大批干部及自然科学人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办了各类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中共中央党校、延安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俄文学校，新文学干部学院、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炮兵学校等，吸收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的青年学生和来自印尼、缅甸、马来亚的华侨青年学生入学。

当时在延安的这些青年男女学生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一切靠自己动手解决。住的是自己打的窑洞；吃的是自己开荒生产的小米、蔬菜；穿的是自己纺织的粗布；校舍、课堂自己动手盖，凳子也是自己制作的……他们一边劳动生产，一边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把自己锻炼成为会劳动，能打仗，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革命战士。

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无数青年学生在这里得到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和培养，成长为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去。他们之中有的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到各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同日寇及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顽强的斗争，有的在沦陷区或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艰苦的地下工作。延安青年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勤俭办学的风气，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为全国青年学生树立了榜样。世界学联先后曾有5个代表团到过延安，他们称赞延安学生的学习生活不愧为中国青年学生的楷模。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还在其他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青年学生和各界青年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培养了大批青年工

作的干部。如在陕甘宁边区，支持西北青年救国会创办了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组织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川陕根据地的各县、区、乡，普遍组织了列宁学校。这些组织都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二、抗日战争初期的上海学生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后，1937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及时指出："上海党目前的中心工作，不是恢复已经主动取消的全国救国会，而是加强救亡协会与救亡团体的群众工作，扩大这些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运动。""必须彻底改变党自己在所领导的救亡团体中命令主义与包办主义的工作方式，尽量发展民主主义，吸收无数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发挥他们最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取消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的批评和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他们自己的不满和压力，才能推动他们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们的错误政策的寿命。"

根据中央的指示，抗战初期的上海学生运动，在市学委的具体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活动的种种限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 成立学生各种抗敌后援团体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战爆发，学校正值放暑假，不少学生群众自发起来张贴标语，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募捐，支援抗日前线。党通过周平等发动数百名留日归国同学首先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齐起来，抗日救亡！"

市学委指示要抓住学生群众抗日情绪高昂的有利时机，迅速

把分散的学生群众组织起来，成立抗敌后援会。7月13日，20多所学校的代表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援助抗日将士的办法，后又通电慰问二十九军全体官兵。8月4日，坤范女中发起征集废铜烂铁支援抗战的活动，接着，各校纷纷成立募捐队、征集队，不少女中如培明、工部局、清心、中西等校的学生都走出课堂，走上街头，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活动。一时间，上海的街头、里弄到处传遍了学生抗日救亡的呼声，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激昂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拨动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心弦。8月30日，又一支学生劲旅——有38所学校200余人参加的由顾德欢、王明远、陈裕年、王元化、高铁生等负责的平津流亡同学会也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为了广泛地发动组织各界青年参加抗日活动，党指示黄若暾、徐云略等公开登报发起组织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不几天，报名参加的各界青年便达2000人左右。这个服务团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领导成员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如黄若暾、何彬、周鲁泉、汪福泉、杨立圻、华碧、林默涵、夏瑞、周平等，也有国民党党员，团长是张裕良。

青年救国服务团成立后，不仅开展了前线工作、难民工作和锄奸工作，而且还在学生、店员、生产工人和码头工人中进行工作。出版了《救国青年》、《抗日画报》等刊物，进行了国际宣传，提倡救国储金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各界民众热血沸腾，竭力支援抗日军队，纷纷组织各种战时服务团，奔赴前线，配合部队修筑工事，抢运伤兵，进行宣传和慰问。当时上海学生界的各抗日团体和学校，如留日同学救亡会、青年救国服务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大夏大学等都积极组织战地服务和慰问、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如同济大学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玉佛寺附近的一所民房里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

伤员医院，抢救受伤将士和难胞。当时在租界地区建立了约 20 所伤兵医院，学生纷纷前去慰问。在医院里，学生们为伤兵读报、讲解时事，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救亡短剧，帮助书写家信，为他们送水送饭、换药护理等。学生们还积极参加救护训练，如中华女子职业补习学校从 8 月开始 3 个月中由罗叔章主办了 3 期救护训练班，有 500 余名同学参加了学习。这些年轻的女学生白天做防毒面具，晚上到学校学习救护知识。当时主持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的何香凝出资购买了大量棉花布匹，她们就在校内发动妇女们日夜制作棉背心、棉军鞋急救包和慰问袋。中华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成了上海妇女界开展抗日活动的一个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起初对救亡运动比较淡漠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当他们目睹了日寇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看到英勇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战时，再也不能沉默了，于是，联合了圣约翰附中和圣玛利亚女中的同学，发动了推销救国公债运动和国际宣传活动，并向全世界学生呼吁，联合起来抵制日货，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2. 发动学生投入“节约救难”运动

随着淞沪战争的进行，战区一天天扩大，战火燃及了闸北、虹口、杨树浦、江湾和上海近郊的宝山、嘉定、太仓以及沪西、南市、浦东等地区。大量难民拥进租界，其中绝大部分是举目无亲，一贫如洗，流离失所，只得栖身街头巷尾。饥饿、疾病和死亡每天都在威胁着他们。

1937 年 12 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来及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教育工作。工委指出，难民中的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他们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抗日基本力量。搞好难民工作，不仅可以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更有利于联系这部分基本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打开工作局面，并为以后进一步发展近郊和外

县的工作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准备条件。做好难民工作的有利条件是，难民问题使租界当局颇感棘手，做好难民工作有利于安定租界秩序，因而能够取得租界当局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赞助。同时也可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难民救济工作，并使之得到教育的锻炼。

因此，党提出了“节约救难”的口号，号召“中国人帮助中国人渡过难关”。很多学校成立了不同形式的救济难民组织，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节约救难”运动。有的学校倡议“一人一月一元节约救难”，有的学校推行“一碗米运动”，将募集的大米煮熟，向难民施粥；之江大学举行了“救难募捐”音乐会；有的学生义卖纪念书签，不少学校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的学生慈善市场，将大量义卖收入分别捐助给各难民所。中国、工部局女中等一些女校会同中华妇女互助会等团体，举办工艺品救济难民展览会，同学们突击赶制绣品、童装，有的向工商界征募商品，以展览会义卖所得款子创办了一所妇孺收容所。

学生们在难民收容所里和难民们吃、住在一起，尽心尽意为难民服务，除负责登记、疾病防治和分配衣物外，还组织难民自救（生产自救）、自管（自己管理自己）、自卫（防止特务、流氓的破坏）。学生们又在难民所里教文盲难民识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他们从教难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小调》、《五月的鲜花》入手，用歌声来鼓舞难民们的抗日热情，以摒弃《桃花江上》、《毛毛雨》等靡靡之音；继而结合文化识字课，生动地讲述抗日爱国的道理，提高难民们的觉悟。同学们边学边教，自编教材，刻印讲义给难民们讲解“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等等。学校开学以后，有的学生还继续从事难民工作。许多青年学生在参加救济难民工作中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教育，他们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要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的命运是和整个中华民族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接触

基层社会的劳苦大众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如当时圣约翰附中的学生莫振球，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题为《难民教育了我》的文章，并在参加难民救济工作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救亡协会在斗争中诞生

抗战爆发后，原来的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已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当时国民党包办的学生组织更不能满足广大学生组织起来抗日的愿望。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党决定建立一个团结上海全市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7 年 8 月 30 日，按照中共上海市学委的部署，留日同学救亡会、平津流亡同学会、暨南大学留沪同学会、光华中学学生战时服务团、大夏大学、法学院和同济大学等校学生救亡组织共 8 个团体的 10 位代表发起组织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筹备委员会。9 月 3 日，学协筹委会正式成立后，即上报上海市当局申请登记立案。不到一周，报名参加的大中学校有 20 余所，9 月 12 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举行成立大会的前一天，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以上海市已有学生战时服务团为借口，不同意登记立案。筹委会代表据理力争，潘公展勉强同意，但坚持必须改期成立，代表们因已发出通知，表示不能改期，潘公展一意孤行，固执己见。9 月 13 日，在有 30 多个单位代表参加的学协成立会上，国民党突然派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自称“各校代表”，闯入会场哄闹捣乱。学协的这次成立大会被迫流产。

经过张英、陈伟达、顾德欢等与潘公展多次交涉、加之 1937 年 10 月起，宝山、大场前线告急，而学生救亡运动又势不可挡，潘公展才被迫同意学协成立，并由国民党指派了多名学生参加理事会。

12 月 28 日，推迟了两个多月的学协成立大会在浦东大厦 5 楼大厅召开，有 36 所学校和救亡团体的代表 100 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致国民党政府电、要求对日绝交、发表告世界各国

同学书、加强保卫大上海等14项提案。选举了留日同学救亡会、平津流亡同学会、暨南、大夏、光华、沪江、集训、中法、法学院、法政学院、特志、麦伦、正行、敬业、务本女中、大公等17个团体和大中学校为理事，国民党特派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也被选为理事。

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的正式成立，开创了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新局面。由书记王尧山、沙文汉、王翰、陈修良、王洞若、彭柏山等任委员的群众工作委员会和下层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十分重视学协工作。为了加强对学协的领导，早在八九月份筹备期间即成立了党团组织，党团书记由张英担任，成员先后有顾德欢、周平和陈伟达等人。

学协成立后，一方面在各大中学校积极发展个人和团体会员，并成立学协小组，团结广大学生群众，进一步发动学生参加难民收容工作；发起义卖"乐善章"，所得款项作为难民教育和生产经费；扩大征募寒衣活动，援助前线将士。同时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校际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介绍进步学生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到内地传播抗日的火种，使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抗日战争初期，广大青年学生除直接参加对敌斗争和开展宣传教育外，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还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援助政府和军队的抗战。1937年10月26日，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抗战中失利。为了掩护国民党大部队退却，10月27日谢晋元奉命率领国民党第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一个营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当时四行仓库除一面临苏州河外三面皆敌，处境极危。但是日寇用了飞机、大炮轰击，也未能拿下这个阵地。10月28日，上海的一位女学生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泅过苏州河送去一面旗帜，升起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这位女学生的英雄气概不仅博得了人们赞扬，也鼓舞了"八百壮士"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全体官兵沉着应战，坚守阵地，先后击退敌

军的6次围攻，完成了掩护任务，最后奉命于10月31日退入公共租界。

自1937年底至1941年期间，学协积极推动各校学生不断前往孤军营进行慰问，其中以1938、1939两年慰问活动最为频繁。学生们成群结队到孤军营演出活报剧，唱救亡歌曲，听战士讲述杀敌故事，参观营地，举行球类比赛等。学生与抗日将士亲如一家，相互鼓舞，相互勉励。各学校党组织把组织学生去孤军营进行慰问活动，看作是组织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对坚定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团长被日伪收买的叛徒杀害，噩耗传来，广大市民万分悲痛。各校学生也怀着沉痛参加吊唁活动，悼念这位民族英雄。

总之，学协成立后，在推进上海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开辟学校工作和发展党的队伍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第十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 党积极筹备全国学联代表大会

为了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并于1937年9月派董必武同志到武汉筹建办事处，重建党的组织。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博古)、邓颖超等同志也先后来到武汉。9月初，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人杨学诚根据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的指示，从南京到武汉开展党的工作。他来汉后，首先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武汉秘密学联、民先队的同志们取得联系。9月中旬，于光远从太原来到武汉，在武昌育婴堂街7号成立了民先队驻武汉办事处。10

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12月间，中共长江局相继建立。

正当我党在武汉逐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之际，动摇中的蒋介石却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暗中向日寇求和。汪精卫配合蒋介石，以"抗战必亡"的谬论来打击民众的抗日热情，推销他们妥协退让的卖国主张。一些亲日恐日分子也跟着散布失败情绪。但是，我党为了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中途妥协投降，尽快地把各地流亡来汉的青年和学生与武汉地区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充分发展武汉的大好形势。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武汉民先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开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青年抗日群众团体。为此，省工委决定派省青委书记杨学诚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但是，在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当时担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主张要发展民先队，他认为民先队有基础，而董必武在武汉组织的青年救国团，是以湖北为基础的，对全国没有号召力。长江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则主张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动群众比较好，因为在国民党的眼中，民先队比较红，而且民先队在南方没有多少组织，不利于发动各方面的学生救亡团体，学生联合会虽然在国民党的眼中也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比民先队的色彩要淡些。另外，在平津沦陷后，大批流亡学生来到南方转到各个学校，其中有学联的老会员、老骨干，争取各校学生自治会显然较民先队方便。最后决定筹备召开第十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

2. 国民党阴谋破产，全国学联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为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武汉开好这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各学生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和经济上的准备。在大会召开之前，黄华通过与国民党中央社一名记者（同学关

系)的交涉,由中央社向全国发了召开全国学代会的消息。因此,重庆各大学的学生会都在该校国民党的组织下选出了代表,准备参加武汉召开的学代会。当国民党中央党部陈立夫、陈果夫发现这次学代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筹备的,非常恼火,但此时那些代表有的已经到武汉报到了,有的已整装待发,已陆续集中到了武汉。这情况使陈立夫、陈果夫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劝回去吧,已经报到,留下开会吧,又不甘心情愿。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便集中国民党的学生代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宣称这次学生代表会议是共产党领导召开的,负责筹备会议的杨克夫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等等,并决定对会议进行破坏,阻挠大会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大会召开前夕,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破坏阴谋,杨克夫等人走访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要他在学代会开幕式的当天,亲自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另外又走访了《大公报》副主编廖盖隆、麦俊增,请他们在副刊上发表特刊予以支持。由于当时在蒋南翔的领导下,由丁浩川主编创办的《战时青年》刊物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为学代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又得到了武汉文化界人士的支持,同时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募得了一些捐款,为大会作了经济上的准备。经过周密的筹备,大会召开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1938 年 3 月 24 日下午,全国学代会在日租界小西路 15 号举行了预备会议。首先由杨克夫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推选了平津同学会、西北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支会及广东学生代表团为临时主席团。接着由郑代巩主席作报告,通过大会程序,讨论会章,通过审查代表条例及本届代表大会选举法。最后选出了香港学生代表团、国立中山大学抗敌后援工作团总干事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武汉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会及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等 9 个单位为大会主席团,蒋南翔、黄华、姚雪

冰、李柏、侯朝芝、方炼百、陈兹照、郑文宣及杨昭明等 9 人为大会秘书。

3 月 25 日至 27 日，第 12 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汉口商务大礼堂正式召开。全国 73 个团体和学校 133 名学生代表聚集在一起，商讨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方针。

中共驻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王明、博古等出席了大会，国民党方面出席大会的有陈诚、冯玉祥、邵力子、陈公博、叶楚伧、黄琪翔、康泽等。到会的各界来宾 1500 人。

3 月 25 日上午，大会开幕，郑代巩致开幕词，随后国共双方与会代表讲话。大会进行过程中，特务头子康泽事先布置好的数十名暴徒突然冲进会场进行破坏捣乱，企图使会议流产。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在会场上也跳了出来，声嘶力竭地叫嚣说："你们这次大会不能代表全国，我们湖北省还没有代表参加。"当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很气愤地站起来，命令维持秩序的宪兵队将闹事的湖北省党部书记当场逮捕起来，在场的康泽十分尴尬。可是会场上的暴徒仍在捣乱喧哗，致使会议无法进行。这时，杨克夫机智地请坐在主席台上的陈诚讲话。大会开幕前，康泽曾想方设法让陈诚不参加开幕式，以便于暴徒破坏大会的进行。而黄琪翔却因为事先已从杨克夫处知道有人准备破坏会场，而设法让陈诚参加了学联代表大会的开幕式，陈诚出乎康泽意料之外直接来到了会场，以致康泽来不及通知他的喽罗们，当陈诚应杨克夫之邀向大会致词时，暴徒们只得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结果，康泽的捣乱计划未能得逞。但是，由于武汉防空紧急警报，会议主席团临时研究决定暂时休会，待警报解除后，再继续进行。

3 月 27 日，大会在军委政治部大礼堂继续进行，由出席世界青年联盟大会的代表陈柱天作关于《各国青年怎样援助中国学生》的报告，他就"世界学生的情况、中国学生联合会与世界青联于 1935 年发生关系的经过、中国学联代表出席世界青联代表大会的

经过及各国学生援助中国学生的情况，详细向大会作了汇报”。会议还通过了由吴华作的《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护文化中的责任》报告。吴华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学生的一般状况及中国学生运动的特点；揭露了日本强盗给予中国学生之灾难，指出了中国学生摆脱灾难的出路；明确了中国学生战时服务工作的要求等。吴华最后说：“我们深深地感谢各国学生对于中国抗战和中国学生运动所给予的热烈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愿意和全世界的学生携手，为人类保卫和平与文化而奋斗。我们深深同情日本学生的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日本军阀最近为镇压日本学生的这种运动，逮捕了 7000 余人，代表大会对这些因反战、反法西斯而遭逮捕的日本学生，深致慰问之忱！我们相信日本学生一定能够在世界学联号召之下，中日学联共同携手，为远东的和平自由文化而奋斗。”

大会还通过了电慰前方战士、加强国际宣传工作、请求政府援助参加游击队同学及抚恤死难同学、出版会刊等提案。最后选出了 5 个单位为监委，15 个单位为执委，郑代巩为学生联合会主席，李庚、方炼百、张鉴英等为常委；同时组成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正式宣告了全国学生救国会的成立。

会议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等同志为大会题了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是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董必武的题词是：中国目前统一的学生运动是统一的青年运动的先锋。徐特立的题词是：学生运动统一在抗战到底的国策目标下。

大会结束后，《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祝中国学生代表大会》的社论，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在每个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特别指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京沪以及其他各地学生在事前事后的奔走呼号宣传鼓动，以及发动参加各地游击队伍的劳绩，更是无可磨灭。中国学生是中国救亡运动中的一支极为有力量的队伍。”

“这次抗战所给予我们的使命比以前更伟大了，任务比以前更艰苦了，前途比以前更光辉了，需要我们发挥出比以前无数倍的力量来完成我们的任务，争取我们的前途。”

3. 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后，在中共长江局青委书记蒋南翔的领导下，武汉三镇的左翼青年力量逐渐壮大。青委还派出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郑代巩、李庚等人去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省活动，扩大学联的力量。国民党对广大青年学生逐步团结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周围，十分不满，决心从思想上加强统治和毒害青年学生，以抵消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影响。于是，《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出面向蒋介石建议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1938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决定建立三青团。同年 7 月，三青团在武昌成立，由蒋介石任团长，其目的在于把三青团作为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具。但是三青团的建立并没有使国民党争到多少青年学生，于是国民党当局便采用法西斯手段，先后下令解散了民先队、青年救国团、蚁社（即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抗日团体。但是，国民党没有敢马上解散全国学生联合会，原因：一是碍于陈诚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的开幕式；二是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团体，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些地区的学联与地方实力派有联系，如广西的学生军、学生抗敌后援会就与李宗仁有联系；三是学生联合会得到了全国各界知名人士黄琪翔、沈钧儒等人的支持。

全国学生联合会与救国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救国会的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早在 1935 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各界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1936 年 5 月，各地救国会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出了沈钧儒为

首的9人主席团。全国学联负责人郑代巩、李庚都是救国会的成员，他们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不仅使全国学联了解了不少上层的动态，而且还掩护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学联的机关刊物《战时青年》在重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检查，不许出版。郑代巩、李庚等就通过沈钧儒请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题字，国民党反动当局碍于林森的赞赏，便不得不准予公开出版。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准备迫害李庚时，也是沈钧儒及时将消息转达党的领导人，使李庚等及时转移到延安，免遭敌人的毒手。

四、西北地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武汉地区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发展的同时，西北等地区的学生救亡运动也蓬勃发展。在西安，党领导青年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农村工作团，分别深入关中50多个县和陕南地区，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并建立起一支700多人的民先队，到1938年春，发展到了1600余人。4月，成立了民先队西北队部。

为了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创办了《青年战线》，西安学联编辑出版了《青年呼声》，民先队西北队部出版了《先锋》，西北文艺工作者协会出版了《沙河》。其他各种宣传活动有民先队组织的报告会，学生组织的宣传队，还有平津同学组织的抗战歌咏队、抗战演剧队等，异常活跃。

当时，蒋介石采取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指令各地的党羽，采取"统制"、"包办"、"以组织对组织"等手段，破坏抗日救亡组织，破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市反动当局首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并将各抗日爱国团体改编成后援会的分会，妄图利用统一之名，取缔救亡组织，破坏救亡运动。根据党的指示，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全国学联吸收了少数后援会的代表参加，并改组为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但是，分会的主要领导骨干由中国共产

党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担任，同时保留了学联组织，坚持联合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其他各抗日团体也是如此，使敌人的阴谋破了产。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搜罗了一批反动学生，拼凑了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两个反动组织（国民党用"抗敌"二字代"抗日"二字是有阴谋的，一旦发动内战，"抗敌"便是对付共产党的，当时如果挂"反共"的牌子不得人心，故使用"抗敌"这个双关语。）以此同民先队和学联争夺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他们的手法是：标榜抗日，拉拢欺骗，威胁利诱，对加入协会者，每月发给津贴，封官许愿，来拉拢害怕"毕业即失业"的学生，搜罗了不少渣滓。学生中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是他们的骨干；落后的学生，是他们的拉拢对象。他们一方面破坏学生的爱国统一战线，一方面造谣中伤，攻击民先队和学联，打击进步的学生，还组织打手殴打进步学生。

根据当时的形势，党及时指示进步学生团体对待顽固分子的斗争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孤立少数反动分子，争取、团结受蒙蔽的学生群众。在上层开展抗日救亡时，邀请他们参加；如果他们搬出国民党的反动主张时，我们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与之斗争。在基层，他们如果捣乱，我们就揭露他们的阴谋。很快，同学们从国民党分子的活动中识破了他们的反动面目，许多受骗的同学，不再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之后，这些国民党分子便携带手枪，监视进步学生，调查共产党员，进行造谣破坏。其结果自然更为广大群众所唾弃。

国民党顽固派"以组织对组织"的阴谋彻底破产之后，便撕下了"抗日救国"假面具，重新采取高压政策，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1938 年 5 月，国民党当局悍然下令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民先队西北队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安办事处、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新文字促进会等 13 个救亡团体，并先后逮捕了西北青年救国会驻西安负责人何志诚，民先队西北队部的负责人李连璧，民先

队西安队部负责人于志远、蔺克义、陈宇等5人。被逮捕的5位同志，当时都很年轻，所以称为“西安五青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迫害青年学生的丑恶行径，提出了严重抗议，并立即领导了“营救五青年”的运动，连续组织了几次群情激昂的示威游行，又发动各界人士开展签名运动进行抗议；同时组织各校学生、各团体的群众轮流去监狱慰问。每天都有大批学生在监狱门前抗议示威。经过斗争，在同年9月国民党被迫释放了5位青年。

1938年冬，党考虑到在抗日战争新的形势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民先队已难以公开活动，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才有利于发动、组织学生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才有利于积蓄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于是，党指示民先队不再发展，同时决定：民先队中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一部分留在西安及原先所在的县城，运用各种组织形式，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救亡运动；一部分派往农村，占领农村小学阵地，在农村青年中进行工作；一部分前往根据地，经过抗日大学、西北公学、安吴青训班等的短期学习，然后再分赴敌后根据地，到人民武装部队去，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这样做使学生运动同各界救亡运动相结合，从而发挥了青年学生在救亡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在西安，几千名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农村工作团，各团有精干的演出队、歌咏队和宣传队。工作团每到一个村镇，先把国难地图和宣传画挂出来，队员们指着图画讲解抗战形势，控诉日寇的残暴罪行，号召农民参加抗日运动。然后在村头、场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10月正是秋收季节，白天学生们下地同农民一起劳动，利用劳动歇息进行地头宣传，小娃娃们也被学生们组织起来，热心地学唱救亡歌曲。工作团的青年学生们背着行李和道具，翻山涉水，边演出宣传，边调查访问，忙个不停。工作团深入关中50多个县和陕南地区，把党的抗日主张，传播到了偏僻的山乡，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民族觉悟。

学生下乡，深入农村搞宣传，这是学生运动的新发展。它突破

了学生圈子，接触了农村社会，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特别是通过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始转变了阶级感情。因此，参加农村工作团的同学，后来绝大多数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民先队在农村工作团内发展了700多名新队员，使组织扩大了一倍半。

在农村工作团下乡的同时，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安吴堡举办了战时青年训练班。战时青年训练班后来定名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通称“安吴青训班”，由朱德为名誉主席，冯文彬为班主任，胡乔木是副班主任。青训班的宗旨是“遵照抗日建国的纲领，训练青年工作干部，服务战区、军队、农村，开展青年运动，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抗战，达到统一青运，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① 青训班的校训是：“坚定刻苦，勇敢活泼，民主团结，虚心切实”。青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党的政策和游击战术。训练班的第一、二期主要是训练西安民先队的骨干，第三期扩大到一般学生和社会青年。

1938年1月，学校放寒假，民先队又组织了一部分民先队员，在安吴堡附近举办了一次学生冬令营活动。学生的冬令营生活很苦，住破庙，睡地铺，自己运粮，自己做饭。白天，由青训班派来的政治教员和军事教员讲解党的抗日政策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晚上围着油灯开讨论会；有时还进行游击战的演习。学生冬令营办了三个星期，不仅使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而且使参加活动的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普遍有了提高，更加自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春天，民先队发展到1600多人，经过一系列的学习与锻炼，大批民先队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同年，青训班动员了500多人到华北敌后去战斗。他们整理好行装，唱着“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的歌声出发了。1938年到1939年初，青训班还组织了7个战地工作团，每个团由

① 李连璧：《古城的怒火》。《忆“西安事变”前后的学生运动》144—147页。

30几名男女青年组成，大的不过20多岁，小的仅14岁。他们背着行李和工作用具，离开学校、课堂，奔向紧张的战区，到实际斗争中去学习。① 安吴青训班这所革命的熔炉，从1937年11月1日第一期开办，到1940年4月，共办十二期，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1万多名青年工作干部。②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一条宝贵经验。五四时期，青年学生走的是这条道路；一二九时期的青年学生，走的还是这条道路，历史证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一条正确途径。一二九时期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首先是民族意识的表现。那时西安学生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便发生了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部分走上革命的道路，到农村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到人民武装部队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实行同工农相结合，彻底转变阶级立场，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另一部分不愿意背叛原来的阶级，不实行同工农相结合，埋头读书，追求名利，成为只图个人安逸、碌碌无为的庸人；还有极少数人甚至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成了革命的敌人。

五、中国学联与世界学联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引起了世界青年的重视。1934年1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了世界学生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大会，中国学生是大会主持者之一。在这次大会上，除了决定在第二年——1935年11月11日为“世界学生保卫和平、自由与文化的运动日”，号召各国学生响应以

① 《战火中的青年干校——安吴青训班》，《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

② 《中国青年运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70页。

外，还通过了一个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纲领，谴责了日、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936 年 2 月，在布鲁塞尔又举行了国际青年和平大会，这次大会决议，专门召开世界学生会议，援助中国学生的抗日运动。经过世界学联（世界学生保卫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的简称）与中国留英学生总会、伦敦中国学联共同筹备，世界学联大会在同年 3 月 14 日召开了。大会作出了有关援助中国学生的决议，还决定组织世界学生代表团访华。1938 年 4 月，代表团由世界学联秘书、法国共产党员柯乐满，英国青年和平大会学生委员会代表傅路德，加拿大代表雷克奈，以及美国代表雅德女士等人组成，对抗战中的中国进行访问、考察。

1. 武汉各界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

世界学联各代表定在 1938 年 5 月在香港会合，然后前往武汉。为了迎接代表团的到来，中国学联及武汉各界群众团体积极筹备，欢迎世界学生代表。这次的访问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正如当年《新华日报》社论所说的那样：这几位代表着世界学生团结的宾客“将在抗战中的中国考察两个月，然后到美国纽约去出席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也正是因为他们是从世界青年的战线上来的，他们将在这一有世界意义的战线上停留，而且还要到更进一步地巩固和推进世界青年的团结的大会去，”他们的来华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视他们的来华是学习世界学生的斗争经验，报告我国学生斗争经过，和巩固我国学生青年和世界学生的团结的时机”。5 月 18 日，世界学联代表抵达汉口的第二天下午，武汉各界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出席大会的有周恩来、田汉、陈绍禹和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的刘文柱等一些官员。同时出席欢迎会的除世界学生代表外，还有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外交官员，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及苏联、英国、美国的一些名记者。这些国际友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组织，甚至有不同

的信仰，可是他们却有着一致的目标，正如傅路德代表说的，“在援助中国抗战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欢迎会上，邵力子在欢迎词中说：“当我们正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掀起革命战争的怒潮的时候，四位世界学生代表远涉重洋而来，是使我们万分感谢的。”他说，“在中日战争的悲剧中，诸君可以亲眼看见……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遵守信义的，我们能克服一切困难为了和平正义而牺牲奋斗，深信我们这种精神必能唤起世界同情，和我们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最近已施放毒瓦斯，并派化学部队来屠杀中国人民，希望诸君把日寇这种野蛮行为和悲惨事实以及中国士兵民众英勇抗战的实情，广播到全世界去，使全世界都知道，为了挽回人类的命运，非共同制裁人类的公敌日本强盗不可……希望诸位能伸出同情的手来。”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在欢迎会上说：“在这次欢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的伟大的精神，使我们感觉到中国一定不会失败的。”他说：“我们看见的所有中国的人民，小至一个个孩童都知道为什么要抗战，这种民族觉醒的精神，正是中国必胜的保证”，“中国学生在过去几年中的英勇斗争唤起了全世界青年的敬佩，使我们感到援助中国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一种义务。我们募捐、示威以帮助中国，全世界青年都同情中国，都斥责日本的暴行。”他表示，“将把中国人民空前的团结统一的精神，中国青年努力参加战时工作的情形带回各国去，更发展援华运动，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完成这种使命。”① 代表团团员雅德说：“中国妇女上前线、教育民众、救护伤兵难民的工作也使全世界惊叹，而中国的解放将促进各民族以及全世界妇女的解放。”“我们要竭力援助中国，要扩大我们援华的运动。”②

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受到了各方热烈欢迎。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20多个团体都先后集会欢

①② 《新华日报》1938年5月19日。

迎，代表团在武汉还参观了武汉女中、汉口一中等学校。在整个欢迎过程中尤以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的欢迎更显示了我国人民的团结和世界人士的联合。

193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汉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博古和吴玉章举行盛大茶会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出席这次茶会的有邵力子、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邹韬奋、钱俊瑞等。中国学联会代表、武汉各校学生代表及歌咏团体，有些国家的外交使节和美国进步作家斯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都参加了茶会。周恩来在会上说明中国共产党举行这次茶会的意义，它表示我们全中华民族统一起来，团结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世界学联代表和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等和各界人士都讲了话。茶会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

2. 世界学联代表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

世界学联代表团结束了对武汉的访问后，又先后去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访问。在重庆，6月19日下午，代表团出席了文化界扩大座谈会，讨论了“如何发动世界青年一致参加反侵略运动”。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南办事处代表说：“我们都是年轻的一代，正义感最丰富，政治自觉性最敏锐，应该把世界的青年打成一片，来共同保卫自由、文化与和平，希望世界学联代表回去以后把中国抗战真实情形报道给世界人士，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联合世界舆论界对日本帝国主义加以制裁……”傅路德表示回去后定要将日本的疯狂侵略和中国的英勇抗战向全世界宣传，将实情报告给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使世界人士对中国有更进一层的了解。代表团在参观中看到重庆青年学生正从事艰苦的救亡工作深为感动，他们说：“中国青年是有希望的，中国抗战前途是乐观的，因为中国青年起来了，在广州、在武昌、在南昌、在战场，看到盈千累万的青年在为自己的祖国而工作着，今天到重庆来我们仍看到无数青年

学生在辛苦地从事后方救亡工作，这就是中国必胜的保证。”

在成都，学生们拿着中、英文书写的“中国学生和世界学生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牌，冒着豆大的雨点，守候在机场上迎接代表团。在机场上，代表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抒说了见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青年学生踊跃在前方服务的感想。出生在成都的美国代表雅德尤为激动，她说：“12年后重返成都，见到一切都进步得多了。”四川大学举行了欢迎会，学生界、文化界和新闻界也都举行了座谈会，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

在西安，民先队、西北青年救国会以及抗敌后援会学生支会的青年学生和代表团进行了座谈。往来驰骋战场的丁玲和战地服务团的女团员，以及许多青年女学生向代表团报告了西北妇女在救亡事业中的工作，与代表团交流了工作经验。世界学联代表在西安与青年团体交流了3天之后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青年训练班主任冯文彬陪同转赴中国的抗日模范区——延安。

3. 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

代表团到达延安时，受到了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同延安机关、各团体等组成了欢迎团，列成长队夹道欢迎代表团。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柯乐满、雅德、傅路德和雷克奈，并进行了谈话，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代表们问及目前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时，毛泽东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首先民众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只要在抗日的原则下，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其次，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你们从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都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

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这就是边区的性质，边区的特点”。“全中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的意义和作用。”毛泽东指出，这种制度要在全国采用，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到边区看的人不少，尤其是青年学生更多，大多数人都是说好的。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作用是什么时说：“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央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在回答了“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和“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后，毛泽东专就中国的学生及青年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及世界学生与青年在援华运动中的主要任务作了回答，他说：“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所谓一般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所谓特殊的任务，“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组织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组织救亡团体的权利，18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贫苦学生有免费入学之权等等”。至于世界青年们帮助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则“首先是经过世界学联对世界大多数青年与学生了解有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帮助中国之必要，并使他们了解反对日本帮助中国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因为和平不能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其次，学生是人们的桥梁，经过学生，使各个民族的人民懂得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及这种工作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关系。”① 在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代

① 《新华日报》1938年7月25日第四版。

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世界学联致敬，并希望代表们回去之后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的学生与人民，他说："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永久幸福而战！"①

抗日军政大学还专门主持了招待晚会，在会上授予各代表"抗日军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会上情绪热烈，充分显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紧密携手前进。

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7月底离华赴美，参加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学联代表团在抵达巴黎之后，即致函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执行部，对中国军民英勇的反侵略斗争以及全国的团结精神，表示无限钦佩。代表团在青年大会上曾发表《告世界青年学生团体及报界书》，阐述来华后对我国抗战的种种感想。并且还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及重要城市的青年团体中公开讲演中国问题，以争取各国民众对华的物质援助；发展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宣传对日封锁。总之，世界学联代表团的中国之行，不仅促进了世界学生的相互了解，而且推动了国际援华运动。

4. 中国学联代表出席世界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根据1936年9月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的决定，在两年以后即1938年召开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的青年学生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这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从与各国代表的交流中，可以学到全世界青年运动的经验。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一次向全世界青年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机会，使全世界青年对日寇的侵略、我国青年学生的抗日运动的实情得以了解和正确的认识，以"推进援华运动，争取国际援助和建立与各国青年团体直接以及

① 《新华日报》1938年7月25日第四版。

在国际规模上的联系。”①

中国学联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这个世界青年反侵略的和平大会。代表团由陆璀等组成。

1938年8月16日，举世瞩目的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在美国纽约华沙大学揭开了序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500余人，代表了54个国家，4000万有组织的青年。大会为了详尽地讨论关于和平与青年学生的福利、青年学生的国际任务等方面的问题，组织了4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报告，都得到了大会的通过。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将来工作的决议，为以后世界青年学生运动指明了工作方向。

大会期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向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的青年友人发表了播音讲话。她以中国青年的名义，热烈祝贺会议的召开，并表示了最深切的关心与期望，她认为：大会“应时而重要，因为这是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差不多包括全部文明与世界的青年代表，把他自己与全人类的广大民众联合起来，反对战争与法西斯——反对那企图毁灭我们二千年来文明果实的侵略武器与侵略行动。”宋庆龄说：“在这残暴野蛮的敌人之前，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不退让一步，拼死地斗争，坚持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不管那三心二意的人怎样想，怎样说，这已经确定是我国青年对于战争与法西斯威胁的一致答复。在这答复的后面，有着一种永远不能征服的精神。”她同时提醒美国与英国的青年朋友，“关于你们对于为着中国的生存而斗争的你们兄弟姊妹的责任”，“是你们自己国家把造成死亡与毁灭的军火材料供给了疯狂的日本军阀，使我们的躯体被炸毁被烧焦被加以恐怖的摧残！”宋庆龄在讲演中希望全世界的青年朋友，特别是英美国家的青年朋友动员起来，促进这种日子的实现，即使得“英美人民会觉悟到他们立于文明世界领袖民族地位的

① 陆璀：《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新华日报》1938年4月15日。

共同职责。日本法西斯党徒们常处在一种莫大的恐惧中，恐惧大家了解日本对于英美贸易、金融、长期信用借款的全然依赖性所能引起的后果"的日本军阀最怕的一天的到来；促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对日本实行封锁，禁止出售军火原料给日本，抵制日货。宋庆龄说："我们目睹战争惨祸的人，并不希望别的国家也卷入旋涡。我们不请求别国帮助我们打，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请求曾自称为基督教国家的那些民族，给我们一些同情和物质的援助。"①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将援华方案写进了文件，援华的具体办法：(1)禁运和禁卖一切战争物资予日本，禁止借款给日本；(2)由政府明令抵制日货；(3)人民抵制日货，同时助销中国货品；(4)以有国际担保的借款给中国，以增强中国国防及建设复兴之用。②

大会在融洽和庄重的气氛中，订立了《华沙和平公约》以作为世界青年一致行动、捍卫和平的依据。

① 《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② 《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4日。

第十一章　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斗争

一、“孤岛”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军队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在淞沪一带血战了 3 个月后奉命撤退，上海沦陷。日本帝国主义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一时不敢贸然派兵进占上海市内的租界地区。因此，上海租界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四周在日本侵略者包围下的“孤岛”。“孤岛”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日军占领上海后，英美法等国为要保持各自在租界上的既得利益，不愿激化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影响租界的继续存在，但毕竟又存在着利害冲突。上海地下党组织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充分利用租界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团结学生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 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从 1937 年底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到 1940 年 3 月汪精卫粉墨登场，是“孤岛”抗日救亡工作广泛深入发展的时期。当时，日本对华侵略侧重在军事进攻，不断把魔爪伸向内地，还来不及对占领区采取巩固统治的各种措施。而国民党势力跟随着国民党军队败退，党政要员和机关，包括学生中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的特务分子也纷纷逃离上海。日寇虽然派遣汉奸特务潜入租界进行破坏、恐吓和暗害活动，但是，这些只能更加激起青年学生的义愤，而无法阻止“孤

岛”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本对国民党由军事进攻转为政治进攻，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国内形势逆转。而国民党当局则积极推行反共政策，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1939年又连续制造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年，国民党派吴开先在上海恢复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并建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同年8月，国民党又在租界先后建立了晓光、新建、思源、肇光等几所教育部特准立案中学以装饰敌后上海教育界的门面，并借此安排国民党的留沪人员。尽管国民党、三青团内部派系明争暗斗，其上层分子总是把矛头指向爱国的进步学生，然而，它的下层人员中还是有不少是爱国抗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青年学生则除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进行斗争外，主要还是开展反对汪精卫的投敌活动。

1937年11月，当国民党军队败退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即发出了《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今后的新环境下，上海党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继续巩固和发扬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反日斗争，一直到反日游击活动”，“充分准备力量与全国抗战配合，争取最后摧毁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恢复上海”。1938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向江苏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坚持抗战总方针，在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的同时，努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民众运动，并加强敌后工作，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并强调指出，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中，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荫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194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针对“孤岛”环境日益恶化的新情况，向江苏省委发出《关于上海党的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必须时刻警惕和估计到租界环境有极大逆转可能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明确强调：“将已暴露的同志送往新四军区域，将这些支部变为短小精干的支点”，“将过去因积极参加过抗战工作而暴露了的群众组

织化整为零，并转成纯友谊性质的团体”，“少做表面的抗日的空喊和暴露工作，多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埋头苦干的工作。”

上海市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在认真学习了省委的指示后，根据“孤岛”这段时期内的特点和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改变工作方法，有步骤地将工作重点由校外转向校内，做好基层学校的工作。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组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使广大同学进一步认清形势，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对汪精卫的媚日投敌行径给予坚决的打击，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分裂、倒退行为给予有力的揭露，尽可能地利用租界当局与日本侵略之间的矛盾，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时期里，学委通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和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和其他学生团体广泛发动和团结了觉悟程度不同的学生群众，在汪精卫粉墨登场、日本侵略者加紧对租界控制时策略地进行了斗争。与此同时，在斗争中涌现的经过考验的最先进、最觉悟的学生陆续被吸收到党组织中，使党的队伍在学生中迅速地壮大了起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又把因公开抗日而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送往解放区或转移他校，并在重点学校建立平行支部，以防敌人的破坏。由于学委切实遵照上级党的部署，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及早为更大的逆转作了准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和汪伪突然侵入租界时，上海学生系统的党组织未遭破坏，并能在敌伪法西斯直接统治的区域内，继续坚持斗争。

2. 积极活跃的上海联学生

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是基督教青年会支持的有历史传统的、由各校青年会和团契民主选举组成的校际性组织，以开展基督教学生运动为宗旨、通过各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群四育，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参加的学生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教徒。抗战爆发后，上海联在孤岛的险恶环境里活跃在教会

系统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上海联针对教会学校的具体情况，按照教会学校学生的特点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传统，以生动活泼的群众喜爱的形式，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逐步引导他们走上爱国进步的道路。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沪江、东吴、之江大学和华东地区不少教会中学迁入上海租界，加上原在租界内的圣约翰大学、中西女校等，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大增。在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教会学校学生也开始投入救济难民、慰问伤兵等社会服务工作。

在淞沪炮火声中，教会学校的一些进步青年竭力主张上海联应根据抗日救亡的形势，积极参加救难扶伤等爱国工作。他们的愿望得到青年会爱国人士吴耀宗、沈体兰、江文汉、刘良模、邓裕志等的支持。1937 年 10 月，各教会学校青年会和团契的代表集会，选举了新一届上海联领导机构。沪江大学学生俞沛文当选为主席。这年底上海联借女青年会举办“慈善市场”，参加的人有数千，义卖所得用以救济失学流亡学生和难胞，又举办了讲演会、讨论会、出版刊物等，这些活动鼓舞了教会学校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中共江苏省委十分关心教会学校学生运动，考虑到当时上海的局势必然日益恶化，即指示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工作应作适当部署，以利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1938 年，党在一些教会学校的进步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同年底，江苏省委专门成立了基督教学校学生运动工作委员会，由陈修良负责联系，以加强对教会大中学校学生工作的领导。

1939 年 8 月，上海联推举代表陈秀霞等两人参加了在昆明官渡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学生代表会议，并在会上汇报了抗战以来上海联的工作。上海联的代表被选为全国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主席。大会还发表了坚持抗战和团结，推行民主政治等各项主张的宣言。

整个“孤岛”时期，在基督教学校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上海

联和各教会学校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它广泛团结学生群众，进行了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启蒙教育，开展了学生青年的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上海学生运动中一支重要的爱国力量。在日寇统治时期，教会学校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始终得以保存和发展，这不仅在当时支援了抗战，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成为外交、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战线的骨干力量。

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新方针，汪精卫公开投敌

1. 上海学生界开展护校斗争和反汪运动

1938年，日伪开始向"孤岛"教育界伸手。学委和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党团领导学生发动了护校斗争。1939年至1940年春，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统一部署，学委又领导全市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伸张了民族正义，使敌伪企图伪化学校、控制上海青年学生、推行奴化教育的阴谋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扶植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维新政府"。紧接着，上海伪政权便开始觊觎"孤岛"各大中学校。6月，日伪势力侵占海关后于7月初胁迫租界各学校向伪市政府登记，企图伪化教育事业。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各校师生展开了"反对学校附逆"的护校斗争。上海教育界同人联合发表护校宣言："保护教育权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天职，应采取集体的力量与汉奸教育败类斗争到底"。有的教会学校学生与英美校方及老师一起，日夜巡逻护校，防止日伪入侵。当时各校青年学生爱国心切，坚决反对登记，反对奴化教育，显示了爱国群众的力量。如清心女中的学协成员在学协领导下首先发动了护校斗争，7月6日，正当学校进行期终考试的时候，《译根》隐约透露了校方要向伪督署登记的消息，同学们闻讯后，马上在大操场上召开了全校同学紧急大

会。当护校委员会主席何乐福(郭世毅)在会上宣布校方即将附逆的消息后,群情激愤,大会当即提出了"师生合作,保护学校,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并推选代表同校方交涉,要求校方:1.登报声明拒绝登记;2.成立师生护校委员会;3.保证同学安全,不得借故开除学生。谈判中校长张石麟先生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继而又否认了自己的许诺,这就更加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懑。在烈日当空、毫无遮蔽的操场上,全校500余学生坚持等候了5小时之久。经过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校长不得不全部接受同学们的要求。清心中学的学协小组团结全校师生合作斗争,取得了"孤岛"护校斗争的第一次胜利。清心中学的斗争,很快鼓动了其他学校。8月2日,新寰、正行、同义等3所中学联合发表声明,拒不向伪政府登记。同月,爱国女中校董会也登报否认向伪政权登记的意图。至9月底,前后有100所学校表示反对登记,声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承认汪伪政权,大大伸张了民族正气。

在"学协"的领导下,各校师生很快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纷纷拒绝奴化教育。在强大声势之下,租界当局不得表示:租界内的教育权绝不允许他人侵犯。"孤岛"各校的护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敌人企图把奴化教育这条魔爪伸向租界的阴谋未能得逞。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觉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2. 席卷全市的反汪运动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认为蒋介石政府已不能对它造成多大威胁,因而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而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种转变,从日本内阁首相近卫的三次声明中可以看出来。1938年1月16日,即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近卫第一次声明发表,两天后,日本政府又发表一个补充声明,强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即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扶植伪政权的强硬方

针。1938年11月3日，近卫第二次声明，狂妄地提出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同时又宣布，只要国民党放弃抗日，日本将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1938年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投降，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都可以存在，甚至日本还可以从华南、华北撤兵，华北在名义上也可以属于中国。但日本提出的条件不但损害了蒋介石政府的利益，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因此蒋介石未敢接受，而暗藏在抗日阵营中的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则公开呼应近卫声明。1938年12月，汪精卫、陶希圣、周佛海、曾仲鸣等潜离重庆，经昆明到达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为日本侵略者辩解，并劝说蒋介石以近卫声明为根据，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这批民族败类公开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权，汪精卫自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长”。这个傀儡政权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汪精卫集团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充当鹰犬和帮凶，另一方面更加激起了上海学生界把反汪运动推向高潮的决心。

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登场。当天，中共江苏省委发表《为开展反汪运动告上海同胞书》，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发表宣言响应号召。这一天，全市学生举行罢课和反汪宣传。省立上海中学召开了讨汪大会，学校大门上高悬着“反汪罢课”的大横幅，会场四周贴着“抗战到底”、“反对投降”等标语，1000余名学生，冒着蒙蒙细雨，集中在操场上，举行声讨汪伪的大会。学生们谴责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要求校方：(1)不向日本投降；(2)不向汪伪政府登记注册；(3)不开日语课；(4)允许学生进行爱国活动。代理校长慑于群众声势公开表态，但言不由衷。当时，有人向法租界巡捕房告密，捕房警车冲击会场，并抓走两名学生。当巡捕将这两名学生押上警车时，同学们拥上前去同巡捕讲理，当场有一二十名同学争上警车，

其他没有上车的同学紧跟车后到了捕房，在捕房门口聚坐抗议，并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押同学。当警官问谁是发动者时，同学们齐声回答："我们都是！"而且反问警官说："你们法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吗？"法国警官无词以答。同学们还发动家长出面交涉；通过报纸舆论声援。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法捕房第二天便不得不释放了两位被无理扣押的学生。斗争取得了胜利。

之江大学政治系学生公开组织了一次对汪精卫审判的模拟法庭，以大量的事实控诉、声讨汪逆的叛国罪行，最后，"法庭"对汪逆缺席审判，判以死刑，以泄公愤。全市各大中学校的反汪、讨汪声浪，一浪高似一浪，学生们集体宣誓："我们是祖国的儿女，我们忠于祖国，不做亡国奴……"广大学生群情激昂，高唱爱国歌曲，高呼反汪口号。还有不少学校发起反汪签名运动。学生们上街进行反汪宣传，散发和张贴"学协"印发的漫画标语传单和反汪宣言。汪伪政府下令各校为"还都"悬"国旗""庆祝"，有的学校同学们故意悬挂半旗志哀，有的把伪国旗上的"脚布条"（即汪伪"国旗"上沿用青天白日旗上加沿的黄布边）撕下以示抗议。

3月31日，大同大学和附中学生为抗议汪伪政府的成立，全校罢课一天，附中近100名学生准备上街游行，被校方阻挡，地下党员曲瑾被校方开除。1940年4月20日，汪伪政府为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亲日奴化教育，通令各中、小学校每周实行一小时的所谓"精神训练"。汪精卫企图以"和平、反共、建国"的"施政方针"作为"教育方针"，使青少年的思想与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意识吻合一致。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南京伪教育部重新编写教科书，把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和汪伪的"和平、反共、建国"等内容写进教材，并规定各学校要以日语代替英语为必修科。广大青年学生对汪伪政府的奴化教育，以各种形式进行抗议。有的学校的学生，当汉奸讲话时，就在台下拍手蹬足，进行"有声抗议"；有的学校，当日本教员在黑板上用日文写上"满洲国"要中国学生朗读时，

学生们闭口不言，采取无声的抗议；有的学校停课，有的学生干脆以退学以示抵制，使汪伪的教育方针无法实施。护校斗争和反汪运动，使"孤岛"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显示了党的坚持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广大学生群众所掌握，就会成为巨大的力量。

3. 打入汪伪组织开展合法斗争

1940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指出："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江苏省委和后来的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遵照中央这一指示精神，要求上海市学委注意和利用有些党员的家庭、亲友或其他社会条件，打入敌伪团体，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争取那里的群众。

1943 年 3 月，汪伪的中国青少年团在上海成立市团部。11 月，在已由汪伪市政府接管的原法租界（第八区）成立伪中国青少年团第八区分团部。12 月伪市团部决定在第八区分团部建立 6 个区团部。学委决定派自 1942 年秋已在小东门地区从事商业上层统战工作、打入日伪保甲组织的中共党员邵钰刚（邵洛羊，原大学区委委员）和萧子冈（原大同、大夏大学支部书记）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打入汪伪中国青少年团，分别取得第一区团部专务副指挥和第一大队大队长的名义，为开展学生和各界青少年工作，建立了合法的阵地。

1944 年 8 月，汪伪中国青少年团改组，建立了包括苏州河以南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地区在内的新第一区团部。邵钰刚被委任为专务副指挥，萧子冈被委任为总干事。上海市学委指示邵、萧利用新建立的区团部作掩护，着重做好两项工作：其一是建立群众性的一青俱乐部，广泛吸收职业青年参加，积极扩大、争取团结职业青年工作的阵地；其二是以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为名，组建青年服务

大队，为将来夺取武装作准备。后来，市学委又先后增派了党员陈立平（陈德贵）、杨伯伟和廖临打入第一区团部，开展合法的群众反汪斗争以及发展党员工作。

一青俱乐部成立于1944年秋，设有图书馆、读书班、歌咏班、话剧组、京剧组和球类活动等，吸引了一些职业青年参加，成为当地青年店员和学徒业余活动的中心。1945年，话剧组发展为一青剧团，以筹募青年服务大队经费的经费为名，于1945年5月公演历史话剧《党人魂》（即徐锡麟与秋瑾），观众逾万，宣传了爱国主义和革命气节，对激发群众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学委还指示，在各种活动中要特别注意利用当地上层作掩护。由于贯彻了这一指示精神，工作开展较为顺利，如对在上海南市小东门地区任伪总联保长的高维庵，地下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当外界对以青少年团为名义的一些活动进行干扰而产生压力时，往往经过他出面斡旋，使情况有所缓解。

学委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打入敌伪群众团体，利用合法身份做好工作外，还积极组织中共党员打入南京汪伪青运的领导机关。1943年七八月间，上海市学委派中共党员叶再生、王君珊考入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第一期高级训练班，以便毕业后打入汪伪青年组织，取得地位，长期埋伏，开展党的工作。叶再生毕业后，便在南京任中国青年模范团团本部、中国青少年团团本部和青年馆三个机构合署办公的文化组主任干事，不久又被提升为中国青年模范团团本部组织组长。王君珊毕业后分配到昆山工作。

1944年秋，叶再生发起组织南京市工商青年联合会。为便于开展工作，由林柏生任会长，叶再生被任为总干事。在叶再生的主持下，联合会积极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体育文化活动，经常组织球类活动和戏剧演出，还开办图书馆、出版期刊等。参加的青年人数众多，会员最多时达2000人，除青年学生外，其中相当部分是敌伪陆军修械所、华中电厂、水厂、电信局、邮局等单位的工人和技术

员。党通过南京市工商青年联谊会这个合法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党员，使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教育和团结青年的阵地，也为日后党开辟各工厂、市政单位的工作，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叶再生在通过联谊会组织青年生活营时，还掌握了100多条枪。叶再生的组织关系一直是属于上海市学委领导，直至1945年6月，为利于工作开展才转至南京市工委，由中共南京市工委直接领导。

三、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加紧迫害进步青年学生

1. 国民党疯狂捕杀抗日青年学生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政府已退至西南、西北大后方。同时，将它的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民众抗日团体和学生救亡运动，采取高压手段予以取缔和摧残。早在1938年2月和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曾两次下令解散西北青年救国会等13个抗日爱国团体，7月间，逮捕了西北青年救国会驻西安负责人何志诚、民先队西北队队长李连璧、和队员于志远等5人。中共陕西省委发起了营救五青年运动，组织西安学生游行示威、动员各界人士签名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释放了5位青年。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民众团体战时行动规约》限制抗日团体集会、结社自由，并强迫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进步团体。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秘密文件，从各方面强化其法西斯统治，摧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强迫解散了全国学联、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

年学生进步团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学生，进行绑架和残杀。1940年六七月间，仅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7所高等学校中，国民党特务就逮捕了33名进步学生，在綦江一地就枪杀了100余名学生。在西安、重庆、贵州、上饶等地，设置了法西斯恐怖统治的青年劳动营、集中营，先后囚禁了20万抗日青年学生，对他们施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国民党政府为了从思想上加强统治和毒害青年学生，还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思想，封闭进步书店和报馆。在学校建立法西斯的训导制度，向学生灌输"读书就是救国"的谬论，要青年读死书，不问政治，并采取了加重课程和会考、总考等制度，迫使学生不能去搞社会活动。另外还任意检查学生的书信、壁报，不许学生会客、出校门，用种种卑鄙的手段限制学生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与此同时，还在学校里欺骗青年学生参加反动的三青团，以便从组织上控制青年学生。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控制全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反动政策，1939年后，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权势，发展三青团组织，到1940年，就由原来的1万多人发展到20多万人，而且整个三青团完全成了由复兴社操纵的反动组织。学校内的公开阵地，如学生会、系会、级会等，大多被三青团夺去，进步学生受到监视、逮捕。这样，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工作，便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2. 国统区学生工作方针的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改变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1939年7月28日，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的学生工作讨论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应该把学生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广大青年中去，到职业青年、青工、店员甚至到青年农民中去调查研究，他着重指出，中国革命需要青年，尤其是需要知识青年为桥梁，数十万学生包括敌伪、大后方地区的学生是革命的干部，要在政治上、学习上、体质上

关心他们的成长。他还指出，青年要交友，对中间分子要从感情上、道义上、学习上加强联络，要做患难之交。

1940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指出："由于国民党对学生运动采取极端压迫的反动政策，因此我们今后在国民党区的学生运动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的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工作中心应自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因此，在工作中必须遵守：(一)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操行；(二)争取团结大多数同学，应以思想的启发为主，提倡尊重人格，研究学术，暴露社会黑暗，介绍文艺作品和不违禁的较进步刊物，但并不放弃适当的共产主义教育。尽可能的组织学术性、生活性、友谊性的团体；(三)对于学生合法团体如学生会、系会、级会、同乡会、青年会、音乐会、球队等，应依环境可能进行组织，多注意学生福利事业及民主作风；(四)争取好教员对我们的同情，麻痹坏教员对我们的敌视；(五)经过一些积极分子参加与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六)领导学校支部的各县区青委，尽可能入校读书等。"① 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国统区青年工作会议。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以及胡乔木、蒋南翔等主持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 16 字方针。强调要团结广大中间力量，反对宗派，反对小圈子，批评那种"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张牙舞爪、到处吓人"的作法。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青委发出了关于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规定了青年统一战线的对象和方法。

在党的一系列方针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地学校的学生工作便由过去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向隐蔽的、分散的、小型的活动。在工作方针转变中，党在昆明联大的学生工作成绩最为显

① 转摘《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 年，230—231 页。

著。

联大的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时联合组成的。1938年秋，武汉、广州战事紧急时，联大由长沙迁往昆明。由于昆明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存在着矛盾，客观上就为开展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联大刚迁到昆明时，学生只有600人左右，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多数已离校，校内进步力量很薄弱。当时，中共联大地下支部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学生中重新集合了留校的民先队员，于1938年末成立了秘密的民先队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不久，联大支部以民先队为骨干，团结进步学生，组成了一个公开的群众性的进步社团——群社，成为党领导下开展民主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

党通过群社，开展了各种容易被一般学生接受的活动，如出版壁报，组织各种演讲会、辩论会、文艺讲习班、社会科学学习小组，举办夏令营、月光会、歌咏、体育比赛等活动，还组织学生下乡和到军队中进行抗日宣传。通过这些活动，广泛团结了具有不同爱好的学生。在这基础上，经过普选，进步学生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这样，校内民主活动更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创造了这一时期联大的丰富多采的民主生活和活跃的政治气氛。很多人感到这里的民主集会和自由的歌声，随时都给人以活力，"往往在极苦闷时，参加一个晚会而可以重新振作起精神。"① "只要在民主墙边停留一会儿，就立刻感到抗战的呼吸了。"② 群社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以能成为群社一员为荣，社员最多时达200多人，先后参加者共1000余人。这一段时期的工作，为以后联大的民主活动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干部。在此同时，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建立了党总支。工学院、师范学院都设立了分支部，党员总数为40多

① 鲁溪：《我的教书生活》。载《联大八年》第62页。

② 史靖：《抗战时期昆明学生运动散记》。载《红旗飘飘》第二集102页。

人，占整个云南省地下党员150余人的1/4左右。处于秘密状态的民先队支部，在群社活动大力开展的情况下，根据党的指示逐步停止了活动，大部分民先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大后方，国民党也加紧逮捕迫害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西南联大的形势也发生了突变，校内的三青团分子大肆活动，公开撕毁了民主墙上所有进步的壁报，特务打手们在学校附近横冲直撞，由国民党特务组成的训导处，不断有鬼鬼祟祟的人出入，联大进入了乌云密布的时期。党组织采取了果断行动，及时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诬蔑，教育了广大群众。1月7日、8日两天，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冒着极大的危险，抄录了《新华日报》发布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和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出去。人们在新校舍的围墙前激动地争看这些消息，正直的老师和同学都义愤填膺。这些行动使反动派十分惊惶，学校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3名进步学生无理开除。为了避免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损失，中共联大党组织及时布置了疏散工作，将绝大多数党员和进步学生100余人撤离学校，分散到云南边境各县和少数民族地区，到农村、矿山去工作，有的担任县立中学教员。这些学生在与工农结合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边疆地区扎下了根，播下了革命火种。

联大遭到国民党特务控制之后，群社等进步团体被迫解散，民主墙上的进步壁报也被迫停办，公开的进步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再度为三青团篡夺。1941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又通令"整顿学风"，叫嚷"凡有越轨，执法以绳"。在恐怖气氛笼罩下，联大的民主活动转入了沉寂时期。这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勤学、勤业、交友》的社论，联大党组织要求处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的党员和进步学生"以自己的人格和学识去感动人家，

以诚恳亲切的态度去接待人家”与朋友“一块去共甘苦、共欢乐”，等待时机迎接新的战斗。党的号召变成了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实际行动，他们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很快获得了大多数同学的信任和拥护。如当时地下党总支书记熊德基就是联大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他的学识在师生中深孚众望。在物价飞涨、学生伙食下降的情况下，一些优秀党员积极参加伙食团工作，如当时中文系的共产党员齐亮，平时作风朴素，在为大家操办伙食工作中，勤勤恳恳为同学服务，深得同学拥戴，后来被大家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思想对青年学生的进攻，皖南事变后不久，“联大”党组织负责人熊德基以优秀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办了壁报《春秋》，发表了《我为青年说话》等文章，驳斥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对学生的污蔑，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青年学生所遭受的压迫与摧残。《春秋》壁报冲破了校内低沉的政治空气，改变了壁报上清一色反动文章的局面。虽然《春秋》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办，但它却犹如从阴云翻滚的隙缝中露出的一丝阳光，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3. 国统区学生掀起“倒孔”运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在香港失陷前，不去抢救在港的知名人士，而是用飞机抢运私产，甚至连他的几只洋狗也用飞机运到重庆。这一情况激起了联大学生极大的愤慨。1942 年 1 月 6 日，联大学生自发地结成 1000 多人的队伍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等口号，并沿街用粉笔在墙上书写标语。游行后，各校联合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向市民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的罪行，通过了要求政府取缔特务统治、制裁孔祥熙等项决议。这次活动是自皖南事变后第一

次对国民党的示威，也是抗战期间昆明学生第一次游行示威。这次事件教育了群众。揭露了四大家族的极端腐朽，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很大的打击。重庆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蒋介石一再密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行政院、教育部也接连密电联大当局，立即"制止出轨行动"。甚至连宋美龄也急忙赶到昆明，召集联大的学生"训话"。这些都反映出国民党对倒孔运动的极端惶恐。这次运动，影响了大后方不少学校，如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和遵义某些中学也掀起了倒孔浪潮。

倒孔运动后，联大党组织撇开为三青团控制的学生自治会，把工作重点放在系、级活动上，以公开合法的系会、级会与壁报团体的名义，举办生活座谈会、学术讲座，社会问题专题报告会、辩论会等，团结了广大同学。社会系邀请了民主人士李公朴来校以讲演"战时教育"为名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系会、社团组织学生到国民党军队中以"劳军"为名，进行抗日宣传，以及到石林参观旅行，加强学生与社会的接触。进步同学还用坐茶馆等方式进行个别交友谈心活动。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到 1944 年初，联大的民主空气又活跃了起来，进步力量又在多数系会、级会中占优势，而那些被三青团控制的校学生自治会实际上已成为空架子。接着一些进步社团也公开成立了，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社等。民主墙上又开始呈现出一片朝气。在斗争中一批新的学生骨干成长起来了，党组织周围又团结起数百名进步分子。这时，皖南事变后疏散到外县去的党员和进步学生也陆续回校复学，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大大加强。联大党组织经过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开展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

1. 国统区学生开展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

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针对敌人的“扫荡”、“蚕食”、“清乡”政策，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顽强斗争，粉碎了日、伪、蒋的夹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后，度过了敌后战场最困难的时期。1944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在国内，八路军、新四军也开始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空前提高，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腐败。

同年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大陆的日军和孤悬在南洋的日军联络起来；另一方面也是便于将来在大陆上和人民军队作战，便对国民党发动了新的进攻，但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实行了惊人大溃退，在短短8个月中连续丢失了河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分和贵州的一部分，146个大小城市失陷，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军事危机，证明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政治上，它坚持一党独裁，实行法西斯专政；经济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以“抗日”的招牌，用野蛮的掠夺方法，集中了全国大量财富，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在工业上的垄断，扼杀了民族工商业；在农业上，以田赋征实残酷地剥削农民。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物资缺乏、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争取生活权利，不仅劳动人民连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四大家族的垄断、统治政策感到不满。1940年12月，马寅初因主张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资本税，并没收不义之财，被特务绑架。1941年6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等发表联合声明——《实业界之困难与期望》，反映了“工业界资金周转日陷艰窘，每一念及，实感寝食之难安”的痛苦，要求重庆政府改善在税捐、资金、原料、运输、营制等方面的政策。1945年5月，上述各单位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递交国民党十二中全会。重庆实业界代表接连集会，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取消统治政策，保护民族企业。

要求民主，实现宪政，是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早在1939年9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即通过了由中共参政员陈绍禹及其他参政员共59人提案——《请政府定期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要求重庆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在延安及全国各地相继组成了宪政促进会、座谈会、讨论会，要求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在人民的压力下，重庆政府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宣告，一年以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它所谓的宪政，是维持抗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制定的"宪法草案"，它宣布："五五宪草"，"不容轻易修改，更不容蔽于成见，存根本推翻之念"；"国民大会代表系政府依据法令合法选出，自不容随意更张。"①

1940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发表演说，揭露了国民党把宪政变成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的独裁做法，以及其欺骗宣传。因为国民党方面根本无意于真正实行宪政，所谓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自此之后，就遥遥无期了。

1941年9月，张澜、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等在香港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刊机关报《光明报》，发表宣言及纲领，主张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证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根本调整党派间不协调之点。1944年6月18日，李济深、柳亚子、黄旭初等在桂林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委员会。针对河南战役的失败，李济深发表广播演说，抨击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组织民众，实行抗战。接着，张澜等在成都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的10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7月初，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张

① 1939年10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关于宪政问题之临时宣传要点》。

申府等20人及在成都的黄炎培，致电响应桂林文化界的呼吁。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同盟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组织，吸收了一部分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并公布了纲领草案。

在国民党内部、冯玉祥、孙科、邵力子、覃振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在重庆，国民党内要求民主的座谈会即70多个。

学生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昆明西南联大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堡垒。1944年5月4日，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教授创办的《自由论坛》是反对专制独裁、宣传民主自由的喉舌。它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① 这时，昆明、桂林、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也纷纷举行演讲会、座谈会，争取民主、自由。7月24日，全国著名的民主爱国战士邹韬奋逝世。10月，宋庆龄、郭沫若等发起召开追悼大会，一致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践踏民主、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反对法西斯迫害。

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等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1940年以来，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反共，南方局贯彻党中央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3年前后，随着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南方局在注意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了在群众中建立广泛的工作基础，开展群众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从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出发，也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不满。他们本想通过对蒋介石的援助，推动重庆政府进行改革。但实际证明了与他们的

①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382页。

愿望相反，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有了美元就不需要改革了。为此，1944 年 7 月 12 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向国务卿赫尔利报告说："我感到，要想控制住局势，只有采取激进措施，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党派和各种分子的统一战线。这些党派和分子应当和蒋介石共同负起制定并实施重新开展抗战、恢复军民双方的抵抗精神的计划的责任。这就要求蒋介石那方面能来个彻底大转变。"① 美国报刊也不断出现批评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文章。上述情况，不能不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动向发生影响。

2. 青年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深切痛恨和强烈不满，各阶层人民迫切要求彻底改革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194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代表林柏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明确提出由各抗日战场、抗日军队、地方政府、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紧急国事会议，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更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昆明、成都、重庆等大后方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争民主、反独裁斗争的最前列，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时代的潮流。同年 10 月 7 日，成都 5 所大学的 12 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事座谈会，参加的学生有 2000 余人。大会宣传了党的主张，学生们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群情高涨。这次大型集会，冲破了国民党控制下的低沉政治空气，在西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适应西南地区学生民主运动日益扩大的需要，根据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织的指示，建立了成都中国青年民主抗日协会（简称民协），年底，在重庆组织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② 民协和新

① （美）伊·卡恩：《中国通》。第 145 页。

② 1945 年 8 月，中共南方局正式批准了"新青社"的成立。

青社在组织成都、重庆学生开展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 年 10 月 31 日，成都发生了武装警察镇压市立中学学生的流血事件。成都市市长余中英、警察局长方超带领数百名警察包围市立中学，打伤反对“党化教育”的学生 30 余人，逮捕 40 多人，制造了“市中血案”。消息传出引起了成都各校学生极大愤慨。11 月 11 日在民协组织下，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和从沦陷区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全市大、中学生 5000 余人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殴打学生的暴行，声援市中学生，要求严惩肇事凶手，赔偿学生损失。游行学生呼喊“保障人身自由”、“反对党化教育”、“民主自由万岁”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歌》等歌曲。口号声、歌声震撼了天府古城。在群众的压力下，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不得不接受了学生的请愿要求，余中英、方超“引咎辞职”，双十一游行示威取得了胜利。

同年 12 月 25 日，昆明学生、市民 6000 多人召开了云南护国纪念大会。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立即停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学生的建议下，会后举行了大游行。游行群众第一次在大后方喊出了“争取民主，打倒独裁”的口号。

在民主运动高涨的情况下，1945 年 3 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昆明各学校进步学生洪德明等 20 余人，秘密成立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民青的骨干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它的成员除大、中学生外，还有部分工人和新闻工作者。民青组织，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学生运动的得力助手。

1945 年五四时，民青先后在西安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语专科学校等 4 所大学和 20 多所中学建立了分支部和小组，还建立了一个工人分部（后来根据党的指示改为民主工人同盟）和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所大量翻印《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整风文献》等著作和各种传单、宣传品，这些著作、传单在学生和进步教师中广为流传，给他们带来了清新的精神食粮和

抗日战争的消息。

1945 年 4 月 6 日，昆明联大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事的意见》，意见书开头写道："历史在跃进，民主在昂扬，祖国在危急中，同胞在水火里。抗战八年以来，国土连年丧失，人民惨遭涂炭；贪污已成泛滥的长流，特务作为统治的工具；财富集中，通货膨胀，大多人民不能不陷于饥饿死亡；统治思想，排除异己，正义的声音被迫归于喑哑……"① 意见书历数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状，提出了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取消一切特务组织、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党化教育等 6 项要求。这份意见书是联大学生经过八年抗战民主觉悟的总结，集中地提出了大后方人民迫切的要求。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消息传到昆明，各校青年学生受到极大鼓舞。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民青和昆明 4 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决定从 4 月 30 日到 5 月 6 日，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把昆明学生的斗争引向深入。纪念周期间，昆明各校学生、职业青年络绎不绝地来到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参加各种纪念活动，使近 2 万青年受到一次广泛的民主教育。

国民党统治当局对昆明学生五四纪念周活动极为仇视。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昆明地方当局对"学生的不轨言行，严加防范"。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命令昆明各报不得刊登有关五四的消息，一面又令昆明市三大影院在五四那天免费招待联大学生看戏，企图以此分散学生的民主力量。可是爱国青年学生及时识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谁也没有去看戏，而是把入场券集中起来，由学生自治会在校门口设了桌子，将它转送给贫苦市民。5 月 1 日，昆明各校学生在云南大学举行音乐晚会，《五月的鲜花》、《怒吼吧！黄河》等

① 《联大八年》第 31 页。

歌声回荡在云南大学校园上空。5月2日，举行了诗歌朗诵晚会，5月3日，举行了五四青年运动讨论会，5月4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支持下，由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4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在云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许多工人市民也赶来参加，游行人数达1.3万余人。学生高举着"昆明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反内战、争民主大游行"的横幅和"我们要民主"的标语牌，从青云街经武成路、福照街、光华街……正义路、华山南路回到云大。沿途高呼"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口号，这些口号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愿。通过这些纪念活动，民青和进步社团迅速发展壮大，进步力量掌握了2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5月中旬，由民青和4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起，成立了昆明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共产党员齐亮被选为学联主席。昆明学生有了自己公开的领导机构，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是独一无二的。昆明学联成立后，各校民主活动便蓬勃开展起来了。规模比较大的时事晚会、演讲会、文艺晚会、戏剧晚会、营火晚会、诗歌朗诵晚会、美术展览会等各种形式都充分利用了。党的七大文件也公开贴在联大的民主墙上，人们争相观看。昆明学生的民主活动迅速传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城市，对当时重庆、成都、西安、遵义、贵阳等地学生争取民主的活动起了推动作用。

在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摧残、掠夺、侮辱和残酷的压迫，因此，激起了他们无比的愤怒，渴望早日报仇雪耻，他们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胜利的鼓舞下，极大地振奋了抗日情绪，迫切地要求组织起来。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积极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在地下党的影响下，自愿地组成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组织，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投奔到各抗日根据地去。同时，地下党又动员和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城市工作训练，然后再派回城市工作。在一些城市郊区着手组织地下军的武装活动，沦陷区的青

年学生成了地下武装活动中的一支最活跃的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西南大后方学生争取民主运动和沦陷区青年武装组织力量的发展，不仅配合、推动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而且也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斗争打下了基础。

第十二章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

一、争取和平民主与反"甄审"斗争

1. 庆祝胜利，惩办汉奸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这一消息从电台传出后，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从城市到乡村，从解放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人们兴奋地谈论着，发出快乐的笑声，流着激动的泪水。沦陷区的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爆竹声声，一片欢腾，茶馆酒楼里挤满了笑容满面的市民，不管是相识者，还是陌生人，都情不自禁地频频举杯，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而干杯。青年学生更是高兴得欢呼、跳跃。在沦陷区当了八年的孤儿，满心以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如今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可以尽情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他们仿佛看到希望之门已经打开，展现在眼前的是读书、工作、建设祖国……一片美好的前景。

可是，正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的时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批又一批从天上飞来，从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乘飞机来，从地下钻出来（昨天还是汪伪汉奸，今天却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成为"劫"（接）收大员，他们像一群饿狼，扑向各国民党的收复区，贪婪地搜刮各种可以劫收的财物。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到处抢房子、抢位子、捞金子（条），抢车子（汽车），连敌伪人员的小老婆也成了他们的接收对象。由于国民党政府搜刮民脂民膏，造成物价飞

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时原沦陷区的人民怀疑产生了，他们说："盼'中央'，望'中央'，没料到'中央'来了更遭殃"。

抗战胜利后，受尽了日寇和汉奸卖国贼欺凌的老百姓，强烈要求政府惩办那些民族败类。可是，在国民党政府的庇护下，那些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竟然逍遥法外，有的过去坐小汽车，胜利后还坐小汽车；有的人在沦陷时代表日本人去接收，抗战胜利后又代表国民党政府来接收。相反，国民党政府却把广大收复区的工人、职员、学生、教师等宣布为"伪工人"、"伪职员"、"伪学生"、"伪教师"，要甄别审查。如"不合格"，则工人不能进厂做工，学生不承认其学籍，职员和教师不得聘用。更令人气愤的是，许多接收官员为了敲榨人民，随意对人以汉奸罪名而予以逮捕。一时间，汉奸帽子乱飞，从小商人到大学教授，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到后方去的人，都人人自危。那些真正在日伪时期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汉奸卖国贼却放在一边，有的还得到重用，摇身变为有"功"之臣。这种人妖颠倒、天地浑沌的局面，使广大青年学生困惑不解，失望、愤懑的情绪在增长。

当时，收复区的一部分人民和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及时提出了"庆祝胜利、惩办汉奸"的口号。1945 年 8 月 22 日，圣约翰大学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首先开展了"严惩汉奸"的斗争。当天上午 10 点钟，全校师生正在课间休息，地下党员萧玉莲敲响了校园中心钟楼里的巨大铜钟，"当、当、当……"急促而洪亮的钟声，把全校学生召唤到了钟楼前的大草坪上。按预定计划，两名共产党员和一名积极分子上台发表演说，揭露校长沈嗣良的罪恶勾当。但由于学生中的三青团分子和特务的破坏，汉奸沈嗣良不但未受到应有的惩办，反而勾结国民党宪兵队，逮捕了这次"钟楼事件"中暴露了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施家溥、夏禹闻等 3 人，以"行为不检，违反校规"的罪名开除了叶嘉馥、陈震中、缪鹏等 17 名学生。学生们的"庆祝胜利、惩办汉奸"这样一个正当的要求，竟然遭到逮捕和

开除，全校师生对此为之震惊，为之愤怒。

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之下，又开展了“反逮捕”、“反开除”的斗争，集中揭露了沈嗣良在敌伪时期干的种种汉奸罪行。《文汇报》、《联合日报》、《时代学生》等报刊发表了《本市圣约翰大学无故开除学生》等的消息和文章，呼吁社会人士支持圣约翰大学学生。一时，社会舆论哗然，正义在学生一边，汉奸校长沈嗣良终于被迫下台。在校董颜惠卿先生主持下，成立了“处理校务特别委员会”，接管了校政。10月下旬，圣约翰大学校园里阳光明媚，被无理开除的17名学生在鞭炮声中胜利地回到了学校。

圣约翰大学学生反汉奸斗争的胜利，很快影响其他学校。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也开展了对汉奸校长李维宁的斗争，李维宁在日伪统治期间，对卖国贼汪精卫阿谀奉承，专为汪精卫举行祝寿音乐会，用“开除”胁迫学生参加。这样一个死心塌地卖身投靠的日伪汉奸，在日本投降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学生提出惩办汉奸，触到了李的痛处，他便暴跳如雷，竟然贴出布告宣布开除领导学生进行斗争的学生自治会主席等7人出校，同时还宣布：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不承认全体学生的学籍，竟然要对清白无辜、纯洁无瑕的青年学生进行“甄审”。是非颠倒到如此程度，使人们无法容忍。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决定对李维宁的汉奸劣迹给予揭露和斗争。李维宁投敌附逆，铁证如山，国民党政府慑于众怒，不得不宣布对汉奸李维宁进行制裁。学校也贴出布告：“不准李维宁到校”，同时宣布李维宁开除学生的决定无效。这一次惩办汉奸的斗争又获得了胜利。

2. 反对“甄审”斗争

抗战胜利后，受尽日伪欺凌的沦陷区广大群众，要求政府惩办那些民族败类。经过斗争，国民党政府也被迫逮捕了一些臭名昭著

的汉奸，但是大批汉奸卖国贼在国民党政府庇护下逍遥法外。相反却在1945年9月25日召开教育复员会议，通过了《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及《收复区中等学校教职员甄审办法》，把长期处于敌伪统治下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职员都冠以“伪”字，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肄业生，要通过国文、英文、三民主义等课程考试，甄审合格后，才准许入学读书；毕业生要经过两三个月的“补习”，交出“研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报告和“研读”《三民主义》的论文各两万字以上，才承认其毕业的资格，各机关才准许录用。

当时，上海有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共有学生4000余名。他们在日寇侵华的黑暗年代里尝够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万万没有想到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会被宣布为“伪学生”，要受到惩罚，而真正的汉奸却逍遥法外，倍受优待。胜利的欢乐，顿时烟消云散，美好的理想，一下成了泡影。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反动措施不仅使广大学生面临失学、失业的危险，而且蒙受了极大的污辱，伤害了他们的政治自尊心。因此，《甄审办法》公布后，引起了广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和反对。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提高广大学生的觉悟，党在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地领导青年学生进行了反对甄审、争取读书权利的斗争。在北平，地下党学委组成了专门领导反甄审斗争的党团组织。反甄审党团决定成立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作为公开领导学生反甄审运动的组织。

1945年10月，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召开了第一次反甄审斗争大会，突然遭到北平国民党当局怂恿下的特务、打手的破坏。校友联合会为了发动更多的学生和毕业生投入斗争，在北师大校园内召开了第二次反甄审大会。北平地区各学校学生代表和毕业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强制实行甄审的反动实质，准备通过反甄审决议，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取消甄审。但正当

代表们就决议纷纷提出意见时，混进会场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公开跳出来反对会议通过反甄审决议，叫嚷“不要同政府作对”、“政府有机关枪”，企图用反革命暴力威胁群众。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以压倒优势通过了北平各校反甄审决议案，并进行抗议。这时，在广大学生的压力下，北平行辕一个参议赶到会场，宣布了教育部新颁布的甄审办法，取消集中考试，每个学生上交两篇论文即可准许读书以示让步，但仍然坚持要审查论文。校友联合会主席当众向北平行辕参议提交了反甄审决议案和抗议书。北平学生坚持斗争，校友会还出版了《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会刊》，除在北平地区散发外，还寄往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北平学生还发出了《给收复区全体青年同学的一封信》，严词痛斥国民党的甄审办法，号召收复区同学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迫使国民党政府当局撤销甄审的非法决定。这对推动收复区其他城市学校开展反甄审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学生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在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市专科学校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会员遍及全市各校，总数达4000余人。1946年5月26日，北平学生在北师大召开第四次反甄审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第二天，各院校学生代表15人到北京行辕见李宗仁，当面表示抗议，并坚决要求彻底取消甄审。李宗仁答应把学生的要求转达国民党教育部。由于学生的坚持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最后实际上取消了甄审办法，北平学生反甄审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天津，1945年10月上旬，天津的学生收到了北平学生《给收复区全体青年同学的一封信》后，天津7所市立中学学生代表于10月中旬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反甄审问题。由于思想准备不足，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后来，经过天津地下党学委深入的思想发动和组织，于12月第二次召开了有18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的反甄审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在天津开展反甄审斗争。12月22日，成立了天津市学生反甄审委员会，作出决议并通电全国，呼

吁共同斗争。12 月 26 日，反甄审委员会举行会议，成立天津市学联，还通过宣言和章程，并决定出版《天津学联报》。这一组织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反甄审运动的发展。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代表于 12 月 28 日向天津市国民党政府教育局提出取消对学生与教师甄审的要求，要求当局 3 天之内给予圆满答复。12 月 29 日，天津市教育局抛出了缓期甄审的“实施办法”，这个办法名为“缓期”实为企图利用家长来威胁学生，因为办法规定学生甄审可由学生家长个别申请；同时又规定甄审“成绩优秀者，本市给予奖学金”。教育局又下令各校提前放寒假，不准学生集会，妄图分化瓦解学生。这个“实施办法”更加激起了学生极大义愤。12 月 31 日，天津市 6000 余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包围了国民党市教育局。学联代表与市教育局长就取消对学生的甄审一事进行谈判，但双方僵持了 3 个小时，毫无结果。学生愤怒之极，摘下了教育局的牌子，不顾持枪警察的威胁，冲进大门，支持自己的代表与教育局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学生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教育局长被迫签字，答应了学联提出的取消对学生甄审的决定，使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列为“伪学校”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商学院、音乐学院等 6 所院校的学生联合起来，于 11 月秘密成立了学生协会，领导反甄审斗争。他们提出了“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等口号。11 月 4 日，学生派代表向来沪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愿。朱家骅不但拒绝学生的正当要求，而且在见到学生代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是伪校学生”、“你们在沦陷区受到了奴化教育，你们在伪立学校读书，无疑是承认伪政府，如不加惩办是说不过去的”。11 月 6 日，6 校学生千余人在交大集合，然后前往国民党接收大员李熙谋公馆请愿。但李熙谋却有气无力地说：“我很了解你们的好学精神，但是教育部法令不能更改。”这样一来，郁积了 3 个月的愤懑再也抑止不住。学生们当场决定游行，向社会控诉。他们举着“因荒废学业而请愿”的横幅前进。没有

口号，也没有歌声，队伍里有一辆三轮车，车上堆满各科书籍，上面贴上一张大封条，封条上写着“教育部封”。这支无声的队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群众议论着：“只有闹罢课游行，还有要上课而游行!?”“真是个奇怪的年头，学生们要求上课还不准，这不是笑话吗?!”，“胜利了，为什么反而不让学生读书?!”11 月 10 日，6 所大学学生又集合前往八仙桥朱家骅的住地请愿，但仍无结果。次日，学生不得不再一次游行，并投书各报社向社会呼吁，要求主持正义：“请同情我们，请为我们主持正义!我们是收复区被迫停学的大学生，我们的学校被当局封闭了、解散了，我们被处罚、被惩罚，因为我们在敌人占据期间继续求学。”“在苦难中，我们熬过了 8 年，然而胜利的光临，破灭了我们的希望，我们被戴上‘伪学生’的称号，我们受到轻蔑歧视，我们受到严酷的惩罚。3 个月来，我们呼吁，我们解释，得到的仍旧是冷淡和歧视、轻蔑和谩骂”。

全国各地收复区的“伪校”学生先后都行动起来了，他们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甄审。当时，不仅有《文汇报》、《大公报》抨击国民党这一反动措施，就连《申报》、《正言报》等也先后发表评论，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学生的罪行，为“废学”的学生大声疾呼。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变办法，朱家骅宣布，将 6 所院校改为临时大学补习班，把原来的“先甄审，后补习”改变为“一面接收，一面继续上课”。但仍说要对学生进行“思想训练”。

1946 年 2 月，6 校学生得悉蒋介石来到了上海，再次组织请愿，要求取消“思想训练”，解决学籍问题。14 日晚，6 校全体学生整队到东平路蒋介石的住所请愿，遭到大批全副武装的巡警和宪兵的阻拦。当局企图以警备车威逼学生解散，学生坚持不散。学生们派出代表去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由于张道藩坚持要学生解散队伍来换取他代呈请愿书的要求，因而谈判毫无结果。张道藩的蛮横态度更加激怒了学生，“人民

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从晚上8时到次日清晨，学生们彻夜坚持。一夜过去，寒风凛冽，学生却始终未见“爱民如子”的蒋委员长一面。冷酷的现实使学生们对蒋介石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临大补习班结束时，国民党当局又耍出了一个花招，规定必须补考三民主义，及格后方能进入国立大学。学生又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结果全都进入了国立大学。

在平津沪各地学生的强烈冲击下，国民党政府步步退却，最后不了了之，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甄审措施，承认了所有学生的学籍。收复区学生的反甄审斗争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6年五六月间胜利结束，历时8个月，是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平津沪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它标志着蒋管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恢复。反甄审斗争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从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打破了一部分人对国民党的幻想，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

3. 上海学生“欢迎”马歇尔来华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从此能安居乐业，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倒行逆施，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把中国拖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统治。当日本宣布投降时，蒋介石的军队还远离沿海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正在前线，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便用飞机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送至内战前线，而且，自九十月间开始，美国军队更是直接在中国各主要港口登陆，替国民党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据1946年12月杜鲁门声明中供称：“一年前驻华美军最高实力为11.3万名。”① 美国政府在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同时，又给予蒋介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75页。

石大批美元的"防务援助",供给大量军事物资。尤为甚者,美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的可耻目的,不惜利用日伪的力量来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杜鲁门曾供称:"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告诉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将为共产党所接收。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①

在美帝国主义上述政策的指导下,蒋介石的军队和伪军迅速完成了它们的合流,一切伪军全部被国民党收编为抢夺胜利果实的"先遣军",许多汉奸头子,成了国民党的"地下运动领袖"和"忠实同志"。据统计,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达50余万之多。到了8月下旬,蒋介石进一步命令日军帮助伪军向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和伪军的积极配合下,抢夺了大量由人民艰苦抗战八年获得的胜利果实。国民党蒋介石不仅抢夺了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而且在九十月间的一个月时间里,侵占了我解放区县城及重要车站、村镇数十处。新的内战在威胁着全国人民。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发动内战的方针早已决定,但由于准备不足,尚未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所以必然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采取假和平、真备战的反革命两面政策来对付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是蒋介石的阴谋:如果毛泽东拒绝前往,蒋介石就可以借此说明要和平的是国民党,而不要和平的是共产党,他便可以师出有名,发动内战;如果毛泽东去谈判,他便借谈判之机,拖延时间,部署兵力,加紧进兵,抢夺胜利果实。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在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72页。

表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3天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便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经过40多天的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可是《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蒋介石便原形毕露，撕毁了协定，向着解放区开始大举进攻了。

蒋介石若是没有美国的支持，打内战是困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成了世界瞩目的问题。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从总统杜鲁门的声明中看出："为了美国和所有联合国国家的最大利益，中国人民应立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抓紧每个机会来调整他们的内部纠纷。"杜鲁门在声明中虽然提出要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要进行政治改革，却又明确表示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说"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自治性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不相容的。"①

1945年11月27日深夜，美国宣布马歇尔将军将以杜鲁门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是同盟国，上海人民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朋友，在许多上海市民的头脑里对美国的形象，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因此，不少人对美国抱有幻想，特别是正当内战逐步升级的时候，对于马歇尔的到来，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马歇尔成了"和平使者"。然而，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地痞流氓，则忙碌地作准备，欢迎马歇尔的到达，为的是乞求美国继续支援蒋介石打内战。

上海学委，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决定组织上海大中学校的学生欢迎马歇尔，通过群众性合法斗争的形式，表达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意愿，要求马歇尔公正地调停内战，真正地促进国内和平。同时，通过欢迎活动，把上海的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提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逐步壮大积极分子的队伍。学委选择了进步力量较强的圣约翰、之江、沪江、上海法学院等4所院校的学生团体作为发起人，来发起欢迎马歇尔的活动。经过这4所院校学生团体的联络，32所大、中学校的学生推选了自己的代表80余人，于12月14日在上海建承中学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成立了"上海市大、中学生欢迎马歇尔特使大会"的筹备组织，还决定由各校代表广泛征求同学对马歇尔特使的期望和要求。经过发动，各校学生纷纷发表意见，提出了开展向马歇尔表达上海学生意志的一人一信活动。之后，筹备组在讨论给马歇尔的信的具体内容时，代表们又提出了"反对内战"、"反对美军驻华"、"实行民主"等6项要求，决定在马歇尔抵沪时，发动同学去欢迎并争取面交信件。

当纯洁的青年学生正在为祖国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奔忙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在暗中派遣特务窥视，准备进行破坏。12月18日上海市长钱大钧电告教育部长朱家骅称："圣约翰大学学生受奸党鼓动，欲发动学潮以响应昆明学潮，其条件为：(一)请马歇尔撤退驻华美军；(二)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经我军戒备及青年团员(指三青团)加入活动，未获结果。闻明日拟再开会，已饬青年团仍秘密派人参加，并命军警戒备。"①

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各大、中学生代表100余人，在西藏路慕尔堂举行会议，会议由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主持，商讨20日马歇尔到沪时的具体活动事项。当代表正在讨论的时候，突然冲进来13个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破坏和捣乱。其中一个自称为黄东生的人跳上讲台，将大会主席陈震中推下讲台，宣布自己为"主席"，废除大会以前所作的各项决议，把全体代表讨论通过的6项要求篡改成反共媚外的3项要求：(一)希望马歇尔元帅对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二)协助国民党政府完成民主统一与建设;(三)希望在华美军完成受降任务后再撤离。各校学生代表对黄东生这一伙特务分子的蛮横无理非常气愤,便责问黄东生代表哪所学校,黄说是交大代表,可是交大的学生代表并不认识此人。经过质问盘查,原来是一伙专事破坏的冒牌学生。他们企图篡夺大会的领导权,由于阴谋被揭穿,真相大白,不得不在一片嘘声中抱头鼠窜而去。

12 月 19 日,上海的《新闻报》、《申报》、《正言报》、《中央日报》分别登载了中央社关于上海各大、中学生代表于 18 日在慕尔堂举行会议的歪曲报导,报导说大会在黄东生的主持下决定将通过的 3 项要求上书马歇尔特使。对此,欢迎马歇尔筹备大会决定对中央社的歪曲报导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除去函 4 家报社要求更正外,还决定在马歇尔来沪那天(20 日)由《大公报》登载声明,公开澄清事实真相,驳斥伪造民意的无耻勾当,重申上海学生反对内战实行民主的 6 项要求的严正立场。

马歇尔于 20 日下午 1 时 50 分抵达上海江湾机场。特地从南京赶来的蒋介石的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陪着马歇尔乘汽车直达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下午 3 时,4000 余名大、中学生排除各种阻挠和干扰,准备在中央路广场(今沙市路中央商场)集合,前往华懋饭店欢迎马歇尔。但是国民党特务冲进人群,强迫队伍解散,上海学生拒绝解散,这群暴徒手持木棍,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许多学生被打伤。

抗战胜利后,上海学生第一次群众性的集会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酷破坏,这对于渴望和平、民主,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帖清凉剂,使他们清醒了。被激怒了的青年学生要自卫、要反击。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学生们与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了搏斗,逮住了 8 名暴徒,其中一名被迫交待了他的身份,原来是三青团第三分团的团员,专门被派来捣乱的。经历了

风暴洗礼的上海青年学生又整队出发了。这时黄浦警察局局长又带了警察赶来，强令学生解散队伍。队伍再一次被迫停了下来。4000余名学生聚集在中央路广场，饿着肚子高呼“我们要见马歇尔将军”、“坚持到底”、“我们要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及人身的保障”等口号。学生们坚持要派代表向马歇尔致欢迎词，表达上海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正义要求。

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罗伦爱利奥脱在场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的暴行，他对学生的正义行动表示了同情，表示愿将同学的信与礼物当晚转送给马歇尔将军。并附了一张简札：“他们为了欢迎你（马歇尔）已遭到了痛苦……我相信他们的目的是端正的，行为是可靠的……我可以保证写这封信的学生确能代表上海的学生……希望你代表学生说几句公道话。”①在场的外国记者迅速记下了当时的情景，并拍摄了照片。但是国民党警察局仍然坚持要解散学生的队伍，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上海学委直接领导了这次斗争，学委书记张本等同志始终在现场指挥着队伍的行动。在分析了当时斗争形势之后，学委认为如继续僵持的局面将对学生不利，于是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在与国民党警察局谈判后，学生与警方达成了协议：（一）学生可以不去华懋饭店，但警方必须答应惩办殴打学生的暴徒；（二）学生可以返校，但警方须保证学生的安全。于是，100多位学生代表和目睹这场暴行的一位过路人一同前往黄浦警察局等候局方惩办凶手。其余的学生整队返回学校，他们操着整齐的步伐，走上南京路，开始了一场反内战、争和平的大游行。在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上，绵延数里的学生队伍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同情。“欢迎马歇尔特使”、“反对内战”、“建立民主中国”、“民主新中国万岁”、“我们要求言论、出版、结社、人身的自由”等口号声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南京路的上空。沿途不少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参加了学生的游行行列。游行队伍一直行进到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国民党社会局门口才胜利结束,然后分散返校。抑制了8年的上海学生,用战斗来表达了自己的要求,表现了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意志和力量。他们的行动也告诉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用拳头、木棍是吓不倒坚决反对内战和争取民主的上海学生的。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投靠美帝国主义,妄想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全国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美国则为了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庸,采取了扶植蒋介石的方针。马歇尔以"调处"中国内战为名来华,就是这一反动政策的体现。由于当时美蒋的反动面目尚未完全暴露,渴望和平民主的上海人民和青年学生,对这位美国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通过发动上海学生欢迎马歇尔,以合法斗争的形式,喊出人民的要求和民主的呼声;通过这场欢迎马歇尔的斗争,逐步提高上海学生对美蒋真面目的认识。

二、反内战、争民主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

1. 昆明学生吹响了反内战的号角

祖国的天空乌云密布,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昆明一天一天强化,内战的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蒋介石为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加紧巩固自己的后方。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命令部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宣布免除地方实力派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务,命令卢汉(此时卢汉正在越南率部受降)继任。在卢汉到任之前由新任民政厅长、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代理省政府主席,蒋的嫡系关麟征担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通过十三政变,蒋介石在云南建立起了自家的统治。从此,大批国民党军队特务纷涌昆明,摧残进步力量,扼杀民主运动。关麟征、李宗黄等人在云南公开推行恐怖统治,到处捕人;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

抢劫绑架；官吏们更是大肆贪污勒索、欺压群众。这一切不仅使云南人民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迅速上升，也使蒋介石同云南地方势力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势力，在不直接触犯其利益的情况下，可能支持或不干预一般的反蒋活动，这对昆明学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十分有利。

中共云南省工委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为核心，通过昆明学生联合会、各大中学生自治会，先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和文化教育界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宣传活动。各校进步社团纷纷举行座谈会、讨论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4校学生自治会向同学们发出“在祖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紧急关头，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号召。文化界著名人士在吴晗、闻一多、楚图南等人的带动下，发起签名运动，呼吁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在一次西南联大和昆明大中学校召开的大型座谈会上，闻一多教授应邀讲话，他手持扩音器警告民族罪魁道：“反动派，你们听听这些声音：人民不要内战，不要独裁！人民要和平要民主。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许多正义的民主人士、进步教授放弃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纷纷投身到爱国运动的队伍中来。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昆明，首先点燃起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卖国的第一把烈火。

在西南联大的倡议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4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定在1945年11月25日举行反内战、呼吁和平的时事晚会。晚会最后在西南联大的大草坪上举行，到会的有4所大学和部分中学生及公务员、工人等6000多人。闻一多、吴晗、钱端升、费孝通等4位教授参加了晚会，并相继发表讲演，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正当讲演进行中，突然电源被切断，枪声大

作，子弹在与会群众的头上呼啸而过。在极短暂的轻微的骚动之后，大家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晚会在汽灯下继续进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镇定地说："我们就要向枪声炮声呼吁和平，正因为枪炮声在我们身旁，更证明我们反对内战的正确……"台下掌声雷动。这时，一个自称"王老百姓"的人，跑上台去，大放厥词，说什么"政府平内乱，不是打内战"，妄图挑起事端，捣乱会场，好让警察乘机冲进来。但大家并没有上当，依然保持镇静。不一会，群众中就有人撕破了这个家伙的画皮，此人原来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调统室（即"中统"）主任查宗藩。他立即被轰下了台。晚会最后通过了反内战宣言和呼吁美国青年学生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国民党反动派未能阻止住晚会的召开，恼羞成怒，竟然采取武装封锁交通的办法，阻止数千名学生离开西南联大返校，学生们被迫留在校内草坪上，两小时后才绕道回城。

国民党云南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极大愤慨。不少同学彻夜未眠，以社团、系、宿舍为单位连夜在民主墙上、教室内外贴满了反内战的标语、口号。一部分民青盟员和进步学生在寝室中发起罢课签名，学生决心要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第二天早晨，国民党中央社发布"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报导，诬蔑学生的爱国集会，以此掩盖他们镇压学生的罪行。消息传出，更加激起广大昆明学生的愤怒。根据多数学生的要求，联大地下党向省工委汇报了情况，请示同意罢课。党根据当时群众已经行动起来的实际情况，决定发动全市学生总罢课，并作了具体部署。26日，西南联大等9所大、中学校宣布罢课。先后参加罢课的大中学校有31所，参加罢课学生有3万余人。各校罢课后都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并选举了西南联大、云大、昌平女中、云大附中等5校代表组成常委会领导斗争。罢联设在联大。罢联成立后，于11月28日发表《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

国同胞书》，要求：(1)立即停止内战，要求和平；(2)立即撤退驻华美军；(3)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4)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同时就晚会事件向云南当局提出4项要求：1.追究干涉联大的责任问题；2.取消11月24日禁止集会游行的禁令；3.保障同学的人身自由，不许任意逮捕；4.中央社更正诬蔑联大的谣言，并向与会人士道歉。①

昆明的爱国学生运动发展得异常迅速，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慌。关麟征、李宗黄召开了党、政、军、警以及各校头目的紧急会议，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指令，狂叫要对学生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反动措施。关麟征还杀气腾腾地说：“学生有在校内开会的自由，我有在校外开枪的自由。”国民党的所谓“以组织对组织”，就是指令一批公开的特务学生组织反罢委员会，盗用西南联大、川陕晋冀鲁等外省同学的名义，反对罢课，企图混淆视听，欺骗社会。反罢委员会运用告密有奖和殴打进步学生等手段破坏学生运动。同时，又组织一批秘密的特务和三青团分子伪装成无党派，以“中间派”的面目出现，策动修改罢课宣言内容第二条的签名运动。② 他们叫嚷“单独反对美国不公平，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如不修改宣言，就要求改组罢委会”，企图分裂学生运动。在这股逆流的影响下，有些中间的学生分不清是非，结果有350人签名退出了罢联。联大党支部、民青组织和罢联冷静考虑了对策，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揭露反罢委员会的真面目，用事实教育中间同学，同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为了争取更多的爱国学生的力量，将罢课宣言第二条修改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打内战，要求撤退在华美军”。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中间同学提高了觉悟，分清了敌我友。很快，

① 《一二·一运动史料选》上册，第59—60页。

② 关于“立即撤退驻华美军”。

原来参加签名的同学纷纷退出反罢委员会，最后，剩下了几十个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反罢委员会在广大群众的怒斥下，只得偃旗息鼓了。

所谓“以宣传对宣传”，就是调动一切反动宣传工具，对学生反内战运动进行诬蔑攻击。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扫荡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连篇累牍发表攻击学生爱国的文章。什么“五四之风不可复见”、“目前不是一二九时代了”等等，散布“反内战的便是共产党”、“罢课是共产党的‘圈套’”等阴险流言。国民党企图通过大造反革命的舆论来威胁、分化罢课学生，以达到孤立进步学生，进而实行血腥镇压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这种宣传从反面教育了群众，许多大中学校的教师都在讲：“他们连五四运动都否定了，还有什么是非？”乌云遮不住太阳，各界群众争看反映爱国青年学生的《罢委会通讯》，这个刊物是由党的地下印刷厂发行，每期都在昆明全市畅销 1.5 万份以上。这份刊物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的谣言和诬蔑。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除了自我暴露外，一无所获。

所谓“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对学生进行野蛮的镇压。李宗黄命令从军队警察中挑选出精壮分子，组织行动小组，穿上便衣，带着凶器，到街头殴打爱国青年学生。仅 29 日一天，学生被打事件就有 25 起，被捕 15 起。30 日，特务 30 余人，手持木棒、铁棍冲入云南大学，捣毁张贴壁报的黑板和罢联的办公室，砸坏桌椅等所有用具。昆明警察局还高价收买流氓、打手向学生寻衅闹事。敌人的白色恐怖更加激起爱国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慨，全市 100 多个宣传队同时出动，与荷枪实弹的法西斯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特务的横行霸道，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连云南省参议会也向关麟征、李宗黄二人提出了严禁在街头殴打、逮捕青年学生，以免人心浮动、影响社会的要求。反动当局不得不如数释放了被捕学生。敌人“以行动对行动”的阴谋也失败了。

云南及昆明市各界群众和各大中学校的教职员工对学生的罢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11月29日，西南联大教授联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认为军警对时事晚会的暴行是“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11月30日，联大工学院全体助教捐款法币5万元支持学生罢课。同一天，民盟云南支部声明：“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学生的8条要求“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很多工人、小贩、职员甚至一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也都写信、捐款，对学生表示支持。反动派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不仅无所收敛，反而穷凶极恶、变本加厉，积极策划更大规模的镇压学生的行动。

2. 昆明一二一惨案

1945年12月1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血腥的日子。11月30日下午，一批武装流氓先后冲进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撕毁壁报，捣毁家什，到处寻衅，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的大屠杀的先兆。

12月1日清晨，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通过民青和罢联作出紧急决定：通知各校加强戒备，当天停止上街宣传，特别指出学生不要个别外出。接着罢联又通知各校学生整理内部，准备对付反动派各种破坏和捣乱。这时，西南联大的共产党员和民青盟员挺身而出，组织同学把桌椅、黑板等杂物堆积在大门前，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

上午10点多钟，查宗藩带领了50多个国民党武装特务，手持刺刀、铁条、木棍、扁担闯进了云南大学的校门。他们杀气腾腾地撕毁壁报、标语，砸烂教室里的桌椅，疯狂地追打学生，当场就有许多人受伤。云大的学生当即退至高坡，居高临下，用石块还击。由于石阶太高，特务们一时无法冲上去，只得呼啸而去。云大被特务攻击的消息传到罢联后，罢联立即通知同学们作紧急戒备。不一会，

联大校门口即出现了两三个撕去布告的士兵，肆意寻衅。接着，100多名佩带“军官总队”标记的军人和身穿军服的特务呼叫着冲进联大的校门，他们用木棍和石块对学生和校警大打出手，学生们奋力抵抗，把冲进校内的一批特务轰出了校门。双方隔着校门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门外的特务向墙内乱扔石块瓦片，联大的同学在里面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几位女学生登上梯子向墙外国民党的士兵作解释。然而，墙外投掷来更多的砖瓦，她们被迫退了下来。这时几名反动军警乘机越墙而入，冲进来用木棒殴打同学。联大同学群起而攻之，轰走了两名，另一名云南国民党军官总队名叫崔俊杰的被同学们抓获。反动军警的领队被迫站出来说是“误会”，并表示联大同学释放崔某之后，即行撤退。但是当武装特务被迫撤退时，一名匪徒竟拿出手榴弹欲向校内投掷，正在这时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经过，急忙上前阻挡，丧心病狂的暴徒竟将手榴弹扔向于再。一声爆炸，于再倒在血泊之中，头部受了重伤，当晚10时在云大医院牺牲。

同日上午11时左右，三青团云南支部的头目周伸率领了40多个便衣特务，又强行闯进联大师范学院，在饭厅前院开枪，并投掷手榴弹。师范学校学生猝不及防，就退入隔壁昆华工校，和昆工学生联合作战，将暴徒逐出了校门。在校门外的匪徒竟将校门打破，复又扔进两颗手榴弹，当场就有几位学生受伤倒地。这批暴徒又乘机钻进校门，用刺刀、石块、木棍等凶器向学生乱捅猛打，昆工学生李云被刺伤。师院女学生、共产党员潘琰因抢救遇难战友被手榴弹炸伤胸部，弹片削去了她的手指，倒地后，又遭豺狼成性的特务分子用刺刀在她腹部猛戳3刀。当天下午，年轻的共产党员潘琰壮烈牺牲。联大学生李鲁连也受伤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与战友们永别。昆华工校学生，17岁的张华昌，闻师院同学遭围攻，便翻墙过来救援，被特务扔掷的手榴弹片击中头部，右耳满盛着血液，红色上浮着白色的脑浆，至下午5时，在医院长逝。

这一天，遭到国民党武装匪徒袭击的还有联大工学院、师院附中、昆华女中、南菁中学等学校。

12 月 1 日，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对爱国青年学生的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集体大屠杀的日子，是一次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师生 4 人，杀伤学生 60 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12 月 7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昆明惨案》的社论。社论指出："就全国来说，是 1926 年三一八惨案以来，将近 20 年间没有发生过的大惨案。这种公开对青年学生进行屠杀的手段，还只有北洋军阀一类的反动派才用。"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请愿的学生开枪，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街头上行凶，而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是冲进了学校来屠杀学生，这正说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比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更加残忍，更加黑暗，更加腐败。

3. 昆明学生的反击

惨案发生后，愤怒的火焰在每一个青年学生心中燃烧，战友们的鲜血，擦亮了每个青年学生的双眼。爱国的青年学生深深感到，要迎来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因此，在惨案发生的当天，90％以上的同学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烈士遗体前立下了誓言："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12 月 1 日下午，罢联发出了题为《我们决不退下》的宣言。宣言上写道："我们都是学生，没有权势，也没有枪杆，但我们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事，却不能不问，我们的同胞正在大批大批地倒在美国的坦克车下，倒在美国的火箭炮下；我们的农民正呻吟在征收之下征购之下；我们的工人在挨饿，我们的工厂在关门；我们的商店在挣扎，这一切，我们，能够不问吗？……我们的同学，一大批一

大批地被逮捕，被殴打，被枪击，被刀刺，但是，告诉这些人，虽然我们挨了打，虽然我们受了伤，虽然我们进了监，我们却绝不退下来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会记起苦难深重的同胞，都不会忘记为内战而倒下去的人民！我们要呼号，我们要反对内战，我们要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这是任何压力都阻挠不住的！”① 宣言表达了昆明3万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斗争的决心。

12月2日下午，在联大图书馆前面，举行了隆重的于再、李鲁连、潘琰、张华昌4烈士的入殓仪式。

这天，4烈士的遗体安详地躺在联大图书馆内，自中午以后，各大中学教授、教师、同学及社会各界人士和4烈士的亲友家属即陆续来到，瞻仰遗容。整个馆内站满了热泪盈眶的人们。图书馆门前的升旗台上布置了临时的祭坛，旗杆上悬着半旗。4烈士的遗像、祭文、挽歌等分列两边。下午3时，天上遍布愁云，阵风卷起尘沙，天气突然变冷，入殓典礼在沉痛静穆的空气中开始，当4烈士遗体抬出图书馆时，全场的万余人一片哭声，顽石亦为之流泪。主祭人悲痛得欲言无语，联大代表哽咽着勉强说了几句话。他代表全体与祭的人在烈士遗体前发誓：“我们不仅是哀悼，我们誓死为争取民主自由奋斗到底，我们要复仇，为千千万万无辜的被法西斯匪徒残害的人们复仇！我们将踏着死者的血迹前进，绝不后退一步……”② 入殓之后，4烈士灵柩暂停放在联大图书馆内，供人凭吊。4烈士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所以在挽幛的横批上书写着“党国所赐”4个大字，两边分别是挽联。旁边陈列着烈士的血衣和遗物。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前来吊唁。尽管国民党特务公然盯梢，在联大门口照相，但群众对此毫不理睬。前往吊唁

---

① 《罢委会通讯》第二期。摘自《“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28—129页。

② 《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4死难烈士殓典礼记》，载《“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二辑，1979年10月版，第92页。

的除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工人、农民、军官、士兵、工商业者、民主人士、地方士绅、宗教界人士。从12月2日到24日，前来的各界团体达650余个，人数达5万多，占昆明全市总人口的一半。捐款到12月5日达3000万元。[①] 前来祭奠的人士用挽诗、挽联、祭文作投枪匕首，直刺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

这些血泪的字句中，有的表现了爱国学生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今天你们打进民主堡垒，明天我们就倾覆法西斯巢穴。"有的愤怒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罪行的："以特务党棍治国，以军阀治国，以独裁治国，民国乃成地狱。""以炸弹木棒饷民，以刺刀饷民，以枪炮饷民，学府竟成屠场。"有的指名道姓痛斥刽子手的："高秉坊、孔祥熙，贪污有据，尚且能去美国安然游历。李宗黄、关麟征，杀人灭证，仍可以在昆明任意横行。"有的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念的："踏着烈士的血迹，走上民主革命的大道。涌起人民的呼声，听到独裁政治的丧钟。"[②]

12月2日，罢联召开了全市40余所大中学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并发表了新的罢课宣言：除重申原有的主张和要求外，又增添了以下3项：(1)严惩关麟征、李宗黄等凶手；(2)优恤死者，死者要公葬，在云瑞公园立纪念碑；医治伤者，赔偿一切公私损失；(3)解散行凶的特务机关。

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激怒了昆明各大中学校教职员工。首先，联大和云大的教授会决定用罢教来声援爱国的青年学生。随后，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师实行了总罢教。罢教宣言中写道："在黑暗的统治下，就国家言，将何以为国，何能建国？就个人言，将何以为教，何忍为教？"在罢教宣言上签名的全市大中学教师400多人。如此大规模的教师罢教，这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闻一

① 郑伯克：《回忆一二·一运动》。《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八期。

② 《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三辑，1979年10月内部发行。

多教授在联大教授会上悲愤地呼吁说："鲁迅先生说中华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就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2月1日。自命为'革命党'的军政当局竟然派出大批武装，闯进最高学府，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我们为人师表，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血腥罪行。"张奚若教授亲自闯入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以辛亥革命的元老身份，当面痛斥关麟征，抗议他一手制造的残暴事件。

昆明社会各界人民对学生遭受迫害也深表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运动。昆明工人阶级在党的民主工人同盟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集会抗议、公祭、捐款等活动。有一群工人给爱国的学生们来信说："我们早已和你们站在一条线上了。我们今天要为中国的团结和平而奋斗，将来要在建国的大道上迈进。现在我们共捐有153850元，给那些死难的同学，聊表我们的敬意。"一位农民老大爷，他的儿子在这次运动中受了重伤，他专程从乡下赶到城里，老泪纵横对同学们说："你们反对内战，争太平日子，是为我们子孙后代造福，现在我捐出5000元钱，我更想捐出我的儿子。"3位乡村小学教师受了乡里多数老百姓的嘱托也写信："代表他们致意，并向死难同志致最崇高的敬礼！"并提出："1. 立即停止内战。2. 迅速撤退驻华美军。3. 马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4. 根绝大独裁者的野心。5. 赶快组织联合政府。6. 打倒一党专政的法西斯制度。"随信还捐助了2000元。昆明的小学生也来信支持他们说："你们英勇地高举着反内战的旗帜……我们全体举手赞成你们。"他们还节省了零用钱，一周中捐集了"17万元，随着这封信送给你们，算着一点点行动的表现"。当时不少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也纷纷写信慰问和捐款，表示了他们厌恶内战和同情学生的心愿。不多天，社会各界共捐款达3000万元，在经济和舆论上给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以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社会各界坚定地站到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学生一边，国民党昆明反动当局却恐慌起来了。在暴行之后关麟征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到联大“慰问”，向学生当面道歉。学生们愤怒地斥责他：“凶手就是你，关麟征！”过了一天，关麟征又派人送来花圈、慰问品，又抬了两口棺材，这一套伪善的表示，理所当然地遭到罢联和学生们的拒绝。关麟征、李宗黄又紧密配合国民党中央社蓄意掩盖惨案真相的报导，在昆明表演了一幕“公审”、“惩凶”的闹剧。他们枪毙了两个所谓的“凶手”，借以逃脱罪责。这些闹剧被揭穿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出一计，强迫中学提前放假，以孤立大学。但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大部分中学的学生坚持留校继续斗争。回乡的同学则利用这一时机组织了农村宣传队，开展援助昆明学生运动。

鉴于昆明国民党反动当局频频丢丑，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于12月7日发表了《告昆明教育界书》，大言不惭地重弹“中正爱护青年，不啻自身之弟”的老调。在标榜愿意“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后，又对学生施加压力，强迫同学复课。他说：“目前一切问题中，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之前提，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罢联对蒋介石诬蔑学生的谬论，逐条给予驳斥。罢联指出：“这种不幸的罢课虽妨害了我们的学业，但决不‘贻误建国前途’，相反地，正因为我们看到‘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惨重，胜利已告实现，复兴时机不可复得，正宜同心同德，积极奋勉进行建国工作’（文告中语）所以才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内战，绝对需要和平；因此才有11月25日的内战问题时事座谈会，试问一面内战，一面如何‘进行建国之工作’？”罢联又指出：“为内战而遭到无理炮轰枪击罢课，到底是我们贻误‘建国前途’，还是那些反‘反内战’的人‘贻误建国前途’？”针对蒋介石的文告中的所谓学生要“认清职责，重视课业，遵守纲纪”，罢联驳斥道：“我们正因为一言一动，应为社会之模范，亦系于国家之命脉，因此才不得不于重视课业之

余，更须'辨明是非'、'认清职责'，因此才举行内战问题座谈会，因此才反对内战，同时我们在学校里公开集会，请教授演讲，并没有不遵守纪纲，却料不到会被围着学校枪击炮轰，更用刺刀手榴弹杀进校门里来杀死4人，打伤教授学生数十人，试问这究竟是谁不'遵守纲纪'，'辜负国家作育之苦心，违反时代所付与之使命'？"罢联在最后指出："目前一切问题决不能以'恢复课业为前提'，而应以死者瞑目，罪有攸归的'正当手续为解决之前提'，否则法纪何在？人权何在？"①

为了进一步向全国人民揭露一二一惨案的事实真相，罢联组织了各种宣传队，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活动，使大家都知道凶手就是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查宗藩、周绅等人，应予严惩。爱国的青年学生们编写的《凶手逃不了》、《不买中央报》、《安息吧！勇士》等歌曲在昆明全社会传唱。剧艺社先后自编自演了《匪警》、《审判前夕》、《潘琰传》、《凯旋》、《告地状》等街头剧。罢联印刷了50万份惨案实录和几十万份传单，在市内散发并寄送全国各地。联大学生还将有关吊唁4烈士的祭文、挽联、挽诗等收集汇总，编印成《四烈士荣哀录》一书，投送国内外。这些活动都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惨无人道，使反动派在全国空前地孤立了。

4. 全国各界对昆明一二一的声援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及时向全国人民报导了反动派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真相，并连续发表了专论和短评，抨击国民党当局屠杀青年的罪行。一二一惨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得到了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声援。

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和青年纷纷行动起来，声援昆

---

① 《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一二·一运动史》编写小组（昆明师院）1979年10月版，第188—189页。

明学生的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各界青年，召开了纪念一二九10周年的大会，在大会上，全体同志为一二一死难的烈士默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对昆明爱国学生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和民主的先锋队，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青年，压迫青年；共产党则爱护青年、培养青年。"①

国民党的陪都所在地重庆，12月9日，由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史良等主持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郭沫若、茅盾、邵荃麟、冯至等写了悼诗。董必武和王若飞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献了花圈。追悼会还通过了要求公审祸首、公葬烈士、停止内战、保障人权等决议，并当场募捐了108万余元。

在成都，12月9日上午，各大中学为追悼昆明殉难同学，在华西体育场举行追悼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浙江大学全体学生12日停课一小时，素食一天，并举行追悼会，决议要求惩办关麟征及其他特务凶手。

在上海，1946年1月13日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惨案烈士。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人组成。宋庆龄先生送的横联上面写着"为民先驱"4个大字。马叙伦宣读了祭文："呜呼先生，不死于抗战胜利之前，而死于抗战胜利之后。呜呼先生！不死于敌伪之手，而死于暴徒之手！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以杀敌人，而用以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马叙伦先生的祭文，是一篇声讨蒋介石的战斗檄文。于再的妹妹于庚梅在公祭大会上发言说："家兄

①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0日。

的惨死我是痛心的，但是我并不悲伤，假使哥哥的牺牲能促使内战停止、民主的实现是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于家的光荣，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荣！"① 公祭大会最后致政治协商会议电，提出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实现蒋介石关于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的4项诺言等8项要求。会后，群众举行了游行。学生高举"纪念昆明死难师生"横幅和"民主万岁"、"人民不死"两面大旗，高呼"反内战"、"要求真正的民主"等口号，行进在大街上。

在西安、贵阳、广州、长沙、南京、南昌、福州以及四川乐山、南充、江津等市县，广西桂林、贵州遵义等城市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声援昆明学生的活动。因此，被毛泽东称为"以昆明罢课为标志"反内战、争民主的人民群众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同时，远在海外的侨胞，也对祖国学生的英勇斗争表示了同情。马尼拉华侨学生发来电文对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及所提出的十一项要求均表同情，并且决意支持"。

5. 殡葬烈士，胜利收兵

1945年底，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给予国民党进犯军队以严重的打击。以昆明一二一学生的反内战斗争为标志的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国统区的学生运动也不得不由过去的高压手段改为公开让步、暗地进行分化的破坏政策。12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先后派傅斯年（北大代理校长）、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暂代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等到昆明"调停学潮"，答应公祭、公葬烈士，医治伤者，赔偿公私损失，并将关麟征停职；命令李宗黄向云南省主席卢汉交权。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当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局仍大肆诬蔑学生运动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操纵。又阴谋组织联大、云大两校的教授集体辞职，从而解散联大，以此达到彻底破坏学运的目的。面对这一情况，罢联认为对联大教授会和学校负责人梅贻琦的争取是非常必要的。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校长，联大期间是3人校务主持人之一。地下党通过民青组织，请闻一多教授出面做工作，终于使这位政治上保守，但有爱国正义感的名流站出来说话了。梅贻琦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激成学生罢课的责任在于地方军政当局，他表示学校要继续从法律上控告杀人凶犯。著名的数学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发表了同情学生的讲话，表示了教师对学生运动爱护的感情。但是，在学生队伍内部，有少数学生主张以惩办李宗黄、关麟征，成立联合政府为复课的先决条件，否则就实行“无限期罢课”。一部分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看到敌人作了一些让步，且政协即将召开，认为运动已达到目的，应该复课了。

为了争取党对学生的领导，12月中旬，罢联派学生代表王汉斌和陈可法赴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并向重庆各界人士报告运动真相。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听取汇报后指出：学生的斗争精神很好，但不能无限期罢课，时间长了，不利于争取群众。党明确表示：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仗，只能一个一个地打。要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地改变对敌斗争的方式，在适当的条件下，组织学生有秩序的复课。

12月18日，在联大由罢联召开昆明全市大、中学生代表大会，讨论复课问题。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决定“停灵复课”。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5项要求，作为复课的条件：(1)保障人身自由，不得非法捕人，不得解聘教授、开除学生；(2)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取消非法禁令；(3)公祭、公葬死者，医治伤者，赔偿公私损失；(4)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新闻；(5)继续控诉

罪犯。[1] 罢联一方面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复课条件；另一方面重申昆明3万学生要继承烈士遗志，为反内战、独裁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斗争。

国民党反动当局无法瓦解学生运动，被迫于12月24日答应了全部复课的条件。卢汉、霍揆彰不得已也在昆明报纸上发表自己照办的诺言。

12月27日，昆明3万多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复课。

为了进一步扩大一二一运动的影响，昆明市学联决定：1946年3月17日为4烈士举行殡葬仪式。17日上午11时，3万多人的殡葬队伍由联大出发。队伍最前面由几名学生高举着"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殡仪"的大横幅作为先导，灵车之后，跟着的是"自由钟"。数不清的送葬者一面缓缓行进，一面悲愤地唱起挽歌："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英雄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那是中国的法西斯，那是中国的反动派，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反动势力消灭掉。"

昆明全城市民不顾反动当局的阻拦，从四面八方赶来目送殡葬。沿路路祭一处接一处，祭文通过扩音器在天空回荡："崇高敬爱的烈士们……你们安眠吧！滇池的浪花，西山的白雪，将永远庇护着你们。墓边的青松，将永远象征着你们对民主事业的忠告。墓上的蕙兰，就要开出自由的鲜花。你们的赤血，已经培育了民主中国的新芽。看吧！新中国就要来到了，你们的名字——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将和民主的新中国一样，万古流芳。"[2]

殡葬的队伍穿街过巷，游遍全城，黄昏时刻返回到联大校内的烈士墓地。公祭典礼开始，查良钊（联大训导长）、闻一多、吴晗3人在会上致词。几万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

---

① 《一二·一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1979年10月版。

② 《一二·一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三辑，1979年10月内部发行。

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向反动派法西斯余孽痛击！我们今天再一次喊出我们的要求，我们进军的方向：民主！”①

从1945年11月25日昆明4大学举行时事晚会起，到1946年3月17日4烈士殡葬止，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前后坚持达4个月之久，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场学生运动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独裁的真面目。同时，这场斗争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内战、争民主”的口号深入人心，广泛地争取了各阶层的群众，带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而且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学生运动的骨干，为解放战争时期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①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

第十三章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

一、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开始了对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将中国人民再度推入全面内战的血海之中。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不仅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巨额美元的援助，还派出大批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军队抢运到内战前线，而且直接在中国驻扎10余万军队和为数6000余人的军事顾问团。这些美军在中国驻地横行不法，无恶不作。他们随意殴打、抢杀和平居民，强奸妇女，抢劫商店财物。当时美军集中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和青岛5市，仅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的一年稍多的时间内，美军制造的暴行就达3800起，死伤人数超过3000人。① 千余位中国群众竟丧命在美军的车轮下，学生、岗警、黄包车夫屡遭美军枪击身亡。1946年9月22日晚上，西班牙海员赖令奈从海员俱乐部出来，乘坐臧大咬子（人名）的黄包车（人力车）去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华都舞厅。车刚停下，赖令奈径直走进了舞厅，不付分文车资。臧大咬子为了糊口活命，无奈只得守候

① 《解放日报》1947年1月10日。

在舞厅门口，等待赖令奈出来。几个小时过去，终于等到了赖令奈，和他一起的是美国水兵铙德立克，赖令奈看到黄包车夫向自己索取车资时，便唆使铙德立克用拳头猛击臧大咬子的胸部，臧大咬子顿时仰跌在地，造成后脑脑震荡，经送仁济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臧大咬子的惨死，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公愤，社会舆论一致要求惩办凶手，为臧大咬子报仇。但是国民党政府法院公然声称，他们无权审理这一案件，以此为美军开脱罪责。外国兵在中国土地上打死中国人，中国政府却无权处理，这充分说明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群众的义愤像沸腾的溶岩，很快就要冲破火山口了。

1. 北平爱国学生奋起抗暴

1946 年 12 月 24 日，西方各国传统的圣诞节就要来临了。国民党政府指令各地用“醇酒佳肴”宴请“中国最好的朋友”。美军兵营四周到处呈现出群魔乱舞的“盛况”。那天晚上 8 时刚过，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路过东单的一条胡同，被两个突如其来的美国兵架到广场附近的树林中强行奸污了。

事发的第二天，一家民营报社透露了这一消息。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实行封锁，警察局严禁各报刊登这个消息，国民党的中央社也通令各报，对此不得声张。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工作，12 月 26 日有 3 家报纸冲破国民党的禁令，刊登了沈崇事件的经过，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首先是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响。

沈崇事件像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投进了火药库，中国人民复仇的怒火迅速燃烧、蔓延起来。清华、燕京、师大、中法、铁道学院等院校的青年学生一致呼出了“抗议美军暴行”、“严惩凶手”、“美军必须滚蛋”等口号。反美群众运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抓住战机，积极开展领导。

当时北平城内的中共党组织有两支。一支是抗战时期，在日伪

统治下坚持原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地下党组织，这时称为北系。另一支是1946年夏秋间，西南联大解散，各校分别回平津复校，联大的党员骨干随学校北上，他们的关系由周恩来特地批准，仍隶属于中共南方局，对这一支党的秘密组织系统，习惯上称为南系。北平会师后，这两支组织系统没有合并，但两方面党的负责同志经常一起商量研究重大问题，彼此之间密切配合着行动。

12月26日，南北两系党组织的学委负责人袁永熙和余泽清共同分析了形势，认为美军暴行涉及到群众尊严，已经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无比义愤。当时，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是给美蒋反动派以应有打击的极好机会。于是立即决定通过沈崇事件，举起维护民族尊严的旗帜，激发广大群众的民族义愤，在北平学生中发起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并对各校学生发动的情况，作了具体周密的部署。

26日当天，北大、清华的同学首先在校内贴出了许多抗议书和壁报。当时因北大刚复校不久，全校还没有统一的学生自治会，系级组织也不健全。沈崇事件发生后，党组织决定由地下党员领导的女同学会和进步力量较强的历史系系会出面，发起召开全校系级社团代表大会，以推动全校同学投入抗暴运动。27日晚间，系级代表会议如期在沙滩北楼礼堂召开，到会代表及同学1000余人，会上由于有三青团员混入进行捣乱，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代表中的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和进步学生按原定方案纷纷提出“严惩凶手”、“驻华美军当局公开道歉”、“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全体罢课抗议”等提案。国民党三青团员极力加以阻挠，叫嚷“罢课和游行有碍外交”、“美军退出中国不是我们应当管的，而是政府的问题”。地下党员、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主持大会，她为了使特务分子暴露面目，在表决提案时，有意采取反表决的方式，逐项提出：“谁不赞成抗议美军暴行的，请举手！”“谁不赞成严惩凶手的，请举手！”这样搞得那些三青团分子十分尴尬。他们自知没趣，也就一个个的溜掉了。

代表会议开至深夜11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1)严惩暴徒及其主管长官，在北平公开宣判；(2)驻华美军当局公开道歉，并保证撤退前不得再有任何非法事件发生；(3)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等，并决定联络全市各校师生于12月30日举行罢课示威。会上还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委员会以领导全校的反美抗暴斗争。

2. 国民党反动派露尽奴才相

国民党当局企图封锁消息破产后，便大肆对被害人造谣诬蔑，竭力为美军开脱罪责。27日，中央社发布报道，胡说"沈崇似系良家妇女，在北平某中肄业，是二十几岁的妇女"，"美军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调查"等等。美联社则公开无耻地诬蔑受害者，说"少女引彼等狎游，并曾言定夜度资"。北大训导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原青年部长陈雪屏闻讯后，首先在先修班的名册上抹掉了沈崇同学的名字，然后竟然声称："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女生，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北大学生义正辞严地回答道："我们不是为一个人雪耻，而是为中华民族雪耻！"陈雪屏理屈词穷，竟把责任推到受害者的头上："她晚上为什么要去看电影？看电影为什么不坐洋车？"爱国的青年学生针对陈雪屏的无耻谰言，在北大贴出了《质问陈雪屏》、《反对陈雪屏》的大字报，指出："北平是中国人的北平，中国人为什么晚上没有看电影的自由？又为什么没有走路的自由？"陈雪屏无奈，只得躲在幕后，继续指挥三青团分子贴出了一期名为"情报网"的壁报，无中生有地说沈崇事件是延安方面设置的"苦肉计"，共产党"派八路来引诱美军成奸"，意在"煽动学潮"。

针对敌人的造谣诬蔑，党组织发动群众，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有力地揭露了事实真相。在《前进报》工作的地下党员在北京大学注册组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片，上面清楚地写着：沈崇，19岁，福建闽候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信处，上海古拔路

25号。[1] 北大的女同学还通过家庭访问，弄清了沈的祖父曾任清朝两广总督，父亲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论社会关系，陈雪屏与沈家还是亲戚。调查材料一公布，国民党反动派的奴才相便原形毕露。陈雪屏为主子充当走狗，竟不惜抛去自己身上的人皮。这场斗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谣言和种种诬蔑，而且使抗暴怒火燃烧得更旺。

3. 坚持"美军退出中国"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可能会改变花样将抗议美军暴行的烈火扑灭下去，因此，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及时给学委发出指示："当群众运动起来后，国民党的政策，一方面可能采取'尽量缩小、化小为无'的办法，企图把民族的侵略缩小为几个美国兵的个人强奸案，变为法律解决"。[2] 不出所料，国民党行政院在给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指令中声称："此事为该犯美兵之私人行为"，"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美驻华第一陆线队司令何德华发表声明说："此事纯属一种罪行，与政治不相联系，应以法律手续处理之。"

为了击败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党提出要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展开斗争。"美军退出中国"这一口号，鲜明地揭示了运动的性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成为团结教育和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战斗口号。各校学生纷纷搜集美军在华一年多的暴行。通过壁报、周刊等形式加以公布，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12月29日晚，北大各院系代表集会，讨论进一步的行动。一批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自称是各校的"代表"一齐冲进会场。北

① 《文史资料选》(北京)第10期，第7页。
② 《中国学生运动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大的同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第二天按计划举行示威游行，此刻必须避免与敌人发生正面的冲突，抗暴筹备会决定停开，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特务分子随即捣毁了抗暴筹备会的办公室，撕毁了校园中所有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壁报和标语。接着，他们自己开会，宣布成立所谓"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宣称誓为政府"后盾"、"决不采取罢课游行手段以荒废学业"、"信任政府合理解决此案"等等，并扬言，如果学生游行就"以机枪对待"。特务的暴行，再一次充当了反面教员。爱国青年学生对抗暴斗争更为坚定，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表示支持抗暴斗争，并积极为第二天的游行作准备。地下党组织进步青年连夜串联兄弟院校，团结行动。

当国民党特务捣毁北大抗暴筹备会的消息传到清华大学之后，全校同学的愤激情绪达到了顶点，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连夜发动同学签名表态，结果主张罢课游行示威的同学占全校总数的2/3以上。与此同时，燕京大学也于29日晚成立了抗暴会，决定30日参加示威大游行。

12月30日，天还没亮，中法、朝阳、师大、铁道管理学院等校游行的队伍陆续来到了北大。清华、燕京两校学生也从西郊进城到了北大。这是一支近万人的示威队伍，在沙滩胜利会师。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了搞好这次抗暴游行示威，经过协商，选出北大的庞邦镛、胡邦定、聂运华，清华的杨立、方复，燕大的殷书训、沈丘义、包儒等组成临时指挥小组，领导这次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上北平街头，一路上高呼"抗议美军暴行"、"严惩肇事美军"、"美军撤出中国"、"美国立即改变对华政策"、"维护主权独立"、"民主新中国万岁"等口号。游行的学生沿途还张贴爱国标语，向市民散发《一年来美军暴行录》、《美军暴行真相》等传单。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消沉了10多年的北平古城，又被爱国的青年学生唤醒了，沸腾了。北平市民纷纷涌上街头，不时报以掌声。

国民党反动当局慑于群众的力量，只得把准备好的水龙藏了起来。平时横行霸道的美国兵这一天也被禁止外出。游行队伍到达驻有美军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门前时，同学们义愤填膺用英语高呼“Get away from China”(从中国滚出去)！又一齐动手把许多写有中文或英文的标语贴到大门和院墙上，军调部的匾额上换上了“美军滚出去”一排大字。然后，游行队伍转至出事地点——东单广场，在这里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大会。北大歌咏团的同学高唱《打倒美军》等歌曲，朗诵了《给受难者》等诗歌。游行结束后，各校推派了 20 名代表去新华门“行辕”请愿，提出惩凶和撤退美军等项要求。

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又得到了老师们的支持。北大 48 名教授，包括法学院院长周炳林、理学院院长江泽涵，联名写信给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暴行。西语系教授闻家泗(闻一多之弟)向记者发表声明：“同学罢课，表示抗议，是个人为人格，为国家争国格！”清华的张奚若、朱自清教授也在这天公开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校长梅贻琦、训导长褚士荃、教务长吴泽霖等也明确表示不能阻止学生游行，并要求国民党当局保障同学的安全。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赞成要求美军退出中国，雷洁琼教授等不但发言支持学生，而且还亲自参加了游行。这些教授的言论、行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对争取中间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是爱国学生运动十分需要的。

这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于群众基础很好，事先组织得当，因此是十分成功的。12 月 30 日整天，北平大街上看不见一个美国军人。爱国学生的伟大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振奋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4. 反美怒火燃遍全中国

北平学生的抗暴斗争，得到了全国学生的热烈响应。

上海《文汇报》冲破封锁，报导了沈崇事件的消息后，上海学生

群情激愤。沈崇原是上海某女子中学学生，因此上海学生闻讯更加愤怒。29日，暨南大学学生首先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通过了从30日开始全校学生罢课的决议。接着，复旦、同济、上法、上海医学院、光华体专、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也先后成立了抗暴组织，举行声讨会、控诉会，张贴宣传标语，发表抗议宣言。

一向平静的教会女中也激起了阵阵的波涛。中西女子中学是上海第一所高级女子中学。1892年由美国卫理公会所办，目的是对中国青年学生灌输"西方文明"，培养"高等华人"。美国兵的兽行撕下了"盟国"、"文明"的假面具，深深地刺痛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学生自治会召开了有全校学生参加的控诉会，女学生有的气得发抖，有的恨得痛哭，呼出了"为沈崇同学雪耻"的口号。崇德女中罢课了，女学生为自己的姊妹被奸污而感到耻辱，对美军的兽行表示愤怒，壁报栏贴满了抗议书。在进德女中，连虔诚的基督教徒也向上帝祈祷，要求惩罚那可恶的美国兵。

抗暴的怒火迅速燃遍上海大中学校，全市30万学生坚持美方必须公开道歉、惩凶，并保证立即退出中国。中共上海局支持学委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抗暴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等专科以上17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1946年除夕的下午，举行联席会议，公开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联合会主席由交大、复旦、暨大、商专等校代表组成，并决定于1947年元旦蒋介石公布伪宪法的第一天举行全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大示威，把抗暴斗争进一步引向高潮。

1947年的元旦，在上海人民的怒吼声中、在黄浦江的咆哮声中来临了。下午2点钟，1万多大中学校的学生，冲破国民党当局设下的重重阻挠，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大示威。交大的同学高举着"保卫中国独立自由"的横幅和"上海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的旗帜，踏着坚定的步伐走在最前面。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公园，学生们怒视着停泊在黄浦江中的美国军舰，高举铁拳和小旗奋

起示威。他们迅速包围了住有美国兵的汇中饭店大厦，把美国的星条旗扯掉，踏在脚下，并齐声高喊着“抗议美军暴行”、“挽救民族危亡”、“为臧大咬子复仇”、“为沈崇同学雪耻”、“美国兵立即滚出去”、“中国不是殖民地”等口号。在愤怒的学生游行队伍面前，平时耀武扬威的驻沪美军全都躲了起来。

在这次反美抗暴游行中，马寅初教授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战斗。12月30日，他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贴出了一张通告：“本教授遵照学联号召，罢教一天。”国民党三青团分子骂他是“学生的尾巴”，马寅初教授理直气壮地痛斥特务分子的谩骂，他说：“我是大学教授，我愿做学生的‘尾巴’，所以出来说话，倘如为外国人掩饰过失，做外国人的尾巴，那才可耻。”

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尊严，过去那些出身名门府第、从来不愿过问政治的女学生，元旦这天也参加了抗暴游行，她们有些人怕走不动，便先雇了三轮车到外滩，然后再与大家一起游行。

在天津，元旦这天，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了市政府，向市长提出了“惩办肇事美军”和“撤退驻华美军”等11项要求。抗暴怒潮使市长庆祝元旦的贵宾招待会也未能开成，各国领事馆的官员都扫兴而归。

在南京，学生突破了种种障碍，在1月2日、3日连续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先到国民党政府和外交部请愿。这时，蒋介石政府正在搞庆祝公布宪法的活动，同学们愤于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把他们挂出的“普天同庆”横幅改为“普天同悲”4个大字，并到美军驻华大使馆向司徒雷登面递抗议书。学生们正告中外反动派说：“美军一日不撤，运动一日不止！”

中国共产党密切注意学生抗暴运动的发展形势。党中央于1947年1月5日和6日，及时发出了《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反蒋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利用蒋管区平津沪学运成绩，扩大我党活动的指示》。指示中说：“北平学生反对美军的爱国运动，得到上海、

南京、天津等地学生的响应。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北平学生抗暴运动后的形势，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方针。

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暴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形成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运动。到1947年1月，除上述几个大的城市外，杭州、苏州、长沙、南昌、广州、桂林、昆明、成都、西安、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都举行了罢课集会或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达50万以上。

学生的抗暴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各界人民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上海工人协会1月7日发表了《告工友职员书》指出：“学生运动是我们中国人民翻身运动的先锋，是我们工人运动有力的同盟军，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关切和支持他们！”周谷城、周予同、刘佛年等近百名教授联合发表声援书，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文学家叶圣陶、雪峰、靳以、胡风，戏剧家田汉、熊佛西，妇女界廖梦醒、景宋（许广平）、胡子婴等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在《文汇报》上发表谈话，支持学生抗暴斗争。1月9日，解放区青联和妇联筹备会通电平、津、沪、宁及全国各地的学生抗暴委员会，表示声援。1月10日，延安各界举行大会，声援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运动，周恩来、谢觉哉、陆定一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讲话。解放区妇联筹备会副主席邓颖超同志代表解放区7000万妇女在大会上愤慨地说：“这是千万暴行中的一件，这件事表面上看来是两个美军强奸了一个女学生，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强奸了中国的国格。这是中国的耻辱，是关系中华民族尊严的事。”

消息传到了海外，有着光荣爱国传统的华侨也发起了抗暴签名运动及集会。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打电报给上海、香港、南京、重庆、天津、北平及延安各个报社，请报社转达给国内同胞。电报中

说："美军在华侵犯中国的主权，延长中国的内战，危害世界和平。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事后又诬其为妓女，实为对中国尊严不能容忍之侮辱，宁、沪、平、津学生之要求美军退出中国，意在维护中国尊严及人类权利。本人主持之新加坡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协会，前此已发动美军退出中国周，并以10万人签名之函，呈杜鲁门总统呼吁。然美军在华暴行仍有增无已，凡属中国同胞，均应支持学生。"这次抗暴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美国军事法庭不得不于1947年1月17日至21日对主要罪犯皮尔逊进行"审判"。

在各地抗暴联的基础上，1947年3月8日，中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上海庄严宣告成立。这一组织的成立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抗暴运动向纵深发展，而且直接孕育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诞生，从而为全国青年大团结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同时，这次抗暴运动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高潮的起点，也是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形成的起点。

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抗暴斗争犹如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一些人的原形。平日高贵家族的，这时却斥责爱国运动为狭隘的民族意识表现；平日以爱护学生自命的，现在却责怪沈崇晚上一人上街；平日以"大学生"姿态出现的，现在完全露出了流氓地痞的面目，捣毁学校，侮辱教授。上述情况，在北大看得尤其清楚。当抗暴斗争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爱国青年学生的迫害和镇压。1947年1月5日，镇江学生遭到国民党保安队的枪击；1月6日，广州市国民党当局明令制止学生游行；2月5日和8日，重庆发生两起殴打学生的流血事件；2月17日，北平实行"户口大检查"，大批便衣警察午夜闯入民宅，无辜市民2000余人被捕。同时

被捕的人中，有清华大学王宪铨、铁院陆元炽等。3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宣布上海各校学生抗暴会为非法组织。各校三青团搜集进步学生领袖的黑名单，并在学生中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

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及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针对目前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组织上，学生的抗暴联合会虽已在宁、沪、平、津、渝学生中有了基础，但也要建立可以自保的防线，即在名称上与行动上，在蒋特发现施以高压后，不妨改换名称或分开作战，使我损失不大，而仍能继续斗争、继续联络。"① 这一重要指示为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把政治斗争和为学生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通过一些局部斗争，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运动骨干，等待时机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更沉重的打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抗暴浪潮并没有低落，全国各地的学生仍以不同的形式为着同一目标，开展着局部性的斗争。当时，影响最大的是1947年5月上海交大的护校斗争。

交通大学早在重庆时期就已形成了以校长吴保丰为首的校政派与教务长李熙谋为首的少壮派。吴保丰原是中国机电工程学会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269页。

的会长，是一个技术专家，在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时，有陈的支持，执掌了交大的实权。抗战胜利后，教育部长换马，调了朱家骅，于是吴保丰上受部的歧视，下受少壮派排挤。少壮派李熙谋是朱家骅的亲信，靠了朱家骅的支持，掌握了教务实权，还直接控制着校内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李熙谋企图撵走吴保丰，自任校长。

朱家骅为了排除异己，夺取交大的领导权，长期以来克扣交大的经费，造成学校经济窘迫，因此学校每月亏空约7000万元。国民党教育部为了缓解矛盾，提出了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系，并决定更改交大校名。消息传来，交大师生员工极为愤慨，纷纷贴出抗议书，呼吁护校。有的学生在壁报上发表《内战第一乎?教育第一乎?》等杂文，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而吴保丰为了与教育部长朱家骅斗争，也想借助学生的力量，因而靠拢学生。

交大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市学委的直接领导下，分析了学校上层、教授、学生等方面的态度，充分肯定了学生要求护校的正义性，为了维护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和国家的海运事业，决定发动和领导这场护校斗争。

5月4日，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成立护校委员会。地下党员周寿昌等参加了护校委员会主席团，保证了党对护校运动的领导。5月6日，护校委员会代表及航海、轮机两系学生代表和校长吴保丰一同到南京请愿，遭到朱家骅的严词拒绝。朱家骅还说："对交大现有的纺织、水利两系，教育部也不予承认，管理学院等亦将逐步改隶"，"交通大学校名是沿用属交通部时旧名，现在似觉不妥。"① 交大师生闻讯，不啻火上加油，纷纷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5月9日晚，护校委员会召开各系各科代表大会，代表一致决议：10日起开始罢课，并向教育部提出：(1)交通大学名称不容更改；(2)航海、轮机、纺织、水利、化工系不容停办；(3)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增加经费，补足教授员工名额和增加校舍设备。

同时，交大教授会也作出决议：由校长率领教务长、总务长暨各院长、各系主任联合赴南京请愿，不达目的全体教授决定辞职。教授与学生站到一起来了。理学院的梁普教授公开表示：已经到了"应有所表示的时候了，否则青年学生的前途更加不堪设想。"护校斗争不仅得到学校教授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交大校友和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前校长唐文治发表谈话呼吁交大学生、校友团结一致，共挽校难。上海市工务局局长、校友赵祖康致电护校委员会，表示支持。

5月13日，交大师生赴南京请愿开始。在上海地下学委的直接领导下，2700多人的请愿队伍迅速而严密地组织起来了。租来的65辆各式大小卡车在校园内一字排列着。清晨，当请愿队伍登上卡车准备出发时，上海公用局局长赵曾钰匆匆跑来阻止请愿，他说："我已经和教育部通话，朱家骅部长答允不取消轮机系，不过限于经费，可能暂时设在造船系下面，航海系并在航业管理系内。其他问题可以派代表去京面谈。"大家一听，就知道是空头支票，是一种欺骗，于是，总指挥发布主席团命令："照原计划出发！"国立交通大学赴南京请愿团的鲜红大横幅挂在卡车车头上，浩浩荡荡的护校队伍出发了。正当车辆鱼贯驶出校门时，忽然，迎面疾驶过来一辆小汽车，在校门口猛然刹住，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从车上跳下来，在门口路中一站，举起双臂，不断挥动手杖，企图阻挡住车队的前进。这时，汽车司机依然高鸣喇叭，并慢慢启动汽车。吴国桢胆怯心惊，不由自主地移动身子，这时后面车上跳下几个同学把他拉到一边，车队就开出了校门。护校赴南京请愿的车队穿过市区，进入北火车站。车队到达北站时，只见军警戒备森严，车站早已奉命不售票。学生马上找到北站站长和路局副局长，提出如不能售票，就借用车辆。站方回答："奉上司命令，不能借给。"学生们严正地表示："同学们赴南京愿望已达沸点，如果由于车站的阻挠而造成的

一切后果，则必须由站方负责。”站方才被迫打电话急告南京，南京回答说：“朱家骅部长将于 11 时 3 刻前飞沪，要学生不要赴南京。”① 交大同学对这种骗人的鬼话不予理睬，而是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机车和 20 多节车厢，自己当起司机、司炉，把车开进站台。这时站台上除交大请愿的同学外，还挤满了冲破军警封锁线前来欢送的暨大、上医以及赴南京请愿的浙江英士大学等校的同学。在“团结就是力量”的雄壮歌声中，一名同学把“交大万岁”的大字标语贴到了机车前头。

国民党反动当局面对当时的形势更加张惶失措，吴国桢以及特地从南京飞沪的教育部、交通部两名次长都赶到火车站，软硬兼施，阻止交大同学赴南京请愿。但交大的同学坚持必须由朱家骅亲自来当面解决。可是等到晚上 6 时，朱家骅仍然没有露面，于是主席团决定发车。汽笛长鸣，开车信号响了，火车缓缓驶出车站，然后加速向南京方向驶去。

列车刚驶进麦根路，发现前方 400 米处的铁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拆除了。当局想用拆轨的办法阻止列车前进，但是，交大土木系的学生在工人的协助下，很快修复了路轨，列车继续前进了。正当学生抢修路轨时，青年军 202 师一个营赶来，冲进车厢，强迫学生立即返校，否则要学生自负一切后果。可是，交大学生毫不屈服，与青年军展开了说理斗争，这些奉命行事的青年军一个个被问得张口结舌，狼狈败阵。

凌晨 3 点，列车进入车站，前面长长的一段铁轨又被拆除了。四周军警密布，土木系的修路队立即下车抢修，就在这时，朱家骅坐着一辆红色警备车，来到了学生的面前，开始向学生“训话”：“你们已经不是交大的学生，此后出了什么事，教育部不再加以保护。我为了维持治安，和吴市长等热诚调解，你们若再破坏法纪，最后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第 85 页。

只有一条死路了。"① 青年军202师包围住列车，公路上不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眼看一场血腥镇压即将发生。

上海地下党始终领导着这场斗争。党的上海局书记刘晓考虑到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全副武装的军警斗争，一旦远离上海则更无后援，因此，派了两位同志骑着自行车穿过敌人的防线，赶到列车停车处，传达了党的指示：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斗争打下基础。因此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时果断收兵。经过学生代表和朱家骅谈判，朱家骅被迫签字答应交大不改名、不停办任何院系、增加经费等5条保证，基本上满足了学生的要求。吴国桢也被迫表示：只要学生返校，一个也不开除。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终于向学生屈服低头，交大护校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斗争仍在继续。

三、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

1. 最后的决定权属于人民

1945年9月至12月，解放区军民粉碎了蒋介石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高涨，使美蒋反动派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需要争取布置内战的时间。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时下达了停战令，并组成了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

中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了停战令。相反，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纵容下，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在关内，自1月10日至5月20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达3600余次。在东北，国民党以"接收主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第88页。

权”为借口，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其结果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东北，国民党军队遭到我军沉重打击之后，于1946年3月27日被迫同意签订了东北停战协议。但是墨迹未干，4月初，国民党又公开撕毁协议，向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蒋介石军队进抵松花江南岸，由于我军的顽强抵抗和国民党军力的分散，国民党军队在遭到连续被歼五六个团之后，马歇尔又建议自6月6日起，双方在东北停战15天，进行谈判。

在停战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国民党提出要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陇海路以南及胶济全线等5项十分荒谬的条件，使谈判陷于僵局，国民党代表于是提出将“最后的决议权”交给马歇尔。为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表声明，呼吁长期全面停战，反对国民党政府赋予马歇尔最后决定权。

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之下，上海的学生、工人、市民以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内战、争和平的群众运动。

5月5日，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救国会、民主建国会、工商协会、妇女联谊会、学生团体联合会等52个团体，组织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6月8日，上海文化界、实业界人士马叙伦、许广平、胡厥文、吴蕴梅等164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马歇尔和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的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挽救中国。

爱国的青年学生再也不能沉默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成了反内战运动的先锋。交大的师生在抗战时期内迁重庆，胜利后又分批回沪，他们有的顺江而下，有的绕道武汉、广州，途中目睹国民党政府抢运军火，强征军粮，拉壮丁，筑碉堡，加紧准备发动内战；眼看灾难深重的人民在抗战胜利后依旧遭到人祸造成困苦的情景，深深感到中国人民不能再让国民党打内战了。6月13日，全校学生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成立了交大学生反内战救灾运动委

员会。接着圣约翰、三江、大同、沪江等大学也纷纷成立了反内战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反内战活动。如开展时事讨论会，发动学生向报社写信，呼吁全上海的同学都来参加反内战斗争。过去一些不大参加学生运动的学校的学生也投入了反内战运动。

6月16日，在日益高涨的反内战的浪潮中，全市100多所大中学校的5000余学生在天蟾舞台举行“尊师庆功联欢大会”。上海地下党学委的负责人和从延安秘密来沪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以群众的身份参加了大会。

大会开始后，首先由郭沫若发表了讲演：他说：“天地君亲师，教师应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却是至低无下的待遇。”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裁减军费，要求大量裁军。今天，除了打内战，军队是没有大量存在的必要的，我们要求立刻停止内战，永远停止内战，把庞大的军费用到国家建设上，用到教育上来！”郭沫若的话讲出了台下师生们的心声。群众呼出了“裁减军费，反对内战”的口号，口号声响彻会场，“反对内战，反对内战，要和平，要和平”的歌声把大会引向最高潮。大会最后通电全国，呼吁“立刻停止内战”，并通过了《沪市学生联合起来》等决议。由于上海地下学委的正确领导，“尊师庆功会”很自然地变成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大会。同时，这次大会也为上海学生由生活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6月19日，全市72所大中学校成立了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不到两天，参加联合会的学校增至130所。各校都成立了反内战的团体。

6月20日，大同大学暨附中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大同反内战委员会，决定从那天开始停课7天，延期参加考试，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宣传活动。6月21日下午，上海市长吴国桢驾车亲临“监试”，可是，教室里寥寥数人，学生们大多在操场上开展反内战宣传活动。吴国桢便把学生集中起来训话，大骂反对内战的学生是“受人利用”、“不参加考试是暴徒”、“对暴徒要严加惩办”。

大同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上台批驳吴国桢，说明当前反内战的紧迫性，严正声明“考试可以延期，和平不能耽搁”。这时，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陈震中正在大同联系工作，也要求上台发言。陈震中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学生反对内战，完全出于爱国。”吴国桢恼羞成怒，大骂陈震中是“暴徒”，是在“煽动学潮”。这时，警备司令部来了20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把陈震中扣留了起来。一批三青团员和特务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捣乱，对学生挥拳乱打，当场打伤学生多人。

吴国桢指挥殴打学生的暴行，引起了上海学生的公愤，2000多学生坚持向吴国桢进行说理斗争，他们强烈要求“吴市长要支持正义”、“释放学生，惩办凶手”。在群众的压力下，吴国桢被迫下令释放陈震中，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2. 赴南京和平请愿

在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于21日宣布将东北停战令延期8天至6月30日中午为止。在这战与和的紧急时刻，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要结成广泛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同时，亲自对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通过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欺骗性的揭露，来提高他们对国民党反动实质的认识。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决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各界协商推选出了马叙伦、阎宝航、胡厥文、簪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吴耀宗、张绚伯、包达三等9人为代表，学生团体联合会推举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陈立夏（东吴大学学生）为学生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6月23日，上海人民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当天，上海13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和工人、职员、市民等各界5万

多人，手执各色小旗，唱着反内战的歌曲，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车站。上午 8 时，北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从广场到月台，人群拥挤，连检票房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充分反映了上海人民和学生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坚强意志。《联合晚报》在社论中说："这是真正人民的行列，这是真正人民的声音，凡是稍有良心的人们，看到这悲壮的场面，无不为之感动落泪的。"

这次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可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各阶层人民联合行动的一次重大斗争。因此，上海地下党十分重视对这场斗争的领导，为此，在火车站附近天目路上一个地下党员家里，专门建立了六二三运动秘密指挥部，地下学委的主要负责人张本、吴学谦、陈一鸣、李琦涛等都在这里指挥。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和正在上海的冯文彬也亲临现场指挥了这场斗争。

上海各界人民群众，送走了自己的代表后，随即进入市区游行示威。由圣约翰大学学生高举着"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的横幅走在队伍的前面。学生在马路上用粉笔写满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标语，他们还喊出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退驻华美国海空军"等口号，沿途还散发了大量的反内战的传单和宣言。下午 4 时，游行队伍抵达复兴公园后解散。

3. 南京下关惨案

上海市人民和平请愿的代表几经周折，于 6 月 23 日当天下午 7 时抵达下关车站。代表们下车后，即遭到预先等伏在那里的特务的殴打。60 多岁的马叙伦先生的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教授被打得口吐鲜血，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夏被打昏在地。代表们身上所带的钢笔、手表等物也被暴徒一抢而光。这群法西斯暴徒还包围殴打了前来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益世报》、《大刚报》的记者，国际新闻社女记者艾勃纳，南京市民

盟代表派赴车站欢迎请愿代表团的叶笃义先生也被打成重伤。这就是国民党当局一手导演的南京下关惨案。

当时，周恩来正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他得悉上海代表在下关被打的消息之后，立即偕同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及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等到医院探视。周恩来向学生代表陈震中介绍了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蓄意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对代表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表达了党对国统区广大进步学生的亲切关怀。

下关惨案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请愿代表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对代表们的安全十分关心。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电报，慰问马叙伦等全体代表。电报的全文是：

"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篆延芳、张绚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夫诸位先生公鉴：

先生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希珍重。"

各界的慰问信、慰问电报如雪片一样飞来。

请愿代表虽然身负重伤，但仍坚持斗争。他们要求蒋介石接见，但蒋介石只单独接见了篆延芳。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接见了两位学生代表。代表们义正词严地向他们陈述了上海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制造下关惨案的经过。6月29日，全体代表返回上海。

六二三反内战运动虽然没有能够阻止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但是人民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下关惨案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狰狞面目，如果说抗战胜利后，还能蒙蔽一部分人的话，那么，这时的蒋介石已是民心丧尽，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暴露无

遗了。铁的事实告诉人民：国民党反动派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也检阅了抗战后的上海革命力量，同时也鼓舞了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四、五二〇斗争

1. 五二〇惨案的发生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发狂似的迅速上涨。物价的狂涛，淹没了不知多少苦难的人民。不安的空气也普遍地笼罩着各学校。

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全国各地的青年同学深感五四时期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继续发扬五四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把反对美蒋斗争进行到底。5月初，南北各高等院校的学生纷纷举行五四纪念会。上海学生除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会外，在五四的当天，还举行了反对内战、反对卖国、反对物价暴涨的社会宣传，国民党警察把正在街头宣传的上海法学院学生2人打成重伤，又无理拘讯学生多人。上海法学院的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各校都纷纷起来支援。5月9日，上海各校学生齐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示威，从此揭开了5月斗争的序幕。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加深，教育危机也日趋严重。教育经费大量移充内战经费，194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经费仅占全部财政支出的3%，而实际支出还不到此数。许多高等学校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师生们由于营养不良，贫病交迫，不可终日；加上教育制度的腐败，国民党党棍治校，特务横行，思想言论没有自由可言，就是生命也无保障。所以，各校师生在开展纪念五四

运动的同时，许多学校即分散地进行着反对各种不合理的斗争：浙江英士大学为要求迁校和反对校长而罢课；交大的“护校斗争”；沪江、大同等校为要求革新校政而斗争，高中学生为反会考而赴南京请愿；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教师要求调整待遇罢教等。这些斗争，通过五四一系列活动，犹如涓涓细流，很快汇集到一个总的目标上来——即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物价暴涨，广大师生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上海、南京国立大专院校公费生一天的菜金只能够买两根油条，一个月的伙食费只够吃半个月。因而各校学生要求增加公费，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逐渐展开。

5月10日至13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先后3次派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按物价指数调整公费。但国民党政府一味拖延，激起学生强烈不满。学生自治会宣布从12日起全校罢课，要求增加公费，由每月2.5万元增至10万元，这个要求得到了学生们的支持，一小时内，就有1500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15日，中央大学、剧专、音专、东方语言专科等4校3000余学生，唱着“我们要饿死”的歌词，举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旗帜，冲入国民党教育部请愿，朱家骅被迫出见。学生们要求：“副食品费要按照物价指数增加！”但朱家骅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财政有困难！”学生们说：“我们不要打内战，把钱拿出来办学校！”朱官腔十足地推说问题应找行政院解决，借故溜走了。学生们又到国民党行政院请愿，行政院长张群不在，由副院长王云五出见。王云五蛮横地说：“维持公费已属不易，要按物价指数调整是办不到的！”王的回答引起了学生的愤怒，纷纷质问：“国家的钱到哪里去了？”“既然财政有困难，为什么还打内战？”接着，大家唱起了反内战的歌曲“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把王云五哄走了。请愿没有结果，斗争向着更大的规模发展。

华北学生掀起了斗争的风暴。16日，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确

定斗争的目标为反饥饿、反内战。随后，又提出了6项要求：(1)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2)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3)停止征兵、征实、征物；(4)清算豪门资本，彻底挽救经济危机；(5)实现"四项诺言"，保障人权，保障自由；(6)提高教育经费，提高教育界待遇，全国学生普遍享有公费待遇。17日，清华大学为宣传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同日，北京大学决定罢课，朝阳、中法、燕京、汇文等校相继响应。天津的南开、北洋等校也紧跟着罢了课。

18日，清华、北大等校学生分队上街进行宣传。在西单活动的宣传队，正唱着"这年头，怎么得了，100元的钞票无人要"时，人群中忽然涌出百来个美式装备的青年军，围殴宣传队，伤10余人。当晚，北大、清华、燕京、中法、朝阳、辅仁、南开、北洋、唐山交大等校学生代表齐集在北大开会，在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迅速扩大，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恐慌。5月17日，国民党行政院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分别发表谈话，命令"治安机关切实执行任务"。18日，国民党当局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民的民主爱国运动采取血腥镇压的所谓"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同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叫嚣什么"此次学潮之离奇怪诞，为以往任何时间所未有"，学生已越出"国民道德"，"形同暴徒"，他将"不得不采取断然处置"。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将仅有的一点"民主"外衣也撕得精光，杀气腾腾地要镇压学生了。但是，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社会的舆论都在学生一边，他们决不是什么政府法令或强力镇压所能吓退的。就在那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颁布的第二天，上海7所国立大专学校7000余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游行时，学生们愤怒地喊出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向炮口要饭吃！"

5月20日，华北、京沪等地的学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汇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

5月20日上午10时起，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陆续向北大红楼操场集合，组成了7000余人的游行队伍。队伍中的歌声与口号声此起彼落，人数愈来愈多，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愈来愈有力。午后1时许，队伍开始出发。队伍中有师院的教授和北大的助教，还有许多女中的年约十四五岁的女同学，他们沿途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反对征兵征税"、"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农民生活"、"增加教育经费"等口号。游行队伍通过东城区到西城区西单附近时，特务们向游行队伍投掷石子进行挑衅。同学们加强戒备，镇静地继续前进。晚上7时，游行队伍回到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反饥饿常委会向同学报告了当天请愿团向"行辕"交涉的经过，提议在请愿未得满意答复前，继续罢课。同时还通过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在这一天游行示威。

5月20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当队伍由鼓楼向国民参政会行进时，密集的宪警已在珠江路口摆下屠杀的阵势，红色的巡逻车发出尖锐的叫声，源源开来；巡官来回奔跑，暴跳不已。游行队伍到达这里，几经交涉，要求他们让出马路，但都遭到无理的拒绝。于是主席团决定冲过去。同学们手挽手，高呼"冲呀！冲过去，我们不能向暴力低头"，跑步冲向珠江路口。6000多人似钢铁洪流冲破了警察防线。这时，如虎似狼的警宪特务一齐动手，放射水龙，迎面冲击学生，挥舞木棍皮鞭，逢人便打，当场被击流血的学生有50余人，重伤8人，遭毒打的有500人以上，逮捕学生28人。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制造的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学生们并没有被暴力吓倒，而是继续前进。但当游行队伍到达国府路（今长江路）时，又遭到国民党设置的马队、防护团、武装宪兵和机关枪队密密层层的封锁，拦住

了学生到参政会的去路。大队只好停下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军警、特务僵持了6个小时，学生们仍然昂首挺胸，坚持不退。风声、雨声和歌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呈现了中国学生团结战斗的宏伟壮观的动人场面。

为了避免同学再次遭受屠杀，主席团派出7名代表与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卫持平谈判，提出释放被捕同学、严惩凶手、医治受伤同学和撤退武装军警等4项要求。同时，主席团就地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控诉反动政府的迫害，呼吁舆论界的广泛支持。卫持平仍不肯撤防，学生代表前去国民参政会，会见秘书长邵力子，向他递交了志愿书，邵力子接受了请愿书，表示愿将学生的要求转达国民参政会和国民政府。接着，由邵力子出面主持，学生代表与卫持平经过谈判，终于下令撤防让路。游行队伍由国府路、碑亭巷、成贤街，带着沉痛的心情，高呼着愤怒的口号，返回了中央大学。

就在这一天，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两校的游行，唐山工学院学生的游行，都遭到国民党警宪和特务的干扰和殴打。当天天津学生被军警打伤50余人，被捕17人。国民党当局以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力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然而，其结果不是学生运动的熄灭，而是运动的扩大。

2. 全国各地声援五二〇斗争

五二〇惨案发生之后，南京学委在市委的指示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最后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当局屠杀爱国青年学生的罪行，呼吁全国学生团结起来向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各地区党组织领导下，运动很快扩展到了蒋管区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全国性

学生运动的高潮。

5月22日，湖南大学举行反内战游行，昆明学生亦罢课游行。开封、广州、沈阳、福州、重庆、南昌、桂林等地学生，也相继行动起来了。23、24日两天，上海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抗议五二〇惨案。各校学生组成了几十个宣传小队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内战和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活动大肆镇压，凶狠的特务用木棍、铁棒和带铁钉的棍子毒打学生，但是，青年学生英勇不屈，虽受伤倒地，仍高歌："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他们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前赴后继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有个宣传小队在外滩进行宣传，全体被捕，另一个宣传队又到同一个地点去宣传，听众越来越多，警察又来抓他们，学生对警察说："请你们允许我们五分钟自由，让我们宣传宣传。"随后他们就自动登上警备车，在警备车行驶途中，仍唱着"反内战"的歌曲。这时，第三个宣传小队又走到了同一地点继续进行宣传。学生们的勇敢斗争，感动了街头的无数听众。当时，上海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正在高涨。上海学生的斗争在工人运动的支持下，使敌人感到非常恐慌，上海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被迫解冻了工人的"生活指数"，而且被迫提高了学生的"公费待遇"。因此，上海学生的斗争取得了又一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屠杀、逮捕、迫害是极不得人心的，因为真理在学生一边。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得到了中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68个团体代表40万市民发表宣告："我们决不能看着我们的子弟在铁棍、钉棒、皮带、刺刀、子弹、手铐底下生活。"长辛店工人罢工3天，声援被迫害的学生。南京工人和市民踊跃为学生捐款，仅21日一天，捐款就达400万元。其他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谈话，表示对学生最大的声援和同情，对国民党的暴行进行严厉的谴责。郭沫若、周建人、茅盾等社会知名人士

也纷纷表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郭沫若说："中国是一定会得到解放的，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中国的希望。这决不是武力能镇压下去的。如武力可以收效，三一八之后不会再有一二一，一二一之后不会有五二〇了。反动派迷信武力，正是走到末路的时候，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这样替我们证明着。"①

清华、北大、燕京、南开、复旦、交大、暨大等大学的教授，都激起了义愤，纷纷联名发表意见，表示反对内战并对国民党政府以武力镇压和任意逮捕学生，提出抗议。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方光焘、刘佛年等10余人到上海国民党市政府会晤吴国桢，提出：(1)抗议便衣人及蒙面客殴捕学生，要求严惩凶手；(2)立即释放被捕学生；(3)停止搜捕并保障教授及学生之安全。

北方9院校教职员585人呼吁和平宣言中讲：同人等深知今日一切纷扰现象，根源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为长期内战之恶果，一切学潮工潮均为当前时势下必然之物，默察当前形势，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俱已临于崩溃之边缘，危机迫于眉睫，政府如长期敷衍下去，不迅采取釜底抽薪之有效办法，最后势必同归于尽而后已。他们最后提出："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无他途。"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单是师长们表示了这种意见，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都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新加坡、菲律宾、暹罗等地爱国侨胞也纷纷来电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暹罗华侨学生联合会来电说："你们是正义的！同学们！虽然独裁者继续屠杀你们，但这些就是记在我们心里的仇恨，你们最近发表的宣言，我们忠心拥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第113页。

②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一分册，第67—68页。

护”，“最后祝你们再勇敢地去战斗，我们誓做你们的后盾，我们是战斗的朋友，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去争取祖国和平民主的实现！”①

1947年6月5日，冯玉祥将军在美国旧金山《华侨世界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斥责国民党和蒋介石。他说：“青年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青年主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要求“不要打内战”，“他们当有这个权力”，“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何至忍心害理，丧尽天良，把子弟们打死打伤呢？”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农工民主党中央、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也在香港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早日结束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

苏联塔斯社发来电讯稿声援中国学生，甚至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和英国的路透社也对五二〇惨案作了客观的报导。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中国学生现在采取有力行动，抗议延续不息之内战”，“故学生之呼吁和平，实较政府当局更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欲望”。美国民主青年大会也写信给上海学联说：“我们用最大的愤慨和惭愧的心情来读完关于你们因为反饥饿、反内战而遭受到毒打和屠杀的消息。”“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这件事有很大责任，……中国政府正为我们的杜鲁门政策所鼓励着从事更大规模的内战。毫无疑问，这种政策是在鼓励着所有的反动派加紧对他们国内人民和民主力量的进攻。我们谨向你们保证美国学生是决不同意这项政策的，……我们一定把你们所遭受到的不幸告诉每一个美国公民，并愿促使我们的政府撤销对你们不民主政府的一切援助，以求停止这一切大屠杀和内战。”国际学联也致电中国学生以表示支持和同情。

---

① 《学生报》1947年10月5日。

五、六一大逮捕和六二斗争形式的改变

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局，到处加紧迫害学生和各阶层人民。6月1日的黎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杭州、贵阳、昆明、重庆等城市，进行全国规模的大逮捕。这一天被捕者至少有2000余人，被捕者都是学生、教员、记者和市民。在武汉，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武汉大学六一血案。

5月31日晚，武汉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晚会，准备响应华北学联的号召，在6月2日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武汉反动当局竟于6.月1日凌晨3时，调动军警数千人包围珞珈山武汉大学，断绝交通，闯进校园进行搜捕。当时武大师生从睡梦中惊醒，许多学生立刻被绑，在枪托毒打之下，有5位教授和12名同学被无辜逮捕，分3辆囚车押送。当最后一辆囚车将要开动的时候，学生再也抑制不住心头怒火，冲破层层包围，打开车门，想从虎口里夺回被捕的战友。但刽子手们竟然用手枪、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一齐对准学生猛射，黄鸣岗、王志德同学应声倒在血泊之中，回到大陆不满一年的台湾籍青年陈如丰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此外还有11名同学被打伤。6月2日，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宣布戒严，军警全体出动，整日不断在街道巡逻。

全国的学生怀着悲愤的心情，准备在这一天举行罢课，掀起大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活动。但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根据五二〇惨案后敌人决心血腥镇压学生的险恶形势，及时地领导广大学生改变了斗争形式，挫败了敌人的屠杀阴谋。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取消了6月2日的游行示威，只在校内罢课不上街游行，并作了撤退隐蔽的准备。北平学生于6月1日在北大举行民主广场命名会。会议结束时，反饥联根据党的指示宣布：决定取消6月2日的示威游行，实行总罢课一天，当天上午在民主广场举行

华北学生反内战纪念会。

6月2日，北平城门紧闭，街上行人稀少，北大周围布满了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上午9时，学生们沉着镇定地在校内举行了“内战牺牲军民追悼会”。追悼和纪念在内战中死难的军民，纪念在这次迫害中牺牲的同学。一个女同学声泪俱下地回顾了抗战以来的民主运动，控诉了反动派的罪行，听众们都流下了悲愤的眼泪。当天，在华北反饥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华北学生联合会，并发表了宣言。宣言指出：“我们深感向顽固执迷者要求和平，是一种不智之举，制止内战，端赖于全国同胞的努力。”这说明，通过斗争，广大青年学生对反动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党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适时地改变斗争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共中央指出：宁沪平津学生停止上街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是对的，“这样，可以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教员，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人员，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目前政府捕杀学生兼及教员记者的暴行是普遍的，应抓紧社会上对此暴行的共同愤慨及统治阶级中某些矛盾（如立法院调查委员会），坚持放人、反暴行的要求，以团结内部，扩大同情。”①

这次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标志着全国范围内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运动的规模和气概，为以往学生运动所少有，仅上海一地就有5万学生直接参加了斗争，各地学生都无例外地和反动派展开了面对面的反复多次的斗争，而且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援和同情，特别是学生运动和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主力部队——工人运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沉重地打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深了国民党的统治危机。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1947年6月3日。

"中国境内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① 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于运动的深入发展，反动派的穷凶极恶更加暴露无遗，从而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要生存，要和平，要自由，除了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外，别无出路。运动促进了广大爱国青年学生觉悟的提高，促进了全国青年学生更加团结。

六、第十三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 全国学联在沪秘密建立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学生大联合。1947 年春天，在抗暴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全国抗暴联合会已为全国学联准备了一个雏形。但在全国抗暴运动结束后，工作人员都返回了学校，抗暴联已不能适应学生运动发展的需要。5 月 22 日，宁、沪、杭、苏学生代表在南京开会，决议成立宁沪杭苏 4 区专科以上的学生联合会。不久，河南学生加入，4 区学联逐步扩大为宁沪苏浙豫 5 区学联，并发表了《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起书》。这个倡议受到了各地学生的欢迎。四川、云南、西康等地学生组织纷纷通电南京，表示愿意参加全国学联。6 月 2 日，华北学联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6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学生的组织形式，应与斗争形势相适应，例如现有华北区学联，宁沪苏浙豫 5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24—1225 页。

区学联以及各地学生反暴行委员会，均可不拘名称形式，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①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统一全国同学的行动步骤，加强全国同学的大团结，为了巩固胜利，扩大战果，决定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

1947 年 6 月中旬，北平、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河南 6 区学联代表汇集上海，于 6 月 17 日下午 4 时，召开了学联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会议决定 6 月 18 日召开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并推选了京、沪、平、浙 4 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负责起草全国学联章程。

6 月 19 日下午 2 时，第十三届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在上海麦伦中学，后在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秘密召开。会上，各地代表报告了本地学运情况，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学联章程》和《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章程》总则规定：本会定为“中国学生联合会”，宗旨为“团结全国学生共同努力于学术之研究及生活之改进，团结全国学生与世界各国学生取得联系，共同争取民主，促进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②《宣言》揭露了国民党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罪恶行径。指出“胜利的果实被少数在抗战中拖战、观战甚至阻碍抗战的反动分子偷窃了，中国人民流血流汗所争取到的国际地位和民主权利丧失殆尽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仍旧桎梏在我们头上，中国仍是一个为豪门官僚资本集团大权独揽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半殖民地，祖国仍旧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青年学生不能眼看着我们在抗战中用自己的血汗拯救过来的祖国被少数人偷偷地把它葬送了，我们更不愿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救过来而又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更不能忍受政治黑暗，特务横行，人权毫无保障的专制独裁统治继续下去。”《宣言》最后号召全国的学生在“反饥饿，争取生存！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迫害，争取自由”的正义

① 《中共中央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1947 年 6 月 3 日。
② 《学生报》1947 年 7 月。

口号下"不分党派、信仰与地域团结起来，结成一道坚固的统一战线，与国内反动分子作战到底！"① 这次大会由于环境的恶劣、交通等原因，不少地区的学联代表未能出席会议，即使出席会议，各地区的人数不一，故大会决定："以学区为代表，即一人发言及投票表决，各学区的发言人首先向大会执行主席登记姓名，并审核其代表资格。"通过投票选出了徐裕荣、马健行、史继海、陈荷夫等7人为本届学联大会理事，陈震中为主席，黄鹤桢为副主席。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学联一开始就不能公开活动，后来便将全国学联理事会、学联党组两套人马合二为一，成立了全国学联党组，领导全国学生运动。学联党组的成员先后有黄振声、戴天、史继海、陈荷夫、刘晴波、钱李仁、吴学谦、铁瑛、朱语今、徐裕荣等。大会最后讨论通过了各学区的联络办法以及出版学联刊物、活动经费、暑期工作等决议案，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告全国师长书》、《告同学家长书》、《告华侨青年书》、《告全国同胞书》、《告世界青年书》等。

全国学联自从1939年初被国民党解散后，现在又重新建立起来，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宣布取缔学联，追踪、搜捕学联领导人，但他们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秘密履行着自己的职责。1947年7月31日，国际学联理事会接受了中国学联为会员，并当选为副主席。

2. 全国学联代表出席国际学联理事会

1946年8月，国际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召开，正式成立国际学生联合会。"国际学联是个三级制的组织，三年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理事会，三个月召开一次

① 《学生报》1947年7月。

执行委员会。"① 第一届国际学联主席是捷克的格罗曼，书记是英国的马丁。第一届国际学联代表大会，中国学联未派代表参加，而是国民党政府花费大量的金钱在英国指定一批留学生由伦敦大使馆率领，无耻地自称是"中国中央学联"的代表，冒名参加大会，甚至蒙蔽一切地当选为理事会的副主席。

全国学联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与进步青年学生团体取得了联系。1947年8月初，全国学联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巧妙地避过了国民党警察特务的视线，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乘机前往捷克，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学联第二次理事会，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企图把中国学生与世界青年学生隔绝的阴谋。中国学联代表在国际学联理事会上将中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英勇斗争事迹向会议作了详细的介绍。会后又举行了中国学生斗争资料展览会，使世界各国的学联代表对中国学生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还揭穿了国民党政府花费大量金钱雇用国民党三青团员，冒名参加第一次国际学联代表大会的无耻勾当。会议由英、法两国学联代表团提议，经理事会讨论一致通过，发出了《抗议中国政府暴行国际学联八项决议》和《国际学联理事会向中国政府抗议书》，其主要内容是：抗议中国政府支持并不是民主选举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参加1946年8月在捷克召开的世界学联大会，并对中国政府破坏学生团结，滥用军警武力压迫民主学生团体、非法逮捕学生并强制阻挠学生的示威运动表示愤怒；由美国学联号召美国学生以行动制止杜鲁门的援华内战政策；世界学联对于中国政府之暴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告；开除中国政府所伪造之"中国大学生中央联盟"会籍，取消中国政府所派遣的代表资格，并将国际学联副主席的荣誉给了真正代表中国学生意见和利益的团体

① 《介绍国际学联》，1947年10月5日《学生报》。

——中国学生联合会。[①]《国际学联理事会致中国学联会书》中说："对于你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愿寄予同情和支援，并且我们要声明：在你们的战斗中，我们准备尽力采取每一个步骤来援助你们。"国际学联把支援殖民地附属国学生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作为它的重要任务之一。1947 年初，国际学联和世界青联组织了东南亚访问团，把世界青年和学生的同情与支援带给了正在为挣脱帝国主义枷锁而英勇斗争的东南亚青年和学生，协助他们成立与巩固了他们的组织。1947 年 8 月，国际学联在一次执委会上通过决议，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交给中国学联代表负责。1948 年 2 月中旬，国际学联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东南亚青年和学生大会，中国学联代表携带大批材料前往参加。这次大会沟通了东南亚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学运的消息，交流总结了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坚定了胜利的信念。

① 《介绍国际学联》，1947 年 10 月 5 日《学生报》。

第十四章　开展“反迫害”与“反美扶日”的斗争

一、全国学生的反迫害斗争

1947年7月，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为标志，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统治中国20年的蒋家王朝已到了“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连连失败，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了空前危机之中。五二〇运动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稳住后方，千方百计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继1947年5月18日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之后，7月4日又颁布了《勘乱总动员令》，借“勘乱”之名，使一切逮捕、监禁和屠杀人民的暴行合法化。在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学生被开除学籍和关进监狱。8月，国民党又开始实行《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任意捕人。整个国统区，到处弥漫着迫害与屠杀的腥风血雨。仅1947年10月，上海、北平等8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被残杀。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的渴望，昔日的政协精神，被一纸“动员令”所破坏了，摧毁了。“动员令”成为对人民的宣战书，同时也成了反动派自己命运的判决书，反动派不但向人民宣告其不要和平、不要民主，而且把当年关于“和平”、“民主”、“宪政”的谎言，变成了“勘乱”、“剿杀”的礼炮。所谓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却是人民被“命令”、“逮捕”、“饥饿”的自由。“反对内战”就是“反对政府”，罢工、罢课、游行、集会一

律禁止。法律成为统治者的护身符，而“动员令”使反动派成了合法的刽子手。

国民党的《勘乱总动员令》，在人民面前划成两条战线：反人民利益的和为人民利益的，要和平民主和不要和平民主的。整个局势因此更加明朗化了：每个人或者勇敢坚决地走向光明，或者公开地做帮凶。但是，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并没有在国民党的《勘乱总动员令》下见难而退缩，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更加坚强了起来，向着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反迫害斗争。

1. 浙大于子三血案

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及同学3人被捕。浙大学生立即展开了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浙江区学联发表书面讲话，指出反动政府采取“摧残人权、迫害青年的野蛮手段”，其目的是在于“打击各地的民主运动”，为此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击破这恐怖黑暗的时代”。下午7时，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决议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当局：(1)无条件的释放被捕者；(2)释放前不得施用任何刑罚；(3)保证今后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之后，浙大学生代表与校方一同前往保安警察处交涉。反动当局施展其推、拖、骗、压的伎俩，以“案情严重，问题复杂”为由拒绝浙大同学的要求，直到28日下午，国民党当局仍不作任何表示。浙大学生忍无可忍，学生会作出决定：如果4位同学到29日仍不开释，将从30日起罢课3天。但到29日晚10时，突然传来凶讯，于子三惨死狱中。

于子三死后，反动派捏造了“共产中坚分子于子三畏罪自杀”的骗局，伪造了于用玻璃片刺破喉咙致死的假物证，实际上是29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子三遇难当天，浙大校长竺可桢入监探视遗体，严正拒绝了反动派要他证明于子三确属自杀的卑鄙要求，他说：“我只能证明他已死，但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自杀。”他在

证明书上只写了“在狱中身故，现场看过”几个字。

战友惨死，浙大全体同学万分悲痛。30日，浙大师生2000余人集会志哀，并控诉反动派的暴行，一致喊出“为死难者复仇”的口号，要求彻底查清惨案真相。31日，浙大教授罢教1天，并发表宣言，严正指出了反动政府的罪责。11月1日，浙大讲师助教会也罢教一天，并捐款1000多万元资助营救工作。

反动派杀害了于子三之后，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浙大发出的通电和信件全被扣留。杭州地方法院还发表了伪造的鉴定书，诬称于子三是自杀而死。但是，墨写的谎言怎能掩盖住血的事实！浙大血案不胫而走，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于是，抗议浙大血案和各地的反迫害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为全国的“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运动。

斗争首先在北平发动。北平各大中学校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关于“立即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举行有限期的罢课”的指示，从1947年11月4日起，几天内，北平各大中学校都卷入了罢课浪潮，并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追悼会。北大、清华、中法等校的163位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同情罢课的宣言；学生又出动街头宣传，反对国民党政府随便杀人，反对法西斯统治。与北平同时，天津的南开、北洋等学校也于11月6日罢课。南开还组织了人权保障委员会，并召开反迫害晚会，以扩大斗争的影响。在昆明，30多所大中学校于11月6、7两日举行总罢课，并在云大广场集合，声讨反动派的暴行。京、沪各校，也在11月10日发动起来了。各校先后举行罢课，召开追悼会，上海学联还发表了抗议书。此外，西安、福州、厦门、长沙、武汉等地的学校也相继罢课。总计参加这一斗争的学生达10万以上。

浙大于子三血案是五二〇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学生的一个新步骤，预示着敌人在行将灭亡之际正酝酿着新的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了。但学生们在斗争中也表现了明显的

冷静和策略，他们以有限期的罢课代替了那种冲出校外举行大规模游行的激烈行动。

2. “救饥救寒”运动

抗议于子三事件斗争后，有相当一些学生积极分子的情绪比较低沉，对能否冲破白色恐怖缺乏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扩大内战，搜刮民财，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农民弃家流浪，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发展。1947 年 11 月中旬，寒流袭击上海。12 月中旬，气温骤降，北风呼号，大雪纷飞。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却有几十万工人、贫民住在冰冷的“滚地笼”内，饥寒交迫、贫病交困。从苏北、安徽等地流浪到上海的大批灾民更是衣不蔽体，露宿街头。每天晚上，饿殍尸体数以百计，即使官方的统计 12 月上旬也有 400 具，至 12 月中旬增至 500 具。另外据报纸登载，其中有一晚街头冻死的就有 189 人，还有一天路边冻死的童尸竟有 800 具之多。社会上的一些慈善团体和报界虽也发起寒衣赈募，但进展不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则摆出一副“冬令救济”的姿态，却无实际行动。当局举办的所谓庇寒所，实际上却是“壮丁征集所”，以救济为名，强拉壮丁是实，饥民无不视之畏途。

历经多次斗争洗礼的上海学生，虽然很多人自己也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但目睹街头贫苦同胞的惨状，心头自然激起强烈的同情与共鸣。12 月 18 日，同济大学不少学生议论起街头难民冻饿而死的悲惨情景，纷纷对现实表示不满。基督教团契 8 位同学首先在校内张贴布告，发起募捐寒衣，救济灾民。布告上称：“昨日本市冻尸已 100 具，今天天气更冷，不知又有多少人将在寒冷中死去。希望同学，本着良心，予以捐助。”① 同济大学同学虽然清寒，但布告

① 《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第 128 页。

贴出后，首先在工学院、法学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第二天晚，仅工学院就募集到棉衣裤500余件，鞋袜90多双。有的同学一人就捐出衣服20多件。当晚就由8位同学和一位工友骑着自行车，顶着风雪严寒，把寒衣送到虬江路、海宁路一带的贫民手中，直至深夜才回校。

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学生自发开展募捐、募寒衣行动可以发展成为救寒救饥、宣传反饥饿运动，也可以利用它的合法性从校内扩展到社会，鉴于这样的情况，党总支决定加强对这次学生自发性运动的领导。首先由学生会出面，联合基督教团契，在12月9日成立同济大学劝募寒衣委员会，而后鼓动社会各界广泛开展劝募活动。12月9日星期日，同济大学300余学生组成50个小队，走出校门，去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进行劝募。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同学们专门编演了文艺宣传节目，散发了《告社会人士书》。大家佩戴着统一的标志，穿街走巷，深入茶楼酒店，跑遍车站码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学生演唱的救饥救寒的歌声："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呀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呀流落在街头。""北风呼呼雪花飘，苦难的人民没棉袄，穿不暖来吃不饱，一个一个都冻倒。前晚冻死200个，昨天又死100多，大家踊跃募寒衣，救救穷人把命活……"经过一个星期天的劝募，同济各小队满载而归，总共募捐寒衣2000余件、鞋袜700余双、现款600余万元，并马上把募捐得的寒衣物款直接分发到贫民手里。

中共国立大学区委根据同济大学劝募寒衣的经验，决定在全市开展"救饥救寒"运动。大学区委认为：开展"救饥救寒"运动有着极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动员教育群众、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冲破白色恐怖、打破沉闷空气、增强群众信心十分有利。上述意见得到了学委的同意，决定由同济、交大、圣约翰大学出面成立上海市学生劝募寒衣委员会，并通过学联在全市大中学校广泛发动。在学委部署下，运动全面展开。继同济大学之后，交大于12月21日首

先响应同济大学劝募寒衣的倡议，成立“救饥救寒”委员会，接着大同、复旦、暨南等校也都纷纷成立了劝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圣约翰、之江、东吴3所教会大学还成立了联合劝募委员会。

12月22日下午3点钟，同济学生听说复旦同学曾前来邀请他们前去该校交流经验，一批同学顶冒着寒冷的西北大风，连奔带跑地向江湾进发。到复旦之后，同济大学的同学一边找复旦的学生取得联系，一边就在校园内唱起救饥救寒的歌曲。复旦大学训导长急忙出来干涉：“不准唱歌，不准在我们学校里搞宣传活动！”他还盘问：“这个运动是谁发起的，经费从哪里来的，你们到复旦来宣传，向治安当局备案了没有？”同济学生代表严正地说：“几十万穷苦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有上百人冻死街头，你知道吗？救饥救寒，人人有责，我们是复旦同学请来的，用不着向什么人备案。”复旦训导长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我警告你们，立刻离开复旦，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我要去找你们的训导长。”

复旦同学听到同济学生到来的消息后，纷纷从教室、宿舍里出来热情地迎接。大家呼起“复旦、同济是一家”、“为苦难同胞服务”等口号，洋溢着团结战斗的情谊。在学生饭厅里，同济学生代表向复旦同学介绍了劝募寒衣救济灾民的情况，复旦有些同学当场脱下了身上的衣服，表示坚决支持这一正义行动。之后，复旦各系科社团迅速组成劝募寒衣委员会，冲破校内反动势力设置的种种障碍，组织1000多名同学投入救饥救寒运动。

在许多大中学校学生，先后投入“救饥救寒”热潮的时候，被人们称为“上帝的好女儿”的圣玛利亚女中的同学，仍然被学校当局关在校园内，不准走向街头。为了帮助该校同学冲破校方的无理阻挠，同济劝募寒衣委员会派出了宣传队，前往该校。开头两次去，宣传队都被关在门外，不准入校。第三次去时，宣传队得到该校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工友的帮助，在下课后进入校内，向广大女学生演唱“救饥救寒”的歌曲，并介绍了广大贫苦人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

线上的悲惨情景，引起了她们的共鸣，有的为死难同胞掉下了热泪，有的为贫富悬殊而愤恨。经过几天的酝酿，圣玛利亚的同学终于走上街头，与全市广大学生一起劝募寒衣。人们称她们是“上帝的好女儿，来到了人间”。

“救饥救寒”运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却恨之入骨，害怕这一运动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之想法设法制止学生的正义活动和破坏学生自治会，但又找不出借口加以阻拦。于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公开发表谈话，声称：冬令救济工作必须由官方的冬令救济会统一办理，任何团体在社会上募捐都必须持有该会印制的收据，否则一律不准进行募捐，并宣布各校学生劝募所得“统一交归冬令救济会”。吴国桢的此举目的在于以种种限制和规定置学生的正义行动于非法，并企图侵吞各校劝募所取得的成果。学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部署了“救饥救寒”的发放工作。通过周密的组织措施，学生们将劝募所得迅速地直接分发到急需救济的贫民手中，并且注意照顾到了失业工人。上海市大中学生的正义行动，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就连《密勒氏评论报》也撰文说：“学生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那些敷敷衍衍、例行公事的人成了尖锐的对照……我们看不出为什么要阻止和压制这一运动的理由。”① 在群众公认为合法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退却，未敢直接干预，最后只得默认。反动的禁令终于被社会公认的合法群众运动冲破了。

这场救饥救寒运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既没有提“反蒋反美”的口号，也没有组织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而是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从侧面揭露了蒋介石的腐朽反动的统治，把全市的大中学生都发动了起来，不仅深刻地使学生接受了教育，也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各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先后有 80 所学校发动了 3 万

① 转摘自《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第 137 页，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多名学生，共募得寒衣近 20 万件、现金 10 多亿（当时货币），救济了 20 余万贫苦人民。这不仅表明了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反映了整个人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在上海学生的“救饥救寒”运动开展之后，南京、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热烈响应，也开展了这一运动，受到了当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

1948 年 1 月 3 日，上海大中学生 3000 余人在圣约翰大学举行了劝募寒衣庆功大会。会后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火炬游行，表达了学生们追求光明前途的强烈愿望。1 月 13 日，全市的各校学生代表又在同济大学举行了劝募寒衣总结大会，宣布“救饥救寒”运动的结束。

3. 抗议九龙暴行

紧接在“救饥救寒”运动之后，发生了九龙事件。港英当局为了扩大九龙机场，在 1947 年 12 月扬言要拆除九龙的中国居民住宅。中国居民要求国民党外交部驻香港办事处特派员与港英当局进行交涉。该办事处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奴才政策，对中国居民一再搪塞敷衍。港英当局便无所顾忌于 1948 年 1 月 5 日以武力强拆民房，逼迁当地中国居民，造成流血惨案，伤中国居民 7 人，2 人被捕，使 2000 余名居民无家可归。

事件发生后，九龙同胞向国内发出呼吁，请求支援。此时，一贯执行卖国政策和奴才外交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迫于形势，提出了“反英护权”，企图将斗争局限在“反英”上，以此转移全国人民“反美反蒋”的视线，摆脱被动局面，捞取政治资本。各校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也随之鼓噪叫喊，张贴“拥护政府反英护权”之类的标语，装出一副“爱国”的样子，假惺惺地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还策划了一场“反英护权勘乱”的游行闹剧。他们护权是假，反共是真，阴谋把反英斗争纳入他们的轨道。

针对这个动向，学委研究决定：依靠和发动群众，抓住英美之间的矛盾，利用“反英”的合法性，将这一斗争的领导权紧紧抓住，把抗议九龙暴行和反对美帝侵略及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奴才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美蒋。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同意了学委的意见，并强调斗争的主要矛头要对准美蒋。各校党组织根据市委和学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地开展群众宣传工作，使广大学生认识：英帝国主义在九龙的暴行，不过是国民党推行内战和卖国政策的一个结果，而主要的问题则是反动政府正在把中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抗议九龙暴行就必须反对奴才外交、反对美蒋勾结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

1月14日，上海学联发表《告同胞书》，提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暴行，挽救民族危机”的口号。1月15日，上海大专院校学生团体代表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市各大学抗议九龙事件联合会，派出代表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1月16日，交大、同济、复旦、大夏、震旦、光华、圣约翰、东吴、南模、幼专、女师等74所大中学校代表在交大开会，会议选出了交大、同济、约大等8校代表为主席团，讨论成立“上海市学生抢救民族危机抗议九龙暴行联合会”，并号召全市学生于1月17日向英驻沪领事馆示威；向英国政府抗议，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备忘录；号召全市学生总罢课一天。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特务混进了会场，散发所谓“护权宣言”，叫嚷“只要反英”，不要“反美”，遭到与会代表们严词痛斥，并被逐出了会场。16日晚，74所学校的4000余名学生在交大举行了抗暴晚会和火炬游行。同学们齐声高呼“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奴才外交”等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上海市学生抢救民族危机抗议九龙暴行联合会的正式成立。

翌日下午，全市大中学生25000余人汇集到外滩，向英国领事馆示威。国民党军警封锁了主要路口，控制了卡车出租公司，但皆未能阻挡住学生。交大学生首先到达，南洋女中学生在四川路桥遭

警察阻拦，她们勇敢地冲了过来，同济、复旦、约大等学校的学生也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参加示威。锡珍女中刚刚建立了党的组织，许多出身上层的女学生也在党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外滩。圣约翰大学附中的一位女同学用她父亲的小汽车把横幅、标语送到外滩。不多久，一支浩大的学生队伍便集中在外滩公园外，队伍中的标语横幅上写着“反帝反奴”、“抗议九龙暴行”、“赶走美帝国主义”、“打倒奴才外交”等口号。学生们高唱“反帝反奴歌”，“反帝进行曲”、“九龙同胞苦”等歌曲，在过往的卡车、汽车上张贴标语，在墙上张贴漫画，向群众宣传九龙事件的真相，揭露美军在华罪行。

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开来装甲车10多辆，布置于外滩公园至外白渡桥英国领事馆一线。但是上海的学生并没有被国民党的汹汹气势吓倒，幼专的一位学生把抗议港英当局镇压九龙同胞的标语贴到了英领馆的铁门上。愤怒的学生高呼“反对卖国外交！抢救民族危机！”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军警，学生们展开了喊话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大家都是中国人，请警察将刺刀放下来”。听了学生们的喊话，一些警察收起了刺刀，有一辆装甲车甚至把机枪调转了枪口。

下午4时光景，游行学生派出吴振东（交大）、何长城（同济）等4位同学代表进入英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这时，小部分同学留在英国领事馆门前等候消息，绝大部分学生开始游行。在主席团的指挥下，游行队伍以同济大学学生为前导，向南京东路进发。当游行队伍进入南京路不久，联络员传来消息说代表被警察局长俞叔平扣留，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又回到了外滩，重新包围了英国领事馆，群情激愤，学生们高呼“立即释放学生代表”、“反动政府要垮台”等口号，一时间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显示了学生们的力量。在广大学生的强烈的抗议声中，俞叔平被迫释放了学生代表。于是，游行队伍又重新向南京东路进发。当队伍经过外滩美国海军指挥所（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时，宣传队用柏油在墙上写下了

大字标语："美国兵滚出去！""替千千万万死在美国'援助'下的中国人民报仇！"下午6时左右，已是万家灯火，游行队伍已陆续到达南京路西藏路一带，25000名学生汇集在一起，数万名市民紧紧地围在四周，形成了十分壮观的场面。上海市学生抢救民族危机抗议九龙暴行联合会主席团在卡车上举行了临时记者招待会，通过临时架设的扩音器由同济大学何长城代表主席团就这次示威游行向全体同学和广大市民作了简要的小结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九龙暴行，也绝对不能容忍卖国政府媚外压内的反动政策"，"上海学生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反对卖国外交，把一切帝国主义赶出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最后，同济医学院四年级女学生王黎华，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抗议九龙暴行！""反对奴才外交！""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政府要垮台！"口号声响彻市中心的夜空，也激荡着广大学生和市民们的心。抗议九龙暴行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决策及时，学委成功地部署了这场斗争，巧妙地抓住了敌人的矛盾和"反英"的合法性，使国民党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他们没有料到反英帝暴行竟会打到了自己的头上。这场斗争声势浩大，继"救饥救寒"运动之后，又一次在政治上完全冲破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束缚，进一步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的觉悟。

4. 同济大学的一二九血案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必然要作最后的挣扎，企图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方面摆脱困境，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五二〇运动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加紧对各校学生的控制，处心积虑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的合法群众组织——学生自治会。早在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就发出了"手

谕”，指示教育部的高教司、中教司训育委员会，对各校学生自治会“有为共党或共党嫌疑者，或共党接近者、把持者，通过查明改组，并先一律停止活动。”① 由于各校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抵制，这一破坏学生自治会的企图才在大多数学校未能得逞。但反动当局并未甘心。

1947 年 12 月 6 日，国民党政府进而颁布了《修正学生自治会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学生自治会的理事须经学校当局审定；活动要由学校监督；自治会的决议，学校有权撤销；对“违背校规的学生自治会”，学校当局“有权随时解散；等等。显然，这个《规则》的宣布，是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剥夺全国学生民主权利的信号。根据这个规则，12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首先解散了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26 日，中央大学学生罢课抗议，并向全国学生发出呼吁。28 日，北平 8 所院校学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扼杀学生民主权利的《修正学生自治会规则》。

在上海，国民党市政府把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作为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同济大学是当时上海学生系统新形成的一个民主堡垒，在五二〇运动中损失较小，“救饥救寒”运动和抗议九龙事件斗争中皆走在前列，成绩显著，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有很大发展。因此，敌人把同济学生视作眼中钉，想及早摧毁这个民主堡垒进而镇压上海的学生运动。同济大学校长丁文渊过去在四川出任同济校长时，曾因专制、暴戾而被师生轰走过。五二〇运动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加紧对同济的控制，便派这个得力工具重新出任同济校长。丁文渊上任后，便卖力地推行压制政策，迫害学生自治会的干部。由于第二届学生自治会理事长杨前坤等 11 人被无辜开除，造成了理事会与监事会的残缺不全。恰逢当时应届学生自治会任期已满，需要改选并加强，因此在 1948 年元旦过去不久，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

① 《五·二〇运动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就积极领导学生自治会的改选工作。但是丁文渊却对改选工作百般压制和破坏，他不仅秉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规则》旨意，不准召开学生系科代表大会，且指定了工学院15个级长筹备自治会，并规定不准成立全校性学生自治会，只准各学院单独成立学生自治会。

1月9日，丁文渊到工学院召集学生训话，宣布"不成立全校性学生自治会"的新规定。同学们当即坚决反对，第二届学生自治会代理事长、工学院电机系学生杜受百理直气壮地说："丁校长的意见，我们决不能同意。学生自治会，顾名思义是自治，而不是'官治'，改选学生自治会是我们学生自己的事，学校无权干涉，丁校长指派人员来筹备，不是明明要剥夺我们仅有的一点民主权利吗？"杜受百的话代表了广大同学的意见。顿时，各学院同学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指出：学生自治会"学校无权圈定"，"同济学生是一家，只能有一个学生自治会"……15名级长也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筹备任务。1月11日，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在工学院体育馆举行，数百名群众自动保卫会场，100多位代表从早到晚认真地讨论了一整天，作出了决议：反对教育部的《修正学生自治会规则》，全校同学13日普选理事；抗议英帝在九龙屠杀我同胞；募捐支援浙江大学反迫害斗争。会议还通过了自订的章程，选出由黄克鲁等5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1月13日，在工学院礼堂改选学生自治会，全校85%以上的学生约1900余人参加了投票，选举取得圆满成功。当晚，全市有8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前往祝贺，举行了"上海市大、中学生救饥救寒运动胜利结束，同济大学第三届学生自治会改选完成庆功大会"。会上宣布选举结果，潘承邦当选为理事长。整个大会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各校学生不断欢呼："胜利属于民主！"

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改选成功使丁文渊气恼交加，疯狂反扑，就在理事会就职这一天，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开除杜受百、何长城两位同学，继而又在18日宣布第二批开除学生名单，有文德昭、吴

虹、范郁芬、韩格兰、唐荆如等5人，并处分黄克鲁、潘承邦等4位同学。1月19日，丁文渊贴出布告，宣布："秩序未安定前，禁止自治会的任何活动，系科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和自治会理事应自动离职。如有违背，学校决不姑息。"

我地下党国立大学区委和同济大学总支及时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这是反动当局的反扑，必须坚决予以反击，反击以后再转向迂回斗争；反击时要注意策略，要争取教师与社会的同情。于是一方面由学生自治会派代表积极做好教授们的工作，争取教授们的同情和支持。经过工作，不少教授十分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如文学院郭治虞教授对走访他的学生代表说："我理解你们。"当代表告别时，他又深情地说："事情平静下来后，希望你们还要读点书，将来有用。"言词不多，但真诚而质朴。另一方面，把斗争口号提高为"反迫害、争民主"，坚决反击敌人的镇压。这一口号深得人心，使同学们明确了斗争方向，起了动员同学积极行动起来的巨大作用。

为了抗议丁文渊开除同学，1月19日全校各系科继续罢课，纷纷集会，机电系学生要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呼吁全校师生支援和保护被处分的同学，并建议全体学生赴南京请愿。机械系二年级学生表示校方如不收回成命，他们将全体休学；土木系二年级学生发起募捐，支援受迫害的同学。女同学会对校方无理迫害同学，特别是开除3位同学，表示极大的愤慨。当天下午，系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1)无限期罢课；(2)向校方交涉，要求收回成命，如无结果，则去南京请愿；(3)要丁文渊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同时，决定为抗议校方无理迫害同学，各学院同学于21日绝食一天。学生自治会又临时决定，20日晚在工学院礼堂举行控诉晚会。是晚，全市有4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赶来参加。7时，晚会开始，被迫害的学生代表杜受百、韩格兰、何长城等先后上台控诉。他们表示："我们要继续努力，同舟共济，维护同济的光荣传统"，"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恨"，"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头可断，血可流"。他们的坚强决心

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杨烈教授等也在晚会上讲了话，支持学生的斗争，谴责丁文渊。

然而，丁文渊继续迫害学生，践踏民主，其气焰有增无减，竟又在1月21日宣布处分了一大批同学。从1月14日至21日的一周时间内，就接连迫害了3批学生共45名，其中被开除学籍的就有11名。

面对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学生们奋起反抗。国立大学区委和同济大学总支研究认为，反动当局已决心镇压，斗争口号则也应提高为"反迫害、争民主"，坚决反对敌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教师同情和全市各学校的支援。同时，准备在进行有力的反击后，立即结束尖锐的对抗形式，转而采取迂回曲折的斗争方式，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新的进攻，争取尽可能多地保存斗争成果和尽可能少地减少损失。1月23日，同济学生自治会公布了与校方交涉报告书，报告书指出："赴南京请愿之举正如箭在弦上"，"仍希校方不失时机"，"使事件获得解决"。国民党当局不求事件的解决，却力图阻止学生去南京。教育部还电告丁文渊："着学生限期复课，阻止来京，如仍不服从命令，即从严惩处。"25日，朱家骅又匆匆来沪与丁文渊密谈。26日，蒋介石亲自指令朱家骅及上海市当局："迅速解决同济罢课事件"。朱家骅立即表示，最后将不惜解散同济大学。这时丁文渊更加有恃无恐，于27日发表《告同学书》，声称"特作最后之告诫"，否则将"遵照部令从严处置"。尽管一些教授曾从中调解，但无效果。

1月29日清晨，国民党当局调集配有装甲车、马队的军警特务近万人，包围了其美路（今四平路）同济工学院，封锁了通往北火车站的市区交通要道以阻止学生赴京请愿。集中在工学院的1000多名同济学生在列队赶来支援的同济各学院及附中、约大、复旦大学学生的配合下，冲出校门，并同随后赶到的交大、东吴、大夏、震旦、上法、同德医学院、南通学院、中华工商、南模等27所大中学校

的学生代表队会合。上午10时许，同济工学院门口已汇集了学生近4000名。学委、国立大学区委及同济总支的负责人来到第一线，大批共产党员站到了学生队伍的前列。稍倾，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军警的簇拥下，出现在同济工学院门前。学生们要求立即撤退军警，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吴国桢表示愿意"调解"，"谈判"。但丁文渊避不到校，吴国桢则采取拖延办法。至下午3时30分"调解"、"谈判"仍无进展。在场的学委、区委和同济总支负责人研究：队伍向前推进一次，压吴国桢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回校开大会，总结经验，教育群众认清敌人的反动面目，以利再战。可是正在整理队伍时，国民党军警忽然对学生行列发起了冲击，刺刀、棍棒一齐向着手无寸铁的学生挥舞过来，顿时鲜血四溅。同学们被迫奋起反抗，用路旁的筑路石子向反动军警掷去。在这场激烈的搏斗中69名学生受伤，其中3人重伤、33人失踪。暴行发生后，学生们退回同济工学院，即在大礼堂举行抗议暴行讨还血债的大会。大会正进行时，军警又闯入会场，当场捕去学生200余人。

同济一二九血案发生后，上海市各大中学校纷纷组织后援会，举行群众性示威大会，一致声讨反动派的血腥罪行。2月10日，华北学联和北平5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集会，声援同济同学，抗议上海当局非法逮捕学生。与会者一致表示："一个自治会受迫害，其他各校一致起来反抗，直至我们神圣的权力恢复为止。"武汉大学学生绝食一天，表示声援。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得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学生，还有11位学生被诬陷有"殴打市长的嫌疑"，继续被关押。1948年3月15日，上海地方法院对11名学生进行公开审判。上海地下党领导同济、复旦、交大等校3000多学生，赶赴地方法院支持11名被诬同学。经群众的说理斗争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营救，法院经过3次审判，将所有学生无罪释放。反动派又一次遭到了可耻

的失败。

同济大学的一二九血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各校大肆逮捕和开除学生。同济、复旦、大同、上法以及沪新中学等许多大中学校学生都有人被开除或勒令退学，总数达400余人。战斗在第一线的党员和大批积极分子被迫离开了学校，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各支部仍利用战斗空隙，总结经验教训，准备迎接新的斗争高潮的到来。

5. 四月风暴

继同济大学一二九血案后，三四月间，学生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又出现了新的高涨。

1948年2月中旬，北大、南开、北洋、唐工（唐山工学院）等校分别成立争取公费联合会、挽救教育危机争取全面公费行动委员会等组织，以推动反饥饿斗争。3月20日，平津7所大学致函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全面公费。平津各大学教授也纷纷提出调整待遇的要求，并支持学生要求全面公费的斗争。3月29日，上海清寒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会、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上海中等教育研究会等团体，提出按生活指数调整教师待遇等10项呼吁。在此期间，武汉、四川、南京、安徽、江西等地学校，为反饥饿也分别掀起了罢课罢教、示威游行、绝食请愿的斗争。3月下旬，南开、北洋和唐山工学院几百名同学利用春假游览古城北平。华北学联建议组织一次平、津、唐各校联欢会。3月28日晚，北平各大学在北大民主广场联合举行了欢迎天津、唐山同学的营火晚会，到会者1万多人。在欢乐的气氛中，北平同学向天津同学献民主旗，重申平、津、唐8大院校学生自治会实行联防。他们庄严宣誓："一校被迫害，七校支援！一人被摧残，全体营救！"整个晚会始终洋溢着团结战斗的精神。

3月29日，即国民党"行宪国大"开幕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下令查禁华北学联。同时，北平各报刊登载了国民党政府的电令，

诬称学联会是"共匪所策动之组织",严禁华北学联活动。有关报纸还刊登了所谓有关方面发表的《学潮综合分析结果》,诬蔑学生是"暴徒",学生运动是"受国际共产学运组织的领导"。很明显,查禁华北学联,是反动派准备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的信号。以此为导火线,华北学生掀起了反迫害的四月风暴。

3月31日起,华北学联发表声明,严厉驳斥反动当局的诬蔑,控诉国民党摧残学生运动的暴行,号召全华北同学"提高警惕,加强团结,英勇地来击退反动的逆潮,保卫自己"。自4月3日起,华北各校相继罢课,分别成立保卫华北学联的机构,展开了"反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这个斗争,恰和平津的教学研究人员和职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罢教、罢课、罢工的斗争结合在一起。4月5日,清华讲师助教联合会、北大讲师助教联合会、北平研究院助研人员联合会、清华职员工会、工警联合会、北大职员会、工警工会等团体发表《告社会人士书》,要求立即改善低劣待遇,按生活指数调整工资,提出"向政府要饭吃"的口号,举行罢教、罢研、罢工、罢职。北大医学院的医生护士也宣布罢诊。过去许多不太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纷纷从书斋和实验室走出来呐喊了,他们已不再只是一群同情学生的旁观者,而是以自己的行动和学生站在一起投入了反饥饿斗争。以学生为先锋,各阶层人民结成了反蒋统一战线,国统区民主运动呈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六罢"奇观。四月风暴,撼动着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给刚刚开场的"行宪国大"以有力的打击。

国民党反动当局又以新的迫害对付广大爱国的青年学生。4月5日,50多名特务蜂拥而至北大民主广场,撕毁了民主墙上的所有文告、壁报,贴上"反罢课"、"打倒华北学联"等反动标语。4月8日,北平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柯在铄等12名同学。4月9日凌晨,国民党武装特务60余人闯入北师院,又绑架了姚堉、庹世泰、王公宇等8名同学。当晚守夜的贾

承先、荆又新同学也被特务击伤倒在血泊之中。

血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传到北平各校，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新的暴行愤怒不已。北平地下学委决定不失时机地发动全市大学生开展一次声势更为浩大的反迫害斗争，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重大的回击。北大、清华、北医、燕京、师院等校6000多名学生，在地下学委两位负责人率领下，会师于新华门。同学们在行辕门口的红墙上写了“南京开国大，北平杀学生”两行大字，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在行辕门口，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主席团当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控诉国民党当局迫害学生的罪行。主席团还拟定了12条斗争口号和9项要求，推派代表入行辕请愿。主要要求是：立即释放师院8名同学；停止传讯北大12名同学；撤销查禁华北学联的命令；释放朝阳大学赴南京请愿代表。经过斗争，终于迫使北平反动当局释放了师院被捕的8位学生，并许诺停止传讯北大12名同学。关于收回华北学联查禁令和释放朝阳请愿代表两项，则同意转呈国民党中央。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反迫害斗争中，师生联合行动是这次华北四月风暴的突出特点。在党的领导下，各校学生联合行动，学生罢课与教师罢教同时进行，它反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各种民主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汇合成一支“觉醒而坚强的队伍”，共同向着创建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

1. 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日本东山再起

战后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除援蒋侵华外，就是扶植日本，恢复其军国主义，变日本为侵苏和控制远东的工具及监视中国人民革命的警犬。因此，日本的侵略势力，在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庇护下，迅速再起。

由于美国积极执行重新武装日本的政策，日本参谋部全体将校级军官均隐蔽于复员局内，大批军事人员借“开拓团”、“渔民协会”、“合作农场”等招牌的掩护而保留下来。美日反动派又以扩充警察的名义重建日本陆军，1948 年，日本警察由战前的 6.5 万人扩充至约 30 万人，这些警察大多数为复员军人。美国又以防止海上走私为理由，准许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重新建立海上武装，拥有军舰 125 艘，横须贺、佐世保、吴港等三大海军基地，完好如昔。美国并帮助日本准备和训练空军，以其“占领费”的 40—50%在日本建立庞大的空军基地网。

日本侵略势力的东山再起，构成了对远东和平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威胁，然而国民党政府却不顾国家的安全，积极追随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甚至对侵略中国的日军总司令、大战犯冈村宁茨不但不逮捕，反而丧心病狂地把他留作顾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青年学生与中国人民曾经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不顾当时政府当局的阻碍，奋起挽救祖国灭亡的危机。然而，胜利还不到两年，当中国人民所流的血以及所遭受到难以计算的灾难损失尚未得到应有的赔偿以前，一个新的“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恶毒计划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又在威胁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日本的工业水准与战争潜力被保留到超过九一八的水准以上，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对日贸易也被当局开放了。这个开放将会造成“日本生产，中国消费”、“日本兴旺，中国弱亡”的可怕局面，不必等到日本全部复兴，新的对华侵略一定又要重来，中国人民一定又将遭到再一次更大更惨的劫掠与蹂躏。①

2. 全国学生掀起反美扶日的熊熊烈火

① 《纪念九·一八宣言》，1947 年 9 月 18 日全国学联发表于《学生报》。

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深感忧虑。1948年初，国内报刊就开始出现揭露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三四月间，上海各校学生纷纷举行反对美帝扶日演讲会和讨论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对美国推行的"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计划极为不满。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在全国发动一次反对美帝扶日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通过反美扶日斗争，既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又可以突破五二〇运动后敌人的高压政策。于是，党在1948年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社会各界迅速响应，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对美帝扶日运动，首先从上海开始了。

1948年5月4日，上海市学联在交通大学举行营火晚会。全市有120所学校、1.5万学生汇集交大参加。会上，由孟宪章教授发表讲演，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帝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大夏大学的学生控诉了国民党当局于5月2日镇压该校学生反对美帝扶日集会的罪行，激起到会学生的无比愤慨。上海市学联号召全市学生团结起来，为反对美帝扶日，挽救民族危机而斗争。在全体学生"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伴随着熊熊的火焰，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简称反扶日联）正式成立。反扶日联当即通电全国，发出反对美国扶日的呼吁。晚会结束后，在交大校园内举行了火炬游行。

5月22日，上海1.5万多学生在交大召开五二〇周年纪念会。会上进一步号召同学们以实际行动抗议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发起一个10万人的"反美扶日"的签名运动，提出解散日本海上保安厅，没收走私日货，拘捕并公审一切日本战犯，召开对日和会等6项主张。会后，各校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或展览会，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阴谋和国民党媚外卖国的

面目。当这些活动开展的时候，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教授、文化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中的进步分子，都纷纷参加学生的集会，予学生以很大的支持。

反美扶日运动在上海发动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展开。5月21日晚，南京各校学生在中山大学举行五二〇血案周年纪念会，号召大家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5月22日，举行五二〇周年纪念大游行，按五二〇游行的路线进行了一次示威。5月中旬，华北学联召开会议决定在各校开展反美扶日宣传。5月20日，华北学联发表《告同学书》，号召广大同学积极投入这场斗争。5月30日，华北12所院校及部分东北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纪念五卅大会"。会上工人代表回忆了八年沦陷时期日军在华的暴行，朝鲜学生控诉美国霸占南朝鲜的罪行。燕京同学演出了活报剧，讽刺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主子面前争风吃醋的丑态。大会决定成立"华北学联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他们以"血和泪，仇与恨"，重温"九一八的伤心史"，提醒全国人民防止日本法西斯重演九一八事件。

天津、昆明、青岛、厦门、武汉、重庆、长沙、广州等大中城市学生迅速行动起来，支持上海、北平、天津学生的斗争。社会各界，尤其是教师、文化人士和民族工商业者都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斗争。一场大规模的反美扶日的爱国运动逐步发展起来。

美帝国主义对爱国的青年学生的反美扶日斗争十分恼火，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横加干涉。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违反外交惯例，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恫吓性的声明，诬蔑中国学生的爱国举动是"阴谋"、"错误"和"歧途"，说"运动仍在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也连续发表谈话，诬蔑反美扶日是受奸人迷惑，还说中国学生受教育是受惠于美国，不应"忘恩负义"。国民党反动当局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

积极镇压反美扶日爱国运动，在上海圣约翰、大夏大学制造了破坏会场、殴打学生的暴行。胡适甚至胡诌反美扶日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不“扶日”，日本“可能接受共产主义”。美国直接控制的上海《大美晚报》对反美扶日运动连续发表歪曲报导，并唆使吴国桢赶快起来压制学生运动。

中外反动派的破坏，阻止不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6月5日，即司徒雷登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上海市120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5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3个中心口号：“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对美国干涉爱国运动”、“国货商团结起来”。下午2时，学生5000余人汇集外滩，在美军指挥部大门前，高唱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歌曲，并散发传单扩大宣传。学生们虽遭反动军警的逮捕和马队的冲击，但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直到晚间8时，才各返原校。

继上海学生之后，北平的反美扶日运动也进入了高潮。华北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针对司徒雷登6月4日的声明进行了严正驳斥。他们一致表示：“我国人民愿意跟别国人民友好，……可不愿意让别国的特殊势力踏在脚底下，喘着气当奴隶。”① 如果“美国扶日政策不变，则中国人民反美扶日运动不停。”② 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也发表声明，义正辞严地宣布：“我们愿意正告司徒先生，中国学生是不怕的。……中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已有一百年的光荣历史，中国学生自五四运动起，即是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刺刀枪杆下成长，在高压迫害下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学生不是任何恐吓和暴力所能吓倒的。”为了揭穿美帝国主义“一手面包，一手军刀”的反动政策，6月17日，清华大学的教授朱自清、吴晗、张奚若等110人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

① 《上海杂志界一封公开信》，《大公报》1948年6月10日。

② 《沪文艺界正告美大使》，《大公报》1948年6月17日。

资。”朱自清教授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愿领美国的救济物资，表现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无比憎恨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赞扬。

轰轰烈烈的反美扶日运动，深刻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扶日侵华的阴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勾当，有力地教育了人民群众，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配合作用。

第十五章　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

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 七五血案

1948年初，国民党在东北军事失败，由于经济破产，教育更加混乱不堪。国民党东北教育部门，为了摆脱困境，除宣布解散一批私立大学外，同时下令东北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南迁平津，诡称“教育部门已在北平成立了临时大学和临时中学”。当东北的学生在报刊上看到教育部门在北平设立临大临中，收容东北入关的学生的消息时，东北大学、辽宁医学院、辽宁省立师专、中正大学、辽东学院、锦州大学先修班、长春大学、长白师院，长春的松北联中、沈阳的中山中学等1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忍痛辞别生长的故乡、父母，大多数的同学都卖掉他们仅有的衣服和书籍，吃尽千辛万苦，怀着满腔的热望，经过解放区，徒步走进关内。到5月末，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已近万人。然而，两个月来，迎头给他们的打击是临大临中的设立杳无消息。而且政府对东北流亡学生的态度是冷遇、漠视和拖延欺骗。成千上万的同学分住在破庙和走廊下，满屋挤下100多个人，躺在阴湿的泥地上。遇到下雨天，只好整夜徘徊，不得安睡。吃的是一天两顿窝窝头，连盐也见不着。真是饿魔缠身、疾病蔓延，不时有人病饿而死。走投无路的学生整天为争取生存条件

而奔走呼号。在北平地方当局互相推诿之下，他们从社会局跑到教育局，又从教育局跑到教育部，仍没有任何结果。

就在此时，1948 年 7 月 4 日，北平各报突然刊载了北平参议会的《救济东北来北平学生议决案》，其主要内容是："(1)本会电请中央，对已到平之东北学生，不论公私学校，凡确有实学籍及身份证明者，应请副总司令予以严格军事训练。在训练期间，予以士兵衣食待遇，并切实考察其背景、身份、学历等项。确有学籍及思想纯正之学生，暂时按其程度分发东北临大或各大学中学借读，俟东北稳定时，仍令回籍读书。其身份不明、思想背谬者，予以营训，不合格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期满退伍。(2)申请中央停发东北各国立公立学校之经费及学生公费，全部汇交副总司令，会同省市政府审核发放，贴补来平学生费用，或改汇东北临大作为经费。东北各校，一律暂行停办，以免其一面派遣学生进关，一面另招学生，并套取经费与公费。(3)东北国立公立学校停办，停发经费。令教职员一律进关，以原薪(照平津指数)在学生军训班或东北临大工作。"① 至此，国民党的骗局完全暴露了，原来他们欺骗东北学生进关，目的是为了搜罗打内战的炮灰。历尽千辛万苦的东北学生对这一骗局极为震怒，15 个东北院校学生代表经过周密协商，决定 7 月 5 日到北平市参议会请愿，要求取消"议决案"。广大学生连夜准备：拟定标语、口号、宣言、抗议书；同时，派人去北大、清华等校求援。

7 月 5 日早晨，分住在各角落庙宇的东北大学、中正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院、沈阳医学院、锦州大学先修班及东北联中等 10 多所学校的学生请愿大队分东西两路出发，喊着"反对市参政会非法议案"、"反对摧残东北青年"、"要读书、要吃饭、誓死不当炮灰"的口号，向西长安街北平市参议会请愿。9 时许，在市参议会门前，

① 《七五血案前后记详》。

汇集了5000人的巨流。学生在门前高唱他们连夜赶编的民歌风味的《打倒参议会》的歌谣，歌词印入了每一个学生的心坎：

参议员哪坏良心，　　硬叫我们去从军，
停公费，受军训，　　调查思想加拷问，
兄弟们，快起来，　　一定把它打垮台，
参议员哪坏良心，　　不该轻视东北人，
不读书，去参军，　　建设东北用何人，
兄弟们，快起来，　　一定把它打垮台。

这时，西长安街交通断绝，参议会铁门早已关闭，宪警堵住了门口，学生多次要求议长出见，均遭拒绝。愤怒的学生撞开大门，冲入院内，遍寻参议长，连个人影也不见。大家气愤之下，将门楣上北平市参议会六个朱漆水泥大字砸掉，用沥青写上了"北平市土豪劣绅会"。11时左右，北大、清华8大院校派人送来了慰问函，并赠上一幅"要自由、争生存"六字的绿色布旗。北大等校学生的支持，给东北请愿学生增添了力量。然后，学生整队到李宗仁副总统官邸请愿。李宗仁接见了学生代表。学生向他提出了3项要求：(1)请参议会撤销原议案；(2)立即成立临大临中，无条件地收容所有东北来平学生并一律发给公费；(3)请解决现在同学的食宿问题。李宗仁对此也作了3项答复：(1)参议会是民意机关，政府不能干涉；(2)尽力为同学解决食宿及读书问题；(3)我是有职无权的，况我个人无权干涉民意机关之事项，但我愿意尽力帮忙。东北学生对李宗仁毫无具体内容、外交辞令式的答复极为不满，因为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于是同学顾不得饥饿，顾不得疲乏，怀着沉重的心情，迈开艰难的脚步，去东交民巷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住所"找许惠东算帐"！许的住所早已戒备森严，学生再三要求见议长许惠东，军警坚持不允。愤怒的学生不顾一切拥倒铁门，进入院内。这时，北平警

备司令率领208师一个营和6辆装甲车冲入学生队伍内，把学生分割包围。请愿学生在同军警进行说理斗争时，不少学生已被殴打，加上同学从清晨到黄昏没有进一滴水、一粒米，大家又累又饿又伤心，决定暂时返校，北平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也答应明日9时负责答复学生的要求，并保障当晚同学安然回校，东北的同学忍痛接受了。当大队正准备整队回校时，国民党反动当局早已预谋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

6时50分，当学生整队归校的时候，即由刚从西郊调来的208师的士兵开始执行屠杀任务。机关枪从背后向徒手学生进行长达15分钟的扫射，当场有10人被打死，100余人受伤。6日清晨，北平当局又以警察失落手枪为由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东北学生的住处，逮捕学生37人。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七五血案。

七五血案发生的第二天，东北流亡同学成立了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开展祭悼活动，向全国揭露国民党的新暴行。与此同时，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院校分别成立七五血案后援会，并发起募捐和慰问活动支援东北同学。7日，北平8所院校学生自治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包括反对参议会决议，提出救济东北流亡学生、释放被捕同学、严惩凶手、安葬死者、负担受伤学生医疗费等9项要求。

七五血案发生当晚，北平地下党学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利用这次事件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争取社会舆论、孤立敌人的一次极好机会。当时，一方面由于事态的严重，社会反应强烈，另一方面，李宗仁正在北平，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还可以利用。于是决定：7月9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七五血案的肇事者，支援东北学生的斗争。北平地下学委强调要注意防止群众、特别是东北学生中可能出现的单纯复仇心理和过激冒险行动。会议研究了7月9日行动的具体部署，并作了认真准备。

7月9日清晨，华北、东北30多所院校的学生1万多人，先后聚集在北大民主广场。9点半，主席团宣布游行开始。游行队伍由

清华大学率先，其次一校随着一校，大队绕民主广场一周后，高举着“反剿民，要活命”的请愿大旗，冲破了国民党警察的第一道封锁线，走向街头。一路上，贴满了标语，呼喊着“反剿民”、“反屠杀”、“要活命”、“要生存”、“严惩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10点钟左右，大队到达了李宗仁官邸门前。学生代表向李宗仁递交了《东北华北学生为七五惨案请愿书》，提出了要求严惩凶手、撤销市参议会决议、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立即解决东北同学食宿问题等10项要求。李宗仁作为北平行政长官，出于自己与蒋介石嫡系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恐惧学生的正义呼声，因此答应调查处理此案。他还表示要保护学生的安全，电令撤销戒严。请愿的结果虽不圆满，可是李宗仁答应了部分要求，主席团决定游行队伍回到北大民主广场。

当晚，上万名东北和华北同学，在北大民主广场召开了追悼七五惨案烈士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大会。大会在沉痛的《七五惨案挽歌》声中开始。默哀后，宣读祭文，表达了东北、华北同学的无限哀思。接着，东北学生代表用血与泪控诉了国民党北平当局的罪行，一致表示：“为了替死者复仇，为了要读书，要活命，我们要团结起来向统治者坚决斗争到底！”控诉之后，主席团宣布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正式成立，并宣读了成立宣言。宣言写道：“七五血案是一个空前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东北死难同学的鲜血，受伤同学的呻吟，洗亮了我们的眼睛，给我们以光明，打碎了我们对政府所怀着的一点点可怜的幻想与希望，启示我们要冲破黑暗，击退反动逆流，获得生存与学习的基本权利。”① 宣言通过后，全体同学高举右拳发出钢铁般誓言：坚决为争取生存，保卫基本人权，同反动派作最后的斗争！

七五惨案和七九请愿斗争，得到了全国同学和各阶层的同情

① 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编：《反剿民要活命》。第71—72页。

和声援。7月9日，全国学联发表宣言指出："血的事实又一次教训我们：不应对反动政府再有任何幻想……血所灌溉的种子已快到收获的时候，反动派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清算血债的日子还会远吗？"① 14日，全国学联向东北学生发出的慰问信中说："所有的同情都在你们这方面。"②南京、上海、天津、山东、武汉等地学生给东北学生发慰问信与唁电。天津南开等4所院校还组成后援会，召开追悼大会，募集法币1亿元，支援东北同学。广大学生在党的领导之下，经过与敌人的反复较量，学生的觉悟水平不断提高，斗争经验不断丰富。通过七九示威游行，团结了大批东北学生，推动了各地学生运动，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解放前夕北方地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2. 八一九大逮捕，组织党员有秩序地疏散

1948年夏，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决战的前夕，但国民党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还要作垂死的挣扎。7月31日，蒋介石密电全国逮捕各地大中学校进步学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凶恶地喊叫："与其养痈遗患，不如操刀一割"，对学生运动要"当机立断，斩草除根"、"为党国雪耻"、"消灭第二战线"。并从8月上旬开始，国民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历次学生运动的所谓"罪证"。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言人公开号召反动分子同爱国学生"作生死之斗争"。8月12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与卫戍司令部、警察厅、军统、中统、北平市党部和华北剿总组成学运小组，共同策划对爱国学生的逮捕和镇压。在北平，由特务、地痞流氓组成的人民服务队钻进各校校园，跟踪迫害进步同学。各校许多学运骨干都收到署名铲共铁血会的恐吓信，扬言要活埋学运中的骨干分子。在南京，

①② 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编：《反剿民要活命》。第40、79页。

7月6日，反动当局秘密逮捕了中央大学3名学生。在上海，先后有10余名学生失踪，大夏大学无理开除56名学生，勒令144人退学。2月21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就在上海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通过了特种刑事法庭的"组织条例"及"审判条例"。宣铁吾、吴国桢也宣布：对已经"被捕的工人、学生、职员等等，当依中央(指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之勘乱期间危害民国治罪条例，移送特种法庭审判"。8月17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特种刑事检举法"，发布所谓清除"匪谍"的命令。8月18日，中央社又发布所谓150家长呼吁清除"职业学生"和"匪谍学生"的公开信。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逮捕开始了。

8月19日，北平各报同时刊登了国民党当局要"传讯"和"拘捕"的第一批250名学生的黑名单。同日，北平特刑庭发出传票和拘票，定于8月20日对这250名学生进行审理，罪名是危害民国。接着，报纸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名单。3批总共463人，其中北大学生最多。与此同时，天津拘传164人、南京147人，上海竟多达1500余人。全国各地的黑名单不断增加，盯梢恐吓到处在进行，反动派想用恐怖手段把学生运动打下去。

党十分关心爱护自己的同志，组织了已经被敌人注意，比较暴露，处境危险的党员、积极分子的撤退工作。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指示中说：国民党最近公开镇压学生运动，"是蒋在我人民解放军愈加胜利面前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和手段"，"是蒋愈加接近死亡的表现"，因此，我们"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策略上，"要依据各个单位自己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人数，实行合法斗争，尽量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如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凡脱离中间派的群众行动必须力求避免"。指示中还具体指出："不论党内党

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或去解放区或回家乡，或转移地区，另找职业隐蔽。“凡是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在检举风浪过去后，再谋有步骤的发展，以便积蓄新的力量，等待时机”。①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华北局城工部派到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获得国民党当局将在两三天内实行大逮捕的确实情报，及时通知了城工部，再由城工部通知各校。因此，大逮捕开始时，上了黑名单的大部分学生已疏散到解放区或暂时隐蔽起来，停止活动，以待时机；有条件坚持下来的同志，留下来继续斗争。上海地下党学委，根据中央与华中局的指示，为老解放区建设和接管新解放城市需要，输送了大批干部。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有1000多学生干部（大部分是党员）安全撤退到了解放区。他们中间多数是去苏北和山东，部分去了大别山，少数去浙东四明山区。在解放区，中共华中工委在华中党校专门设了上海学生大队。以后这批干部，随军南下，大部分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接管工作，一部分去西南或其他地区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同时也十分关心被捕学生的安全，积极组织了营救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被捕学生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因此在社会、家属、学校及被捕学生的坚决斗争下，敌人被迫陆续释放被捕学生。这次反逮捕斗争，再次表现出党领导白区工作的高度斗争艺术，生动体现了党对广大学生的无限爱护。

二、将革命进行到底，迎接全国解放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0—312页。

量和精锐部队已被消灭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覆灭的前夕。根据党的指示，这时国统区学生工作的重点，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教育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学生开展护校斗争，迎接解放。

1. 揭露敌人假和平的阴谋

1949年1月30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面临覆灭的绝境，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在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动下，一面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又玩弄"和平"花招，妄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卷土重来。美帝国主义为了帮助中国的反动派取得喘息的时间，在1948年下半年就从各方面策动重开"和谈"，企图以"和平"攻势来挽救反动派的军事溃败。12月25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逼他下台的"和平解决"的要求，当时在白崇禧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要蒋介石"恢复和谈"。蒋介石既遭到三大战役的致命打击，又受到美国主子和桂系势力的内外催逼，遂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声明。但是，蒋介石在其"和平"叫嚷中，却要求保存他的伪宪法、伪法统和他的反动军队等等，显然这样的"和平"，只是一种欺骗和阴谋。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以便保存反动势力。有一些冒充人民朋友的"自由主义人士"则要我们对敌人"怜惜"、"仁慈"，接受美蒋反动派的"和平"。有人甚至主张以长江为界，搞所谓"南北朝"。这样，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就成了全党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1949年元旦，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同时告诫一些朋友，决不能怜惜敌人，而要慎重地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同中

国共产党真正合作，共同努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和平”阴谋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指出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声明说：“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就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得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① 毛泽东的这一声明，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并给予蒋介石的假和平声明以致命的打击，从而使蒋介石于一个星期之后，即1月2日，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而由代总统李宗仁出场”。此后，李宗仁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的8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而蒋介石仍躲在幕后进行指挥。对于国民党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是洞悉其奸的。但为了以真和平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争取尽快地缩短战争时间和减少战争的破坏，中国共产党没有拒绝他的要求。3月26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定于4月1日在北平和国民党举行谈判。李宗仁政府遂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谈判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于4月1日飞到北平。在国民党代表飞抵北平的同一天，南京14个专科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89页。

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为代表团送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8项和平条件。飞机起飞3小时后，蒋介石授意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指使军警特务殴打学生，打死2人，打伤100多人，造成南京四一惨案。四一惨案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学生对反动政府的暴行无不深恶痛绝，义愤填膺。交大、复旦、同济等校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向校方总请假，以举行追悼会和座谈、进行募捐、慰问死难学生家属等方式，来支援南京学生的斗争。上海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行动十分恐惧，警备司令、特务头子跑到各校巡视，恐吓校方和学生，扬言和平谈判一破裂，就要立即大逮捕，"格杀勿论"。各校特务活动猖獗，竭力搜集黑名单，对积极分子监视盯梢。李宗仁政府既然愿意以中国共产党的8项条件为基础实现国内和平，就应当逮捕南京惨案的主凶和暴徒，严惩破坏和谈的反革命分子，但李宗仁政府对南京惨案的凶手，不作任何处理的表示，这就表明了李宗仁政府并无争取和平的丝毫诚意。

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自4月1日开始到12日，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至15日又拟定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最后修正案"是以中国共产党的8项条件为基础而商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国内和平，曾作了极为宽大的有原则的让步。如对惩办战犯一项，"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准予依照战犯的表现情形，分别处理，规定："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此外，对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也拟定了宽大处理的办法，对其他各项问题也都作了适当的解决。上述协定，中共代表团宣布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李宗仁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至此，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也就宣告破产。

2. 组织起来，迎接解放

辽沈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包围了平津，达官贵人、巨商豪富，席卷金银细软，吵吵嚷嚷纷纷南逃。反动派在南逃之际，企图协迫平津各校南迁。1948 年 11 月 24 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督学”专程抵达北平与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校长正式交换意见，声称：“在遇万一时，政府为保护民族文化决定全力设法抢救。”针对敌人与人民争夺知识分子的阴谋，平津的地下党部署了北平学生运动的最后任务：保护学校、反对南迁，争取知识分子留下，配合解放军解放平津，让所有的大学完整回到人民的手中。各校地下党组织都向党员传达了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与任务，对迎接解放的工作进行了周密具体的部署。

第一，组织发动同学反对学校南迁的斗争。反迁校斗争的重点是争取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留下，为新中国服务。各校党组织都以主要力量从事这项工作。一方面，通过学习成绩好、为教授所赏识的同学去做教授、专家、学者的工作，向他们说明形势、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通过这一工作，除极个别的反动知识分子愿做蒋家王朝的陪葬者而孤雁南飞外，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另一方面，通过壁报和各种读书会的宣传形式，说明利害，反对迁校。特别是通过当初东北流亡学生的血的教训，证明南迁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圈套。同时，通过秘密印刷有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文件以及解放军生活和教育状况的宣传材料，使广大师生员工安下心来，积极参加护校和迎接解放的斗争。

第二，开展争生存求温饱的斗争。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宣布废止法币，发行金元券，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这实际上是对国统区人民的一次空前的大搜刮。“限价”使一些贸易转入黑市，而后使物价猛涨，而工人职员的工资、学生的公费却被冻结，使人民生活比“改革”前更加恶劣。于是北平首先发动了争温饱

运动。1948年10月24日，北大等6校学生自治会提出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减轻家长负担3项要求。25日，北大82位教授宣布为饥寒所迫，停课3天进行借贷。接着，师大、清华、燕京等大学和各中小学校教师也相继停教。北大教师停教后，学生当天举行了同情罢课。26日成立了争温饱委员会，要求全面配售必需品，增加公费名额，公费中全部主食发给食物，副食品要逐月调整等。27日，清华学生成立了反饥饿争生存委员会，宣布总请假3天。争温饱求生存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掠夺人民、残害教育的罪行，有力地配合了争取知识分子留下来的工作。

第三，开展"应变"与护校斗争。国民党当局准备南逃之前提出了"应变"的口号，规定"疏散"人员发给"应变"费，非"疏散"人员也可预支3个月的工资。党利用了国民党"应变"口号的合法性，发动各校学生组成"应变委员会"，一面向国民党要"应变"粮、"应变"钱，蓄粮筹款，一面组织起来加强护校。党派出同学去各系、馆、部门暗中清点登记学校资产，特别注意保护图书、设备仪器，以防反动派偷窃、破坏和转移。同时，对各类人员情况作系统了解，以备查询。为了防止国民党撤退前的破坏，各校由身强力壮的党员、民盟盟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护校纠察队，日夜巡守保护学校，监视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分子的活动。

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解放，学生的斗争并未终止，他们除了积极复课外，一部分学生考入了华北大学等革命学校，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参加了革命工作；还有一批思想先进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随军南下工作团，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新的战斗。

在平津的学生欢庆解放的时候，南方各校同学正处在迎接解放最紧张的阶段。南京各校学生都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南京专科以上学校应变联席委员会，领导同学一边坚持上课，一边调查学校的人员、物资情况，为接管作准备。1949年1

月下旬，中央大学代校长周鸿经等携款潜逃。中大师生在党的领导下，立即成立了以梁希、潘菽等进步教授为骨干的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主持校务。各系科学生推举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学生应变委员会。会议决定：反对国民党教育部委派校长，要求国民党政府拨给“应变”粮、“应变”钱，释放被捕学生。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第3天，中大应变会就组织全体师生向李宗仁政府请愿，要求撤查周鸿经，承认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合法职权，速拨应变经费，释放被捕同学。李宗仁迫于压力，发给了一部分“应变”费和两个月的“应变”粮。

学生应变会成立后，立即建立起警卫、消防、救护、联络、物资储备、生活福利等组织，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和一部分家属都动员起来，各司其事。他们把粮食一部分存入仓库，一部分分散各人手里保管。同时，学校的交通要道和一些主要场所，如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工厂、仓库、财务部门等处，都派有专人值班，严加保护。中大几千名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英勇斗争，挫败了敌人的各种阴谋，保护了学校，直到南京解放。

上海各大中学校，由于1948年秋大批党员、积极分子疏散到解放区，许多学校党员与积极分子数量减少了，远远不能适应领导群众运动开展斗争的需要。为了确保党能领导学生群众迎接解放的斗争，党组织抓紧时机，吸收了一批经过历次斗争锻炼和考验的积极分子为新党员。由于吸收了这批新党员，党在重点学校的基层组织加强了，同时还在一批中学里建立了党支部，为上海的解放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三、全国学生大团结

1. 第十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为了把全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和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3月1日至6日，在中国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北平隆重举行了全国学联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209人，除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因为时间来不及未到以外，全国各地都有代表。有老解放区的代表，新解放区的代表，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尤其是全国著名的大学都有代表参加。"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共产党员129人，青年团员24人，非党、团群众56人，他们代表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100余万大中学生"。①"但是，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团缺乏得力的干部领导，彼此互不熟悉，互不了解。主席团是各地来的学生代表组成的，亦缺乏经验。特别是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生代表，思想意识较差，组织观念薄弱，自由主义作风浓厚"。②所以，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在任弼时的指导下，由冯文彬具体领导，对开好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会前作了领导与群众的准备。领导的准备，主要是写好大会的主要文件；群众的准备，是通过宣传使代表了解会议的目的和内容。

其次，明确会议的宗旨和方针。这次大会是以团结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工农群众服务为中心。

再其次，加强党的集中和统一领导，每个代表团都有核心领导。会前召开全体党团员会议，讲清楚大会的意义、目的、方针、党团员的任务等。

3月1日，大会正式开幕。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冯文彬代表解放区青联向大会致词，各界知名人士郭沫若、沈钧儒、张溪若、周扬、许之桢、李德全、马叙伦、许德珩等也出席了大会

①② 《学联代表大会秘书处向毛主席汇报》全国学联文书档案1号。

并作讲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发了贺电，贺电充分肯定了中国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作出的光辉贡献。同时，贺电希望“大会能号召全国学生再接再厉，积极地参加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使这个斗争迅速地获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地加强与劳动人民的联系，不断地掌握科学知识，以便在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完成新的历史任务。”① 会议期间，代表们听取了冯文彬作的题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工农群众服务》的讲话，他指出：“学生与工农群众结合，为工农群众服务，这是学生运动的唯一正确方向。”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决议指出：“30年来的中国学生运动，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国度中，它曾经不仅起了传播革命理论的桥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即将完全灭亡，中国快要解放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在作垂死挣扎，在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动下，企图以虚伪的和平口号，保存残余的军事力量，以便卷土重来。”因此，决议指出当前中国学生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真正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加紧努力，粉碎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虚伪和平，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规定本会是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本会的宗旨为“团结全国同学，谋取同学福利，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文化科学知识，培养自己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有用人才，与全国人民一道为争取新民主主义

① 《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

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并联合全世界青年，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而奋斗。”

大会选举了西北区程浩、杨光斗、聂维庆、吴剑夫，华北区施不为、李桂荣、晏福民，东北区刘廉如、冯荫复、杨健伯、徐净武、郭永泽，华东区范均（女）、谭明甲、翁奎生，中原区丁力、李公天、王云祥、曹廷芳，北平区刘希圣（后改谢邦定）、黄祖民、姚培芳（女），天津区冯彬彬（女）、吴功俊，上海区周寿昌、何长城、陈震中、黄震声、刘修正（女），南京区黄鹤祯、赵树民，武汉区王云从（女），广州区何锡金，沈阳区张桂云，西安区王天元，浙江区李景先等42名执行委员，由谢邦定为全国学联主席，程浩、刘廉儒、晏福民、丁力、范均、陈震中为副主席，[①] 组成全国学联领导机关——中华全国学联执委会，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

朱德为大会题词：“庆祝你们在解放了的北平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这是你们的幸运。请你们努力学习一切科学，掌握一切技术，在这个得到了自由的美丽的锦绣山河上欢迎你们来参加人民大众的新建设，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富强的繁荣的新中国。”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是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学生胜利的大会师，她标志着中国学生空前的大团结和进步。

2. 全国学生运动的核心——青年团

为了把学生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以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使学生运动在新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在广大青年中建立党的后备军。同时，也是为了满足经过长期的各种斗争锻炼和共产党的教育而涌现出大批先进青年的要求，党中央于1949年元旦，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① 《中国学生运动大团结》，北京图书馆。

决议》，号召在全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决议》明确规定了团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建团的方针和步骤。

建团《决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的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它的任务，就是首先要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再经过这种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和中国人民一道，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并在这种实践的奋斗中不断地教育中国的青年。"青年团"吸收一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为新民主主义的事业而积极奋斗，愿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的男女青年为团员，年龄一般地应为15岁至25岁。"《决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决议》还指出，建立全国性的和各地方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当前青年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党在目前革命形势发展下极重要的工作之一，各地党委必须予以重视。

2月间，成立了由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领导的全国青年团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4月11日至18日，在北平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部队中的战斗英雄，有工厂、农村中的劳动模范，有学校中的学习模范，有中国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各个时期的代表，共364人，代表了19万全国各地的青年团员。

朱德总司令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

报告。报告对过去青年工作的成绩与偏向作了总结，提出了今后青年运动的方向和青年团的任务。冯文彬作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报告对青年团的任务、工作、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团与各方面的关系和团中央的工作等6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指示青年团要"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并接见了到会的代表。朱德总司令也为大会题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完全胜利，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已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大会一致选举任弼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通过了团的章程、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的任务等决议；选出了第一届团中央委员会，冯文彬当选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任副书记。大会决定以《中国青年》杂志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组织广大青年学习，指导团的工作；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为中央团校，训练大批青年团的工作干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青年长期教育和培养的结果。它的建立，使中国青年运动包括学生运动有了自己的核心，标志着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标志着全国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解放区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同学，团结教师，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提高同学们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水平，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培养各种人才。为夺取全国胜利，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各项工作，如参军、宣传、慰劳解放军和伤病员、慰问军人家属、普及教育和参加各种建设活动等。

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揭穿国民

党反动派的虚伪和平等，如上海学联针对部分学生中对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和平花招的模糊思想，《学生报》专门编辑了“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专栏，和“战犯介绍”、“要彻底全部实行八项和平条件”等专辑。[①] 同济大学学生把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1949年4月21日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及4月2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翻印后散发到社会上去。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组织秘密的保安队（地下军）和宣传队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及公共场所，不让敌人破坏；为人民解放军作向导；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战争罪犯；瓦解敌军，收缴敌人武器。

4月下旬，全市组织在人民保安队中的进步群众已达6万人，其中学生超过1万人，连同宣传队等其他形式组织起来的群众约有10万人。几个重点学校有组织的学生占该校学生数的80%，一般学校约占30%。这支队伍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了很多工作。

第一，组织“应变”和护校斗争。许多学校除利用“应变”这个合法的口号与国民党展开斗争之外，就是建立巡逻队值班制。交通大学每天出动200多名人民保安队员分散在各个岗位，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使整个学校戒备森严，敌人很难乘虚而入。对校内教授，特别是校长，密切注视，掌握动态，加强工作。有个大学的校长，在去留问题上举棋不定，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该校地下党组织立即派专人对他进行说服教育，解除思想顾虑，坚定了他留下的决心。他答应做到：不去台湾；保护好学校的仪器、图书和设备；尽力保护师生的人身安全。

① 《上海学生运动史》。

第二，向国民党军警、官员提出警告，要他们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如果继续为非作歹，定不宽待。采取写信、寄宣传品、打电话、个别会晤等方式，针对军警官员的不同特点，进行政策攻心，这对瓦解敌人营垒起了不少作用。有的反动分子接到突如其来的警告信，看了信上列举的他自认为秘密的事情和所有的罪行后，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主动向我地下党员、积极分子打招呼，表示要悔过自新，有的打算另找出路。大灭了反动分子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斗志。

第三，为解放军进攻上海做搜集情报工作。学生们冒着危险，用各种办法调查摸清敌人的据点、兵力和装备等军事情报，同时对各个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设备、资财以及国民党特务的名单等政治、经济、组织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调查整理，逐级上交，由地下市委汇集送交已经到达丹阳的华东局，为顺利解放上海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 月 21 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覆灭。

5 月 27 日，上海全部解放。这一天，爱国青年学生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走上街头，和全市人民一起，举起“欢迎解放军”的横幅，扭起秧歌，纵情高唱《我们的队伍来了》，热烈欢庆上海解放。艺术院校的学生们，赶绘了上海第一幅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高高悬挂在大世界街头，表达了上海学生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深切感情。

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开始公开活动。上海学联发表了《庆祝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和《迎接上海解放告同学书》，号召各校同学迅速复课，参加维持社会秩序和宣传工

作。广大学生对迅速恢复上海的社会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相继迎来了解放的曙光，第二条战线与人民解放军配合，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决战，埋葬了蒋家王朝，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伟大使命。

30年来，中华全国的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继承和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历尽艰辛，逐渐通过自身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喊出了人民的要求，使学生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民解放运动的号角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全国学联派出10名代表参加会议，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参加全国性的讨论建国大计的盛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踏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途！

后　记

30年来，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团结，并积极与进步人士合作，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英勇献身，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了使当代中国青年学生能了解中国学生运动光辉的斗争历史，学习我国学生运动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光荣传统，继承前辈创业的革命精神；引导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树立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和建设成就；理解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国情决定的，是中国人民自己历史性的选择；也是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必由之路，进而启发青年学生更自觉地为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而奋斗，特编写了这部《中国学生运动史》。

我们的编写工作是在团中央、全国学联的热情关怀和指导下，查阅了有关学生运动的历史档案资料，走访了不少当年从事学生运动的老同志的基础上，才最后编写完成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学生运动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由于

我们的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编写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同行专家、从事学运工作的前辈们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过程中，张惠英、张富财、张菊英、张静星、王蕙炎等同志参加了资料搜集和誊写等具体工作，谨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翟作君、蒋志彦编写，最后由翟作君终审、定稿。

编　者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1193282